分类号： I206
单位代码： 10028 学 号： 2020101017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论吴伟业的“诗史”观

——兼论与“梅村体”之关系

研 究 生： 张金环
指导教师： 左东岭 教授
学科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
学科方向： 中国古代诗学理论

2006年5月15日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分类号： I206
单位代码： 10028
学　号： 2020101017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论吴伟业的“诗史”观

——兼论与“梅村体”之关系

研 究 生： 张金环
指导教师： 左东岭　教授
学科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
学科方向： 中国古代诗学理论

2006 年 5 月 15 日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首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张金环

2006 年 5 月 18 日

首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首都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张金环

2006 年 5 月 18 日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内容提要

吴伟业是明清之际诗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本文以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为指导，在明清之际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探讨吴伟业核心诗学思想——“诗史”观形成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对中国古代诗学的贡献。

第一章探讨吴伟业诗史观的成因。明清之际的社会环境、实学思潮是影响吴伟业诗史观的主要外部原因。人格心态则是各种外部因素进入文学思想的中介，吴伟业从明亡前在经世理想与个体享乐间的矛盾徘徊，到明亡后既重命又重名的精心算计，再到仕清后饱受煎熬、愧悔与救赎相交织的复杂心态，是诗史观形成与发展的直接原因。

第二章论述吴伟业诗史观的具体内涵与发展演变过程。他认为诗史不仅应该记录时事，还应记录历史变迁过程中个体的内心感受，进而赋予了它“史外传心之史”的深层内涵。从明亡前的侧重客观记史，到明亡至仕清前的情、史并重，再到仕清后的以“心”传“史”，其诗史观经历了一个逐步发现并肯定诗史抒情功能的过程。

第三章论述诗史观在“梅村体”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及其在戏曲创作中的渗透。“梅村体”创作风貌从明亡前的以客观记事为主，到明亡后的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再到仕清后的情余于事，正是各阶段之诗史观的体现。其戏曲创作也明显体现了诗史观的影响。

第四章从文学创作的目的、影响创作的因素、文学批评三个层面来探讨诗史观所涉及的文学思想内涵。吴伟业视经世与不朽为文学的两大目的，视作者与时世为创作的两大决定因素，以才、性情、学识为作者的必备要素，提出了情、法完美结合的文学表现观，而这些思想恰是诗史观之不同侧面的体现或延伸。其“知人论世”批评观的新内涵，也同样体现了其独特的诗史观。

本文的基本观点：吴伟业诗史观主要是在明清之际社会环境、实学思潮与吴伟业人格心态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他没有停留在传统诗史观以客观记史为主要内容的层面上，而是发展了自身的新内涵，认为诗史不仅应该记录客观时事，还应记录历史变迁过程中个体的内心感受，进而赋予了它“史外传心之史”的深层内涵。与人格心态的发展演变一致，诗史观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明亡前的客观记史，到明亡后的情、史并重，再到仕清后的以“心”传“史”，是一个逐步发现并肯定诗史抒情功能的过程。“梅村体”的独特风貌及其发展演变，正是其诗史观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诗史观是吴伟业文学思想的核心，典型地体现了明清之际诗史观的新进展。

关键词： 吴伟业　“梅村体”　“诗史”观　明清之际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BSTRACT

Wu Weiy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ets between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crete con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poetry” which is Wu’s core idea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ese ancient poetry.

The first chapter mainly discussed how Wu’s idea about “historical poetry” comes into be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practical trend” are the main outer rea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dea. And his experience proceeded from the oxymoron between the idea about the country-governing and individual entertainment before the perish of Ming, to his eager purchase of being alive and remaining loyal to the former Ming, until his complicated thought tortured by regret, shame and wanting of redemption after his subdue to Qing serve as the direct reason for this idea which is the mediation for the various outer reasons effect on this idea.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d about the connot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is idea. He thought the “historical poetry” should include the facts as well as the feelings of individual during the historical precession which then changing into the new theory “the history of emotion synchronized with the facts”.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d about the embodiment of this idea in his works of “Meicun style” and other plays. The feature of this style changes from an emphasis on objective narration in Ming to the equal emphasis of narra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until the perfect mingle of the two after his subdue which is the very embodiment of his idea of “historical poetry” in each stage. The influence of this idea is also obvious in his plays.

The fourth chapter discussed about the correspondent literary theories with this idea in three aspects: the goal, the resources, and criticism of literary creation. He take the country-governing and the permanence of his literary fame as the two main purposes, take the narrator and the world, that i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as the two key resources, also his new theory of criticism “learn about the narrator and his time from his work”, all show his special idea of “historical poetry”.

The ground idea of this paper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 The “historical poetry” idea of Wu Weiye was developed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 social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environment in the joint of the Ming and Qing, the “practical trend” and personal mood. He developed his new theory of “historical poetry” which included the change of individual feeling in the history as well as the objective narration instead of sticking to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it, and eventually brought about the theory “the history of emotion synchronized with the facts”. Just like the evolution of his personal mood, this idea is also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by the Ming perish and subdue to Qing. The unique fe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Meicun style” is the very embodiment of this idea in his poetical practice. This idea is the core of Wu’s literary theory and typically embodie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poetry” in the joint of Ming and Qing.

Key words: Wu Weiye; “Meicun style”; “historical poetry” idea; the joint of Ming and Qing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目　录

绪　　论 1
一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
二　主要创新点 6
三　“梅村体”的重新审视 7
第一章　诗史观的成因：明清之际社会思潮与人格心态 13
第一节　明清之际社会思潮对诗史观的影响 13
一、吴中经世思潮的兴起 13
二、吴伟业与复社的实学思想 19
三、吴伟业与复社的经世致用文学思潮 25
第二节　人格心态与诗史观的形成 29
一、明亡之前：徘徊于“仕”与“隐”之间 29
二、易代至仕清之前：复杂微妙的遗民心态 37
三、仕清之后：忏悔与赎救相交织的复杂心态 43
第二章　诗史观：“梅村体”之核心思想 56
第一节　吴伟业“诗史”观的内涵 56
一、诗史的基本性质：记事要“真”、论事要“当” 57
二、诗史的基本功能：反映“世运升降、时政得失” 63
三、诗史的深层内涵：“史外传心之史” 66
第二节　诗史观的发展演变：从存“史”到“传心” 71
一、自觉以“诗”存“史”的早期诗史观 71
二、记史与传情并重的创作倾向 73
三、以“心”传“史”的晚年“心史”观 79
第三章　诗史观之体现：“梅村体”之创作实践 83
第一节　“梅村体”创作风貌的发展演变 83
一、明亡之前：客观记事 83
二、易代至仕清之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 85
三、仕清之后：情余于事 102
第二节　“诗史”观向戏曲的渗透 111
第四章　诗史观所涉及的文学思想内涵 120
第一节　经世与不朽并重的文学目的 120
第二节　作者与时世并重的创作论 124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三节 “知人论世”批评观的新内涵 136
结 语 143
主要参考文献 147
致 谢 154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绪　论

诗史思想是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文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吴伟业诗史观支配下的“梅村体”既继承了此前“诗史”记录时事的传统，又突破了此前“诗史”脱离诗歌抒情本质的局限，体现了明清之际诗史观的新进展。本文的核心论题就是探讨吴伟业的核心诗学思想——“诗史”观形成与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对中国古代诗学的独特贡献。

一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由于吴伟业本人的气节问题及时代思想的局限，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其诗歌成就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1949年以前，文学史著作中虽有所涉及，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李维《诗史》、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但基本上仍沿用清人的观点，尤其是四库馆臣之论，并未进一步作深入的理论探讨。相对来说，梁乙真《中国文学史话》对吴诗“哀感顽艳”的美学风格及其仕清后的“枉节自恨”之作分析较为深刻。[1]1949年以后，学界则往往从阶级观点出发，因其气节问题而否定其诗歌成就。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吴伟业虽然对清征服者也无好感，但反对农民起义，其思想“基本上属于封建儒家体系”。虽然不愿出仕，但态度是“乞求”而非反抗，所以是一个“骨头不硬，缺乏反抗性的人”。[2]又如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也强调“诬蔑农民军”、“不直接揭露民族叛徒”是吴诗的弱点。[3]这30年的时间里，关于吴伟业的研究论文共有6篇：《吴梅村佚诗八首》、《吴梅村逸诗》、《谈迁与吴梅村》、《吴梅村绝笔词质疑》、《略谈吴梅村的七言古诗极其<萧史青门曲>》、《吴伟业<圆圆曲>与<楚两生行>的作期》，[4]也仅是一些材料辑佚与考证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伟业诗歌才重新受到学界的关注：

一、80年代至90年代，在承认其诗歌“诗史”特质的前提下，以索隐批评为主导，侧重史实的考证。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第一，《圆圆曲》是否为纪实之作；第二，吴伟业仕清的原因，并由此展开了一场论争，规模虽不大，却一直持续到80年代

1　梁乙真《中国文学史话》第二十九章《清代的诗词》，上海元新书局1934年印行。
2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清代文学》第一章第二节《诗歌、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3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修订本）》第八编第一章第二节《清初的诗派和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据中山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第85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末。

这场论争首先是由姚雪垠《论<圆圆曲>》[1]一文发端，随后一系列文章参与了论辩。如万搽一《对〈论<圆圆曲>〉的一点质疑》[2]、童思翼《<圆圆曲>辩》[3]、王孟白《吴梅村及其诗歌评价问题（兼与姚雪垠、黄裳同志商榷）》[4]等，他们的论争虽然并未触及文学创作、文学思想本身，客观上却触发了对文学本身的关注，即什么是“诗史”？诗歌与历史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到了80年代中期，研究进一步深化，主要表现是刘世南与王兴康相互辩驳的三篇文章：刘世南《吴伟业论》认为“吴诗虽号‘诗史’，其实是名不副实的”，其理由有三：（1）吴诗无“讽谕实质”；（2）吴伟业对现实的认识肤浅，对农民起义极端仇视，其诗“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的挽歌”；（3）吴伟业在诗中颂扬清朝。[5]而王兴康《关于吴伟业及其诗的评价问题：与刘世南同志商榷》则针对“诗史”的概念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应该按“古人”理解的“诗史”来衡量吴诗，“只要能在诗中较真实地反映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主要是政治事件），反映这些历史事件在人民中引起的反应，就可以称之为‘诗史’，而没有必要同时要求能够有‘讽谕’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有反封建的内容。”[6]刘世南《再论吴伟业及其诗：答王兴康同志》再申前说，并提出“马列主义的批判精神”作为衡量“诗史”的标准。[7]二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处理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显然以“马列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苛求古代的文人，是一种不尊重历史的表现，以此衡量古代文学作品的优劣也是违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做法。直到80年代后期，徐仲伟《<圆圆曲>真实辩》一文，才针对这一文学理论问题对《圆圆曲》是否为“诗史”的论争做了比较客观的总结：“如以史家的眼光，按‘信史’的要求，去考察‘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话，那它是不合格的，它不是‘不空’而是‘空’得很厉害，如果把它坐实理解，就未免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而“艺术的目的不在对生活作客观地摹写，而在能动地主观表现，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了对象本身的生活真实而达到的意念的真实。”所以《圆圆曲》作为文学作品而非历史著述是“运用典型化的方法，把吴三桂降清诸因素中陈圆圆的作用提取出来，加以突出，放大”从而“使得对吴三桂的讽刺更沉痛、更有力。”所以“《圆圆曲》的真实性是一种文学的真实性，把它视为向壁之作固然不妥，但目为‘信史’又未免太过。它是一首以一定史实为依据，经过作者创造性的提炼加工，具有浓重抒情色彩的叙事诗”。[8]从现代文学理论的高度肯定了吴伟业“诗史”的文学价值。

---

1 《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
2 《书林》1980年第6期。
3 《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
4 《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
5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6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7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8 《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总之，80 年代这场论争，基本上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反映了当时人对“诗史”的认识，尚未涉及吴伟业本人的“诗史”观念。这一时期除了围绕这两个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外，其他方面的研究文章为数不多。其中黄天骥《论吴梅村的诗风与人品》一文可以说是较有深度的力作，比较深入地分析了社会处境、人格心态与诗歌风格的关系。[1]

二、90 年代以后，基本上从 80 年代对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转向了对文学本身的关注。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对其诗歌内容与形式诸方面的特征展开了讨论，但直到目前，大都侧重文本分析，对其诗学思想的研究则相当薄弱。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专著：1990 年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1994 年裴世俊《吴梅村诗歌创作探析》，1998 年伍福美《吴梅村诗歌艺术新论》，1999 年叶君远《吴伟业评传》，2000 年 Tung Yuan-fang《Two Journeys to the Nor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etic Journals of Wen T’ien-hsiang and Wu Mei-ts’un 》(文天祥与吴梅村两组北行诗的比较研究)、王建生《增订本吴梅村研究》，2001 年徐江《吴梅村研究》、施祖毓《吴梅村歌诗编年笺释》，2003 年施祖毓《吴梅村钩沉》；还出现了几篇博士论文（未出版）：1995 年程相占《吴伟业与中国古代叙事诗》、1999 年何锐钰《吴伟业诗歌研究》、2002 年孙利平《吴伟业戏曲研究》。其中冯、叶《年谱》为此时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材料基础。这些专著侧重对作品进行横向、静止的剖析，而不是揭示其文学思想的动态发展过程。

这一时期的研究论文也非常多，与研究专著一样，大都聚焦于文本本身。首先，诗歌的艺术特征最受关注。出现了大量论文：叶君远《论吴梅村的早期诗歌》批驳了清人如四库馆臣、朱庭珍《筱园诗话》等早期吴诗为“艳体”的观点，认为早期的梅村诗已具备了“激楚苍凉”的特征。[2]而王于飞《吴伟业早期艳体诗略论》对此提出了质疑，结合同时期的词作，重申早期诗为“艳体”之说。[3]曾思艺《以词法写叙事诗》[4]、向琪《吴梅村叙事诗的传奇色彩》[5]则探讨了词、曲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另外如蒋炜《谈吴梅村后期诗歌》[6]、裴世俊《简论吴梅村诗歌的悲剧特色》[7]、叶君远《论吴梅村诗歌的艺术特色》[8]、李世英《论吴伟业叙事诗的审美特征》[9]、陈抱成《论吴伟

[1] 《文学评论》1985 年第 2 期。
[2]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 年第 1 期。
[3]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
[4]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4 年第 3 期。
[5]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6] 《吴中学刊》1991 年第 3 期。
[7]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5 期。
[8]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
[9] 《殷都学刊》1999 年第 2 期。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业叙事诗的艺术特色》[1]、郭建球《论吴梅村叙事诗的艺术成就》[2]、李秀成《吴梅村的诗歌艺术》[3]等等，都是对吴诗艺术成就的研究。其次，开始关注心态与创作关系。如徐江《吴梅村八年遗民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政治心态》[4]、沈金浩《懊丧心态笼罩下的“意识流”：吴伟业<过淮阴有感>解析》[5]、刘彦君《失节之痛——吴伟业传奇论》[6]、王于飞《从<临春阁>到<秣陵春>——吴梅村剧作与清初士人心态的变迁》[7]等文章都注意到了作者心态对创作的直接影响。魏中林《徘徊于灵与肉之际的悲歌——论吴梅村诗歌中的自我忏悔》可以说是其中的一篇力作，从吴伟业灵与肉相冲突的矛盾心态出发，分析了其晚年诗歌创作中“真挚而强烈”的忏悔情感。[8]

此时期的专门史著作，也明显反映了上述特点。如朱则杰《清诗史》分析了“梅村体”在内容与形式上对元、白歌行的继承与发展，并指出了吴伟业自觉的“诗史”创作动机：“吴伟业创作‘诗史’，……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有意以诗为史，以此作为追求的目标”。[9]又如严迪昌《清诗史》则从分析人格心态入手，认为吴伟业仕清的决定因素是“名心未除”；认为“深情丽藻，是构成‘梅村体诗史’特色的关键因素”；并且敏锐地指出吴伟业创作动机中对“身后名”的考虑：“诗人是聪明的，他生前先自责‘失身’，而‘万古惭愧’，必为‘后世儒者所笑’，后世之人也就真能宽宥、同情他。”所以“姑勿论其诗，即以其人心态的层叠复杂看，以他对诗的深具生命价值的认识而言，已是诗史所罕见。吴梅村的存在，意味着作为言志抒情的诗这一文体，进入了载负能量更见深广，其承托的‘心声’也将愈见转曲襞积”。[10]但由于不是专门研究，故对此问题未能展开论述，也未由此进一步分析这种动机、心态与诗学思想的关系。

此时期对吴伟业诗学思想的探讨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只有为数不多的专题论文。程相占《吴伟业的诗史思想》论述了“吴伟业言论中有关诗史的看法”，并用诗歌作品予以印证。[11]魏中林《诗史思维与梅村体史诗》一文分析了“梅村体”诗心与史思异质同构的思维方式。[12]章培恒《试论吴伟业的文学创作——以其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关系为中心》一文则通过对吴伟业诗歌与戏曲创作的分析，揭示了其文学思想与晚明性

---

1 《郑州大学学报》1981 年第 1 期。
2 《中国文学研究》1997 年第 1 期。
3 《湖北大学学报》1991 年第 1 期。
4 《河南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
5 《文史知识》1995 年第 12 期。
6 《中国文化报》1999 年 12 期。
7 《浙江学刊》2001 年第 2 期。
8 《苏州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9 朱则杰《清诗史》第四章《吴伟业和古代叙事诗的高峰》，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10 严迪昌《清诗史》第二编第一章第二节《吴伟业及“娄东诗群”》，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11 苏州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1 期。
12 《文学遗产》2003 年第 3 期。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灵文学思潮相通的一面。[1]林启柱《试论吴伟业的文学思想及其渊源》强调吴伟业对明七子派复古思想的继承，认为“吴伟业的复古文学思想，更直接以明七子为其渊源，而且对七子以复古为革新的现实主义精神有所发扬。”“尽管吴伟业对明七子理论有所突破和发展，但他的诗学主张基本上是倒向七子一边的，在明季诗文领域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中鲜明地站在复古立场上极力为七子辩护”。[2]叶君远《浅论吴梅村的诗文观》[3]、徐江《吴梅村诗学理论刍论》[4]对吴伟业理论表述中提到的一些主要观点，作了分析说明。

从总体上来说，目前学界关于吴伟业诗歌的研究，以文本本身研究为主，多从平面展开，探讨其方方面面的特征，关于诗学思想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薄弱，研究中尚存在许多问题，譬如：

第一，大多数研究均聚焦于其诗歌的“诗史”价值及自成体派的艺术成就，而忽略了对思想成因的揭示，缺乏对吴伟业本人“诗史”观念的探讨，以致对吴伟业“诗史”的认识也存在偏差。论者普遍将吴伟业晚年以“心”传“史”的诗歌排除在“诗史”之外，这并不符合吴伟业本人的诗史观念，因为他明确提出过“史外传心之史”的理论命题。也正是职此之故，关于“梅村体”的理解也存在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因为诗歌本身呈现出来的特征总是多样性的，以此为标准来界定“梅村体”就难免顾此失彼。

第二，关于吴伟业诗学思想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大都从纯理论的角度条分缕析，缺乏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也缺乏对思想发展变化的关注。涉及其诗学渊源的研究，仍然延续清人的观点，强调其继承前后七子“宗唐”思想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他众多因素。整个明代，文学流派纷争，心学思潮引导下的性灵文学思潮，已对七子的复古思想产生了强烈冲击；吴中文学张扬个性、热衷结社的传统，随着吴中地域经济、文人社会地位与思想的改变，以更加复杂的形式被保留……它们在与复古文学思想竞相纷争的过程中，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复古”的弊端。所以，处在明末清初之吴中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与特殊地域的吴伟业，诗学思想成因是非常复杂的。

第三，涉及吴伟业心态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大都强调“文如其人”的一面而忽略了“文不如其人”的一面。原因是受传统“文如其人”思想的影响，未能深入、准确地把握其真实的人格心态，以致对其创作动机的理解存在偏差。

---

[1] 《长江学术》第 6 辑。
[2]《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 3 期。
[3] 见叶君远《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1 版。
[4]《中国文化研究》2002 夏之卷。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　主要创新点

本文以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为指导，既将吴伟业放在明清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进程与吴中这一特定的地域传统中，又将其放在明清之际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中来考察，通过人格心态的分析，将创作与理论相结合，探讨其核心诗学思想——“诗史”观的成因与发展过程及其与“梅村体”的关系，进而剖析其在明清之际文学思潮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古代诗学的贡献。

主要创新点如下：

一、吴伟业与明清之际的社会思潮。吴伟业“诗史”观受到了东林学派与复社实学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已是学界的共识。本文主要通过吴伟业交游情况的考察，进一步探讨他具体接受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二、吴伟业的人格心态。人格心态是各种外部因素影响文学思想的中介，也是理论认识与创作实践的中介，直接决定着作者的创作心态。吴伟业人格心态的层叠复杂，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是非常罕见的。对此，现有研究在论述其文学创作时已有所涉及，但大多只注意到“文如其人”的一面，而忽略“文不如其人”的一面，对其具体发展过程与演变原因也无专门论述。本文全面论述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并着重探讨其掩藏在文学背后、“文不如其人”的一面，进而揭示出明清之际文人在生命与名节间饱受煎熬的普遍心态。

三、吴伟业“诗史”观的具体内涵及其形成过程与演变原因。目前学界对吴伟业“诗史”观具体内涵的探讨仍然不够深入，对其形成发展过程与演变原因也无专门论述。本文将吴伟业本人的理论表述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并结合明清之际其他文人对“诗史”的理解，来探讨其“诗史”观的具体内涵与形成过程及演变原因，从而揭示出他对中国古代“诗史”思想的贡献。

四、吴伟业“诗史”观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学界对“梅村体”艺术特征的研究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但由于对其核心思想——“诗史”观的理解不够深入，所以对“梅村体”的理解也仍然存在偏差，以致把长篇歌行以外的所有作品都排除在了“梅村体”之外。本文则在重新界定“梅村体”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这些特征形成的原因，认为是其“诗史”观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并探讨其“诗史”观对戏曲创作的影响。

五、“诗史”观所涉及的文学思想内涵。关于吴伟业的文学思想，许多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诸如文学在吴伟业人生中的作用，应如何创作，文学创作应表现哪些内容，什么是好的文学等等。本文从文学创作的目的、文学创作的要素、文学批评三个层面展开探讨这些问题，从而揭示出“诗史”观在吴伟业文学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以上五个方面都是围绕本文的核心论题展开的，本文的核心论题就是吴伟业“诗史”观形成发展的具体过程与演变原因及其对中国古代诗学的贡献。

三 “梅村体”的重新审视

关于“梅村体”，学界通常认为是指吴伟业的七言歌行叙事诗，同时又强调其反映明清之际时事的“诗史”内容。[1]这种理解的确抓住了吴伟业诗歌在体式、创作方式、题材方面呈现出的显著特征，但仔细推敲却仍有顾此失彼，甚至纠缠矛盾之处：吴伟业的七言歌行既有叙事作品，也有大量叙事与传情并重的作品与以抒情为主的作品，前人即往往用“情文兼至”[2]、“情余于文”[3]来形容其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其歌行叙事诗有的反映时事，而有的却与时事无关，如《画兰曲》、《三松老人歌》、《百花骢歌》等；反过来，吴伟业的叙事诗既有七言歌行，也有五古、排律、律诗、绝句等其他诗体；其“诗史”作品有的以叙事为主，而有的却是以抒情为主的“史外传心之史”。因此，以诗歌外在特征为标准进行界定，往往难免顾此失彼，甚至自相矛盾。若只有同时具备“七言歌行”、“叙事诗”、反映时事的“诗史”内容几个特征才成其为“梅村体”的话，其总数不过数十篇而已，吴伟业大量富有独创性的作品将均被排除在外，还能否称之为一“体”也将值得商榷。事实上，一种诗歌体派的独特风貌虽然呈现为一系列外在特征，但这些特征形成的根源却是诗人独特的诗歌观念。因此，笔者以吴伟业的诗学观念为标准，重新审视“梅村体”。

一、吴伟业“诗史”观与“梅村体”之关系

确如许多论者所言，吴伟业诗歌不仅客观上“可备一代诗史”，而且诗人本身也具有自觉的“诗史”动机。如多数论者都曾引用过的《梅村诗话》关于《临江参军》的“诗史”定位就是一个明显而有力的证据。另外，吴伟业对其许多代表性诗作均明确以“诗史”自视，如《思陵长公主挽诗》：“他年标信史，同日见高皇。”《雕桥庄歌》：“黄巾从此成贻祸，青史谁来问断编。”《银泉山》：“总为是非留信史，却怜恩宠异前王。”他还往往以“序”、“引”或“注”来补充说明诗歌所纪史实，如《木棉吟·序》云“今累岁弗登，价钱如土，不足以供常赋矣。余作《木棉吟》纪之，俾盛衰得所考

[1] 可见林启柱《梅村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们和影响》（渝州大学学报 199 年第 2 期）、叶君远《论“梅村体”》（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2 年第 2 期）、曾垂超《“梅村体”辨》（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2002 年第 4 期）、高永年《论梅村体的个性风貌》（江苏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2 期）等研究成果。

[2]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第 2355 页，郭绍虞《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3] 赵翼《瓯北诗话》卷九，第 13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焉。”明确以反映历史盛衰为目的；又如《琵琶行》、《楚两生行》、《雁门尚书行》、《咏拙政园山茶花》、《矾青湖》等被公认为“梅村体”的七言歌行，《观蜀鹃啼剧有感》、《赠荆州守袁大韫玉》、《寄房师周芮公先生》等目前尚被排除在“梅村体”之外的律诗，均通过序言传达了自觉的纪“史”动机。所以，“诗史”观是指导其诗歌创作的核心思想。那么与传统“诗史”观相比，吴伟业的“诗史”观有那些新进展呢？

首先，吴伟业明确以纪事之“真”与论事之“当”规定“诗史”。[1]所谓“真”即真实地记录史实；所谓“当”即客观、公正地评判史实，这就要有批判现实、秉笔直书的勇气与捍卫正义、褒善贬恶的道义情怀。显然，这一观点主要还是对传统“诗史”观的继承。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吴伟业不是阐释他人诗歌，而是自觉以此规定个人创作。宋代“诗史”说主要是从“用诗”的角度阐释杜甫诗歌的纪“史”功能，直到宋元之际，这种对诗歌客观功能的认识，才逐渐渗透进诗人的主观创作动机，在与杜甫相似的丧乱经历激发下，产生了自觉的“诗史”创作意识。但这一现象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相反，随着崇唐抑宋文学思潮的兴起，明代诗学对宋代“诗史”说展开了猛烈批判，甚至予以彻底否定，认为它脱离了诗歌的抒情本质。在明末清初这一天崩地解的历史背景下，吴伟业不仅重新肯定了“诗史”的纪事、议论功能，而且自觉以此指导个人创作。所以与此前“诗史”相比，他的诗歌记史功能更自觉、更集中，史学价值更突出。如七绝《墙子路》记崇祯十一年清军入侵墙子岭之事，七律《怀杨机部军前》、《再怀杨机部》及七古《读杨参军悲钜鹿诗》、五古《临江参军》记钜鹿之战的前后情况及经过，五古《襄阳乐》记崇祯十四年张献忠陷襄阳之事……都是明清易代史上关系重大的事件，而这恰是“梅村体”题材上超越此前诗史的一大特色。

其次，吴伟业拓展了传统诗史观对“诗史”功能的认识，认为诗歌只要能反映“世运升降，时政得失”即可谓之“史”，不仅可以记录时事，还可以记录当事人的个体内心感受，将记史与抒情两种功能结合在了一起。他在《且朴斋诗稿序》中指出：“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太史陈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入贡天子，不必其为朝廷邦国之史也。”在“诗与史通”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诗歌不必出于士大夫之手，其内容也不必是朝廷邦国之大事，只要能够反映“世运升降、时政得失”即可“宣付史馆”，就是“史”。从表面看，似乎只是对古代“采诗”内容的客观描述，实则借以表达个人对诗中之“史”的新理解。吴伟业根据个人的切身体验认识到，在明清易代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有关于“世运升

[1]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八《梅村诗话》“杨廷麟”条，第1136－1138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降、时政得失”的不仅仅是朝廷党争、社会动乱、政权更迭等历史大事，伴随战乱、屠城、剃发、变衣冠等血腥史实而来的，必然还有个体的命运遭际、身世浮沉以及家国之痛、兴亡之感等个人感受。也就是说，作为客观史实的实际承担者或耳闻目睹者，当时人的心理感受同样也是世运变迁的体现。那么，记录个体内心感受自然也是“诗史”应当承担的基本功能。这就从理论上将中国古代诗歌纪实与抒情两种传统结合在了一起。如果说吴伟业对记事之“真”与论事之“当”的规定，力反明代诗学否定诗史的主张，重新肯定了诗歌的纪事、议论功能的话，那么他对诗史功能的此一拓展，则进一步解决了明代诗学给“诗史”提出的难题：记“史”的诗歌同样可以兼具抒情的功能。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其大部分歌行名篇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吴门遇刘雪舫》、《鸳湖曲》、《圆圆曲》、《琵琶行》等，以及大量其他体式的诗作如《思陵长公主挽诗》、《甲申十月南中作》、《与友人谈遗事》、《读史杂感十六首》、《扬州四首》等，不仅叙述明清之际的重大客观史实，还记录当时人（上至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艺人妓女、野夫平民）及诗人自身复杂的内心感受与悲剧命运：有哀怨无奈的身世之感，痛心疾首的亡国之恨，也有凄凉悲伤的故国之思，皆记史与抒情并重。

再次，吴伟业提出了“史外传心之史”的崭新命题。[1]其所谓“史外传心之史”，是与客观历史相对而言的，指个体的心灵历史——实际行为背后的真实心迹。但“心”须以“史”为依托，故仍可依稀看出其时之史实，反映“世运升降、时政得失”的功能仍然与“史”相通，实质即以“心”传“史”。因为史书之写人物，主要记录其在历史事件中的实际行为，对人物的评价也仅仅依据其外在的行为表现，譬如在明清鼎革这一历史巨变中，死国死君者为“忠”、为“义”，不仕二姓者为“高”、为“遗”，投降、出仕者则为“奸”、为“贰”，而那些掩藏在行为背后，尤其是与现实行为并不一致的真实心迹却往往不被注意，所以诗歌所写这种心灵历史是史书所不载的内容，故曰“史外”之“史”。很明显，这一命题是前两层内涵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彻底实现了“诗史”向诗歌抒情本质的回归，是吴伟业对明清之际“诗史”观的独特贡献。吴伟业晚年那些以史实为依托，剖白个人心迹、抒写个人内心情感的诗歌创作正是以此为理论依据的。

总之，吴伟业的“诗史”观在继承传统“诗史”观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内涵，是支配“梅村体”创作的核心思想。

二、由“诗史”观透视“梅村体”的新特征

(一)记事要“真”、论事要“当”的“诗史”观决定了部分“梅村体”作品以客

[1] 《吴梅村全集》卷六十《且朴斋诗稿序》，第1205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观记事为主、夹叙夹议的创作特征。

由于这一理论认识并未超出传统诗史观的范围,所以以此为创作宗旨的部分作品,艺术上与此前叙事诗相比并没有太多的发展变化，主要采用以客观记事为主、夹叙夹议的创作手法，叙事核实而讽谕深远。如《殿上行》、《临江参军》、《高丽行》、《悲滕城》、《襄阳乐》等被公认为“梅村体”的长篇歌行均采用了这种创作模式。其中《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明显模仿杜甫《三吏》、《三别》,《直溪吏》、《临顿儿》、《堇山儿》、《织妇词》、《打冰词》、《木棉吟》等则仿效元、白新乐府。而《送黄石斋谪官》、《怀杨机部军前》、《汴梁二首》、《海溢》等以记录时事、批判时政为宗旨的近体诗，同样以客观纪事为主，夹叙夹议，也同样体现了“梅村体”的史学价值与艺术风貌。

（二）记录客观史实与个体内心感受相统一的“诗史”观，是形成“梅村体”一系列鲜明特征的根本原因，决定了“梅村体”叙事与抒情的紧密结合。

其一，反映世运变迁过程的“诗史”目的，是“梅村体”选择歌行体式与形成卓越叙事艺术的思想根源。因为古体诗，尤其是歌行，不受篇幅、格律的限制，与近体诗相比容纳量与自由度较大。所以为了成功地反映纷繁多变、时空跨度较大的历史过程与个体内心感受,“梅村体”往往采用长篇歌行的体式，并创造性地运用其容量大的特点，发展了多种叙事手法与叙事角度，打破时空限制，将传统叙事诗按时间顺序单线推进、情节单一的结构模式演进为多线索交织并进，将纷繁的史实重新组合、联缀，错综交织成一幅完整、立体的艺术画卷，大大拓展了诗史的叙事容量与抒情功能。如《萧史青门曲》、《圆圆曲》、《王郎曲》、《临淮老妓行》、《楚两生行》等歌行名篇，为了成功地反映明清之际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与人物内心感受，都交叉运用了顺叙、倒叙、插叙等叙事手法，以及哀乐对比等抒情手段，使时空大幅度跳跃，情节曲折多变，结构纵横开阖，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显示了“梅村体”的独特性。

其二，学界所谓“梅村体”歌行的又一鲜明特征：和谐流畅、凄丽婉艳的语言，同样是在这种记史与抒情相统一的“诗史”观支配下形成的。因为吴伟业“诗史”在记录故国历史时，往往要写到其繁华、美好的一面，以便通过亡国前的乐景反衬亡国后的哀情，而凄丽婉艳、骈散相间、和谐流畅的语言既适合叙述这些与歌舞繁华场面紧密相关的特定历史内容，又适合缠绵哀怨之情感的咏叹。如《洛阳行》、《永和宫词》、《鸳湖曲》、《琵琶行》、《后东皋草堂歌》等，均骈散相间，婉转流畅，辞艳情哀。而“梅村体”语言的又一个重要特征——频繁地使事用典，固然与吴伟业追求文雅的审美理想有关，也不能排除其炫耀学识博洽的心理动机，但根本上还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纪“史”与抒情的需要。因为此时期“梅村体”所叙史实往往是刚刚过去的、关系明清兴亡的大事，所要表达的感情又往往包含对故国、旧君的哀悼与对新朝的不满，而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清初文网严密的特定环境中，诗人不能质言、不敢昌言却又不忍不言，所以通过典故曲譬暗喻，将事情说得若隐若现、扑朔迷离，委婉曲折地传达内心感受。如《圆圆曲》、《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勾章井》等，均凭借丰富的典故，不仅隐晦地叙述了难以直言的史实，曲折地传达了难以直抒的情感，而且将眼前偶然的个人命运与事件纳入了历史的长河，使诗人对具体人物命运的感叹与对明清易代兴亡难料的感慨上升为一种人生与历史的反思，很好地实现了记“史”与抒情的双重兼顾。所以，“梅村体”之用典已不仅仅是一种获得典雅华丽之形式美的修辞手法，而且也是一种特殊的叙事与抒情手段。总之，正是记录时事与个体内心感受相结合的“诗史”观，促使“梅村体”歌行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的创作特征，呈现出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的独特风貌。

其三，以此“诗史”观为理论根源，其大量近体诗同样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字数固定、格律严谨的近体诗，向来以写景抒情为主，以营造言简情深、意在言外的含蓄意境为长，但出于纪史的需要，吴伟业却兼以叙事。如七律《有感》、《与友人谈遗事》、《白门遇北来友人》、《登数峰阁礼浙中死事六君子》、《鸳湖感旧》等，均以情、史并重的诗史观为基础，或因情以记事，或缘事以抒情，情事交融，余韵悠然。为了成功地反映纷繁复杂的世运变迁过程，他还创造性地运用组诗形式，克服了近体诗篇幅短小的弊端。如五律《读史杂感十六首》叙述从弘光朝建立到南明各政权相继灭亡的历史过程，“数首可合为一首，一首中又自具开阖变化之妙”。[1]对纷繁复杂的史实，“或专叙，或错叙，或复说，或带说”[2]，错综交织、或详或略，真实完整地记录了那段亡国历史。有对误国君臣的辛辣嘲讽，也有对江山沦丧、英雄战殁的沉痛哀悼，“彼黍离离，不足并其哀激。”[3]又如《杂感二十一首》、《避乱六首》、《听朱乐隆歌六首》、《赠寇白门六首》、《扬州四首》等均以明清之际的重大时事为题材，融情于事，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同样体现了吴伟业独特的创作风貌，应是“梅村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以“心”传“史”的“诗史”观决定了部分“梅村体”作品以史实为背景直接抒情的创作特征与“情余于事”的独特风貌。

为了剖白失节行为背后的“本心”，吴伟业晚年的大量诗歌创作皆以展示痛苦、拷问灵魂为主题，直接抒写自我内心情感，情余于事。如《过淮阴有感二首》、《自叹》、《怀古兼吊侯朝宗》、《临终诗四首》、《赠辽左故人八首》、《悲歌赠吴季子》等，或传达失节的悔恨自责，解释仕清的无奈、剖白“本心”的忠贞，或传达个人对时事的感受，均直接抒发自我内心情感，但通过这些情感又可清楚地看到明清交替的历史背景、

[1]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十一上，七律总评，苏州扫叶山房藏版乾隆刻本。
[2] 黄传祖评语，《吴梅村全集》，第 97 页。
[3] 黄传祖评语，见《吴梅村全集》，第 97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清初对汉族文人特别是明朝遗臣的高压政策，“事”因“情”见。关于这类作品独特的认知意义与艺术价值，前人已屡有论述，如管世铭《论近人绝句诗》云：“白衣不放铁崖还，斑管题诗泪渍颜。失路几人能自讼，莫将娄水并虞山。”[1]赵翼《题梅村集后》：“剩有沉吟偷活句，令人想见泪痕潸。”[2]张际亮《书吴梅村诗后》“兴亡过眼声华薄，出处伤心著述工。”[3]可以说是奠定梅村诗诗歌发展史地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以心传史具有更复杂的内涵，并可引出重大的诗学命题，此容当后述。

总之，吴伟业的“诗史”观是形成“梅村体”独特风貌的理论根源。

三、对“梅村体”的重新认识

从以上辨析可知，吴伟业本人的“诗史”观是形成“梅村体”的核心思想，决定了“梅村体”的独特风貌。因此，本文认为，所谓“梅村体”就是吴伟业以个人“诗史”观为核心思想创作的诗歌，不仅有七言歌行，还有其他诗体；不仅可以叙事，还可以抒情、“传心”。

后人有些与吴伟业“诗史”风格特征相似的诗，如吴兆骞、陈维崧的歌行；王闿运《圆明园词》；樊曾祥前后《彩云曲》；王国维《颐和园词》；钱钟联前后《胡蝶曲》等，亦被称为“梅村体”，原因在于这些诗同样以与吴伟业相似的“诗史”观为基础。若纯粹着眼于形式、风格的模仿，就会像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批判的那样：“后来摹拟成派，往往无病而呻，令人齿冷。甚至以委巷见闻形容宫掖，谰言自喜，雅道荡然，则非梅村所及料也。”[4]

---

1 转引自郭绍虞等《万首论诗绝句》，第 60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2 赵翼《瓯北诗话》卷九，第 13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第 1 版。
3 见《吴梅村全集》附录四，第 1518 页。
4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第 207 页，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一章　诗史观的成因：明清之际社会思潮与人格心态

吴伟业诗史观的形成，受到了明清之际社会环境与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点已是学界的共识。但他具体接受了哪些思想，通过什么渠道接受这些思想，这种影响又是如何进入其诗歌创作的，目前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首先通过其交游情况的考察，把这一大的社会思想背景落实，然后通过人格心态研究，深入剖析社会环境、思想潮流、个体的生活境遇等外部原因是如何影响到其诗学思想上来的。

第一节　明清之际社会思潮对诗史观的影响

一、吴中经世思潮的兴起

吴伟业出生在万历三十七年。早自 20 多年前开始，随着张居正改革的失败，明王朝已经走上了“溃败决裂，不可振救”的道路。[1]神宗皇帝怠于临政而贪于敛财，朝廷内君臣隔绝、朋党纷争，朝廷外外患日亟、民变屡起，明末社会所有的矛盾症结几乎都已出现，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2]而随着社会政治的日益混乱，明中叶以来广泛盛行的心学思想也逐渐蜕化成了禅学：由于官场中大部分士人放弃了原则操守，各为私利结党相争，故正直士人厕身其中，非但不能有所作为，且自身难保，于是大批士人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出了官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阳明心学的启示下本来就有追求自我生命解脱与顺适的倾向，只是放不下儒者的经世责任才暂留官场，既然仕途已被堵绝，自然便转向对这一方面的追求。于是心学由此转向，文人们将其与释、道合一，公然谈禅论道。[3]正是在这种心学风靡，多数士人或逐利忘义、不讲操守，或只求自我解脱而弃社会危机于不顾的情况下，吴中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诸子却抱着强烈的济世热情，力图以学术来挽救世道危亡。万历三十二年，在他们的努力下，无锡东林书院重新修复，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会合高攀龙、刘元珍、钱一本、安希范、叶茂才、薛敷教等同仁，在此大会三天，顾宪成“爰作会约以谂同志”，[4]标志着东林学派正式形成。他们维护程朱理学正宗，痛诋王学末流的空虚之弊，开启

[1]《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纪二》，第 295 页，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 版。
[2]《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纪二》，第 295 页，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 版。
[3] 关于此时期的士人心态与王学转向及社会境遇的关系，参见左东岭先生《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第四章“阳明心学与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4] 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二《泾阳先生东林会约》，第 758 页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246。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了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1]吴伟业自幼即生活在这一思潮氛围中，自然会受到深刻的影响。他称赞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东林学者“绍续微言，倡明绝学”，[2]并参加复社，以继承东林自任。那么他具体继承了东林学派的什么思想呢？

东林诸子本来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朝廷的中下级官吏，他们注重名教礼法，坚持气节操守，关心国事民生，同情百姓疾苦。在职期间，他们力争“国本”，反对矿监税使，支持海瑞等正直官员，所以前后纷纷遭到罢黜。但与袁宏道、陶望龄、管志道等心学信徒由此陷入自适、空寂不同，也与他们的吴中前辈王鏊、吴宽、文征明、祝允明等人风流放达但无出位之思的传统风尚不同。他们退归故里后，仍然放不下现实政治的关怀。顾宪成曾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3]高攀龙亦云：“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4]明确表示，“君子”无论在职去职都应以天下国家为念。所以，他们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东林书院的座右铭，以在野士人的身份“裁量人物，訾议国政”，目的是“冀执政者闻而药之”。[5]公然以舆论与政府相对抗：“将长安有公论，地方无公论邪？抑缙绅之风闻是实录，细民之口碑是虚饰邪？”大声呼吁“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6]故“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7]“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8]一批在中央和地方任职的官吏，如叶向高、赵南星、邹元标、冯从吾、李三材等人都与之互通声气。因此，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东林学派，实际上又与其支持者一起形成了一个政治派别，被反对者目为东林党，成为一支影响明末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这种强烈的政治参与精神，无疑对吴伟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自幼便树立了经世济民的宏伟抱负，自言早在天启二年十四岁时便与里中同学好友吴继善“长揖谢时辈，自比管与乐。”[9]好读古人书，而“特厌苦俗

---

1 明清之际是一个界限并不十分确定的时间段。一般而言，是指明万历到清康熙期间的这段时间。谢国桢先生《明末清初的学风》限定为万历三十年至康熙四十年左右，本文认同此说。因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明万历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与李贽、达观、袁宏道等人的去世，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开始发生重大改变；至康熙前期，随着主要文学活动跨明清两朝的一代文人如钱谦益（1582－1644）、冯舒（1593－1649）、吴伟业（1609－1671）、归庄（1613－1673）、龚鼎孳（1615－1673）、顾炎武（1613－1682）等人的相继谢世，以及新一代文人的兴起，文坛风会再次转向，所以这段时间在文学思想史上也具有独特的地位。

2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六《萧孟昉五十寿序》，第 771 页。

3 《顾端文公遗书》：《小心斋札记》卷十一，第 318 页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14。

4 《高子遗书》卷八《答朱平函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 231、别集类，1292 册。

5 《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一·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第 1377 页，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1 版。

6 《顾端文公遗书》：《自反录》，第 497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14。

7 《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一·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第 1377 页，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11 版。

8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第 6032 页，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 版。

9 《吴梅村全集》卷一《哭志衍》，第 19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儒之所为”，[1]吴继善“独许”其文、“谓侔古人作”。[2]

东林学派正是从有用于世、有补于世道人心的经世目的来批判王学而阐扬程朱之学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世风败坏是由王学的空虚之弊造成的，而“对病之药”则是“扶持程朱之学”。[3]他们把这种流弊的根源归于阳明四句教中的“无善无恶”一句，自万历二十六年始，就围绕此句与管志道、钱渐庵等吴中的王门后学展开了激烈争论。[4]顾宪成将“无善无恶”说的弊害概括为“空”、“混”二字：“本病只是一个‘空’字，末病只是一个‘混’字。”[5]“空”则由儒入禅，遗弃一切外在的道德规范、工夫践履，从而丧失对现实的关怀，即“以善为恶”而善恶双谴；“混”则是非善恶颠倒，从而道德沦丧而陷为逐利忘义的小人，即“以恶为善”而混淆善恶。并且认为其迷惑性极大：“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故对之辩驳极难，后果将是“以学术杀天下万世”。[6]高攀龙也认为“无善之说”“夷善于恶而无之”，[7]是“惑世诬民之最”。[8]阳明“无善无恶”指的是一种超越价值判断与事物分别的心体境界，其目的本来是要人忘怀一己之得失荣辱，以廓然大公的胸怀来济世利民，[9]并非象顾宪成、高攀龙所说这样从道德层面上抹杀、混淆善恶。但是到管志道等人这里，在解除一己烦恼的同时也失去了儒者的经世职责，“无善无恶”也就成为追求自我受用与自我解脱的理论依据，将王学导向了佛、老之空寂。东林学者对“无善无恶”说的批驳，正是出于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心。不过正如左东岭先生所言，将士风士习的败坏归咎于王学，则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是政无准的、朋党纷争的黑暗社会导致了士风败坏与王学蜕变，而非王学导致了社会的败坏。[10]吴伟业明显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他对王学末流的儒、释合一也表示不满，如其《卓海幢墓表》云：“姚江重良知，颇近佛氏之顿教，而源流本殊，后之门人推演其义以见吾道之大，于是儒释遂合。”[11]又如《赠照如师序》指出“唐、宋之讲学儒释分，而我明之讲学儒释合”，而又云：“儒者之道，与佛教同为盛衰。往者唐、宋大儒专斥浮图氏，而名僧大德咸出于其时，盖儒术与佛教同盛，此古人之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为浮图学者，大率重宗而绌教，其弊也，黑白互异，南北相訾……而名山老纳乃有没法沦堕之恨，此所谓儒术弊而佛教与之同衰，

---

[1]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四《德藻稿序》，第 746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一《哭志衍》，第 19 页。
[3]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七《崇正学辟异说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 231、别集类，1292 册。
[4]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十一《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戊戌，始会吴中诸同志于二泉之上，与管东溟辩无善无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顾端文公遗书》：《还经录》，第 492 页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14。
[6] 《顾端文公遗书》：《小心斋札记》卷十八，第 355 页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14。
[7] 《高子遗书》卷九上《方本庵先生性善绎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高子遗书》卷八《答顾泾阳先生论格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参见左东岭先生《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第二章第二节有关“无善无恶”说的论析，第 192－20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10]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第 52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11]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第 1027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其可叹也矣。”[1]批评儒、释合一的明代学术是儒术之弊、佛教之衰，针对的同样是明末儒学的空疏。

既然认为王学“以学术杀天下”，所以他们要通过“正学术”来收拾人心，端正士风，从而匡救天下。如高攀龙云：“天下不患无政事，患无学术。学术者，天下之大本也。学术正，政事焉有不正？”[2]针对王学的空虚之弊，东林学派开出的药方就是重振程朱之学。他们的理论辨析触及到了宋明理学的方方面面，如在本体论层面，力阐程朱“性善”说以辟“无善无恶”论；在工夫论层面，推崇朱熹“格物穷理”说以救正阳明格致论等等，但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回到程朱，而是通过程朱上承孔、颜、曾、思、孟，弘扬先秦儒学的经世精神。顾宪成对朱熹与阳明的学说曾作过这样的比较：

> 以考亭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为宗，其弊也荡。拘者有所不为，荡者无所不为。拘者人性所厌，顺而决之为易；荡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为难。昔孔子论礼之弊，而曰：与其奢也宁俭。然则论学之弊，亦应曰：与其荡也宁拘。此其所以逊朱子也。[3]

他很清楚，朱学与王学各有其弊。王学以本体自然为宗，其弊会导致摆脱绳束，放浪纵恣，即“无所不为”；而朱学务在功夫上用力，其弊则会导致拘谨支离，自缚手脚，即“不为”。但他忧虑的是任情姿肆、放诞不轨的晚明士风，所以主张“与其荡也宁拘”。事实上，顾宪成并不赞成朱学的“有所不为”，他曾在《日新书院记》中对学界尊朱黜王、尊王黜朱的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朱熹与阳明是孔子圣学的两个支流，二者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合而为一就是“孔子之全身”。所以，他反对“各执己见，过为抑扬”而主张“祖述孔子，宪章朱、王”，“当士习之浮诞，方之以朱子可也，当士习之胶固，圆之以王子可也。”[4]问题是，眼下正值“士习浮诞”之时，所以要“方之以朱子”方能“祖述孔子”。又如高攀龙比较朱、陆异同云：“陆子之学直截从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疏略处。朱子却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为教，使人以渐而入。然朱子大，能包得陆子；陆子粗，便包不得朱子。”[5]朱、陆异同实际上也是朱、王异同，他认为朱子是“守定孔子家法”的，能够将文、行、忠、信落到实处，这也是他以朱学为宗的原因。所以顾宪成《东林会约》“首列孔、颜、曾、思、孟，明统宗也。次白鹿洞学规，定法程也。”以“尊经”为“四要”之一，要求学者对儒家经典体认躬行，

---

[1]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五，第 755－756 页

[2] 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七叶茂才《高景逸先生行状》引高攀龙语，第 835 页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246。

[3] 《顾端文公遗书》:《小心斋札记》卷三，第 266 页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14。

[4]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十一《日新书院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 231、别集类，1292 册。

[5] 《高子遗书》卷五《会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 231、别集类，1292 册。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既“不淫于荡”又“不拘于支”，领会其“维世教”、“觉人心”的经世精神，[1]高攀龙一言以蔽之曰：“吾儒学问主于经世。”[2]

从这种忧世淑人、砭俗回澜的经世精神出发，东林学派把是否有治世之用作为衡量学术是非好坏的标准，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顾允成曾感叹当时的空疏学风：“今之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3]故东林讲学与此不同，他们是要管天下事的。顾宪成在《东林会约》中谈到东林讲学的“九益”之一“广见博闻”时说：“一人之见闻有限，众人之见闻无限。于是或参身心密切，或叩诗书要义，或考古今人物，或商经济实事，或究乡井利害……”明确将古今人物、经济实事、乡井利害等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实用学问纳入了学术研讨的范围。对此做出更大理论贡献的是东林书院的另一领袖高攀龙：

> 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然学者苟能随事精察，明辨的确，处之事事合理，物物得所，便是尽性之学。若是个腐儒，不通世务，不谙时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国而害一国，当天下之任而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先致知格物，后必归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不然单靠言语说得何用？[4]

学以尽性是朱熹理学的宗旨，但强调知行功夫的辩证统一：“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显然与朱熹分知、行为两个阶段有所不同，而与王阳明“知行合一”论有相通之处。当然，王阳明“知行合一”论是建立在“心外无理”这个基本前提下的，所谓“知”不是指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是指对心中固有之“理”的认识，高攀龙所谓“学”(即“知”)却包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王阳明仍有“毫厘千里”之辨；以“事事合理”、“物物得所”为“尽性”，显然也已不是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翻版。在朱熹那里，穷究事物之“理”即“格物”只是“致知”的功夫，最终目的仍然是恢复“性善”本体。所以他特意为《大学》“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两目作《补传》，《补传》开宗明义：“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5]即通过“格物”的功夫达到“致知”的目的，由“物”返回“理”。“格物”功夫虽然也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实用学问，但“理”或“性”是“体”、是“本”，而“治国平天下”只是“用”、是“末”。因此，无论是王学还是朱学，实际上都是“内

---

1 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二《泾阳先生东林会约》，第 760 页至 762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246。
2 《高子遗书》卷三《家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明儒学案》卷六十《东林学案三·主事顾泾凡先生允成》，第 1469 页，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1 版。
4 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五《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第 784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246。
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第 6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圣”之学，“外王”只是“内圣”的发用。高攀龙在这里却以“用”为归，把“内圣”当作“外王”的前提：“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立本正要致用”，[1]“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也”，[2]对空谈心性而“不通世务”、“不谙时事”的腐儒嗤之以鼻，“致知格物”最终不是归于“至善”而是归于“治国平天下”。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东林之学溢出了宋明理学形而上的心性论范畴，具有了反内省自足的价值指向。诚然，东林诸子本身并未因此而致力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学，治学重心仍然是对儒学的义理诠解，但毕竟在理论上为实学的兴起营造了氛围，稍后吴伟业等复社文人正是在此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折中朱、王而归于经世，这就是东林之学的要义。无论是对王学的批判抑或反思，还是对程朱之学的阐扬抑或改造，其终极目的均在于救国济民。在国家面临危机，心学不能拯救时局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为很多士人所接受，不仅在吴中得到了广泛响应，而且影响波及全国，顾宪成、高攀龙成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3]然而，一个王朝的兴亡盛衰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非单项因素所能决定，正如管志道在回复顾宪成辩难时所云：“此际此风，岂但提阳明‘无善无恶’四字救不得，即提孟子‘性善’二字，亦救不得。”[4]仅靠“正学术”并不能挽救明末的政治危机，所以不管东林士人怎样努力，明王朝仍然一步步趋于瘫痪，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东林党也在激烈的党争中惨遭失败。东林学者对此亦并非全无认识，高攀龙与朋友曾有一段这样的问答：“有友曰：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先生曰：……若凡事料其不可与言，遂不言，其如世道何？且世道虽否塞，全赖正人君子之言。……吾辈今日所言，岂能必人之听且行，亦欲存此公论耳。”[5]他并不是不知道世事已到了“不可与言”的程度，而是像孔子那样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以舆论的力量评议政治、挽救人心。为此，在现实中他们甚至不惜“与世为敌”：“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夫苟亟亟于救世，则其所为，必与世殊。是故世之所有余，矫之以不足，世之所不足，矫之以有余。矫非中也，待夫有余、不足者也。是故其矫之者，乃其所以救之也。”[6]不仅“守己之是”，还要“匡人之非”。[7]此种以圣人之道对抗朝廷、对抗世俗的行为，以在野士人的身份参与政治、拯救时局的进取精神，在心学流行以前的历史环境中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东林学派虽以反王学的

---

1 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六《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下，第 803 页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246。
2 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第 801 页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246。
3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高攀龙传》，第 6314 页，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 版。
4 管志道《问辨牍》卷之利集，第 734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87。
5 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五《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第 786 页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246。
6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八《赠凤云杨君令峡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小心斋札记》卷四：“均之为君子也，而以廉洁见者，其取忤犹少；以正直见者，其取忤常多，何也？廉洁惟务守己之是，正直兼欲匡人之非也。”第 275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14。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立场出现，实际上却明显带有泰州学派“出位之思”的狂侠色彩。[1]另外，这股经世思潮的产生，固然与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分不开，但与吴中士人政治地位的变化也有重大关系。此时的社会境况其实与元朝末年极为相似，而元末吴中文人大都远离现实政治，这是因为元代文人长期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遂形成了淡薄政治的传统，直到明中叶沈周、文征明、祝允明、唐寅等人犹然如此。但是明中叶以后，随着吴中经济、文化的日益发达，越来越多的吴中士人通过科举走进了政治中心，于是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烈，疏离政治的传统遂逐渐改变。到东林诸子这里，面临严峻的社会危机，又受王学泰州传统之影响，终于酿成了“思出其位”的经世思潮。作为政治团体的东林党虽然在与阉党的斗争中惨遭失败，但经过 20 多年的讲学议论，加上诸君子个人气节操守的影响，东林学派关心国事、志在世道的经世精神对明末士人，尤其是吴中本地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幼生活于此思想氛围中的吴伟业自然也不例外。他与其他以继承东林自任的复社文人一样，[2]注重清议、名检，关心现实、热衷政治，提倡实学。反映在文学领域中，便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潮，吴伟业“诗史”观正是在此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

二、吴伟业与复社的实学思想

在东林诸子所倡导的经世思潮影响下，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文人士大夫们再也无法沉浸于个人的心性修养。吴伟业后来在《清忠谱序》中描述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权时的政治形势云：“上自宰辅禁近，下暨省会重臣，非阉私人莫参要选；时倾险之士思逞志于正直者，亦愿为之爪牙，供其走噬，甚至自负阿父、养子而不惜，而东林之难作矣。故自辛酉至丁卯七年之中，在朝诸贤无不遭其坑戮，而国家之气以不振。”认为一方面阉党当道，士无廉耻，忠义莫申，国家元气随之以衰。而另一方面：“方公(周顺昌)被逮时，宣诏于郡西察院，民随而号泣请救者万人；见公将就桎梏，咸戟手愤詈，因直前击缇骑，几为变。……事闻，诏捕首乱，颜佩韦等五人毅然诣官府自列，赴死无改容。呜呼!公之节义能使人感奋至此，可谓难矣!”[3]东林君子的浩然正气充盈天地，激荡着人们的心灵。张溥、陈子龙等人都曾参与这次营救周顺昌的事件，张溥还为颜佩韦等人写下了当时广为流传的《五人墓碑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

1 参见左东岭先生《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第 377 页至 37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2 如复社领袖张溥在《房稿是正叙》中云：“三吴之理学文行，前士之彰彰者不可累书，即近若泾阳诸先生，其殁未及一世，而传人已废，盖诚私心痛之，则后生小子之过。吾党欲推而远之，又可得乎？”即以复社为东林之“传人”(《七录斋诗文合集》:《古文存稿》卷三，第 468 页上，《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1387)。组成复社的重要文社之一几社也明确以“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为旗号(杜登春《社事始末》，第 4 页，吴江沈氏世楷堂道光刻本。)

3 《吴梅村全集》卷六十《清忠谱序》，第 1215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他们继东林之后相继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结社运动，弘扬儒家经典中的经世精神，主张以实用之学拯救国家危亡。如天启四年，太仓张溥与同里张采、顾梦麟、常熟杨彝等人创立应社，提倡“尊经复古”。张溥在《五经征文序》中说：“应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经复古者，盖其志也。”[1]各地士人遥相应和，其规模不久即扩大到了全国：“大江以南主应社者，张受先、西铭、介生、维斗；在江以北主应社者，万道吉、刘伯宗、沈眉生。”[2]后来张溥即以此社为基础创立了复社。吴伟业受东林学派的熏陶，自少年时期即有极强的经世抱负，所以得到了张溥的赏识，“因留受业，相率为通经博古之学。”[3]复社成立后，作为张溥高足、社中党魁，他是当时主流思想的代表人物，并受到了诸同志的巨大影响。

在思想上，吴伟业等复社文人与东林诸子一样，均以救国济民为终极目标。崇祯二年，在标志复社正式成立的尹山大会上，张溥“立规条，定课程”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能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4]《社事始末》则云：“复者，兴复绝学之义也。”[5]可见，“兴复古学”或“兴复绝学”是复社的基本宗旨，最终目的则是“致君泽民”。所谓“古学”或“绝学”首先是指儒家的经典之学，因为他们认为明末种种社会危机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士子不通经术”。吴伟业作为张溥弟子、复社成员，对其师所定纲领自然予以积极支持。他在《复社纪事》中记载了张溥的一段议论，即对复社的缘起及思想特征作了很好的说明：

> 先生以贡入京师，纵观郊庙辟雍之盛，喟然太息曰：“我国家以经义取天下士垂三百载，学者宜思有以表章微言，润色鸿业。今公卿不通六艺，后进小生，剽耳傭目，倖弋获于有司。无怪乎椓人持柄，而折枝舐痔，半出于诵法孔子之徒。无他，诗书之道亏，而廉耻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临雍讲学，丕变斯民，生当其时者，图仰赞万一，庶几尊遗经，砭俗学，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党乎！”乃与燕、赵、鲁、卫之贤者，为文言志，申要约而后去。[6]

此为复社正式成立前一年即崇祯元年，张溥在京师订立“燕台之盟”时的思想言论。天启年间的阉党之祸，使朝中善类一空，正直士人受到了严重摧折，王朝统治亦摇摇

---

1 《七录斋集》:《七录斋文集》卷一，第 397 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82。
2 计东《改亭集》卷十《上太仓吴祭酒书一》，第 656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228。
3 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吴梅村全集》附录一，第 1403 页。
4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第 210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5 杜登春《社事始末》，第 4 页，吴江沈氏世楷堂道光刻本。
6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四，第 599－600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欲坠。张溥、吴伟业等人正是在对这样的社会危机与东林党之失败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确立其“兴复古学”思想的。认为“公卿不通六艺”的空疏学风、“椓人持柄”的政治危机以及“折枝舐痔，半出于诵法孔子之徒”的无耻士风等社会问题，病根就在于“诗书之道亏”、“廉耻之途塞”，所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尊遗经”的思想主张，复社盟约更是明确规定“毋读非圣书”。[1]很明显，“尊经”的终极目的不是回到经典本身，而是救国济民、治平天下，趁着“新天子即位”的时代契机，重建一个“比隆三代”的盛明之时。所以吴伟业才会称赞其师“用经术大儒负名于当世”、“敦气谊，尚名节，慨然有康济斯世之心。”[2]

吴伟业等复社文人提倡尊经，不仅是基于对王学末流禅学化的反思，也是针对所谓“俗学”即明代科举制度影响下的学术弊端。先秦儒学在汉代以经学形式兴起的时候，本来注重实事、实政，堪称实学，但在科举制度束缚下，尤其是永乐以后，《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被法定为士人读书治学的蓝本与八股取士的唯一标准，于是士子不必读注疏、真正贯通儒家经典之本义，而徒以揣摩风气、记诵程文为能事，从而遗失了儒学的经世精神。如张溥指出：“学者尊尚《大全》”而视“《注疏》等为闲书”，“成祖命诸臣集《四书五经大全》，以训天下，而《十三经》复整栉悬设。”“古人说经，源流尚近，文旨并深……宋元诸儒，解经最详，然稍错出矣，师门相因，语言不休，复说枝谈，往往而有……明以经学取士，流为科举，其学遂荒。”[3]正是针对这种弊端，吴伟业直接对科举时文作了尖锐批判，如其《何季穆文集序》：“余尝惟国家当神宗皇帝时，天下平治，而士大夫之习不能比隆往古者，良由朝廷以科目限天下士，士亦敝敝焉束缚于所为应世之时文。以吾耳目所闻见，如吴中邵茂斋、徐汝廉、郑闲孟三君子，皆号为通人儒者，而白首一经，穿穴书传，于朝政得失，贤奸进退之故，则不闻有所论述。”[4]认为科举制度是士风败坏的根源，因为士子为躐取世资大都将聪明才智磨耗在时文上，而对真正的临民出政之道如朝政得失、贤奸进退则无暇也无力探讨。又如《严修人宜雅堂集序》：“帖括者，摘裂经传，破碎道术……虽其中非无卓然名家而超轶绝群之才，拨去其筌蹄，不害于所为古学，然敝一世以趋之，而人才之磨耗固已多矣。”[5]批评时文“摘裂经传，破碎道术”，大都遗失了古学精神，导致了人才浪费。复社也讲论制艺，但与一般文社以应举为目的而主要切磋八股时文有所不同，[6]它以兴复经学为宗旨，务在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从而为经世致用实学提供最直接、

---

[1] 《复社纪略》卷一，第 210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2]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七《张攲庵黄门五十序》，第 791、792 页。
[3] 《七录斋诗文合集》:《古文近稿》卷二《五经注疏大全合纂序》第 288 页、287 页，《续修四库全书》集 1387。
[4]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七《何季穆文集序》，第 654 页。
[5]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九《严修人宜雅堂集序》，第 687 页。
[6] 所谓文社，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释云：“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本来是士子为应举而聚在一起切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如张溥有《易经注疏大全合纂》、《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尚书注疏大全合纂》、《四书注疏大全合纂》、《春秋三书》，被吴伟业评为“既与同辈，亦多所摩切，敢为激发之行，数以古法治乡党闾左”[1]的另一位复领袖张采有《周礼注疏》，太仓顾湄(吴伟业后来的诗学弟子)之父顾梦麟有《诗经说约》、《四书十一经通考》等，这些经学著述或纂揖，或笺证，或考辨，突破了宋明理学“六经注我”的治学思路，清代经学的兴起，在此已初肇端倪。吴伟业后来在给孚社诸子的信中称：“伟业尝亲见西铭先师手抄《注疏》、《大全》等书，规模前贤，欲得其条贯……今诸公遵传注而奉功令，务以表章六经，斥奇邪而补阙失，如此则西铭之遗绪将以再振，伟业昔见之于师者今复见之于友。”[2]可见他对张溥等师友“表彰六经”的赞赏与支持。正是在这种宗经思想以及著述风尚的影响下，他也著有《春秋地理志》、《春秋氏族志》两部经学著作。[3]

因此，与东林学者有所不同，吴伟业等复社诸子不再囿于对儒学的义理思辨，而是更注重探讨切实有用的经世方略，以事功、实效即所谓“实学”为旨归。如其师张溥，崇祯四年曾问学于著名的自然科学学者徐光启，其《农政全书序》曰：“予生也晚，犹获侍先师徐文定公，盖岁辛未之季春也。公时以春官尚书守詹，次当读卷，亟赏予廷对一策，予因得以谒公京邸。公进予而前，勉以读书经世大义，若谓孺子可教者。予退而矢感，早夜惕励，闻公方究泰西历学，予邀同年徐退谷往问所疑。”[4]接受其读书经世的思想，并向其学习“泰西历学”。徐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5]从西洋人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之术，遍习兵机、屯田、盐筴、水利诸书，编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勾股义》、《泰西水法》等科学著作，并写成农业科学巨著《农政全书》。崇祯十二年，云间友人陈子龙则将《农政全书》整理成书，刊布行世，以为“富国化民之本在是”。[6]由此可见，他们对经世实学的重视。又如虞山钱谦益，十分推崇较早提倡事功之学的归有光：“昆山归熙甫守其朴学，言称古昔，与其韦布弟子，端拜洛诵，倡道于荒江寂莫之滨，于是吴中有归氏之学。”[7]吴伟业与陈、钱等人关系都非常亲密。他在《梅村诗话》中专章记陈子龙之事，二人彼此非常欣赏。钱氏作为东林领袖顾宪成的门生，崇祯元年曾被推到党魁的位置，由吏部推举为阁臣，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学上，于吴伟业都是前辈。崇祯九年钱氏入狱后，吴伟业曾不顾危疑，代为营救。正是在众多师友的影响下，吴伟业也有“苟不知一事，吾之深耻”的实学

磋时艺的社集，可以说是八股取士制度的产物。第 199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1]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四《复社纪事》，第 602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四《致孚社诸子书》，第 1087 页。

[3] 《春秋氏族志》今不存，《江南通志·艺文志》“经部”有著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农政全书》卷首，第 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第 1 版。

[5]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徐光启传》，第 6494 页，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 版。

[6] 陈子龙自撰《年谱》“崇祯十二年己卯”，《陈子龙诗集》附录二，第 66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7] 《牧斋有学集》卷二十《陈確庵集序》，第 847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思想。[1]他赞扬何季穆“谈国是人才、边情水利，凿然欲见诸施行”，[2]赞扬白东谷“攻实学，修笃行。”[3]他还为晚节遭物议的唐顺之鸣不平：“独应德晚年超授，人谓其为分宜所知。嗟乎！彼苟贪富贵，何不少年循资拱默以取公卿？乃末路艰难，没身王事，论者犹谓纾意时宰，从而訾謷之，过矣！虽然，襄文之学于地理扼塞、兵机成败，无所不通，雅自负经济，谓有用于世，世遂得而羁縻之。”[4]敏锐地指出，唐顺之晚年出山是为了成就事功，体现的是一种为实现经世济民之志而不顾他人非议的超然品格。这种以事功为归的思想，显然与东林学派名节至上的道德观念有所不同。[5]唯其如此，吴伟业才会称赞被东林党视为小人的王锡爵为“经世大儒”。[6]对于东林学派的缺乏实学，另一位复社士人、吴伟业的好友夏允彝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曾指出：“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著。”故与“攻东林者”一样“无济国事”。[7]所以，他们更重视向“实著”处用力。关于复社成员此方面的论著，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如张溥的《治夷狄论》、《备边论》、《兵论》、《两直论》、《灾异论》、《赋役论》、《钱楮论》、《治河论》、《建学论》等，陈子龙的《采金议》、《保甲议》、《江南乡兵议》、《平内盗议》、《议财用》等，与吴伟业过从甚密的云间友人宋征璧的《左氏兵法测要》等等，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天文舆地、农田水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都是他们研讨的对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还努力将其经世济民的措施付诸实践，如崇祯六年“大风杀稼，斗粟千钱，太仓漕无输”，此时乡居的张溥、张采便与知州刘士斗“谋救荒之策”，[8]采府胥宋文杰之言，以太仓、镇海两卫军储救荒，张采《军储说》、张溥《军储说跋》即为此而作。又如“娄东三友”之一陈瑚，明亡后隐居蔚村，吴伟业在《陈確庵尊人七十序》中说他“读农经水利之书，谓古人代田之法，一亩三畎，深耕易耨，岁可获数十钟。又以尚湖、巴城诸水挟淫潦泛滥，劝谕父老，筑堤设防，经画指点，悉有成法。”[9]吴伟业在明朝作为朝廷重臣、复社党魁，更是直接向最高统治者建言献策，如其“退敌御清疏”、“端本澄源论”、《第二问》、《第三问》等，论列国家选材之道、用人之法、御敌讨贼之方等与时局攸关的现实问题。又如入清后，江苏巡抚土国宝就疏浚刘家河之事向他咨询，他“详稽典故，旁咨父老，察其形势，参之人情，必其功成而无悔，其事有利而无患”，而后作《答土抚开刘河书》以献，详

---

1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二《满江红·感旧》，第 566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七《何季穆文集序》，第 654 页。
3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七《白东谷诗集序》，第 657 页。
4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八《傅锦泉文集序》，第 676 页。
5 高攀龙曾明确表示：“君子不幸为小人所荐，终身之羞也。”（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六《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下，第 804 页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246）以此观念为标准衡量唐顺之，自然难脱“终身之羞”，显然与吴伟业观点不同。
6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四《王茂京稿序》，第 748 页。
7 夏允彝《幸存录》，第 20 页，上海书店 1982 年第 1 版。
8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233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9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七，第 790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细论列“议费”、“度工”、“销田”、“定法”等策略。[1]正是以这种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为基础，他在文学上主张以诗歌批判现实、反映现实，重新提倡“诗史”观。

史学也是吴伟业等复社文人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社会现实，总结历史的盛衰规律与经验教训，以资当世之用，是他们研治明以前历史的共同宗旨。如张溥认为史鉴“必自近始”，如“周书戒王，殷鉴不远；汉臣进规，引秦是喻”，[2]故致力于距明朝最近的宋元历史的研究，著有《宋史纪事本末论正》、《通鉴纪本末论正》、《元史纪事本末论正》、《宋史论》、《元史论》等史著。对许多问题的探讨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批评北宋仁宗与南宋孝宗的求治太速、任人不专，显然有针砭刚愎多疑的崇祯帝之意；又如强调“夷夏大防”，认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乃“儒学陵夷，被发左衽”的一段“痛史”，强烈呼吁“夏进夷退”，明显关合着明末满族入侵的民族危机。他曾在为陈子龙等人的《皇明经世文编》所作序言中说:“客年与余盱衡当代，思就国史，余谓贤者识大，宜先经济。”[3]所谓“经济”即“经世济民”之简语，可见其治史旨趣之所在。又如吴伟业的同里好友、舅氏朱明镐，吴伟业称其有《史纠》、《史粲》、《史鉴》、《史俳》、《史最》、《史异》等十三种，且称“《史纠》特为可传”。[4]另外如钱谦益的《太祖实录辩证》五卷，陈子龙的《汉武帝论》、《唐论》、《晋论》、《陈涉论》、《春秋论》等，学界研究颇多的顾炎武与王夫之之史学，更是各有千秋，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尽管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有同有异，但目的均在“述往以为来者师”：通过考察历史上各种经世措施及其得失利弊，以供当世效法或鉴戒，针对明末种种社会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和解决办法。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史学氛围影响下，吴伟业自幼便“独好三史”，[5]有《祭仲论》、《王室卿士论》、《伍胥复仇论》、《宋魏两彭城王论》等史论若干篇，同样论古以鉴今。出于这种勇于担当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感，他们对明末历史即当时的现代史更是关注有加，尤其是明朝（崇祯朝）覆亡后，保存故国历史成为经世致用的主要手段，私人撰史风气空前盛行。如吴伟业表侄辈的文秉有《烈皇小识》、《先拨志始》，与吴伟业关系密切的云间友人宋征舆有《东村记事》、《琐闻录》、《琐闻别录》，夏允彝有《幸存录》，夏完淳有《续幸存录》，复社长辈长州杨廷枢有《全吴纪略》、《崇祯长编》，被吴伟业评为“为人仪观伟然，雄怀顾盼”[6]的宜兴陈贞慧有《过江七事》、《山阳录》等等。他们之所以要写下这段历史，一是痛定思痛，反思亡国原因，总结覆亡教训；二是缘于“国可亡，史不可亡”的爱国思想，为故国保存历

---

1 据《江南通志》卷六十五载，顺治九年以工科给事中胡之骏之请“浚刘河以泄巴阳之水”，并且附录吴伟业《论开刘河》一文，实即此文。而顺治年间土姓江苏巡抚只有土国宝一人，以顺治二年任，顺治七年再任（《江南通志》卷一百五“江苏巡抚”），故此文当作于顺治七年至顺治九年之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张溥《宋史纪史本末·叙》，冯琦《宋史纪事本末》第 2 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四版。

3 张溥《皇明经世文编序》，见《皇明经世文编》第 23 页，《四库禁燬书丛刊》本，集部 22。

4 《吴梅村全集》卷四十六《朱昭芑墓志铭》，第 949 页。

5 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吴梅村全集》附录一，第 1403 页。

6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六《冒辟疆五十寿序》，第 773。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史。吴伟业除《复社纪事》外还有《绥寇纪略》一部，写崇祯一朝的农民战争，每篇篇后都加以个人论断，虞山钱曾《梅村先生枉驾相访酒间商榷绥寇纪闻有感赋此》诗云："迢然影事未能忘，戴笠乘车过草堂。借箸漫言山聚米，引杯兼笑海生桑。秦关鹿走当年火，吴苑乌啼此夜霜。指点旧京愁历历，为公枨触恨偏长。"[1]很能传达出吴伟业等人悯明室沦丧、叹神州陆沉的著史心情与动机。但由于"史"之文体的制约，著史并不能自由表达内心情感，所以吴伟业转而致力于以"诗"存"史"，并由此形成了情、史并重的"诗史"观。

总之，面对更加艰危的时局，吴伟业等复社文人的经世思想明显比东林更加强烈，政治参与意识也更加急切。《社事始末》谓"社局原与朝局相表里"，方以智亦称："吴下社事与朝局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2]社局中人同时也是朝局中人，从一开始便直接介入了朝廷党争。他们自称"东林余韵"或"小东林"，阉党则称他们为"东林余孽"。因此，复社不仅是对作为学术团体的东林学派的发展，也是对作为政治团体的东林党的延续，干预政治、拯救时局才是他们最大的兴趣之所在。就晚明吴中士人之学术关注重心而言，经过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先是东林诸君子的反空疏而返经史，再到复社众人的由经史而措诸实用，再到宗社丘墟时的史学之作，均与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有关。吴伟业亲身体验并参与了此一过程。他的由重经到重史，是合乎这一过程的选择，而最终以诗存史的"诗史"观念则是这一意识的合理延伸。

三、吴伟业与复社的经世致用文学思潮

综上可知，经过东林的提倡与复社的阐扬，经世致用思潮成为明末清初吴中文化思潮的主流。这必然也会反映在文学领域中，经世致用同样也是明清之际文学的主潮。吴伟业"诗史"思想便是这股主流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文学史上许多文学变革都借"复古"的形式进行一样，这股文学潮流也是在"复古"旗号下兴起的，与复社"兴复古学"的思想一致。复社领袖张溥指出："今右文之世，学始五经。"主张诗文应"代圣人之言"，"从今则陋，从古则文。"[3]以《诗经》为诗歌的最高典范："以予观之，《三百篇》之后，作诗而不愚者，独屈大夫原耳。"[4]正是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崇祯四年，吴伟业与张溥、陈子龙、夏允彝、宋征璧、彭宾、杨廷枢、徐汧及江右杨廷麟等复社名士汇聚京师参加会试期间，曾"拟立燕台之社，

---

1 谢正光《钱遵王诗集笺校》:《今吾集》，第 120 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0 年第 1 版。
2 钱撝禄《钱公饮光府君年谱》"壬申年"引方以智语，第 3 页，宣统 2 年刻本。
3 《七录斋诗文合集》:《古文近稿》卷三《皇明诗经文征序》，第 316 页下，《续修四库全书》集 1387。
4 《七录斋诗文合集》:《古文近稿》卷四《宋九青诗序》，第 335 页上，《续修四库全书》集 1387。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以继七子之迹”，[1]明确主张取法七子，倡导复古。后来以陈子龙、宋征璧、彭宾等为首的云间派诗人，便一直坚持宗法七子、尊尚汉唐的复古文学主张。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诗人与他们走得最近，也是这一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即使立足于性灵说、反对前后七子的虞山诗老钱谦益也同样提倡“复古”，如其《袁祈年字田祖说》一文云：“《三百篇》，《诗》之祖也；屈子，继别之宗也；汉、魏、三唐以迨宋、元诸家，继祢之小宗也。六经，文之祖也；左氏、司马氏，继别之宗也；韩、柳、欧阳、苏氏以迨胜国诸家，继祢之小宗也。古之人所以驰骋于文章，枝分流别，殊途而同归者，亦曰各本其祖而已矣。……夫欲求识其祖者，岂有他哉？六经其坛墠也；屈、左以下之书，皆谱牒也。尊祖敬宗收族，等而上之，亦在乎反而求之而已。”[2]虽然以“祖”、“宗”、“小宗”分别源流，对先秦、汉、唐、宋、元各代文学均有所肯定，但“各本其祖”、“六经坛墠”的观点，与张溥宗圣尊经的复古思想并无二致。

但他们倡导复古的真正目的并非单纯地在文学上是古非今，而是为其远绍汉唐、比隆三代的政治理想服务。因为他们都深信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诗学命题：文学之正、变反映着时代之盛衰。吴伟业曾在《观始诗集序》中借魏裔介之口曰：“依古以来，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得失，皆于诗之正变辨之。”[3]陈子龙亦指出：“世之盛也，君子忠爱以事上，敦厚以取友，是以温柔之音作，而长育之气油然于中，文章足以动耳，音节足以竦神，王者乘以致其治。其衰也，非辟之心生，而亢厉微末之声著，粗者可逆，细者可没，而兵戎之象见矣。”而“近世以来，浅陋靡薄，浸淫于衰乱矣。”[4]所以从力挽狂澜的政治理想出发，他们不愿让自己的文学创作反映出衰世气象，而是提倡“元音”，即充盈着元气的雅正之音，希望以此培育国家之“元气”，挽回衰亡之世运。吴伟业强烈呼吁：“一气元音接混茫”，[5]“追国初之元音，还盛明乎大雅”，[6]“诚使卓人尽出所学，以诗道训邦之弟子，庶几元音正始可以复作。”[7]钱谦益甚至由此得出了“文章亡国”的结论：“自万历之末迄于今，文章之弊滋极，而阉寺钩党凶灾兵燹之祸，亦相挺而作。尝取近代之诗而观之，以清深奥僻而致者，如鸣蚓窍，如入鼠穴，凄声寒魄，此鬼趣也。以尖新割剥为能者，如戴假面，如作胡语，噍音促节，此兵象也。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气运从之。有识者审音歌风，岌岌乎有衰晚之惧焉。”

---

[1] 《陈子龙文集》：《陈忠裕公全集》卷十二《壬申文选凡例》，第 670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2] 《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六《袁祈年字田祖说》，第 826－827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3]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七，第 660 页。
[4] 《陈子龙文集》：《陈忠裕公全集》卷七《皇明诗选序》，第 358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5] 《吴梅村全集》卷十《送杜大于皇从娄东往武林兼简曹司农秋岳范佥事正》，第 256 页。
[6]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二《与宋尚木论诗书》，第 1089 页。
[7]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七《毛卓人诗序》，第 663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这是针对竟陵派而言的，认为竟陵诗风“凄声寒魄”、“噍音促节”，已露“衰晚”气象，而国家气运亦从之。将世运之衰归咎于“文章之弊”，显然是颠倒本末，但明确表达了通过复“元声”而“挽回运数”的迫切愿望。其实，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提倡文学复古，其目的本来也是为疗救国家“元气之病”。他认为当时天下有两大病，“元气之病”居其首，此病体现在“士气”上即萎靡疲软的士风：“张拱深揖，口呐呐不吐词”、“遇事圆巧而委曲”，[2]而体现在文学上则是嗫缓冗踏、千篇一律的“台阁体”文风，故提倡以秦汉文、盛唐诗为文学审美典范，实有起衰救弊、复兴汉唐盛世气象的用意。但他们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过程中，却往往把“复古”手段当成目的，从形式到内容一味拟古、摹古，终致脱离了社会现实，消泯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吴伟业等明末清初的吴中文人与此不同，他们面对岌岌可危的社会现实，从强烈的经世思想出发，呼吁文学批判现实、干预现实，要求诗文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寻求社会出路的重任与总结历史教训、反思亡国原因、保存故国历史的职责。吴伟业《抚轮集序》云：“方海宇多事，士不能为《铙歌》、《鼓吹》诸曲，铺扬武功，而徒咏牛渚之月，问莫愁之湖，张讥清谭，岂能效萧郎破贼？麈尾蝇拂，可烧却耳。”[3]明确要求文学为社会政治服务，反对脱离现实。他还要求诗人不仅要有才情，而且还要有“性情”、“学识”，认为诗人有无高尚的道德、能为世用的学识，直接关系到诗歌的浅深正变。[4]又如陈子龙在肯定“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的基础上，[5]特别强调诗歌的怨刺功能：“居今之世，为颂则伤其行，为讥则杀其身……虽然，颂可已也。事有所不获于心，何能终郁郁耶！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6]“夫作诗而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讬物联类而见其志，则是《风》不必列十五国，而《雅》不必分大小也。虽工而余不好也。”以“忧时讬志”为“诗之本”。[7]钱谦益则要求文学指陈“时政之疾病”，起到“救世之针药”的作用：“先儒有言：诗人所陈者，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8]主张以诗“续史”。[9] 顾炎武则提出了“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时代命题，认为文学应承担“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的功能。[10]强烈呼吁：“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文学家须有“救民于水火之

---

1 《牧斋初学集》卷三十《徐司寇画溪诗集序》，第 903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2 《空同先生集》卷三十八《上孝宗皇帝书稿》，第 1067－1068 页，（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 1976 年版。
3 《吴梅村全集》卷六十，第 1204 页。
4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八《龚芝麓诗序》，第 664-665 页。
5 《陈子龙文集》:《陈忠裕公全集》卷七《佩月堂诗稿序》，第 381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6 《陈子龙文集》:《陈忠裕公全集》卷三《诗论》，第 142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7 《陈子龙文集》:《陈忠裕公全集》卷七《六子诗序》，第 376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8 《牧斋有学集》卷四十二《王侍御遗诗赞》，第 1430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9 《牧斋有学集》卷十八《胡致果诗序》，第 801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10 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第 143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心”。[1]又如本时期大量涌现出的描写现实政治大事的时事小说、时事戏剧，空前繁荣的“诗史”创作，以及大量旨在存史、补史的诗歌总集的编选，无不体现出征实尚史的经世致用思想。吴伟业明确要求诗歌创作继承古代“诗与史通”的精神，承担反映“世运升降、时政得失”的社会功能，并付诸实践，创作了大量以总结历史教训、反思亡国原因、保存故国历史为目的的诗史。很明显，他们虽然以“复古”为旗号，但与前后七子中之空同、于鳞辈的盲目拟古不同，也与吴中文学传统中的“复古”内涵有别，而是在继承传统儒家政教文学思想的基础上，紧扣社会现实与时代思潮，以求实致用、经世济民为主要内容。吴伟业以诗存史的“诗史”观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与学术思潮、文学思潮氛围中形成的。

当然，新的文学思潮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彻底抛弃。在经世致用思潮高涨的同时，吴中传统特有的那种重个体享乐、风流潇洒的士风与文风仍有保留。如复社的社集，不仅谈论时事、切磋学问，而且诗酒唱酬，征歌选伎。陈去病《五石脂》记崇祯六年复社虎丘大会盛况云：“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侣，经过赵李。或泛扁舟，张乐欢饮。则野芳浜外，斟酌桥边，酒樽花气，月色波光，相为掩映。……飞琼王乔，吹瑶笙，击云璈，凭虚凌云以下集也。”[2]吴伟业与陈子龙、钱谦益等复社名士们依红偎翠、留连风月，为后世留下了无数风流佳话。与此一致，本时期的文学创作亦不乏风流旖旎之作，吴伟业就有大量秾丽靡曼的艳诗艳词。又如陈子龙之诗“有齐梁之丽藻”、“早岁少过浮艳”，[3]叶襄之诗“风华悽丽”，[4]有六朝风致。又如昆山柴君子与里中同学效仿元末玉山草堂诗人的“唱和流连”，其“啸咏唱酬”之作即命名《玉山诗集》。[5]归庄曾对此种风流文采作过一翻解释：“余因念（倪）云林当至正之末，方内如沸，淮张据吴，所谓江南春色，半销磨于金戈铁马之中；若文（征明）、沈（周）以下诸公，生成、弘、正、嘉间，此极盛之时也。山川锦绣，楼阁丹青，有非画图之所能尽者，宜其胜情藻思，波涌云兴。今日江南，则又一变矣！要之泽国江山，吴宫草树，三春佳丽，无改于前，虽复怀伯仁之嗟叹，亦何妨子山之词赋哉。”[6]明确视之为元末以来吴中传统的一脉相传。吴伟业不仅家世与吴中文化传统联系密切，而且本人也具有强烈的地域意识，以继承吴中文学传统自任，[7]自然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如其在《太仓

---

1 《顾亭林诗文集》卷四《与友人书三》，第 91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1 版。
2 陈去病《五石脂》，第 353 页，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3 陈田《明诗纪事》，第 281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第 1 版。
4 陈田《明诗纪事》，第 323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第 1 版。
5 《归庄集》卷三《玉山诗集序》记载，第 206－20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4 月第 1 版。
6 《归庄集》卷三《汇刻江南春词序》，第 212 页，括号注释为笔者所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4 月第 1 版。
7 “吴中”最初泛指春秋时的吴地，后来不断沿革变化。明代人所说的吴中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吴中指苏州府所属一州七县，即太仓州（领崇明县）与长州、吴江、常熟、嘉定、昆山、吴县；广义的吴中除苏州府外还包括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所属各县，与吴伟业同时的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即以吴中指这四个府。两种意义上的吴中，吴伟业本人都曾使用过，如《宋辕生诗序》：“吾吴诗人，以元末为最盛。其在云间者，莫如杨廉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十子诗序》一文中，即将门人“太仓十子”的诗歌流派视为元末顾瑛等玉山草堂诗人与明嘉、隆年间诗坛领袖王世贞传统的继承与发展。[1]所以，吴伟业文学思想中还有吴中传统重个性、尚文雅的一贯倾向，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诗史”观重视抒写个体情感的一面。

总之，吴伟业“诗史”观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那么，这种影响又是如何具体作用于“梅村体”创作的呢？显然是通过吴伟业的人格心态此一中介。

第二节 人格心态与诗史观的形成

在诗史观的诸多成因中，关于明清之际的社会环境与吴伟业的具体生活境遇，学界已有很多细致的研究。但社会环境、生平境遇首先影响的是人格心态，通过人格心态这一中介才能影响到文学思想上来。关于吴伟业人格心态的发展轨迹及演变原因，学界至今尚无专门论述。本文认为可以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与顺治十年仕清为标志分为三个时期。

一、明亡之前：徘徊于“仕”与“隐”之间

吴伟业早年积极进取的心态除了受当时的社会思潮影响外，家庭环境的熏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2]吴氏从伟业四世祖吴凯、高祖吴愈到曾祖吴南（曾官鸿胪寺序班）三代仕宦，虽然并不十分显赫，但也称得上是“昆山名族”。[3]可是到了吴伟业的祖父吴议一代，家道便衰落了。关于衰落之原委，吴伟业在《先伯祖玉田公墓表》一文中曾有交待：“余祖尝抱伟业于膝，顾叔祖而叹曰：‘尔知吾宗之所以衰乎？三世仕宦，廉吏之橐，固足以传子孙，尔伯祖实主其帑，用之为饮食裘马费，产遂中落。余与尔叔祖庶出也，少孤，故皆贫。’余祖亡后，祖母汤孺人每谈及鸿胪公时事，辄言嘉、隆中鹿城有倭难，伯祖自以私财募兵千余人，转战湖、泖间，兵败，左右皆殁，得一健卒负之免，家遂以破。”[4]据此文之记述，伟业祖父与祖母所言虽略有不同，但都说明吴家之衰落主要是由吴南嫡长子吴谏所致。吴议是吴南次子，入赘太仓瑯琊王氏，遂落籍太仓。伟业父吴琨虽“有声场屋”，然“屡试不收”，以“穷诸生”教授里中，以致“家贫无以为养”。[5]所以重振家业、恢复昔日荣耀便成了伟业祖、父两代挥之不去

夫、袁海叟。”所谓“云间”即松江府别称。故本文取其广义。

[1]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太仓十子诗序》，第693－6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版。

[2] 叶君远《吴伟业评传》（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在论述吴伟业家世时，已谈到了家庭期望对幼年吴伟业功名心的影响。笔者此处着重谈吴琨对吴伟业的影响与吴伟业本人对家庭期望的心理感受。

[3] 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吴梅村全集》附录一，第1403页。

[4]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先伯祖玉田公墓表》，第1032页。

[5] 《吴梅村全集》卷四十九《王母周太安人墓志铭》，第1016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梦想。吴琨虽然屡试不中，却一直坚持科考，直到崇祯四年吴伟业中进士后，他的老师李继桢写信时还劝他“自此收却书本”，不要再“恋恋鸡肋”。[1]他虽然没有取得功名，但文章写得不错，张溥称其“文名震动江介”，[2]钱谦益谓之“南国名儒”，[3]说他“学正而则，原本经术，发挥理性……文闳而肆，尚友千古，博极子史。”[4]此虽不无溢美之词，但亦非毫无根据，再加上其为人豪爽，所以在当地读书人中颇有几分名气，结交了不少当时的文人名士，其中周延儒、李明睿二人后来对吴伟业的科举仕途、政治际遇都曾有过不小影响。吴伟业晚年回忆家庭往事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自古贤母，未有不愿其夫若子之富贵……当吾父之有声场屋，屡试不收，而祖母汤淑人已老，家贫无以为养，吾母为予言之而泣。予幸弋一第，窃喜有以慰母，而终有憾于吾父之不遇也。”[5]对父亲“屡试不收”的不幸、母亲“家贫无以为养”的悲伤记忆犹新，为自己功名及第而重振家声感到万分庆幸的同时，仍然为父亲没有取得功名而遗憾。由此可以想见，家庭的期望对他产生了何等深刻的影响，促使他很小就萌生了极强的功名心。

在从师张溥之前，少年吴伟业的求学经历主要就是跟随父亲就读于各家书塾，为应试做准备。正是在此期间结识了吴继善、吴克孝、吴国杰、穆云桂、周肇等志同道合、后来成为一生至交的朋友。如 14 岁那年，他随父读书于吴继善家之五桂楼，与长其三岁的吴继善“深相得”。[6]崇祯十六年，吴继善赴成都令任，吴伟业为诗送行，[7]追忆二人共同读书时的情形云：“我昔读书君南楼，夜寒拥被谈九州。动足下床有万里，驽马伏枥非吾俦。”[8]可见当时踌躇满志的进取精神。他在《志衍传》中称志衍：“博闻辩智，风流警速，于书一览辄记，下笔洒洒数千言，家本《春秋》，治三《传》，通《史》、《汉》诸大家，继又出入齐、梁，工诗歌，尤爱图绘，有元人风，下至樗蒲、六博、弹琴、蹴踘，无不毕解。……生平负志节，急人患难。”[9]对其风流倜傥、急人患难的为人，博闻强记、精通三史、工诗善画的才华学识欣赏备至，再联系其《德藻稿序》所言：“初吾与志衍少而同学，于经术无所师授，特厌苦俗儒之所为，而辄取古人之书，攘摭其近似者嫥括为时文，年壮志得，不规规于进取，乃益骋其无涯之词以极其意之所至。”[10]以及《哭志衍》诗所云：“予始年十四，与君早同学。君独许我文，谓侔古

---

[1] 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崇祯四年谱文引李继祯《与门人吴禹玉书》，《吴梅村全集》附录二，第 1433 页。
[2]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古文近稿》卷二《吴年伯母汤太夫人寿序》，第 301 页，《续修四库全书》集 1387。
[3] 《牧斋有学集》卷二十四《吴封君七十序》，第 947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4] 《牧斋杂著》：《有学集文钞补遗》，第 443－444 页《封宫相吴约庵七十寿譔序》，《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5] 《吴梅村全集》卷四十九《王母周太安人墓志铭》，第 1016 页。
[6]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二《志衍传》，第 1052 页。
[7] 事迹时间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第 1 版。本文所涉及到的吴伟业生平事迹与作品编年，凡无特别说明者，均依据本书，后文不再一一注释。
[8] 《吴梅村全集》卷二《送志衍入蜀》，第 50 页。
[9]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二《志衍传》，第 1052 页。
[10]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四《德藻稿序》，第 746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作。长揖谢时辈，自比管与乐。……长途驭二龙，崇霄翔一鹗。遂使天下士，咸奉吾徒约。词场忝两吴，相与为犄角。”[1]等语，可以看出吴继善志存高远、踔厉奋发的人格精神，对其为人、为学的影响。

从师张溥可以说是吴伟业人生中的一个重要事件。[2]从此，本来就功名心极强的吴伟业不仅受到张溥热衷用世的政治热情与博通经史的治学精神的深刻影响，并因此成了复社的中坚。他一生的政治命运即与复社有重大关涉，一生的交游也以复社同志为主要对象。与其他复社文人一样，年轻的吴伟业正是抱着致君泽民、匡救天下的政治理想踏入仕途的。崇祯四年会试，因周延儒、李明睿、李继桢等人的帮助，他以弱冠之龄高中会元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但也是因为与复社的此种特殊关系，入仕之初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朝廷党争。先是张溥缉次辅温体仁“通内结党，援引同乡诸事，缮成疏稿，授伟业参之”，他“中情多怯，不敢应。”而又难拒师命，于是“取参体仁疏增损之”，改参温之私党蔡亦琛，体仁大怒，赖首辅周延儒从中曲解才得以无事。紧接着，温体仁又授意其党徒借吴伟业会试试卷攻讦首辅周延儒，使他“几挂吏议”，幸赖崇祯帝亲阅其卷，批曰：“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物议始息。[3]但无论如何，南宫首捷、蒙皇帝赏识并“莲烛赐婚”，毕竟是文人士子梦寐难求的荣耀，张溥《送吴骏公归娶》诗云：“人间好事皆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4]后来，其子吴暻《鹿樵感旧》诗云：“甲科收物望，弱冠得华资。玉殿喧名字，金闺艳履綦。陆机题赋丽，苏轼起文衰。”诗内自注曰：“先公授编修，制词云：‘陆机词赋，早年独冠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5]不难想见，此时的吴伟业仍然是春风得意的，从后来的创作中也不难看出，终其一生对崇祯帝的知遇之恩都是深怀感激的。所以，入仕初期的吴伟业，心态从总体来说是积极的，关心时事，在政治上努力有所作为。如崇祯八年假满还朝，正值温体仁当国，他后来在《与子暻疏》中自言，与杨廷麟等人“正直激昂，不入其党。”[6] 崇祯九年典试湖广期间，他与友人宋玫、熊开元、郑友玄“夜半耳熟，谈天下事，流涕纵横。”[7]试后呈序一首、论一首、策三道，论列国家选材之道、任人之法、讨贼之方、圣王修身立政之本等问题。[8]崇祯十一年，他“念切忧时”上《劾元臣疏》，首疏劾首

---

[1] 《吴梅村全集》卷一《哭志衍》，第 19 页。

[2] 关于吴伟业从师张溥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看法，自顾师轼《吴梅村先生年谱》至冯其庸、叶君远的《吴梅村年谱》均认为始于天启二年吴伟业十四岁时，王于飞《吴伟业行实考二则》(《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一文则推断为崇祯元年，笔者认同王氏观点。

[3]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第 229－230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陆世仪曾入复社(吴嘉《复社姓氏传略》第 19 页)，且与吴伟业同时同里，其关于吴伟业的记载当可信。

[4]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诗稿》卷二，《续修四库全书》集 1387。

[5] 吴暻《西斋集》卷一，清康熙刻本。

[6] 《吴梅村全集》卷第五十七《与子暻疏》，第 1131－1132 页。

[7]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四《书宋九青逸事》，第 607 页。

[8] 见《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六《湖广乡试录序》、《圣王修身立政之本论》、《第一问》、《第三问》。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辅张至发“因私踵陋”、尽袭前相温体仁之所为，[1]又与杨士聪谋劾“大奸史范”，[2]并向崇祯帝进“端本澄源之论”，“欲重其责于大臣，而广其材于庶寮，……言极剴切，上为动容。”[3]此顷，黄道周因直谏被贬，他作《殿上行》诗颂扬黄氏的凛凛风节，讥讽朝臣的贪生怕死、庸碌无为：“公卿由来畏庭议，上殿叩头辄心悸。”九月，清兵入塞，他作《墙子路》诗批判明军将领的贪图逸乐：“匈奴动地渔阳鼓，都护酣歌幕府钟。一夜蓟门风雪里，军前樽酒卖卢龙。”又如崇祯十二年，他上疏言退敌御清之方略，建议皇上下哀痛之诏“悯人罪己，思咎懼灾，吊死卹忠，赏功禁暴。”公侯贵戚共捐家财以募死士，令入敌营“烧其辎重，毒其水草。”建议选将积粟、大更法制，以为久安之计。[4]还曾斥责陆完学、张四知“行所无事”的为官之道：“国之大事在戎，何云行所无事。”[5]由于官居史职，他对时事格外留心，自云曾为“岁抄日记”记录“公庭之论略，私家之晤语”以备修史之需。[6]且不管吴伟业是否真有经邦治国之才，其建议是否拥有实效，这些言行举措足以说明他不乏致君泽民、匡救时艰的经世精神。正是在这种关心时事、积极进取的心态支配下，此段时期的诗歌创作如《悲滕城》、《殿上行》、《墙子路》、《东皋草堂歌》、《临江参军》等，皆以反映现实、批判时政为主旨，反映在诗歌观念上，便形成了以记录时事、批判时政为主要内涵的“诗史”观。

可是，由于朝政的腐败、残酷的党争以及崇祯帝的刚愎多疑，吴伟业不仅难以施展政治抱负，而且很快便体会到了仕途的险恶。举其大者而言，如崇祯九年、十年，常熟陈履谦、张汉儒疏讦钱谦益及其门人瞿式耜贪肆不法，吴伟业后来在《复社纪事》中追记此事云：“相温从中下其章，锒铛逮治，而复社之狱并起。”[7]太仓陆文声“捃摭两公（张溥、张采）事十余条，踵汉儒上章诬奏。”[8]闽人周之夔亦讦奏张溥等树党挟持。陈子龙后来回忆那时的情形说：“丁丑，无赖恶少逢起飚发，纵横长安中，俱以附会时相矜夸，旦夕得大官矣。闽人周之夔者，……揣时宰意，缘绎走七千里，入都门告密，云‘二张且反’，天子疑之，下其事抚按。……又疑予辈为二张道地，则以黄纸大书石斋师及予与彝仲、骏公数公名，云‘二张辇金数万，数人者为之囊橐。’投之东厂，又负书于背，蹩躠长安街中，见贵人舆马过，则举以愬之。蜚语且上闻，人皆为

1 《吴梅村全集》卷第五十七《劾元臣疏》，第 1124－1125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第五十七《与子暟疏》，第 1132 页。
3 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吴梅村全集吴梅村全集》附录一，第 1404 页。顾湄为吴伟业门人，从之游二十余年，所记当可信。
4 谈迁《国榷》卷九十七有全文记录，谈迁与吴伟业同时，且顺治十一年至顺治十三年在京师时过从甚密，对吴伟业的事迹也非常熟悉。今已收入《吴梅村全集》卷六十，第 1232-1233 页。
5 谈迁《枣林杂俎》：《和集》“陆完学”条，第 458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113。
6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二《梁水部玉剑尊闻序》，第 718 页。
7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四《复社纪事》，第 602 页。
8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四《复社纪事》，第 603 页，括号注释为笔者所加。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予危之。”[1]而吴伟业以复社党魁，代为营救，其处境当比陈子龙更加危险，他自言当时为“世所指目”当是实情。[2]又如崇祯十二年，奉使封藩期间，史范犹谋以御史成勇劾杨嗣昌事之主使连坐之，“赖范死而后免”。[3]不仅吴伟业本人身处危疑中，他周围的师友、同志也同样安危难料。如崇祯十一年，黄道周因直谏而贬秩外调；杨廷麟因疏劾杨嗣昌对清主和、失事误国之罪，而被杨嗣昌诡荐为卢象昇军参赞，欲借清兵之刀杀之；卢象昇则在钜鹿之战中以无援败死。又如崇祯十二年，傅朝佑因直谏遭廷杖而死，吴伟业为诗伤之云：“直道身何在，犹为天地伤。同时怜死谏，几疏宥疏狂。”[4]流露出对朝政的失望。正是如此凶险的仕宦处境，使他逐渐萌生了脱离政治是非的念头。

由于受家世传统的熏陶，吴伟业本来就有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倾向。其高祖吴愈（1443—1526），身历天顺、成化、弘治、正德数朝，是明代吴中文化复苏、新变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对吴伟业有很大影响。吴愈与吴宽“同举于乡，相好久”，[5]与王鏊为同年，与林见素“联官相好”，[6]本人又是夏昶之婿，“吴中四才子”之一文征明、“娄东三凤”之一陆容之子陆伸的岳父。文征明《明故嘉议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吴公墓志铭》谓其“风流雅尚，奕奕照人。”[7]康熙九年，吴伟业62岁的时候，意外得到了100多年前沈周为高祖所画《京江送远图》。[8]于是遐想先人风采，感慨万分，作七言长歌一首以阐扬先德，并求“诸君子”唱和，诗即《京江送远图歌》。[9]他为吴氏与沈周、文征明、祝允明等名士的亲密关系而自豪，对他们的风流文采倾心不已：“吾吴儒雅倾当代，石田既没风流在，待诏声华晚更遒，枝山放达长无害。”的确，与同时期北方以前七子为核心的复古派迥然有别，沈周、文征明、祝允明等人，上承元末吴中重视个体与个性自由的思潮，风流儒雅，放达不羁，在追求任性适情、世俗生活的道路上比元末文人走得更远，实开晚明任个性、重情欲之社会思潮的先河。[10]但他们并不在政治上出格，故能避免政治迫害，甚或仕途顺利，即所谓“放达”而“无害”。尽管他们也向往功名，仍然存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但毕竟在仕途之外发现了新的人生归宿。当仕途不通时，很快便投身于世俗生活与自己喜爱的文艺创作。伟业高祖吴愈与文林、吴宽、王鏊、李应桢等士大夫虽然身在官场，却一样欣赏这种风流潇洒、

---

1 《陈子龙诗集》附录二陈子龙自撰《年谱》“崇祯十年丁丑”，第6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版。
2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七《与子暟疏》，第1132页。
3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七《与子暟疏》，第1132页。
4 《吴梅村全集》卷六十《傅佑君以谏死其子持丧归临川》，第1184页。
5 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六十九《吴叙州妻安人夏氏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集部256。
6 周道振辑校《文征明集》卷十六《寿大中丞见素林公叙》，第4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版。
7 《文征明集》卷三十《明故嘉议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吴公墓志铭》，第6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版。
8 此图现仍存世，《紫禁城》1996年第4期王颀《沈周＜京江送远图＞卷》谓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笔者未能见到。
9 《吴梅村全集》卷十《京江送远图歌》，第272－2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版。
10 关于此时期吴中文人的思想特征及成因，可参见罗宗强先生《弘治、嘉靖年间吴中士风的一个侧面》（《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及郑利华《明代中叶吴中文人集团及其文化特征》（《上海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自我适意的精神风尚。当“仕宦堪高枕”时，他们追求事功，承时而翱翔；当仕途不顺时，他们又能安心退隐，转身享受丹崖翠壑、朗月清风与诗酒宾朋之乐，同样追求风流放达之潇洒，重视个体享乐，所以与沈周、史鉴、祝允明、文征明、王宠等风流啸达的名士相亲相知。但与王艮、何心隐、李贽、公安三袁等心学信徒不同，他们并无出位之思，只拈己之是而不攻击社会或他人之非，所以能够“放达”而“无害”。正是受此传统的熏陶，吴伟业具有极强的个体享乐倾向，再加上自幼羸弱多病，父母护惜，对个体生命之脆弱体验尤为深刻，对亲情尤为珍惜。

所以面对朝政的黑暗与仕途的凶险，他不久便产生了全身远祸的思想。他后来曾在《梁水部玉剑尊闻序》中说，当时其所作“岁抄日记”“虽藏在箧衍，不以示人”，犹恐“招忌而速祸”，于是“尽取而焚之”，[1]可见他对个人安危之顾虑。崇祯十二年，当他在封藩返回途中得知母病危笃的消息后便“焦心灼骨，昼夜兼程”，自身亦以忧劳致疾，于是上表陈情，请求“于南雍供职”，以便就近“养身事亲”，[2]主动离开了险象环生的党争中心——朝廷。然而，仕途的危险并未因此而远离他。崇祯十三年，蒞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刚三日，即闻黄道周遭廷杖讯，他急忙遣人入都营救，《与子暟疏》追记此事道：“吾遣涂监生入都具橐饘。涂上书触圣怒，严旨责问主使，吾知其必及；既与者七人，而吾得免。”晚年追忆此事，犹是心有余悸。他虽然再次侥幸得免，但从此却对现实政治丧失了信心，萌生了归隐之志。本年秋，他在给至友吴继善的信中便吐露了归隐的心思。[3]书信首先描绘了陪都南京表面的繁华壮丽，然后笔锋一转道：

> 清凉寺无高座谈经，玄武湖无水犀耀甲。功臣庙画壁漫漶，无陆探微、顾野王添越公、鄂公毛发；铜浑天仪款识皆蒙古、色目人，不得如徐铉、萧子云大小篆书。太学经库，书简脱落，不及竟陵王子良钞集经史百家；诸生贩缯卖浆者儿，不及雷次宗、伏挺教授生徒数百。列肆桥门，多篱壁间物，无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秦淮歌舫有屠沽气，不得碧玉吹箫，桃叶持檝，唱《乌栖曲》，谢灵运、刘孝标辈作醉人。志衍闻之又爽然自失矣。
>
> 嗟呼！凉秋独夜，危峰断云，梧桐一声，猿鸟竞啸，追念旧游，独坐不乐。世已抵随、和，而吾犹恋腐鼠，若弟者独何以为心哉！丈夫终脱朝服掛神虎门，不能作老博士署纸尾也。归矣志衍，扫草堂待我耳！[4]

---

1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二，第 718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七《升任请养疏》，第 1128 页。

3 裴世俊《吴梅村诗歌创作探析》（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 版）三《激流勇退——以儒为主的心理个性》与徐江《吴梅村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第二章第一节《南中赋归　心仍忧国》都从中国古代士人“穷独”、“达兼”的传统，分析了吴伟业的归隐思想。本文侧重考察吴伟业当时的心态，进而揭示心态背后的人生价值观。

4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四《南中与志衍书》，第 1093－1094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书信开端对南京表面之形胜的渲染，其实就是为了衬托其骨子里的衰落。通过对现实与历史一连串的对比，说明作为明王朝开国首都的南京，既已失去了江左风流文雅的文化内涵，也不复有开国时的恢宏气象，体现出强烈的失望感。书信接下来便直接向好友倾吐自己对世事绝望的悲凉心境与归隐决心，他说追念昔日与志衍等人踌躇满志的情形，不禁感到无限孤独与失望。有志救世，却无地用武，如今的世道就连随侯之珠、和氏之璧这样的稀世珍宝都会遭受排抵，自己还贪恋什么呢？所以他最后告诉志衍，自己不想再“作老博士署纸尾”，决定放弃此闲职。崇祯十四年，尽管在复社的努力下周延儒再相，仕途出现了一线好的转机，但厌倦了党争、被频频风险吓怕了的吴伟业还是退出了官场。同时人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中收录其《与吴默寘》一札，是此际写给接其任的同年社友吴太冲的，信中云：“弟以此中多佳山水，受事之日，拟读数百卷书，作几十首诗，为诸生直条教，使鸡鸣讲舍有雷次宗、伏曼容之风。顾一年懒废，牵耗岁月，负此官矣。……鸡鸣山长松数十章，弟与盘桓一载，临行傲然无送迎之色。亭前之荷虽零落，犹作数花，居然新官旧官笑啼不敢。……然弟自有莼鲈稻蟹、斗酒黄柑，不堪落寞。”[1]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朝政的失望，透露了不愿再在仕途虚耗岁月而欲转身追求田园之乐的心态。

对现实政治失望后的吴伟业，进一步向吴中文人张扬个性、重视个体享乐的传统回归，在歌舞繁华的城市生活、妩媚秀丽的江南山水中感受着世俗生活的快乐与自我精神的自由。笔下出现了大量的艳诗艳词如《赠妓郎圆》、《子夜歌》、《戏赠》十首、《生查子》二首、《南乡子》三首、《西江月·春思》、《醉春风》二首等等，吟咏艳情，张扬欲望，成为影响“梅村体”风格后来由平实向华艳转变的因素之一。但这只是吴伟业隐居心态的一面，诗酒风流的生活并未真正使他获得心灵的安宁。事实上，在经世致用思潮高涨的时代氛围中，作为复社主将，加之个人极强的功名心，他根本做不到完全忘怀世事、放弃经世理想。退出仕途，只是全身远祸的无奈选择，而非忘怀时事后的恬然退处。他后来曾在《旧学庵记》中披露自己归隐的原因：

当先皇帝方向经学，开文华，召一二通博正直之儒，虚己礼下之甚，而执政大臣勿善也，中之以事，辄罢去。其在位者，率笃癃疲曳，使数人扶持，痀偻入省门，居庭中，惛惛不辨。上或问掌故，则左右遻视，涕唾流沫，叩头不起。……余因是发愤谢病，将闭户不出，读书十年。[2]

[1] 《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卷十三，第 701 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36。
[2]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九《旧学庵记》，第 827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他说执政大臣结党营私，倾陷异己，通博正直之士皆被排挤而去。而在位者皆衰癃疲病、昏愦无识、是非不辨，并且才疏学浅，庸碌无能。很明显，在这样一片混乱平庸的政治氛围中，无论有怎样的才干都无从措手，传达了他对黑暗政治愤激失望而又无奈的复杂感受。再加上个人安危的考虑，所以他愤而谢病，打算“闭户不出，读书十年”。但失望并非绝望，所谓“读书十年”，不仅是为了积累学识，更是为了等待时清之机，准备东山再起。所以，在对待“仕”与“隐”的态度上，他是矛盾的，始终在追求经世理想与个体享乐之间徘徊。又如崇祯十六年，至友吴志衍赴蜀上任时，其送行诗有云：“愧予王粲老江潭，愁绝空山响杜鹃。”[1]即透露了内心的骚动不安。据王于飞《吴伟业行实考二则》一文考证，本年他甚至还有过一次未能成行的还朝之举。[2]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隐居故里的吴伟业何以仍然关心国事，写下了诸如《洛阳行》、《汴梁二首》等反映明末重大时事的诗史；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后来何以会在弘光朝旋出旋归。

总之，吴伟业在明朝的 30 多年里，在家世传统、政局变化与生活境遇的综合影响下，入仕之前及入仕初期可以说是积极进取的，但不久便在“出”与“处”的矛盾中徘徊：当仕途不顺，尤其是政治风险危及个人安危时，即思退步抽身；离开官场后，又放不下现实关怀，体现出重视个体享乐与追求功名理想相冲突的矛盾价值观。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便是记史与抒情两种倾向并存，诗史观尚处在继承传统的阶段而未形成自身的新内涵。

二、易代至仕清之前：复杂微妙的遗民心态

明清鼎革，可以说是吴伟业人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人格心态由此发生了一些复杂微妙的变化：

（一）艰难选择背后的价值倾向

同历来的改朝换代一样，明清易代也将同样的难题摆在了士人们面前：是践履道德理想还是保全个体生命？在吴伟业的师友中，做出各种选择的人都有：如有徐汧、夏允彝、黄淳耀、宋玫等人以死殉国；有黄道周、陈子龙、瞿式耜、杨廷麟等人投身抗清斗争；有熊开元、王瀚、文果、归庄等人逃身方外，坚拒与清廷合作；也有钱谦益、李雯、陈之遴、龚鼎孳等人不顾伦理道德、民族气节而主动降清……当然，更多

[1] 《吴梅村全集》卷一《送志衍入蜀》，第 51 页。
[2] 王于飞《吴伟业行实考二则》，《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还是选择了“遗民”这一隐居守节的生活方式，如王时敏、冒襄、许旭、朱茗芑、陈瑚、杜浚、余怀等等。甲申之变，崇祯毙命，吴伟业也曾有过痛苦的内心挣扎，他曾尝试以殉节来践履传统道德的最高规范，曾经“号恸欲自缢”，却因“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儿死，其如老人何！’”而止；[1]也曾尝试遁入空门，以结束尘世生活来坚守道德信念，与好友王瀚“相约入山”，却又“牵帅不果”。[2]最终，仕宦显赫且受崇祯知遇之恩的吴伟业还是与多数士人一样，选择了“遗民”这一既不违背道德操守，又不必牺牲个体生命的生活方式。

无可否认，吴伟业的确想过以壮烈的方式践守道德信仰以尽忠前朝，家庭的牵累、忠孝之冲突等客观因素，也确实牵绊着他殉节或出家的行为，但这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真正使他犹豫而止的是其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压倒了对完美道德的追求。这种价值倾向在其诗歌创作中屡有流露：“空坑战士尽，柴市孤臣戮。一死之靡它，百身其奚赎！”[3]“人生骨肉那可保，富贵荣华几时好？”“归来故乡无负郭，破家结客成何济！”[4]……比起个人的生命、现世生活以及子孙骨肉（个体生命的接续），富贵荣华、功名事业都是虚空。所以他后来在《陈母夏安人墓志铭》中才会由衷地称赞夏安人，在亡国之际能规劝其夫不参加抗清斗争，从而幸免了与“李公”同没于兵的劫难是“贤且智”。[5]当然，他之所以更重视个体生命，也与他对历史大势的认识相关。如前所述，早在崇祯十三年任职南京国子监司业时，他已认识到明朝国运难以挽回。弘光朝建立，他虽有过短暂的“中兴”希望，如其《甲申十月南中作》云：“六师长奉翠华欢，王气东南自郁盘。起殿榜还标太极，御舡名亦号长安。”[6]但很快就“知天下事不可为”，[7]如此时所写《有感》诗云：“已闻羽檄移青海，是处山川困白登。征北功惟修坞壁，防秋策在打河冰。风沙刁斗三千丈，雨雪荆榛十四陵。回首神州漫流涕，酹杯江水话中兴。”[8]目睹弘光君臣的苟安与儿戏，对“中兴”彻底失望，故入朝两月便“固请病而归”。[9]对于弘光灭亡后的南明各抗清政权，他虽然始终寄予关心，但希望更加渺茫。所以在他看来，即使献出个人生命，也无法挽回明朝的灭亡命运，就如同文天祥的殉节也终于挽救不了赵宋之灭亡一样：“文山竟以殉，赵社终为屋。”[10]故从此一角度讲，他无意为明朝做无谓的祭品。退一步讲，即使乾坤能够挽回，做出壮烈牺牲与巨大贡献的人也未必能够得到应有的好报，如历史上“霸越平吴”的范蠡，结果却落得“爱

---

1 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见《吴梅村全集》附录一，第 1404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一《赠愿云师》序言，第 16 页。
3 《吴梅村全集吴梅村全集》卷一《毛子晋斋中读吴匏庵手抄宋谢翱西台恸哭记》，第 11 页。
4 《吴梅村全集》卷二《行路难》之三、十三，第 34 页、37 页。
5 《吴梅村全集》卷四十九，第 1010 页。
6 《吴梅村全集》卷五，第 137 页。
7 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吴梅村全集》附录一，第 1404 页。
8 《吴梅村全集》卷五《有感》，第 137 页。
9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七《与子暟疏》，第 1132 页。
10 《吴梅村全集》卷一《毛子晋斋中读吴匏庵手抄宋谢翱西台恸哭记》，第 11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子犹难免”；[1]“为汉倾其宗”的翟太守，“刘氏已再兴”后也仍然是“白骨无人封。”[2]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使他看透了政治前途的祸福无常：“功成或倖退，祸至终难度。”所以，他时时告诫自己“屈伸变化间，即事多斟酌。”[3]“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4]“自是图全非易事，与君随意狎樵渔。”[5]如此精细的利害算计，如此务实的世俗念头，任何崇高感与道义的力量都将化为泡影。更何况此时他尚未面临生与死的抉择，恰如魏中林先生所言，“遗民”方式的选择，“化解了生命与道德的冲突”，使其获得了“内心的平衡”。[6]但这一选择是以保全个体生命与尘世生活为前提的，“平衡”的表面下是更重视个体生命的人生价值观。算计固然体现了老道与成熟，但工于心计本身就是俗气的人格显现，这使吴伟业难以走向道德的崇高境界。

（二）遗民生活背后的灵魂骚动

退隐守节的遗民生活，确曾给吴伟业带来过心灵的宁静与自安，故此时期写过不少表现安然淡泊心境的山水田园诗，如《园居》、《溪桥夜话》、《过闻果师园居》、《西田招隐诗四首》、《和王太常西田杂兴八首》等等，但这只是其人格心态的一个侧面，更多的时候其心境并不宁静。

首先，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始终萦绕心中。面对满清的残酷战争、野蛮压迫与神州萧条、生灵涂炭的现实，尤其是个人、亲友的不幸遭遇，他不能不陷入亡国的悲愤哀痛、身世的感伤以及对故国旧君的思念当中。如其《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诗描述清军的暴行云：“钟陵十万松，大者参天长。……不知何代物，同日遭斧创。……大军从北来，百姓闻惊煌。下令将入城，传箭需民房。里正持府帖，佥在御赐廊。插旗大道边，驱遣谁能当。但求骨肉完，其敢携筐箱。扶持杂幼稚，失散呼爷娘。……下路初定来，官吏踰贪狼。按籍缚富人，坐索千金装。以此为才智，岂曰惟私囊。今日解马草，明日修官塘。诛求却到骨，皮肉俱生疮。” 从群生到草木、从百姓到富人，无不被凌夷摧残。目睹如此悲惨的现实，吴伟业不能不悲愤交集。这不仅仅源于其爱国之心、苍生之念与“夷夏之防”的民族大义，更源于其个人的切肤之痛。因为随着明朝的灭亡，他本人作为士大夫所享有的殊遇也一去不返。他不仅在乱离中“麻鞋习奔走，沦落成愚贱。”（《避乱六首》其五），而且乱定之后也和普通百姓一样受着清朝

[1] 《吴梅村全集》卷五《谒范少伯祠》，第 146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一《读史杂诗四首》其四，第 7 页。
[3] 《吴梅村全集》卷一《读史杂诗四首》其二，第 6 页。
[4] 《吴梅村全集》卷三《鸳湖曲》，第 72 页。
[5] 《吴梅村全集》卷五《陈青雷以半圃索题走笔戏赠》，第 149 页。
[6] 魏中林《徘徊于灵与肉之际的悲歌——论吴梅村诗歌中的自我忏悔》，《苏州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官吏的盘剥:“我家海畔老田荒,亦长芦根岂赐庄?州县逢迎多妄报,排年赔累是重粮。”(《马草行》)他的亲朋好友同样如此,如复社领袖张采明亡后“为邑蠹里猾乘乱摽击,刺剟几无完肤”,[1]而其子“贫不能自聊,尽撤先人之庐以偿井税。”[2]友人瞿式耜“可怜双戟中丞家,门帖凄凉题卖宅。有子单居持户难,呼门吏怒索家钱。穷搜废箧应无计,弃掷城南五尺山。”[3]又如其姻家李幼基明亡后困于诛求、门庭日微,吴伟业在为其所作祭文中曾描述他遭受“诛求”的情形云:“择肉犹虎,同恶如蝇,投鈲告缗,操兵到门”,以致死后“箧无长物,庾无藏粟,余阁之奠,饭含不足。”并感叹“余忝姻盟,道衰莫庇,屈指亲朋,高门日替。”[4]所以,无论是从家国民族还是从个人的角度讲,他都会感受到刻骨铭心的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便形成了此时期“梅村体”抒写兴亡之感的主题,对此学界已有充分论述;[5]而反映在诗歌观念上,便形成了情、史并重的诗史观。

其次,未能壮烈殉节的愧疚与失落时时在心中涌动。选择“遗民”尽管并不违背道德操守,但毕竟是最后一条退路。吴伟业与一般的士人不同,他在明朝不仅官高荣宠、受崇祯帝知遇之恩,且为复社中坚、负清流之望,是政治与道德的楷模。按当时的观念,他即使不能殉节,也应该像陈子龙、杨廷麟等友人那样投身抗清复明的斗争事业,至少也应该像文果、王瀚等友人那样皈依空门,彻底斩断与新朝的联系。比如其好友王瀚,不仅在甲申国变时曾劝他一同入山,顺治七年往游庐山前贻书相别,还曾再次以出世相规。[6]通过吴伟业《赠苍雪若镜两师见访》、《谢苍雪赠叶染道衣》二诗我们还可以知道,苍雪法师在顺治四年拜访他时曾赠给他“叶染道衣”,劝其出家的用意也非常明显。可是由于对尘世生活的牵恋,他一件都没能做到。正因为没做到,所以才于心难安。当他以理想的道德人格审视自己,尤其是触及故国旧恩及并时之忠义时,愧疚、失落相交织的复杂情感便会在胸中涌动。如其《追悼》诗云:“秋风萧索响空帏,酒醒更残泪满衣。辛苦共尝偏早去,乱离知否得同归。君亲有愧吾还在,生死无端事总非。最是伤心看稚女,一窗灯火照鸣机。”[7]此诗为顺治四年悼念亡妻郁氏之作。追念与妻子同甘共苦的过去,他不能不联想到当初崇祯帝“莲烛赐婚”的恩遇。故国已逝,故君已亡,如今同受君恩、同经乱离的妻子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而自己

---

1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四《复社纪事》,第 606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六《顾母陈孺人八十序》,第 808 页。
3 《吴梅村全集》卷三《后东皋草堂歌》,第 67 页。
4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三《祭李幼基文》,第 1075 页。
5 如裴世俊《吴梅村诗歌创作探析》四《“兴亡一代黍离歌”——沧桑之悲的内在意蕴》(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 版)、徐江《吴梅村研究》(首都师范大学 2001 年第 1 版)第四章第二节《国事身世皆伤情　谱就诗篇总泪痕》即对此主题作了全面的分析。
6 《赠愿云师》序:“……云将远游庐山,贻书别予,以两人年近不惑,衰老将至,世法梦幻,惟出世大事,乃为真实,学道一著,不可不勉。”诗中也有记录。
7 《吴梅村全集》卷五,第 145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本应殉节却没有殉节，仍然苟活于异代。想到这些，愧疚不安便油然而生："君亲有愧吾还在，生死无端事总非。"又如顺治七年王瀚再次劝他出家时，他以诗"识愧"云："……再拜诵其言，心颜亦何怍。末运初迍邅，达人先大觉。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流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君亲即有愧，身世将安托？"[1]尽管他仍然做不到抛弃尘世生活，但对比友人的操行、面对友人殷勤的规劝，内心却不能不陷入愧疚惭怍与"身世将安托"的忧虑，所以他再次许诺："不负吾师言，十年践前诺。"这既是给朋友的许诺，也是给自己不安的灵魂的许诺。正因为愧疚失落，他才会反复为自己没有壮烈殉节的事实进行辩解，如其《赠吴锦雯兼示同社诸子》诗云："……其余诸子俱岳岳，感时上策愁祁连。会饮痛哭岳祠下，闻者大笑惊狂颠。皋亭山头金鼓震，万骑蹴踏东南天。贻书诀别士龙死，呜呼吾友非高官。余或脱身弃妻子，西兴潮落无归船。我因老亲守穷巷，买山未得囊无钱。息心掩关谢时辈，五年不到西溪边。……岂甘不死愧良友，欲使奇字留人间。"此诗为顺治六年游杭州时赠吴锦雯等登楼社诸子之作。登楼社为读书社之支流，曾入复社，故吴伟业称之为"同社"。面对社中诸子慷慨激昂的气节：或"感时上策"、"会饮痛哭"，或在明朝并非高官却以身相殉，或"脱身弃妻子"、永不归家，自然会令他想到自己身为"党魁"却并不怎么光彩的表现。所以在赞扬诸子的同时，又向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殉节："我因老亲守穷巷"。以"孝"为理由是再好不过的借口，因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向来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所以这也是后来他为自己的失节作辩解时所使用的一个主要借口。诗歌最后为吴锦雯的"不死"作开脱云："岂甘不死愧良友，欲使奇字留人间。"实质也是在为自己的"不死"作开脱。此外，他还常常将自己的"沦落"归因于"时命"，如顺治四年为姜如农、如须兄弟所作的《东莱行》诗，对姜氏兄弟没有像左懋第、宋玫一样壮烈殉难的原因作了这样的解释："鲁连蹈海非求名，鸱夷一舸宁逃生？丈夫沦落有时命，岂复悠悠行路心。"他说姜氏兄弟之飘零避乱同鲁仲连之蹈海、范蠡之浮海一样，既不是为了求名，也不是为了逃生，而是由不幸的"时命"所致。这实质上也是对本人没有殉难的解释，所以诗笔紧接着便转到了自己身上："我亦沧浪钓船系，明日随君买山住。"又如《毛子晋斋中读吴匏庵手抄宋谢翱西台恸哭记》："丈夫失时命，无以辞碌碌。"《咏史十二首》其二："时命苟不佑，千载无完人。"均将个人的碌碌无为、道德之不完美归因于客观"时命"。也是因为愧疚失落，他才会反复表明自己退隐守节之志的坚定，如《言怀》诗自言心志云："苦留踪跡住尘寰，学道无人且闭关。只为鲁连宁蹈海，谁云介子不焚山。枯桐半死心还直，断石经移藓自斑。欲就君平问消息，风波几得钓船还？"他说自己虽然没能壮烈殉节而苟活于世，但就好比枯桐半死而心犹直，岩石虽断而旧

[1] 《吴梅村全集》卷一《赠愿云师》，第16－17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苔仍斑斑可见，自己仍然心系故国，对故国的忠贞永远不变，会像鲁仲连、介子推那样远避富贵与浮名，像严君平那样隐居不出。他告诉王时敏等友人："未堪醉酒师彭泽，欲借飧英问首阳。"(《王烟客招往西田……赏菊二首》)自己归隐并无陶渊明之"悠然"，而是如齐、夷之不食周粟；告诉老友："移家就吾住，白首两移民。"(《遇旧友》)告诉弟子许旭："翛然吾愿足，不肯负沧浪。"(《园居谏许九日》)既是自我鼓励、自我安慰，也是向人表白。以诗歌记录故国历史，表现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就是他所选择的回报故国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变形的赎罪方式，成为此时期"梅村体"诗史的主要创作动机，亦即情、史并重之诗史观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其实，透过这种种的辩解与回护，依然透露的是吴伟业的精于算计，他不仅重命，同时还重名，担心朋友的议论与后世的针砭，于是便不得不找出种种的理由替自己辩解。吴伟业是不幸的，他如果是一般士子，也许不必担心这些，但他受君恩太重，在吴中影响太大，人们对他有太高的希望，因而成为众目所视的人物，而这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

再次，失去功名前途的失意与不甘时时困扰心中。随着清朝统治的确立，吴伟业退隐守节的遗民生活也很快平稳安定下来，但自此"致君泽民"的功名事业也彻底成为泡影。自幼功名心极强且习惯了众人追捧、曾经"文章、德器倾动天下，议者谓旦夕入相"的吴伟业，[1]面对清苦寂寞的遗民生活，不免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失意与不甘相交织的复杂感受，成为他以"诗史"抒情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如在顺治六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他梦到"杏花盛开，桃李数株，次第欲放。予登小阁，临曲池，有人索杏花诗，仿佛禁中应制。"似乎回到了昔日贵为天子近臣、春风得意的美好岁月，醒来之后便不胜怅惘："追思陈事，去予登第之岁已二十年矣。"[2]于是走笔为诗《庚寅元旦试笔》："二十年前供奉官，而今白发老江干。青樽酒尽贪孤梦，红杏花开满禁阑。西苑楼台遗事在，北门词赋旧游难。高凉桥畔春知许，赢得儿童走马看。"回想二十年前为"供奉官"时的春风得意，再对比眼下"白发老江干"的凄凉寂寞，遗事虽在而旧游难追，在伤怀故国的同时，交织着无限落寞与失意。第二年的除夕，他"再梦杏花"，[3]作《辛卯元旦试笔》诗，对过去那段车马宾从的显赫生活念念不置。又如其《行路难》诗云："愁思忽不乐，乃上咸阳桥。盘螭蹲兽势相啮，硌呀口鼻吞崩涛。当时平明出万骑，马蹄蹀躞何逍遥。长安冠盖一朝改，紫裘意气非吾曹。柴车辟易伏道畔，舍人辞去妻孥嘲。人生太行起面前，何必褒斜栈阁崎岖高。"(其四)随着明朝的灭亡，长安城内富贵腾达者一朝间尽换作他辈，威风八面、春风得意的不再是吾曹。作为前朝遗民，穷愁落泊的生活，甚至遭人耻笑。人生就如同太行山忽起面前，往事犹如天

[1] 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三《与吴骏公书》，第 470 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51。
[2] 《吴梅村全集》卷六《庚寅元旦试笔·序》，第 156 页。
[3] 《吴梅村全集》卷六《辛卯元旦试笔·序》，第 162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上。通过前后对比，抒发了对眼下失势之遗民生活的极度失落与不满。因为失意，所以内心时有不甘寂寞的躁动。如《行路难》其八：“男儿读书良不恶，屈首残编务穿凿。穷年矻矻竟无成，徒使声华受萧索。君不见王令文章今大进，丘公官退才亦减。寂寂斋居自著书，《太玄》奇字无人问。”学而优却不能仕，学也就成了无用之学，“徒使声华受萧索”，因为仕宦不进才华亦退。即使著成奇书，也无人过问。流露出对闭门读书、寂寂无闻之生活的不满与对个人“声华”的向往。又如《南生鲁六真图歌》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读书终老岂长策，乘云果欲鞭龙螭。神仙吾辈尽可学，六博吹竹游戏作。不信晚年图作佛，趺坐蒲团贪睡著。丈夫雄心竟如此，世事悠悠何足齿！”抒发了雄心被磨耗的惋惜与愤慨。并且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他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友人如宋征舆、宋征璧、许尧文、张王治、侯方域、周肇、叶方蔼等，为了个人的功名前途或家族利益开始出来应考做官，这自然也会触发其内心骚动。但吴伟业不甘寂寞的实际表现主要是追求文坛声名与“遗民”声名，而非富贵荣华与飞黄腾达。他曾告诉友人宋征璧，自己“万缘遗落，独于诗文一道”“结习未忘”，[1]足见他对诗文创作的重视。他不仅在创作上呕心沥血，以独具一格的“梅村体”诗史享誉文坛，而且有意确立自己文坛领袖的地位。比如他在门下招揽聚集了周肇、许旭、王撰、王挺、王昊等一批门人弟子，据其后来所写《太仓十子诗序》来看，明显有开创诗歌流派的用意。正是“名心”的躁动，使他忘记了对“诗祸史祸”的恐惧，[2]甚至出来参加带有很强政治倾向的文学派别活动。如顺治九年，他曾致书云间慎交、同声两社诸子，以社中前辈的身份出面调解两社矛盾。顺治十年又参加了两社的虎邱大会，被奉为宗主。他还曾以社中领袖、“故老遗黎”的身份致书孚社诸子，与之讲解“论文取友之道”。[3]我们不必讳言吴伟业“名心未除”[4]以致不能韬光养晦的躁动，但也不必因此怀疑其遗民之志的真诚。如顺治八年其至友周肇往京师游太学之前，吴伟业为作《周子俶东冈稿序》，文中云：“余今日毕志家园，杜绝人事；子俶入京师，游太学，交王公大人以成名，若有异乎两人之踪跡者。余曰：不然。夫君子之道，可以出而不出，可以处而不处，皆非也。余受遇当年，滥叨宫相；子俶少而遭乱，门户未显。余稟受羸弱，积疢沈绵；子俶精力强济，负当世之具。子俶而不出，则又谁出哉。”[5]认为周肇可以“出”是因为

---

1 宋征璧《上吴骏公先生》述吴伟业信中之语，《抱真堂诗稿》卷一附，顺治九年自刻本。

2 他在《与子暠疏》中曾说：“改革后吾闭门不通人物，然虚名在人，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面对周围一起起文字狱，在诗中记录故国之史、表现故国之思的吴伟业自然会感到恐惧，但用“惴惴莫保”形容整个这一时期的心境其实有所夸张。由于此文是临终前所写，那时他正处于失节的忏悔与对清廷逼迫的怨恨中，并且也不愿承认自己曾因“名心未除”而忘记了韬光养晦，所以在总结从前的感受时难免片面夸张。

3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四《致孚社诸子书》，第 1086－1088。本文写作时间难以确考，在《梅村家藏稿》中排在《致云间同社诸子书》之后、《与宋尚木论诗书》之前（两文皆作于顺治九年），且文中有“今海内方定，兵革已息”、“故老遗黎，优游宽大”之语，可推知当约略作于同时前后。

4 严迪昌《清诗史》，第 380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5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一，第 707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其“少而遭乱，门户未显”，但他本人“受遇当年，滥叨宫相”则不可以“出”。尽管已认可清朝的统治，并鼓励好友追求仕途功名，但并不打算改变个人“处”的信念。又如顺治九年得知被清朝官吏疏荐于朝之后，他在回复侯方域之规劝时犹自矢“必不负良友”。[1]应该说其“遗民”之志的真诚是没有问题的，“名心未除”并非其后来失节的决定因素。但隐而不深与名心躁动，增强了人们对他的关注，则遗民生活也就不能过得安稳。

总之，在吴伟业看似宁静安定的遗民生活背后，其实是一颗骚动不安的灵魂：有国破家亡的悲痛愤慨，有未能殉节的愧疚失落，也有失去功名的失意与不甘。正是这种层层叠叠、复杂微妙的心态，决定了此时期“梅村体”复杂的创作动机，从而形成了情、史并重之诗史观的丰富内涵。

三、仕清之后：忏悔与赎救相交织的复杂心态

“仕清”是吴伟业人格心态发展演变的又一转折点，自此他又背负上了“贰臣”的沉重负担。面对已然失节的事实，他觉得仅凭以诗存史已无法挽回个人形象，所以进一步用“心史”诉说，一面自悔自恨，一面又用心良苦地予以挽救修饰。以往论者大多从“文如其人”的观念出发，只注意到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本文力求客观揭示他这段时期的真实心态。

关于吴伟业的人格评价中，其失节仕清出于“被迫”抑或“自愿”是历来学者争论的焦点。持“被迫”说者站在同情吴伟业的立场上，将其失节之事实与本心之动机分开，如清初尤侗：“及入本朝，迫于征辟，复有北山之移。予读其诗词乐府，故君之思流连言外。……论者略其迹，谅其心可也。”[2]主张“略其迹”而“谅其心”。又如清中叶的赵翼，将其仕清与主动降清的龚鼎孳、钱谦益作了区别，认为他“究是本心不昧”。[3]此外如顾湄、陈廷敬、胡介、陈廷焯、沈德潜、毕阮、管世铭、程穆衡、陈康祺等人对此都持谅解态度，认为吴之仕清主要缘于清廷逼迫、“忠孝不能两全”，本心并未背叛故国。持“自愿”说者则站在维护传统伦理的立场上，认为吴伟业仕清缘于“委蛇好爵”。如荆如棠云：“梅村当胜国时，自负重名，位居清显。当改玉改步之际，纵不能与黄蕴生、陈卧子诸公致命遂志，若隐身岩谷，绝口不道世事，亦无不可。乃委蛇好爵，永贻口实。”[4]又如刘声木《吴伟业出仕二姓原委》云：“祭酒因海宁陈相国

---

1 伟业复方域书已佚，但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三《与吴骏公书》后附有方域友贾开宗语：“余见学士复侯子书，尤慷慨，自矢云：‘必不负良友’。……”《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51，第 471 页。

2 《艮斋杂说》卷五，第 99 页，中华书局 1992 年第 1 版。

3 《瓯北诗话》卷九《吴梅村诗》，第 13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第 1 版。

4 靳荣藩《吴诗集览》:《谈薮》卷之下，苏州扫叶山房藏版，乾隆刻本。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之遴所荐起……意其必以卿相相待，故祭酒欣然应召。……世但知其为老母，而不知亦为妻少子幼，故偷生忍死，甘仕二姓。人生一有系念，必不能以节烈称。祭酒所系念有四：官也，母也，妻也，子也，宜其不克以身殉义，得享令名。”[1]王曾祥则谓其“心染”。[2]又如洪亮吉、徐麟吉、沈冰壶、荆如棠等人，都认为吴之仕清主要是权利熏心、变节求荣。两种看似相反的观点，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前者看到了吴伟业被“逼迫万状”与“忠”、“孝”不能两全的客观处境；后者则抓住了其失节仕清的行为本身，但同时又都有偏颇之处。目前伍福美、徐江、叶君远、严迪昌等学者，尽管结论不同，但对其仕清原因的复杂性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既指出了清廷胁迫吴伟业出山的必然性，又指出了吴伟业本人人格的懦弱。[3]的确，满清尽管可以用武力镇压人们的反抗行为，却不能以此征服人们的反抗精神，因为中国古代“忠臣不事二君”及“夷夏大防”的观念根深蒂固，作为当时文化中心的东南士人反抗精神尤为强烈。所以清朝在立国之初，为了稳固统治不得不软硬兼施，在以武力打击反抗力量的同时，又以“招降”瓦解人们的反抗意志。由于吴伟业在东南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其出处直接关系到汉族士人的抗清斗志，所以清廷胁迫其出山是必然的。对此，吴伟业及亲友其实也有所认识，顺治九年他为舅氏朱明镐所作《墓志铭》中曾提到：“当君之未亡也，诏书举山林隐逸，学官以其名闻，君辞以书。……君殁未两月，余之困苦乃百倍于君，君平昔所以忧余者，至今日始验，愤懑不自聊，乃致抱殷忧之疾。”[4]谓担心清廷征召为平昔所忧，说明他们对此事的发生早已有所预料。与易代时的情形不同，此次没有任何两全选择的可能。当然，也确如有的论者所言，吴伟业如果坚决拒绝出仕，也未必不能像顾炎武、傅山、李颙等遗民一样赍志以守，全节以终。但这只是后人的事后判断，对当事人而言，此次则无疑是生死抉择，顾炎武等人当时无不是以生命为赌注的。康熙年间的史学家邵廷采谈到明遗民之处境时也曾感叹道：“於乎！明之季年，犹宋之季年也；明之遗民，非犹宋之遗民乎？曰节固一致，时有不同。宋之季年，如故相马廷鸾等，悠游岩谷竟十余年，无强之出者。其强之出而终死，谢枋得而外，未之有闻也。至明之季年，故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非是，则有出而仕矣。”[5]可见清廷逼迫明遗民出山的政策确实非常严酷。而如前所述，吴伟业尽管有“名心未除”的躁动，但其“名心”主要并非官爵富贵，他并不缺乏真诚的“白首遗民”之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仕清的确是“被迫”的，确非其本心所愿。

---

1 《茶楚斋随笔》卷八《吴伟业出仕二姓原委》，第160-161页，中华书局1998年第1版。

2 王曾祥《静便斋集》卷八《书梅村集后二则》，第880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272。

3 分别见伍福美《吴梅村诗歌艺术新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一章《吴梅村生平及时代环境》、徐江《吴梅村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1年第1版）第四章第一节《盛名累清节　悲吟诉长恨》、叶君远《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第1版）：《吴梅村应召仕清之际心态探微》、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一章第二节第一部分《吴伟业的心路历程》。

4 《吴梅村全集》卷四十六《朱昭芑墓志铭》，第950-951页。

5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第211-21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但这种“被迫”又是在保全个体生命的前提下才成立的，按照吴伟业人格发展的逻辑，明亡时不能殉节，面对清廷的强征自然也很难做到以死抗争。在传统伦理道德中，“孝”道确实是一种最基本的观念，但“忠”、“孝”又是一体的，并且随着宋代以来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又往往要求以“忠”为先，强调尽忠即尽孝，王曾祥《书梅村集后二则》所谓“或言梅村老亲在堂，未宜引决。夫求生害仁，匪移孝之旨；见危授命，实教忠之义。”[1]所持即此种观念。所以，吴伟业仕清最根本的原因并非“委蛇好爵”、“富贵逼人”，也并非“忠孝不能两全”，而是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再次压倒了道德信仰。

面对生死抉择，求生是人的本能，吴伟业确实贪生怕死，没有以生命捍卫信仰的人格境界，但不能因此谴责他权利熏心、变节求荣。在得知被疏荐于朝之后，他也曾做过抵抗。顺治九年，他分别上书两江总督马国柱与总戎黄某，以病力辞。顺治十年，又亲自跑到南京拜谒马国柱，上《辞荐揭》，并作二诗以赠，其中第二首云：

十年重到石城头，细雨孤帆载客愁。累檄久应趋幕府，扁舟今始识君侯。青山旧业安常税，白发衰亲畏远游。惭愧荐贤萧相国，邵平只合守瓜丘。

辞旨尽管谦卑委婉，却明白地表达了不愿出仕的心志。他说自己安于为一介布衣服从朝廷管理，并且还有年迈的双亲在堂，确实不能远游。就像秦东陵侯邵平一样，自己只合布衣田园。但其前朝名臣、“海内贤士大夫领袖”的名望地位，却决定了他没有朱明镐那样仅“辞以书”即可免于征召的幸运，他的努力并未起到任何作用。顺治十年秋，清廷的征辟召书终于还是正式下达了。当然，吴伟业的辞荐方式若与顾炎武等人相比，性格之懦弱、对身家性命之顾虑可谓一目了然，亭林先生辞荐书如《与叶讱庵书》：“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记与孝感熊先生语》：“余答以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2] 以死相誓，陈辞激烈，比之吴伟业《上马制府书》：“膏盲沉痼，狼狈不前，万难上道……为此恳陈，万祈垂鉴。”[3]《辞荐揭》：“素婴痼疾，万难服官……真病真苦，实实如此。伏祈祖台将病苦实情详列到部，庶几于共闻共见，宁严毋滥之部覆功令允符。而伟业贪观圣化，调理余生，仰诵九重之深仁，拜感祖台之至爱，生生世世，啣结于无穷矣。”[4]这样的哀哀乞怜，甚至不惜违心谄谀清朝、恭维清吏，无疑有霄壤之别。很明显，吴伟业并没有杀身成仁的勇气。所以面对清廷的逼迫，他犹疑再三后还是选择了屈节。就在应征北上将要

1 王曾祥《静便斋集》卷八《书梅村集后二则》，第 880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272。
2 《顾亭林诗文集》第 53、 196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1 版。
3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四，第 1092 页。
4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七，第 1130－1131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到达京师时，他还怀着“白衣宣至白衣还”的一线希望，写诗寄“当事诸老”：

柴门秋色草萧萧，幕府警传折简招。敢向烟霞坚笑傲，却贪耕凿久逍遥。杨彪病后称遗老，周党归来话圣朝。自是玺书修盛举，此身只合伴鱼樵。

莫嗟野老倦沉沦，领略青山未是贫。一自弓旌来退谷，苦将行李累衰亲。田因买马频书券，屋为牵船少结邻。今日巢由车下拜，凄凉诗卷乞闲身。

匹马天街对落晖，萧条白发怅谁依？北门待诏宾朋盛，东观趋朝故旧稀。雪满关河书未到，月斜宫阙雁还飞。赤松本是留侯志，早放商山四老归。

平生踪迹尽由天，世事浮名总弃捐。不召岂能逃圣代，无官敢即傲高眠？匹夫志在何难夺，君相恩深自见怜。记送铁崖诗句好，白衣宣至白衣还。

经过前两次的失败，他应该明白可怜兮兮地哀求不会有结果，但仍然小心翼翼、软弱可怜地哀求着。极力表明自己并非“敢向烟霞坚笑傲”，逃避、傲视“圣朝”，只是性爱山水，贪恋耕凿之逍遥。并且衰病羸弱，就象汉之杨彪、周党一样，[1]虽然天子盛意征召，但自身只希望过隐逸生活。接下来小心翼翼地解释难以应征的病苦情由，委曲婉转地表白不愿仕清的心志：自兵兴以来，自己已屡以远行牵累衰亲，为买车马、船只，已频频卖田、卖屋，所以为此恳乞赐予闲身；朝中故旧已稀，自己匹马长安，白发萧条，有谁可以依靠？隐逸是自己的本志，为此恳求早放归山。最后再次表明“世事浮名”总非己所关心，不召也不能逃避圣代，无官也不敢傲视朝廷，苦苦哀求君、相见怜，开恩成全他作一介布衣顺民的心愿，让他白衣而返。字里行间，流露着无限酸楚凄凉之感，映射出不想仕清却又惧怕清廷治罪而不敢断然拒绝的凄苦心境。无论是清朝统治者，还是想借其为“剡矢”的举荐者，自然不会因为他的再三哀求而心慈手软，所以不能舍弃个体生命的吴伟业只有放弃名节。顺治九年秋，他曾在为同年王孙兰所作《墓志铭》中就王氏之果决赴死发表议论：“夫死者人之所难，未有不健于决，成于果，而败于犹豫者也。”[2] 难下死的决心、“败于犹豫”正是其本人之写照。

吴伟业尽管贪恋生命，但并不能彻底摆脱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自明末东林学派提倡“清议”以来，社会舆论对士人名节操守的要求尤为严格。当吴伟业被荐举的消息传出后，老友侯方域当即给他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不厌其祥地为之剖析不能出仕的理由，语重心长地劝勉他要顶住压力、珍重名节。[3]仕清之后，更是受到多方责

[1] 《后汉书》卷五十四《杨彪传》（第 1970 页）记载：“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卷八十三《周党传》（第 2761 页）记载：“建武中，征为议郎，以病去职。遂将妻子居黾池。复被征，不得已乃著短布单衣，榖皮绡头，待见尚书。及光武引见，党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帝乃许焉。”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1 版。

[2] 《吴梅村全集》卷四十三《中宪大夫广东兵备副使王公畹仲墓志铭》，第 913 页。

[3] 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三《与吴骏公书》，第 470－471 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51。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难。如顺治十一年周肇入京时，陆元辅赠诗云：“离离禾黍故宫残，玉署金銮改旧观。若见铁崖为问询，锦衣何似白衣安。”[1]让周肇见到吴伟业时代为问询，“锦衣”怎比得上“白衣”心安？顺治十二年，胡介曾致书云：“既落世网中，顺行逆行，冷暖自喻。要之，古庙香炉酬偿本愿，我辈唯以不负三生为大耳。从来慧业文人，皆道人之名根色想未净，转展迁流者，故世遇率坎坷多故，正以助发其回首拂衣也。……唯万万审时珍重。”[2]这尚是友人诚恳委婉的告诫与提醒，另外一些批评可就严厉多了。如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计东曾以《和钱塘陆丽京圻无题诗六首》呈吴伟业，“于其出处，备极讥刺”。如其一云：“广庭长恨月明多，小立阑干蹙黛蛾。胆怯几回看瘦影，夜深偷自试新歌。依稀斗帐人双宿，恍惚灵风雁独过。可惜故夫曾未识，孀居空有泪如波。”其六云：“不胜幽怨却生疑，又见杨花满地吹。小妹生男良宴会，阿姨新寡又于归。一时轻薄横相诱，几度踟蹰不自持。日暖游丝争入户，辘轳肠内有谁知。”[3]以再嫁之妇为喻，极尽嘲讽之能事。黄宗羲《张南垣传》也记载，张氏在吴伟业应召临行前的饯别宴会上，曾借戏词“切莫提起朱字”嘲讽他。[4]当然，这类记载未必全都属实，但由此却可以想见吴伟业当时面对怎样的舆论压力。明亡时没有殉节，他尚且觉得“君亲有愧”，如今又出仕二姓，负罪感自然更加强烈。所以自决定屈节之时起，其内心便彻底失去了平衡。顺治十年征辟诏书下达后，他竟“以怫郁大病”，[5]病中留下了被很多后人误以为绝笔的《贺新郎·病中有感》一词，写下了他当时的痛苦感受：

>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绝决。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历史上的龚胜虽然为捍卫名节“天年竟夭”，却已然“高名难没”，曾几何时，他还以龚胜自比、矢志遗民，而如今却要屈膝做“贰臣”。他说自己的病并非医药所能医治，而是万劫难覆的心病，纵然华佗再世，也难解愁肠千结。他追思往事，倍感凄凉哀痛，悔恨当初“沉吟不断，草间偷活”，没有像杨廷麟等故人那样慷慨死难，以致今日“艾炙眉头瓜喷鼻”[6]、难以绝决；他痛斥自己“一钱不值”，感到生命的存在失去了意义

---

1 《陆菊隐先生文集》:《菊隐诗钞》,《送周子俶游燕兼寄吴梅村学士》其二，民国间抄本。
2 胡介《与吴骏公先辈》，见李渔《尺牍初征》卷三，第 553－554 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153。
3 徐珂《清稗类钞》“讥讽类”，第 1542－1543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1 版。计东本人诗集内并无此诗。
4 《南雷文定》前集卷十，第 239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205。
5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七《与子暟疏》，第 1132 页。
6 此句为用典，《隋书》卷六十四《麦铁杖传》:“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艾炷灸颏，瓜蒂歕鼻，治黄不差，而卧死儿女手中乎？”第 1512 页，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和价值。虽然有“脱屐妻孥非易事”苦衷的诉说，但更多的却是铭心刻骨的悔恨自责。确实像魏中林、裴世俊等学者所说的那样，愧悔自责的精神痛苦自此便一直伴随着他，成为晚年“心史”创作的主旋律，[1]尤其是顺治十四年复归之前的四五年时间里，因为失节仕清确实有违他的道德信仰。

但是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思想上来说，吴伟业并不甘心就此“身名颓落”，在后世留下“两截人”的千古骂名。所以面对已然失节的事实，他并非一味消极地忏悔自责，同时还用心良苦地利用文学创作弥补救赎，甚至自我修饰，竭力挽回“贰臣”的形象，成为其“心史”观形成的深层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极力为自己的“不死”开脱辩解，强调失节的外在原因。家庭牵累、“忠孝不能两全”仍然是他反复强调的一个主要理由。如顺治十三年秋，乡人田茂遇应试落第、客游京师一年多之后决意归里，吴伟业以诗送行，细数两人的知己之感、共同的归里心愿，并向他解释自己不能拂袖而归的原因：“拂袖非长策，蹉跎为老亲。”[2]说自己忍辱含垢是为了“老亲”。又如临终前，他在名义上写给儿子、实际上却是因“岁月日更，儿子又小，恐无人识吾前事”而向后人表白苦衷的《与子暟疏》中说：“十年，危疑稍定，谓可养亲终身，不意荐剡连连，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同事者有借吾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返矣。……吾以草茅诸生，蒙先朝巍科拔擢，世运既更，分宜不仕，而牵恋骨肉，逡巡失身，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以见烈皇帝及伯祥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3]愧悔自责的同时，又以清廷“逼迫万状”、“同事者借吾为剡矢”而“老亲惧祸，流涕催装”为解，说明他为了“孝”不得不放弃“忠”的无奈与无辜。再如《遣闷》诗云：“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其三) 《又咏古》诗云：“一身累妻子，举足皆荆榛。”(其二)等等，屡以家累为由为自己的失节辩解。他在《王母周太安人墓志铭》中还曾就仕清一事将自己与王澧相比较：“君父子同取甲第，父处子出，于道为宜。……若夫遭逢世故、进退维谷之日，在楚先欲以完节畀余姚公，可出身为门户计，而余于大义不得援此以为解。”[4]由于伟业父在明朝未取得功名，他甚至为自己不能像王澧一样“援此以为解”深感遗憾，更是无意中流露了欲寻找借口为自己开脱的心理。清廷的逼迫是他反复向别人解释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如在京师期间，他寄诗同时被征却“独得不至”的房师周廷鑨，向他倾诉自己被迫仕清的苦衷，希望他能够“识此襟情”，理解自己。诗歌首先抒写了“惆怅平生负所知”的愧悔之情与饱经战乱的沧桑悲感，然后便向房师解释个人失节仕清的原因：“但若盘桓便

---

1 魏中林《徘徊于灵与肉之际的悲歌——论吴梅论吴梅村诗歌中的自我忏悔》(《苏州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裴世俊《吴梅村诗歌创作探析》（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7 月第 1 版）十《“君亲有愧吾还在”——忏悔悲歌的价值效应》。

2 《吴梅村全集》卷十二《送田髴渊孝廉南还四首》其三，第 341 页。

3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七，第 1133、1132 页。

4 《吴梅村全集》卷四十九，第 1015－1017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见收，诏书趋迫敢淹留。”(其三)是说清廷的残酷逼迫：诏书催逼，但若推托就会被逮捕，又怎敢拖延逗留呢？“巨源旧日称知己，误玷名贤启事中。”(其四)是抱怨陈名夏、陈之遴等荐举者，以山涛荐举嵇康的典故为喻，说他们本来也是自己的知交，可正是他们的举荐迫使自己玷污了名节。又如康熙七年，他在《修孙山人墓记》中借题发挥道：“古之肥遁者，先乱形之未成，引领绝迹，得以行其所志；不幸濡忍，一底于沦胥，求为逢萌、梅福，难已！……不数年，天下大乱，贤人君子虽欲远引高蹈，龙不能潜鳞，凤不能戢翼，每罹于矰缴网罗之患。”[1]此翻感慨议论显系针对自身遭际而发，指出在险恶的环境逼迫下，贤人君子也难逃网罗。言外之意，其本人之仕清自然也是因为清廷的“矰缴网罗”。他向何采抱怨道：“纵抱凌宵姿，萧条斧斤畏。时命苟弗谐，贫贱安可冀？”(《送何省斋》)向吴雪航解释道：“欲取石上泉，洗濯尘中累。群公方见推，雅志安得遂？”(《赠家侍御雪航》)向吴青房解释云：“天意不我从，世网将人驱。……一官受逼迫，万事堪唏嘘。”(《矾清湖》)反复解释自己仕清是迫于清廷压力，实非本心。他还往往以“虚名在人”为自己的失节辩护。如顺治十年赴京途中，他赠诗偶然相逢的嵇宗孟：“湖海相逢一俊英，风流中散旧家声。琴因调古须防怨，诗为才多莫近名。浊酒如淮歌慷慨，苍髯似戟论纵横。惭余亦与山公札，抱病推迁累养生。”(《淮上赠嵇叔子》)以嵇康喻嵇宗孟，告诉他才俊之士必须提防别人妒怨，千万不能“近名”。正是由于盛名，自己虽然也曾像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山涛那样拒绝过举荐者，但还是没能逃脱清廷的罗致。《赠陆生》则因陆庆曾被科场案牵连的遭遇抒发抱怨：“习俗谁容我弃捐，才名苦受人招致。古来权要嗜奔走，巧借高贤谢多口。”又如《病中别孚令弟》：“万事愁何益，浮名悔已迟。”(其六)《矾清湖》：“乱世畏盛名，薄俗容小儒。”……强调被迫仕清的不幸命运是“才名”、“盛名”所致，所以反复怨悔悲叹，以表明自己的悲哀无奈。我们并不怀疑这些外界原因的客观存在，但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住他贪生怕死的人格本质，因为“死”的权利毕竟掌握在其本人手中。其实吴伟业并非不知道自己仕清的行为本质是“忍死偷生”，但其诗文在向他人、向读者作解释时却反复申述外在原因，这恰恰反映了其为获得他人尤其是后人谅解而自我开脱辩解以减轻失节责任、挽救自我形象的良苦用心。

其次，在为失节行为辩解的同时，他还努力剖白，甚至文饰自己的心迹。(1)努力表白自己真心退隐、无意仕清的“本志”。如顺治十一年，应征入京后，他前去拜访极力举荐他的大学士陈名夏，应陈之请为其文集作序，序文一开头先讲了这样一件事：“溧阳陈百史先生以诗古文词名海内者二十余年，余也草野放废，未尝一及先生之门，先生顾寓书余曰：‘吾集成，子为我序之。’夫先生之文，衣被四海，乃于三千里外，欲得穷老疏贱者之一言，此其通怀好善，诚不可及，而余则逡巡未敢也。今年春，始

[1] 《吴梅村全集》卷四十，第856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进谒于京师，会先生刻其集初就，余得受而卒读，不揣为之序曰……”讲他在入京师之前，“未尝一及”陈名夏之门。陈氏曾致书求序，但他“逡巡未敢”，并没答应。直到“今年春”来京师，他才第一次拜谒陈氏。很明显，摆明这样一个事实，并非真心想赞扬这位借他为“剡矢”的陈名夏“通怀好善”，而是有意划清自己与陈氏的界限，表明自己本来并不与陈名夏这样的降臣交往，陈氏的荐举绝非自己的意愿。又如在京师仕清期间，他尽管并不敢拂袖而归，而是一直等到嗣母去世才借奔丧之由安全归乡，但是在送往迎来之作中还是反复向人展示自己的复归心愿，以表白自己真心退隐、无意仕清的“本志”。如顺治十一年秋，伟业崇祯九年所取士沈以曦谪任深州州判，他以诗赠行，前三首写对沈氏谪官的同情与鼓励，还是此类送行诗的常套，最后一首则转而表白个人真诚的隐逸之志与急切的复归心愿：“岂不贪高卧？其如世路非。故园先业在，多难几时归？遇事愁官长，逢人羡布衣。君看洞庭雁，日夜向南飞。”(《送湘阴沈旭轮谪判深州四首》其四)他说他何尝不想高卧不起，但无奈世道不许。故园也有祖先家业，何时才能复归呢？他的归心就像日夜南飞的大雁。为别人送行，不写离别之情却写个人“本志”，显然是有意自我表白。又如他赠诗送行自京师南还的老友穆云桂说：“幸留残岁伴，忍作独归人？……与君谋共隐，为报故园春。”(《送穆苑先南还四首》其一)赠诗因遭贬谪而有“故乡思”的吴雪航说：“待余同拂衣，徐理归田计。”(《赠家侍御雪航》) 赠诗在京相遇的诗人胡介云：“我有田庐难共隐，君今朋友独何心？还家早便更名姓，只恐青山尚未深。”(《送胡彦远南还河渚》)赠诗“已谒选得官，需次未授。”而自京师南归的儿女亲家王瑞国云：“共知三径志，早定十年前。”(《送王子彦南归四首》其一)“中年存旧业，雅志毕躬耕。”(其三)既是说王瑞国的“本志”，也是表白自己的“本志”。实际上做不到，却还反复向人表白，这种作法本身同样暴露了他既愧悔失节又不甘接受“身名颓落”之事实，力图剖白心迹、重塑自我形象的复杂心态。(2)有意展示，甚至修饰夸张自己愧悔自责的精神痛苦。确如论者所言，吴伟业仕清后的一些作品自悔自惭、自我谴责，充分体现了强烈的失节之痛，其中最经常为人所引用的是词作《贺新郎·病中有感》与诗作《过淮阴有感二首》、《临终诗四首》。但仔细分析吴伟业此时期作品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这种愧悔痛苦的心迹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写给别人的作品中展示的。如顺治十三年八月，何采致仕归，何采是伟业座师何如宠之孙、儿女亲家何应璜之子，吴伟业赠长篇五古一首送行，诗歌除了诉离别之情、赞赏何采的身世才华与拂袖归乡之举外，还用了不少篇幅诉说个人的不幸身世、被迫仕清之原因、真心退隐之“本志”，并剖白失节的愧悔痛苦：“过尽九折艰，咫尺俄失坠。凄凉游子装，诀绝衰亲泪。关山车马烦，雨雪衣裘敝。……我行感衰疾，腰脚增疲曳。可怜扶杖走，尚逐名贤队。薄禄贪负闲，忧责仍不细。……白杨何萧萧，冲泥送归槥。尔死顾得还，我留复谁为？……早贵生道心，中年负名义。蹉跎甘皓首，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此则予所愧。”[1]向何采倾诉自己十年守节“过尽九折艰”而咫尺失坠的痛悔，不能摆脱世网、重归故乡的痛苦，背叛信仰、辜负名义的惭愧。又如顺治十五年，复社友人黄涛五十，吴伟业作文为寿，文章最后却诉说个人失节的愧悔：“余也少壮登朝，羁栖末路，犬马之齿，未填沟壑，获与观只称齐年，而困厄忧愁，头须尽白，其视观只逍遥乎网罗之外，蝉蜕乎尘壒之表，不啻醯鸡腐鼠，仰睹黄鹄之寥廓也。乃因诸君之请而为之辞，其以识余之愧，而观只为不可及也夫!”[2]再如《送纯祜兄浙中藩幕四首》之四：“一竿秋色里，踪跡愧渔翁。”《送詹司理之官济南》：“故人惭鲍叔，相送话东游。”《赠家侍御雪航》：“我来客京师，一身似匏系。老大惭知交，凄凉托兄弟。” 以及《淮上赠嵇叔子》、《寄房师周芮公先生四首》、《茸城楼大风晓寒吟眺以示友圣九日玉符诸子》、《夜发破山寺别鹤如上人》等展示个人痛苦愧悔的诗作，皆是写给他人看的迎来送往之作。他不仅直接展示内心痛苦，还反复用形体的“早衰”来证明精神上的痛苦煎熬。如康熙三年，座师李明睿八十，吴伟业为作《座师李太虚先生寿序》：“其之维扬也，与伟业相遇于虎丘，别十五六年矣，其容加少，其发加鬓……伟业颠毛斑白，自数其齿少于师二十岁，而忧患蹙迫，以及于早衰，窃仰自惭叹，以吾师为不可及。”[3]“忧患蹙迫”以致“早衰”，更可见出他承受着怎样沉重的心灵折磨。又如《郁静岩六十序》：“余白头憔悴，黄颔提携……余凿坏何遁，投劾非还，疲曳趋长乐之钟，风雪从兰池之猎。洗沐归休，俄惊会逮；征输解网，再遇刊章。……言之即罪，知者谓我心忧。”[4]诉说个人的憔悴困顿，希望“知者”理解其“心忧”。虽然是以个人的痛苦不幸反衬郁氏的康乐幸福，然酸楚凄凉，已非寿文本旨。再如《彭燕又五十寿序》：“余年过四十，而发齿摇落。”[5]《怀王奉常烟客》：“把君诗卷问南鸿，憔悴看成六十翁。老去只应添鬓雪，愁来哪得愈头风。”《送旧总宪龚公以上林苑监出使广东》：“独有飘零老伏生，不堪衰白困将迎。”《矾清湖》：“秋雨君叩门，一见惊清癯。我苦不必言，但坐观髭鬚。岁月曾几何，筋力远不如。遭乱若此衰，岂得胜奔趋。”等等，形体的过早衰残无疑是精神痛苦的象征。吴伟业因失节而愧悔痛苦的心情无可怀疑，但反复向他人展示，并用形体的“早衰”加以证明，则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剖白心迹、博取他人怜悯同情的良苦用心。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甚至会对个人某些心迹予以修饰或夸张，如临终前的《与子暟疏》回忆自己入清后的遗民生活云：“改革后吾闭门不通人物，然虚名在人，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当时面对

1 《吴梅村全集》卷九《送何省斋》，第 222－223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六《黄观之五十寿序》，第 770 页。
3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六，第 765 页。据《吴梅村年谱》考证，吴伟业与李明睿相遇于虎丘是顺治五年时事，“十五六年”后应是康熙二年、三年左右，而康熙三年李明睿八十，王昊《硕园诗稿》本年有《寿李大宗伯太虚八袠》诗，伟业《寿序》应作于同时。文中所言“少于师二十岁”，“二十”为约数，实际是二十四岁。
4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七《郁静岩六十序》，第 799 页。
5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六，第 766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周围一起起文字狱，在诗中记录故国之史、表现故国之思的吴伟业确实会感到恐惧，但据其游山玩水、主持诗社等表现来看，用“惴惴莫保”形容那一时期的整个心境显然是有所夸张的，无疑掩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内心躁动。当然，许多自我抒情类的作品也抒写内心的愧悔痛苦，并且有《贺新郎·病中有感》词与《过淮阴有感二首》、《临终诗四首》这样一组以强烈的忏悔意识著名的作品，但更多的时候所写之“愧”并非是愧悔自己选择了屈节仕清，而是惭愧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与智慧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摆脱被征召的命运，并且大多数此类作品不是抒写自悔而是抒写对外界压力的怨恨与个人命运不能自主的悲伤。如其应征北行途中留下的除《过淮阴有感二首》之外的一组触景伤情、自抒内心痛苦的诗歌：

岸束穿流怒，帆迟几日程。石高三板浸，鼓急万夫争。善事监河吏，愁逢横海兵。我非名利客，岁晚肃宵征。(《清江闸》)

远路犹兵后，寒程况病余。装绵妻子线，致药友人书。晚渡河津马，晨冰驿舍车。萧条故园树，多负向山庐。(《远路》)

百尺荒冈十里津，夜寒微雨湿荆榛。非关城郭炊烟少，自是河山战鼓频。倦客似归因望树，远天如梦不逢人。扁舟萧瑟知无计，独倚篷窗暗伤神。(《新河夜泊》)

已遇江南雪，须防济北冰。扁舟寒对酒，独客夜挑灯。流落书千卷，清羸米半升。征车何用急，惭愧是无能。(《旅泊书怀》)

白头风雪上长安，裋褐疲驴帽带宽。辜负故园梅树好，南枝开放北枝寒。(《临清大雪》)

回首乡关乱客愁，满身风雪宿任丘。忽闻石调边儿曲，不作征人也泪流。(《任丘》)

自信平生懒是真，底须辛苦踏春尘。每逢墟落愁戎马，却听风涛话鬼神。浊酒一杯今夜醉，好花明日故园春。长安冠盖知多少，头白江湖放散人。(《自信》)

反复抒写旅途之羁愁乡思，思归无计、身世不能自主的辛酸悲伤，以及对清廷强征的怨恨与无奈，甚至有对仕清前景的隐隐担忧：“长安冠盖知多少”，但极少自悔偷生、自恨不死。这说明他虽然为失节而愧疚痛苦，但以个体生命为重的价值观并没改变，为了个人安危甚至不惜违心为清朝歌功颂德。[1]《过淮阴有感二首》等作品所写那种自悔偷生、自恨不死的精神痛苦其实也是有某种程度的修饰或夸张的，同样暴露了剖白

[1] 如《江海肤功序》、《梁宫保壮猷记》、《崇明平洋沙筑海堤记》等作品即仕清后所作的歌功颂德之作。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本心、博取他人同情谅解的良苦心机。关于这类诗歌创作的自饰现象，在后面的章节中再作具体分析。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记载，吴伟业临终前曾遗命："吾死后，敛以僧装，葬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1]以僧装入敛、以诗人自命的苦心安排，或许更能说明这种愧悔与救赎相交织、将人生价值与不朽希望完全寄予文学创作的复杂心态。正是这种复杂心态，决定了此时期诗歌创作自我宣泄与自我剖白、自我开脱重叠交织的复杂动机与独特抒情功能，促进了"心史"观的形成。

当然，这种用心良苦地救赎行为本身，又恰恰体现出吴伟业在名节观念制约下内心的焦灼与煎熬，因为无论他怎样辩解表白或掩饰，都洗涮不掉"贰臣"这一铁的事实。在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严于以气节区分君子、小人。经过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强化，名节无疑成了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根本。尤其在明代，加上政治的严酷暴虐，更是促成了士人"苦节"的风习，[2]发展到明清之际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则几乎走上了极端。其时死节者之众、遗民之多已是尽人皆知的史实，被后人一再描述与渲染过。著名忠义瞿式耜在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曰："可恨者，吾家以四代甲科，鼎鼎名家，世传忠孝，汝当此变故之来，不为避地之策，而甘心与诸人为亏体辱亲之事。汝固自谓行权也，他事可权，此事而可权乎？邑中在庠诸友，轰轰烈烈，成一千古之名，彼岂真恶生而乐死乎？诚以名节所关，政有甚于生者。死固吾不责汝，第家已破矣，复何所恋？不早觅隐僻处所潜身，而反以快仇人之志，谓清浊不分，岂能于八斗糟中议论人乎？别处起义，亦博一名，亦奉有旨。独我常熟起义，原做不成而反受累，受累矣，而又博不得一起义之名，岂不笑杀，痛杀，恨杀！"[3]其子并非易节仕清，只是在清人占领常熟之际没有避地潜身而与诸人一起当了顺民，瞿式耜犹恨恨地责备他亏体辱亲，毁掉了瞿氏四代以来的忠孝家声。他指出，赴义之士并非真地恶生乐死，而是名节所关，远比生命重要。他对名节与生死的看法，颇能代表当时广大士人的观念。正是在这种极端化的名节观念制约下，众多风节岿然的遗民尚且以"不死"为耻，自我感觉罪大莫赎，如归庄《断发二首》诗云："亲朋姑息爱，逼我从胡俗，一旦持剪刀，剪我头半秃。发乃父母生，毁伤贻大辱，弃华而从夷，我罪今莫赎。人情重避患，不惮计委曲，得正复何求，所懼非刑戮！……已矣不可追，垂头泪盈匊。""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所恨身多累，欲死更中止。……隐忍且偷生，

1 《吴梅村全集》附录一，第1406页。

2 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一章第一节"施虐与自虐"，第10－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3 《瞿式耜集》卷三《丙戌九月二十日书寄》，第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坐待真人起。……誓立百代勳，一洗终身耻。”[1]更何况吴伟业这样虽重命但又极为重名的身仕二姓者！由此可见，明清之际的文人在名节与生死之间遭受着怎样的心灵折磨。很多时人及后人之所以同情谅解吴伟业，正是因为他们也遭受着同样的煎熬，确如瞿式耜所言，没有人真地会恶生而乐死。所以吴伟业忏悔自责与弥补救赎相交织的复杂心态，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明清之际文人在传统伦理观念制约下饱受煎熬的普遍心态，从而使其“心史”观具有了较为普遍的意义。

综上所述，由于家世传统、社会思潮以及现实境遇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吴伟业在人格气质上优柔软弱，他没有慷慨赴难的杨廷麟、瞿式耜等志士的激昂壮烈；没有削迹晦名、足不入城市的归庄、徐枋等人的坚贞高洁；没有逃身空门的王瀚、文果等人的虚心淡泊；也没有以天下、民族之“道”为己任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担荷精神，但他也不同于汲汲于功名富贵、卖身求荣的龚鼎孳、陈之遴等人，他有积极的政治理想与真诚的伦理道德信仰，但他更看重个体生命，所以在明末势如累卵的社会环境中，他在政治进取与个人安危之间徘徊；鼎革后，他也在个体生命与道德理想间作过犹豫，但还是选择了“遗民”这一两全的最后退路；面对清廷的强行征辟，他又犹豫再三，最终还是为了保全生命而放弃了名节。可是度过生死关头以后，又因道德信仰的丧失而忏悔不安。他不是政治上的楷模，却与政治密切相关；不是伦理观念的化身，却受到伦理观念的支配；不是纯动物性的人，却有动物性的特征。这种矛盾复杂的人格心态及其发展演变，正是其“诗史”观丰富内涵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直接原因。

[1] 《归庄集》卷一，第 4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4 月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二章　诗史观：“梅村体”之核心思想

向来有“诗史”之誉的“梅村体”，与此前“诗史”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论著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诗歌本身的史学价值及独特的艺术特征，但对于诗歌背后的理论观念——吴伟业本人的“诗史”观相对来说却关注较少，尚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而“梅村体”之所以有别于以往“诗史”而自成一体，恰恰在于吴伟业突破传统“诗史”观的藩篱，丰富、发展了“诗史”观的内涵。本章即探讨其“诗史”观的具体内涵及其发展演变过程。

第一节 吴伟业“诗史”观的内涵

吴伟业具有明确的“诗史”创作动机，已是学界的共识，多数论者都曾引用过的《梅村诗话》关于《临江参军》的论述，就是一个明显而有力的证据。另外如《雕桥庄歌》：“黄巾从此成贻祸，青史谁来问断编。”《银泉山》：“总为是非留信史，却怜恩宠异前王”……他对许多代表性诗作都以“诗史”自视；他还往往以“序”、“引”或“注”来补充、说明诗歌所纪史实，如《木棉吟·序》云“……今累岁弗登，价钱如土，不足以供常赋矣。余作《木棉吟》纪之，俾盛衰得所考焉。”明确以反映历史盛衰为目的。又如《琵琶行》、《楚两生行》、《雁门尚书行》、《咏拙政园山茶花》、《矾青湖》等被公认为“梅村体”的七言歌行；《观蜀鹃啼剧有感》、《赠荆州守袁大韫玉》、《寄房师周芮公先生》等目前尚被排除在“梅村体”之外的律诗，诗序中均透露了自觉的纪“史”动机。这种“史”的意识甚至渗透到其他文体中，如其词作亦多“以史料为词料”，[1]以致被人称为“词史”[2]；其剧作亦均以朝代更迭为背景来象征明清易代的历史，寄寓黍离之痛、身世之悲，与“梅村体”诗歌的创作宗旨一脉相通。那么，吴伟业所谓诗中之“史”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尽管现有论著在不同程度上对此已有所涉及，但由于研究重点不同，仍然缺乏细致深入的辨析，以致对“梅村体”的理解也存在一些分歧与偏差。根据吴伟业本人的理论表述与创作实践，本文认为其“诗史”观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

[1] 《国朝名家诗余》引孙豹人语，《吴梅村全集》第 537 页。
[2] 《国朝名家诗余》引曹顾庵语，《吴梅村全集》第 564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诗史的基本性质：记事要“真”、论事要“当”

《梅村诗话》明确以记事之“真”与论事之“当”规定“诗史”，所谓“真”即真实地记录史实；所谓“当”即客观、公正地评判史实，这就要有批判现实、秉笔直书的勇气与捍卫正义、褒善贬恶的道义情怀。这一观点与明代诗学否定诗歌记事、议论功能的观念相左，而与传统“诗史”观一脉相承。[1]

“诗史”概念首见于唐孟棨《本事诗》，[2]是针对杜诗的纪“史”功能而言的，杜甫之前及杜甫本人并未对此作过明确的表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杜甫及此前人对诗歌纪“史”功能无自觉认识。中国古代“诗”与“史”通的观念由来已久，孔子所谓“诗”的四大功能之一——“观”，即有“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考见得失”之义，故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3]即指“诗”与《春秋》（即“史”）有相同的功能，并提出了以“论世”为目的的知人论世观。此后，以“史”解“诗”便成为中国诗学的一个传统。故“诗史”观的思想渊源可上溯至先秦，但作为一个特定的诗学范畴却形成于杜甫之后，主要是经宋人的推举阐扬而成为一种诗学观念的。[4]宋代“诗史”说的主要内涵就是以“诗”为“史”，“史”指“时事”或诗人行迹、经历。又有以具备“史笔森严”[5]、“善叙事”[6]、“字字有证据”[7]、“备众体”[8]等特征为诗史的观点，实质即对纪“史”手法的认识，目的仍在强调纪“史”功能。在这种“诗史”观支配下，便形成了以史证诗的笺注方法，从“用诗”的角度来阐释杜诗的纪“史”功能，杜诗深厚的情感内容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对诗歌客观功能的认识，必然渐渐渗透进诗人的主观创作动机，宋末元初，诗人们在与杜甫相似的丧乱经历激发下，产生了自觉的“诗史”创作意识，如郑思肖：“为痛英雄并消没，以诗为史笔传闻。”[9]汪元量：“我更伤心成野史，人看野史更伤心。”[10]林景熙：

---

1 吴伟业诗史观的这层内涵已为多数论者所指出，如程相占《吴伟业的诗史思想》(《苏州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4 期》)、叶君远《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浅论吴伟业的诗文观》等，本文把这一观点放在明代诗学背景下，重在探讨它在明清之际提出的意义。

2 孟棨《本事诗》，第 15 页，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3 《孟子注疏》卷八上《离娄下》,《十三经注疏》本，第 272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第 1 版。

4 就现存文献看，唐代除孟棨外未见他人论及。

5 黄彻《□溪诗话》卷一：“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诗云……史笔森严，未易及也。”《历代诗话续编》本,tx 第 348－349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 版。

6 《蔡宽夫诗话》云：“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本，第 618 页，江苏古藉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

7 史绳祖《学斋占毕》：“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 《宋人诗话外编》本，第 1352 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年第 1 版。

8 释·普闻《诗论》：“老杜之诗，备于众体，是为诗史。”《宋人诗话外编》本，第 1568 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年第 1 版。

9 《郑思肖集》：《心史·中兴集》，第 9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0 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卷一《答林石田》，第 26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何人续迁史，表为节义雄。”[1]等均透露了这一迅息。他们的诗歌创作以杜诗为榜样，一方面自觉纪“史”，一方面抒发强烈的亡国之痛、爱国之情，如郑思肖《大义集·自序》云：“有不可遏之兴，辄作数语，以道胸中不平事。……每有一作，倍怀哀痛，直若锋刃之加于心，苦语流出肺腑间。”[2]但囿于宋代“诗史”说的影响，理论上仍然以纪“史”为“诗史”的内涵，杜诗（“诗史”）的情感特征仍然没有得到合理的理论认识，如文天祥虽然意识到了杜诗“灿然”的褒贬之意，却仍然作出“虽谓之史可也”的总体评价，甚至自谓《集杜诗》“非有意于为诗”，而是以备“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3]又如方逢辰《周月潭诗序》认为周诗与杜诗一样，“以史为诗”而非“以诗为诗”，故可谓“诗史”。[4]

宋代“诗史”说正因忽视了杜诗不同于史的抒情特征，从而混淆了诗与史的界限，实质即“以文为诗”观念的典型体现，所以才成为明代诗学检讨的对象。在崇唐抑宋的复古思潮影响下，明代诗论家从“辨体”的角度，针对“诗史”说展开了杜诗优劣的评判，认为“诗”在以下三个层面均应有别于“史”：[5]一、诗的本质功能应是抒情，而非纪事或议论；二、诗的合理创作手法应是“比”、“兴”，而非“赋”；三、诗的审美特征应是含蓄蕴藉，而非直率浅露。这三个层面又相互关联：“诗”与“史”功能的不同，决定了创作手法、审美特征的不同；对不同审美特征的追求，亦影响了创作手法与创作目的的选择。如茶陵派领袖李东阳指出，文的功能重在纪事，即“纪述铺叙，发挥而藻饰”；诗的功能则重在抒情，即“歌吟咏叹，流通动荡”，[6]故文可“正言直述”，而诗则贵乎“比兴”、“寓托”：所谓“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7]只有运用“托物寓情”的比、兴手法，才能感发情志，收到“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的抒情效果，从而形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境界；相反，若用“正言直述”的赋法，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由此得出了“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结论。所以他批评杜诗之记述“细事长语”

---

1 林景熙《霁山集》卷二《杂咏十首酬汪镇卿》，第34页，《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版。
2 《郑思肖集》：《心史·大义集自序》，第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3 《文天祥全集》卷十六《集杜诗·自序》，第397页，中国书店1985年第1版。
4 方逢辰《蛟峰先生文集》卷四，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88集部、宋别集类，第801页。
5 陈文新《明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一章专门论述了明代诗学中“‘诗史’之说的辨证”，指出“明人对‘诗史’之说的辨正，大体上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溥涉世故’的不满；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唯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笔者借鉴了此书的观点，但角度有所不同，笔者主要从明人对诗歌文体的认识这一角度来考察他们对“诗史”观的批判。
6 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文后稿》卷三《春雨堂稿序》，岳麓书社1984年第1版。
7 李东阳《麓堂诗话》，第1374－1375页，《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虽“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但亦因此开了诗格“渐粗”的先河。[1]其弟子杨慎对“诗史”说的批判更为尖锐：“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已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2]同样认为诗歌功能是“道性情”，记言、记事则是“史”的职责；诗歌语言宜含蓄蕴籍、意在言外，而不宜直白浅露、类于讪讦；诗歌创作宜托物喻意，而不宜铺陈直叙。前后七子复古派，虽然言近体诗必以李、杜为首，甚至以学杜相标榜，但对杜甫以诗纪事的作法却不无微辞。如何景明从“诗本性情之发”的诗歌观念出发，批评杜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3]王廷相《与郭介夫论诗书》则拈出“意象”的概念来说明诗歌含蓄蕴藉的审美特征：“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与李东阳之赞赏“意象超脱”、反对“意象太著”实出一辙，认为好的诗歌应如《三百篇》、《离骚》一样，运用“比兴杂出”、“引喻借论”的创作手法，实现“意在辞表”、“不露本情”的含蓄之美；批评杜甫《北征》等诗“漫敷繁叙，填事委实”，以致“言多趁帖，情出附辏”，所以是“诗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轨”。[4]又如谢肇淛《小草斋诗话》：“诗不可太着议论，议论多则史断也；不可太述时政，时政多则制策也……不可太铺叙，铺叙则游记也；不可太堆积，堆积则赋序也。故子美《北征》、退之《南山》、乐天《琵琶》、《长恨》、微之《连昌》，皆体之变，未可以为法也。”[5]屠隆《与友人论诗文》云：“老杜语多质朴，滥觞苏、黄诸君，不知老杜之所以高妙特立，正不在此。”[6]皆认为叙事、议论不符合诗歌的文体特征，有碍于诗歌的含蓄蕴藉。在复古思潮之外，沈周、唐寅、文征明、祝允明等吴中文人则标举个性、重视才情，诗歌挥洒淋漓、自写胸次，以抒情为本。王阳明心学影响下的作家，如徐渭“本色”论，李贽“童心”说，焦竑、汤显祖“情真”说，公安派“性灵”说等，更是高扬个体情感；力矫公安派末流俚浅、率易之失的竟陵派，则重谈诗歌含蓄蕴藉的审美特征，如谭元春《东坡诗选序》曰“文了然于心，又了然于手口；诗则了然于心，犹不敢了然于口，了然于口，犹不敢了然于手者也”。

---

1 《麓堂诗话》：“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而其为格亦渐粗矣。”《历代诗话续编》本，第1386页，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

2 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诗史”条，第868页，《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

3 何景明《大复集》卷十四《明月篇·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206、别集类，1267册。

4 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郭介夫论诗书》，第502－503页，中华书局1989年第1版。

5 《小草斋诗话》卷一，读耕斋林先生旧藏本摹刻。

6 屠隆《由拳集》卷二十三《与友人论诗文》，第677－680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80。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因此，无论复古派还是性灵派，都以抒情为诗歌的本质功能，“诗史”说在这里彻底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与此一致，以“史”解“诗”的批评传统也受到了挑战。复古派虽然将秦汉诗文、盛唐诗与汉、唐盛世联系在一起，但其主旨并非强调“文”与“世”的关系，[2]而是要通过格、调、声、律等法式规范以恢复盛世文学雄浑壮阔的“格调”。相反，他们对文学随世运相盛衰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如李梦阳《章园饯会诗引》云：“说者谓文气与世运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谓六书之法，至晋遂亡，而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鲍、谢，用其全句甚多；……诗云‘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蘀’，择而取之，存诸人者也。”[3]因此，他们对杜诗的推崇，与宋代“诗史”说迥然不同，只是推崇杜诗雄浑壮阔的“格调”，以及实现这种“格调”的字法、句法，而非“诗史”说所谓叙述时事的纪“史”功能、褒贬美刺的“《春秋》大义”、善于叙事的创作手法。性灵派虽力矫复古派摹拟之弊，主张文随世变，但其主旨亦非强调“文”与“世”的关系，而是为了肯定不同于古人、亦不同于他人的一己情感，将文学视为张扬个性、宣泄情感的手段，如徐渭所谓“师心横纵，不傍门户”；李贽所谓“童心自出之言”；汤显祖“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均以诗歌为作者个性、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张任性适情，突出“人”与“世”的对立，排斥外界社会的一切束缚。因此，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看来，无论复古派还是性灵派，理论上均存在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这也正是他们虽以抒情为诗歌本质，诗歌创作却难免空虚肤廓或俚浅率易之弊的根本原因。

正是有鉴于此，吴伟业不仅强烈批判性灵派末流的俚浅率易，而且对复古派的机械模拟也极为不满。《与宋尚木论诗书》云：“彼其于李、杜之高深雄浑者未尝望其崖略，而剽举一二近似，以号于人曰：‘我盛唐，我王、李。’则何以服竟陵诸子之心哉？”认为求“李、杜之高深雄浑”于字、句，而非学习其创作精神，就如同“泰山之农人得拳石而宝之”、“河滨之渔父捧勺水而饮之”，只能学得一点皮毛，是没有根柢的“虚骄之气，浮游之响”。[4]事实上，吴伟业也以杜诗为学习榜样，《与宋尚木论诗书》云：“夫诗之尊李、杜，文之尚韩、欧，此犹山之有泰、华，水之有江、河，无不仰止而取益焉，所不待言者也。”[5]又如《梅村诗话》对陈子龙为诗“好推崇右丞，后又模拟李白，而于少陵微有异同”的作法委婉地表示不满，认为此乃陈子龙“倔强语，非由

---

1 《谭元春集》卷二十二，第 59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2 传统知人论世批评，“世”指社会政治、教化状况，或广泛的社会生活。关于其在各个时期的涵义，后文还要论及。
3 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五十五《章园饯会诗引》，第 1583－1584 页，（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 1976 年。
4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二，第 1089 页。
5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二，第 1089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也”，[1]由此可见杜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那么吴伟业之推崇杜诗，当然与复古派不同，他是在继承传统“诗史”观的基础上，自觉学习其植根于现实的“诗史”精神。“梅村体”大量诗歌的确与杜甫“诗史”一脉相承，叙事核实而讽谕深远。如《临江参军》以杨廷麟参赞卢象升军的经过为线索，真实而详尽地叙述了钜鹿之战这一关系明清易代的重大事件。诗歌不仅真实地描述了杨、卢二人舍身报国的行为与大义凛然的气节，而且深刻揭示了战争失败的原因，即杨嗣昌等权臣对杨廷麟的陷害及对卢象昇的掣肘：“中枢失筹策”、“将相有纤介”、“犄角竟无人”，对当权者无策御敌、倾陷异己的可耻行为予以冷峻地批判：“所恨持禄流，垂头气默塞”、“匡庐何巉巉，大江流不测。君看磊落士，艰难到蓬荜”，体现了诗人捍卫正义、爱憎分明的情怀。又如《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描写清初苛政下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感讽之旨，不减斥卤桑田”，[2]明显模仿杜甫《三吏》、《三别》；《直溪吏》、《临顿儿》、《堇山儿》则仿效元、白新乐府，以讽谕、谏诫为宗旨；[3]再如《打冰词》、《再观打冰词》、《苦雨》、《海溢》、《东皋草堂歌》、《殿上行》、《悲滕城》、《襄阳乐》、《雁门尚书行》、《松山哀》、《墙子路》、《汴梁二首》等作品均以记录时事、批判时政为宗旨，传达出诗人悯世忧时的情怀。

当然，吴伟业在此时标举“诗史”观并非孤立的文学现象，而自有其时代原因与理论氛围。事实上，有鉴于复古派与性灵派脱离现实的倾向，明代中后期，知人论世批评与“诗史”思想已逐渐浮出水面。如王世贞已意识到复古派脱离现实的弊端，《邹黄州鹪鹩集序》云：“夫古之善治诗者，莫若钟嵘、严仪，谓某诗某格某代某人诗出某人法，今乃而悟其不尽然。以为治诗者毋如《乐记》云：‘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如是三者，以观世足矣。”[4]因此，他并不一概反对诗歌的纪“史”功能与叙事手法：“杨用修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云：……其言甚辩而核，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劝乐而曰……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何如贬剥也。”[5]针对杨慎一概否定“诗史”说的偏颇，指出《诗经》中亦有以“赋”法所写、“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的诗歌。论诗服膺王世贞的胡应麟，亦肯定诗歌的叙事、议论功能，称赞杜诗“言理近经，叙事兼史，尤诗家绝睹”，[6]指出自古以来就有叙事诗的传统，并且将“诗史”理解为卓越的叙事技巧，认为杜甫不应独擅此称号。但他避开了“诗史”最关键的内涵，即“史”的价值，《木兰》、《焦仲卿》固然“叙事工绝”，却不具

---

1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八，第1135页。
2 孙鋐《皇清诗选》评《芦洲行》语，《吴梅村全集》第85页。
3 元白新乐府也是对杜甫“即事名篇”之新题乐府的继承。
4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一《邹黄州鹪鹩集序》，第2619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
5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第1010页，《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
6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第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10月第1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备“史”的真实性。李维桢则进一步呼吁诗可以“观”的社会功能：“夫诗可以观，以今人诗观今人，何不类之甚也？”[1]并重新提出了“诗”与“史”通的观点：“孟氏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而史求之《三百篇》止矣。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诗则言与事俱在，非史而何？”反对“离诗与史为二途”，肯定“诗史”的价值：“学士大夫有史才者，或不得为史，而稍以其时事形于诗，则后人目之为诗史。”[2]性灵派的焦竑亦针对复古派诗学脱离现实的弊端，呼吁“论世”批评：“古今称诗莫盛于李、杜，学者诵其诗，莫不思论其世，至为谱其年以传。盖自毛、郑以来皆然。……故李、杜之诗编年为序，岂独行役之往来，交游之聚散，与夫文艺之变幻，犁然可考；而时之治乱升降，亦略具焉。昧者取其编，门分类析，而因诗以论世之义日晦，余尝叹焉。”[3]

时至明末清初，人们面对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社会局势，忧患意识顿增，随着经世致用文学思潮的日益高涨，知人论世批评与“诗史”思想重又成为文学思想的核心。当时最大的文人社团——复社，即在“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宗旨下，[4]大力提倡兴复古诗关乎风俗、系乎人心的现实精神。如虞山诗派代表钱谦益，虽立足于性灵说，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诗学，但其所谓“性情”已超越了公安派的“性灵”，具有深广的社会政治与道德内涵，《胡致果诗序》云：“学殖以深其根，养气以充其志，发皇乎忠孝恻怛之心，陶冶乎温柔敦厚之教。其征兆在性情，在学问，而其根柢则在乎天地运世，阴阳剥复之几微。”[5] “性情”不仅仅指个人的情趣爱好，还指“忠孝恻怛”的道德之心，且以“运世”为根柢；以灵心、世运、学问为诗歌创作的三大要素：“夫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发焉。”[6]在吸取性灵说的同时，又突出作者道德、学识与“世运”的关键作用。作为娄东诗派代表的吴伟业同样如此，如《梅村诗话》以记载诗人事迹、钩沉诗歌本事为宗旨；《彭燕又偶存草序》、《宋直方林屋诗草序》、《田髯渊诗序》、《抚论集序》等大部分诗论，均强调诗歌对“人”与“事”的真实反映。易代之际，保存历史、总结历史兴衰规律、反思败亡原因成为爱国文人经世致用的重要手段与义不容辞的责任，黄宗羲甚至喊出“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口号。[7]故“诗史”思想重又成为诗学思

---

1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十九《端揆堂诗序》，第 719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150，影印万历三十九年刻本。

2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十九《据梧草序》，第 722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150。

3 焦竑《澹园集》卷十六《青溪山人诗集序》第 172－173 页，中华书局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4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第 210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5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十八，第 801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6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十九《题杜苍略自评诗文》，第 1594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7 《南雷文约》卷一《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第 362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205。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想关注的焦点，顾炎武强调诗歌要“纪政事”、“察民隐”、写“王者之迹”；[1]屈大均主张：“士君子生当乱世，有志纂修，当先纪亡而后纪存，不能以《春秋》纪之，当以诗纪之。”[2]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甚至认为“以史证诗”犹不能充分体现诗史的史学价值：“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进一步提出“以诗补史之阙”的主张，[3]要求以诗歌补充历史著作之未备。推崇杜甫“诗史”自然也成为明清之际较为普遍的诗学现象，吴伟业之外，如顾炎武、朱鹤龄、傅山、申涵光、杜浚等人无不如此，即使所谓“宗宋”的钱谦益、黄宗羲也都肯定其纪实功能与爱国精神，钱谦益甚至以杜甫自况：“孝子忠臣看异代，杜陵诗史汗青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氛围中，吴伟业重新高扬“诗史”观，强调诗歌的记事、议论功能。也正是在这种自觉的记“史”创作动机支配下，“梅村体”多以重大时事入诗，史学价值较此前“诗史”更突出，这一点已为历来论者所承认。

二、诗史的基本功能：反映“世运升降、时政得失”

重新肯定“诗史”说，在明清之际这一天崩地解的时代背景中，虽然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就如明代诗学所批评的那样，单纯的记事或议论的确有违诗歌的审美特征。饱经吴中传统与明代诗学熏陶的吴伟业，自然也会意识到这一点。正因如此，他对“诗史”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客观记“史”这一传统观念层面上，而是发展了富有时代精神的新内涵。其《且朴斋诗稿序》一文集中阐述了他对“诗史”的看法，文章第一段云：

> **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太史陈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入贡天子，不必其为朝廷邦国之史也。**[4]

在“诗与史通”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诗歌不必出于士大夫之手，其内容也不必是朝廷邦国之大事，只要能够反映“世运升降、时政得失”，即可“宣付史馆”，就是“史”。从表面看，似乎只是对古代“采诗”内容的客观描述，实则借以表达个人对

---

1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九“文须有益于下”条、卷二十一“作诗之旨”条，第1439、15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版。

2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翁山文钞》卷一《东莞诗集序》，第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3 《南雷文约》卷四《万履安先生诗序》，第469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205。

4 《吴梅村全集》卷六十，第1205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诗中之“史”的新理解。吴伟业根据个人的切身体验认识到，在明清易代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的不仅仅是朝廷党争、社会动乱、政权更迭等历史大事，伴随战乱、屠城、剃发、变衣冠等血腥史实而来的，必然还有个体的命运转变、身世浮沉以及家国之痛、兴亡之感等刻骨铭心的感受。也就是说，作为客观史实的实际承担者或耳闻目睹者，当时人的心理感受同样也是历史盛衰的体现。那么，与反映客观史实一致，记录个体的内心感受自然也是“诗史”应当承担的基本功能，这就从理论上将中国古代诗歌纪事与抒情两种传统结合在了一起。其《吴六益诗序》一文也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今春孺木别我以归，未几月，六益又将行矣。余尝念身名颓落，惟读书一事未敢少懈，思得乞身还山，偕孺木键户读史；俟稍有所得，则又携六益入天台，访禹穴，极山川之高深、烟霞之变幻，以助吾诗之所未备，而惜乎尚有所待也。……今二子之才，毕其苦心，咸诣有专，而余顾欲兼之。”[1]这里谈的是作者需要具备的修养，以“读史”作为写诗的前提，读史“稍有所得”后再从事于诗歌创作，但要写好诗歌仅有“史得”还不够，还必须有山水之助，即感发情志，以补诗歌之“未备”。认为作者只有“史”之才与“诗”之才兼备才能创作出理想的诗歌，换言之，就是要求诗歌情、史兼备。其创作实践更能说明这一点，被称为“诗史”的大部分“梅村体”名篇，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鸳湖曲》、《圆圆曲》、《思陵长公主挽诗》、《琵琶行》等，在叙述史实的同时，还真实地记录了当事人（上至皇亲国戚、朝廷士大夫，下至艺人平民、野夫游女）复杂的内心感受：有哀怨无奈的身世之感，痛心疾首的亡国之恨，也有凄凉悲伤的故国之思……均纪事与抒情相结合。如果说吴伟业对记事之“真”与论事之“当”的规定，力反明代诗学否定诗史的主张，重新肯定了诗歌的纪事、议论功能的话，那么他对诗史功能的此一拓展，则进一步解决了明代诗学给“诗史”提出的难题：记“史”的诗歌同样可以兼具抒情的功能，同样可以具备含蓄蕴藉的诗美特征，并以杰出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在吴伟业之前，也曾有人提到过“诗史”不同于“史”的情感倾向。宋代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李光弼代郭子仪入其军，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军晦光彩，烈士痛稠叠。’前人谓杜甫句为‘诗史’，盖谓是也，非但叙陈迹摭故实而已。”[2] 对以客观记“史”为主要内涵的“诗史”说表示异议，认为杜诗之所以被称为“诗史”，不仅仅因其“叙陈迹、摭故实”，更因为记录了人们对历史事件的感受，体现了爱憎分明的情感倾向。这说明，他注意到了杜甫“诗史”实际上与以实录为宗旨的史著有所不同。历史著作虽然也可寄寓史家之褒贬，但“微言大义”

[1]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第 699 页。
[2]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第 1208 页，《宋诗话全编》本，江办古藉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式的“《春秋》笔法”主要是在选词用字上寓褒贬，如《史记·孔子世家》所云“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王”与“子”一字之别，表明了著者对吴楚之君逾制称“王”的贬损；“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1] “召”与“狩”一字之差，表明了著者尊天子、贬诸侯的立场，即所谓“一字褒贬”，体现的是著者维护伦理规范的正统立场，并不具有情感倾向。而杜甫“诗史”之褒贬却具有强烈的情感倾向，如上述魏泰所引《故司徒李公光弼》一诗，便抒写了诗人对名将之殁的哀痛之情。事实上，杜诗之所以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不仅因其记载了安史之乱的时事，同时也因其表现了深沉的忠君爱国情怀，所以杜甫不仅被推尊为“诗史”，还被推尊为“诗圣”、“情圣”。但如前所述，这种情感倾向在后来的“诗史”说中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魏泰的观点在当时及后来很长时间里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明清之际，人们不仅接受过明代诗学的熏陶，而且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社会动乱给个体造成的不幸，所以当他们重新瞩目“诗史”时，其中的情感倾向自然也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如黄宗羲《万履安诗序》在提出“以诗补史之阙”的主张后接着又说：“是故景炎、详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晞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死，《宝幢》志其处所，可不谓之诗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见于九灵之诗，而铁崖之乐府，鹤年、席帽之痛哭，犹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尽矣。明室之亡，分国鲛人，纪年鬼窟，较之前代干戈，久无条序。其从亡之士，章皇草泽之民，不无危苦之词。以余所见者，石斋、次野、介子、霞舟、希声、苍水、密之十余家，无关受命之笔，然故国之铿尔，不可不谓之史也。”可见在他看来，“苦心”、“痛哭”等亡国感受与“闽、广之兴废”、“黄东发之野死”等具体史实同样是“史”。甚至其所举元明之际杨维桢等人与明清之际十余家的诗歌，在后代并没有获得“诗史”称号，但黄宗羲当时却认为他们在世运流极之时，表彰草泽之民，抒写“危苦”的亡国感受与故国情怀，“不可不谓之史”。又如施闰章《江雁草序》：“古未有以诗为史者，有之自杜工部始。史重褒讥，其言直而赅；诗兼比兴，其风婉以长……其用有大于史者。”[2]认为杜甫“诗史”在纪“史”的同时，具备诗歌的“比兴”特征，风格委婉而情韵悠长，作用比“史”更大，言外之意即指“诗史”比“史”更具有感染人心的情感力量。归庄亦谓杜诗“寄托深远，感动人心”。[3]因此，吴伟业进一步拓展诗史的抒情功能，由杜诗所写忧国忧民的博大儒者情怀，扩展到抒写动乱时事引起的个体情感，也是因缘时会。

当然，作为“梅村体”区别于此前诗史的一个显著标志——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

---

1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1943页，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
2 何庆善、杨应芹点校《施愚山集》：《文集》卷四《江雁草序》，第68－69页，黄山书社1982年第1版。
3 《归庄集》卷三《吴余常诗稿序》，第182－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创作特征，已为许多论者所指出，如伍福美《吴梅村诗歌艺术新论》用一章的篇幅分析了“梅村诗的抒情机制”；[1]有的则从史学传统与诗学传统相结合之创作思维的角度予以阐释，如裴世俊先生《吴梅村诗歌创作探析》将其成因总结为作者“以诗写史——诗史结合的观照意识”。[2]魏中林先生《诗史思维与梅村体史诗》一文，也归结为吴伟业“高度的诗史异质同构思维能力”。[3]本文关注的则是这种创作特征背后的诗学思想，即吴伟业赋予“诗史”的新内涵。

三、诗史的深层内涵：“史外传心之史”

但是在清初的政治高压下，为了避免惹祸上身，一些真实的内心情感往往并不能外化为相应的现实行为，甚至只能隐微地诉诸文字。尤其是被迫丧失气节的吴伟业，对此体会更加深刻。因此，《且朴斋诗稿序》接下来进一步提出了“史外传心之史”的著名命题：[4]

> 剿后而时事难言矣。映薇急流疾退，一遁而入于野夫游女之群，相与一唱三叹，人之视之与其自视，皆不复知为士大夫也。然而气运关心，不堪凄恻，乃教翠环十二，遂空红粉三千。一老子韵脚初收，众女郎踏歌齐应。笔摇五岳，知《竹枝》、《白苧》非豪；舞罢《六么》，笑《霓裳羽衣》未韵。人谓是映薇湎情结绮、缠绵燕婉时，余谓是映薇絮语《连昌》、唏吁慷慨时也。观其遗余诗曰：“菰芦十载卧蘧蘧，风雨为君叹索居。”出处相商，兄弟之情，宛焉如昨。又曰：“山中已着还初服，阙下犹悬次九书。”则又谅余前此浮沉史局，掌故之责，未能脱然。嗟乎！以此类推之，映薇之诗，可以史矣！可以谓之史外传心之史矣！[5]

他从分析个人内心情感与表面行为之间的反差入手，认为徐懋曙（映薇）看似“湎情

---

1 伍福美《吴梅村诗歌艺术新论》第四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2 裴世俊《吴梅村诗歌创作探析》，第 26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3 魏中林、贺国强《诗史思维与梅村体史诗》，《文学遗产》第 99 页，2003 年第 3 期。

4 程相占《吴伟业的诗史思想》（苏州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4 期）一文已将吴伟业“史外传心之史”这一命题看作其诗史观的理论表述，分析道：“吴伟业称‘映薇之诗，可以史矣’，是因为映薇之诗，真实而准确地记录了他的经历，如同史书；同时，映薇之诗又深挚地表达了二人的兄弟情谊。这种内容具有真实性，而又包含着深挚情感的诗作，被吴伟业称为‘史外传心之史’。这就是‘诗’与‘史’的联系与区别：史重在纪实，诗重在传情。即纪实又传情的诗作，则是‘史外传心之史’。”笔者认为尚未发掘出这一命题的深层内涵，正因如此，程氏该文仍然把吴伟业晚年的“传心”之作排除在“诗史”之外。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第一章第三节则从现代理论的高度对这一命题作过阐述，指出“史外传心之史”是“诗史”的深层含义，它强调的是诗歌所传之“史”是“通过个体心灵真实感受体验的表现所反映出的一代兴亡盛衰的历史。它不是社会史、政治史，而是心灵史、情感史。”“既强调了诗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突出了诗歌反映生活的独特方式。”强调了它的普遍理论意义。笔者试图将此命题放在明清之际的特定环境中，进一步探讨吴伟业本人赋予它的独特内涵。

5 《吴梅村全集》卷六十，第 1206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结绮、缠绵燕婉”的风流放荡行为背后，实际掩藏着“气运关心，不堪凄恻”的内心情感。他那些一唱三叹、“韵脚初收”便付歌女齐唱的诗歌，即如同元稹之《连昌宫词》一样“唏嘘慷慨”，抒写了这种凄恻之情，虽未直接涉及客观史实，却记录了个人及朋友在时事变迁中的心路历程，写出了掩藏在行为背后的隐微心曲，同样反映了世运之升降。试看其所举映薇诗：“菰芦十载卧蘧蘧，风雨为君叹索居。”是对朋友(吴伟业)出处之际的理解、索居生活的同情，“兄弟之情”未因历史的变迁、人事的改变而改变；“山中已着还初服，阙下犹悬次九书。”是对朋友在鼎革之际，虽然隐居避世却始终心怀故国、始终放不下修史职责之心情的赞赏，抒发了自己对朋友的感情，也写出了隐藏在朋友隐居行为背后的内心情感与愿望。吴伟业正是认为这类诗歌“可以史矣!可以谓之史外传心之史矣!”故其所谓“史外传心之史”，是与客观历史相对而言的，指个体的心灵历史——现实行为背后的真实心迹，但“心”须以“史”为依托，故仍可依稀看出其时之史实，反映“世运升降、时政得失”的功能仍然与“史”相通，实质即以“心”传“史”。因为史书之写人物，主要记录其在历史事件中的实际行为，对人物的评价也仅仅依据其外在的行为表现（譬如在明清鼎革这一历史巨变中，死国死君者为“忠”、为“义”，不仕二姓者为“高”、为“遗”，投降、出仕者则为“奸”、为“贰”），而那些掩藏在行为背后，尤其是与现实行为并不一致的真实心迹却往往不被注意，所以诗歌所写这种心灵历史是史书所不载的内容，故曰“史外”之“史”。譬如上述映薇与吴伟业的心迹，便与其风流放荡或隐居避世的行为表现不一致。在明清之际，人们忍怒、忍悲而不敢言、不敢行的心态较为普遍，而吴伟业对此矛盾心态的体认尤为深刻：其个人之失节虽然出于被迫而有违本心，但将来在正史上留下的却只能是“贰臣”声名，因此他对史书记录、评价人物忽略“本心”的作法自然有所不满，或者说有所恐惧，那么给予这种“传心”的诗歌“史”的定位，其实也是对个人表白心迹之作的价值定位。很明显，这一命题彻底实现了“诗史”向诗歌抒情本质的回归，是吴伟业对明清之际“诗史”观的独特贡献。

当然，吴伟业“心史”观的形成也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崇祯十一年，郑思肖《心史》的发现，引起了广大士人的普遍关注与强烈心灵震撼，在众多文人努力下，至崇祯十三年两度锓版，大行于天下。[1]关于《心史》的真伪问题，自清代以来便存在争议，今人陈福康《井中奇书考》一书对此作了详细辨析，笔者同意其“《心史》非伪”的观点。[2]尽管此时离明朝灭亡尚有五六年的时间，但敏感的士人已嗅到了亡国气息：外有强悍的清军入侵，内有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而朝廷内部党争却愈演愈烈，此时之形

1 参见陈福康《崇祯末<心史>刊刻经过及序跋者考》，《学术月刊》1998 年第 12 期。
2 陈福康《井中奇书考》，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势与宋末极其相似。故《心史》的突然问世，对他们来讲无疑是个不祥的征兆：是否预示着明朝将要重蹈宋朝亡于异族的覆辙？就像顾炎武明亡后所云“天知世道将反覆，故出此书示臣鹄。”[1]在向来严于夷夏之辩的文化传统中，亡于异族不仅意味着改朝换代，还意味着民族之“道”的丧失。[2]如顾炎武认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3]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4]所谓“仁义充塞”，“充”之义亦是“塞”，即夷狄之残酷野蛮、无父无君，使我民族的仁义之“道”因之塞绝。又如屈大均引王猷定语“古帝王相传之天下至宋而亡”亦是此意。[5]因此，广大文人在对明朝衰亡命运已回天无力之时，尤其是亡于异族既成事实之后，便将捍卫民族之“道”作为捍卫“天下”的唯一手段，抱着“道存则天下与存”的信念，[6]强烈呼吁以“道”对抗新朝的“遗民”精神。[7]吴伟业同样以传承民族文化为己任：“不谓斯文丧，终存万古心。”（《送周子俶张青琱往河南学使者幕六首》其六）“谈仁讲义追尧夫，后来姚许开榛芜，斯文不坠须吾徒。……即今绝学谁能扶，屈指耆旧堪嗟虚。”（《题苏门高士图赠孙征君钟元》）因此，同遭“亡天下”之变的宋遗民精神，成为他们提倡与学习的榜样，屈大均云：“今之天下，视有宋有以异乎？一二士大夫，其不与俱亡之者，舍逸民不为，其亦何所可为乎？世之蚩蚩者，方以一二逸民伏处草茅，无关于天下之重轻，徒知其身之贫且贱，而不知其道之博厚高明，与天地同其体用，与日月同其周流，自存其道，乃所以存古帝王相传之天下于无穷哉。嗟夫，今之世，吾不患天下之亡，而患夫逸民之道不存。”[8] 此时期，不仅程敏政的《宋遗民录》大为流行，而且“遗民录”的编撰也蔚然成风，[9]正是这种遗民精神的体现。在此种遗民心态支配下，具有强烈爱国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宋遗民诗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从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如黄宗羲崇祯十一年为谢翱《西台恸哭记》、《冬青引》作注，其《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云：“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10]又如钱谦益《胡致果诗序》：“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时称盛。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竹国，水云之茗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沍寒，风高气栗，悲噫怒号，

---

1 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卷五《井中心史歌》，第 290 页，中华书局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2 在明清之际，“道”主要指儒家仁义之道。
3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七“管仲不死子纠”条，第 4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第 1 版。
4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三“正始”条，第 101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第 1 版。
5 《屈大均全集》：《翁山文钞》卷八《书逸民传后》，第 39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
6 《屈大均全集》：《翁山文钞》卷八《书逸民传后》，第 39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
7 “遗民”，有的也称为“逸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8 《屈大均全集》：《翁山文钞》卷八《书逸民传后》，第 39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
9 参见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中的《清初所见“遗民录”之编撰与流传》一文，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10 《南雷文约》卷四，第 471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205。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万赖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残篇啮翰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1]高度肯定其时代精神与“诗史”价值。吴伟业《毛子晋斋中读吴匏庵手钞谢翱西台恸哭记》记录他与友人读《西台恸哭记》时的感受与情形云：“看君书一编，俾我愁千斛。……主人更命酒，哀吟同击筑。四坐皆涕零，霜风激群木。嗟呼诚义士，已矣不忍读！”[2]郑思肖《心史》更以其鲜明的民族意识、炽烈的忠孝情怀，加之奇特的问世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据陈福康先生考索，明清之际文人提及《心史》者有八十余人：或专咏、步韵，或序跋、刊印，或在诗文中提及，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著名文人，当然也包括吴伟业。[3]其特殊的纪“史”方式、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诱发了文学界关于“心史”的重新思考。

郑思肖《心史·总后叙》“发明《心史》之义”曰：“天下治，史在朝廷；天下乱，史寄匹夫……我罹大变，心疢骨寒，力未昭于事功，笔记断其忠逆，所谓诗，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系焉。”[4]明确以存“史”为目的；但“纸上语可废坏”，“存不存，诚非可计”，而“心中誓不可磨灭”，因为“心”盖“实无所变，实无所坏，本然至善，纯正虚莹之天也。”故存于纸未若誓于“心”，“心”在则“史”存。所以《心史》既是复宋之“心”，又是亡宋之“史”，“心”与“史”并列而统一：“史”的功能是“载治乱，辨得失，明正朔，定纲常”，即正伦理；“心”即秉誓“为大宋办中兴事”，亦以忠孝伦理为主要内涵，其本质是“本然至善，纯正虚莹”、“天地万花(化)”皆自此出的永恒“天理”，显然受宋代理学的深刻影响。明清之际，在《心史》影响下，人们对“心”与“史”进行了重新思考。侧重史学观念者，如张国维《宋郑所南先生心史序》云：“史者，文也，所以抚纲常、辩统系、佐征伐之穷者也；心者，精也，所以植天经、立人极、代命讨之大者也。《春秋》一书，为史外传心之要，而其义在尊王、黜僭、诛乱贼而大复仇。”[5]对“心”、“史”关系的理解明显偏重于“心”，认为《心史》与《春秋》一样，主旨在于“传心”，即传达“尊王、黜僭、诛乱贼而大复仇”的正统伦理精神。凌一槐《心史跋》则对“史”作了“文”与“质”的辨析：“网罗百代，区别九流，布事属辞，扬音摘藻，史之文也；善善恶恶，明得失之由，伤人伦之废，史之质也。郑公所南是编，可谓备其质者矣。……或疑是编叙次荒迫，间有如铭、如谶等，微与史体不合，窃谓读《离骚》者，每于杂复

1 《牧斋有学集》卷十八，第 801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2 《吴梅村全集》卷一，第 11 页。
3 陈福康《再论郑思肖＜心史＞绝非伪托》，《学术月刊》1995 年第 11 期；《井中奇书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年 7 月第 1 版。
4 《郑思肖集》:《心史·总后叙》，第 19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5 《郑思肖集》:《心史》附录一，第 297－29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缭绕、迂夸谲怪之语，而益愍其忠爱之深且挚也。三复是编，可以感矣。”[1]认为网罗史实只是“史之文”，“善善恶恶”的忠爱之“心”才是“史之质”，认为《心史》与文学作品《离骚》一样虽“与史体不合”，却具备“史之质”，同样重视其“传心”的一面。侧重文学观念者，如钱肃乐云：“士君子不可一日遭《心史》之事，而不可一日不存《心史》之心。……此心之存，则人而天矣！仙矣佛矣！一日而千古矣！诗文而史矣！”[2]认为写《心史》之“心”的诗文即“史”；又如屈大均谓自己“诗法少陵，文法所南”，由于“少陵以诗为史，所南以心为史”，故自名草堂曰“二史”，[3]而《翁山文外自序》借友人之口称“此非予之文，乃予之心所存”，[4]故写“心”之“文”亦是“史”。总之，他们所谓“心”，仍然主要指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但对“心”与“史”关系的认识，却不同于郑思肖“心”、“史”并列的思路，而是将“心”作为“史”的应有内涵：从史学观念讲，认为“史”可以是写“心”之作；从文学观念讲，认为写“心”之诗(文)即“史”。以此衡量吴伟业所谓“传心”之诗，自然可谓之“史”，或者说具备“史之质”，只不过这个“质”不是“善善恶恶”的道德之“心”，而是个体在历史变迁中的内心情感。

吴伟业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将“心史”引入了“诗史”理论。并且由于“贰臣”身份使其丧失了以“道”自居的遗民资格；失节后宣泄内心痛苦的需要；以诗剖白心迹、为“失节”行为进行开脱的创作动机；对当时士人微妙心理的深刻理解；吴中文学重个体传统的影响等等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他进一步摈弃了“心”的道德内涵，更偏重于个体内心情感，甚至往往专指那些掩藏在现实行为背后、与现实行为并不一致的隐微心曲。但由于情感以客观史实为依托，故通过传“心”又可以传“史”，既符合“诗史”反映历史的基本要求，又接受并发展了明清之际以“心”为“史”的史学与文学观念。因此，如果没有明清之际复杂的历史机遇，没有被迫仕清等不幸的个人遭际，吴伟业也会同顾炎武、归庄等遗民诗人一样，以遗民自居，标榜气节甚或批评他人，而不需要委婉曲折地剖白心曲，也就不会产生“史外传心之史”这样复杂而深刻的诗史思想。

---

1 《郑思肖集》:《心史》附录一，第 31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2 钱肃乐《钱忠介公集》（张寿镛《四明丛书》约园刊本），王德毅《丛书集成续编》149 集，台北新丰文出版公司 1989 年第 1 版。

3 《屈大均全集》：《翁山文钞》卷一《二史草堂记》，第 32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

4 《屈大均全集》：《翁山文外》卷首，第 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二节 诗史观的发展演变：从存“史”到“传心”

吴伟业“诗史”观的这些内涵并非同时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存“史”到“传心”的发展过程，主观抒情倾向越来越突出，逐步突破传统的纪实思想，走向了合乎诗歌抒情特质的以“心”传“史”。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自觉以“诗”存“史”的早期诗史观

自崇祯四年入仕至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是吴伟业诗史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1]以存“史”为自觉的创作动机，主要继承了宋代“诗史”说的纪实思想。

明清之际，史学作为实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在这种思想氛围影响下，吴伟业自幼便“独好三史”。[2]官居史职后，更加留心时事，曾为“岁抄日记”以记录朝廷中的所见、所闻，以备修史之需。因此，与此前“诗史”作者相比，吴伟业不仅有自觉的创作动机，还具有较高的史学修养，这就使“梅村体”具备了很高的史学价值，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既能真实地记录有关“世运升降、时政得失”的重大时事，又能客观地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纪“史”功能更清晰、更集中。此时期存留下来的“诗史”作品，[3]清晰地反映了明末一系列重大事件：《东皋草堂歌》写崇祯十年瞿式耜、钱谦益之被捕；《殿上行》写崇祯十一年黄道周之被谪；《墙子路》写崇祯十一年清军入侵墙子岭；《傅右君以谏死，其子持丧归临川》写崇祯十二年傅朝佑以论温体仁罪受廷杖而死；《怀杨机部军前》、《再怀杨机部》、《读杨参军<悲钜鹿>诗》、《临江参军》写钜鹿之战的前前后后；《襄阳乐》、《洛阳行》写崇祯十四年张献忠陷襄阳、李自成陷河南……从朝政之失，到亲王遇害、宗室不保，揭示出了明王朝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必然命运。

此时期，吴伟业“诗史”观总体上并未突破宋代“诗史”说以“诗”为“史”的内涵，但其存“史”意识更自觉、更明确，以记事之“真”与论事之“当”作为自己“诗史”创作的理论规定。在创作中，自觉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时事予以客观地叙述与冷峻地批判，如《临江参军》，先从全知角度客观叙述杨廷麟参卢象升军事之来龙去脉，然后借杨廷麟这一当事人之口，叙述卢象升钜鹿之战的经过。虽然也有对杨、卢

---

1 金鸿修、李鳞纂乾隆《镇洋县志》卷十四载《焚余补笔》云：王中翰昊述吴梅村语：“余初第时不知诗，而多求赠者，因转乞吾师西铭。西铭一日漫题云：半夜挑灯梦伏羲。异而问之，西铭曰：尔不知诗，何用索解。因退而讲声韵之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缩微制品。

2 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见《吴梅村全集》附录一。

3 吴伟业曾云“余之书虽藏在箧衍，不以示人，恐招忌而速祸，则尽取而焚之……(易代后)其稍有闻者，忌讳疑畏，辄逡巡不敢出”(《梁水部玉剑尊闻》)，可推测早期许多关系时事的诗文因避忌而未存。他在世时所刻《梅村集》比后来发现的《梅村家藏稿》少许多内容，极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人悲壮行为的热情歌颂以及对杨嗣昌等权贵的讥刺与愤慨，但诗人是站在历史事实之外评判是非功过的，这种扬善疾恶的情感倾向，与杜甫“诗史”一样，体现的是一个儒者爱憎分明的道义情怀，而非个体情感。再如《东皋草堂歌》记崇祯十年瞿式耜、钱谦益被捕之事，直言被捕之根源乃明末之党争：“今年党禁闻未除，黄门北寺修捕车。”[1]既有秉笔直书的勇气，又有揭示事件本质的睿智，无疑是从存“史”的角度进行创作的。

这种客观纪“史”的创作倾向除受理论认识支配外，与其心态亦密切相关。此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大江以南尚未遭烽火，北方士人也因避难而大批南迁。此时的吴中，是文人最集中的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风流放诞士风并未因时世的动乱而骤然改变，尤其是陪都南京，诗会文社、促管繁弦、翠袖红衫……表面仍是一派歌舞繁华。吴伟业后来在《宋子建诗序》中回忆其任职南京时的生活云：“当是时，江左全盛，舒、桐、淮、楚衣冠人士避寇南渡，侨寓大航者且万家，秦淮灯火不绝，歌舞之声相闻。……凡四方宾客之过者，图书满架，笙镛在列，招延谈咏，殆无虚晷。……盖山川之盛，文章之乐，生平所未有也。”[2]并不无感慨地写下《望江南》一十七首，追忆此时之裙屐风流。因此，他像陈子龙等风流倜傥的明末文人一样，既怀济世之志，又“流连声酒”，一面在诗词中“裁云剪月画三秋”，[3]一面又提倡以文学经世。尽管对岌岌可危的社会现实已有清醒认识，但动乱的时世尚未造成其个人的不幸，对崇祯朝仍抱希望，故“诗史”创作仍能站在时事之外，客观理智地叙述评判事实，追求“史”的真实与准确。

当然，随着对朝廷政治的日益绝望与归隐意识的日渐增强，其“诗史”观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如第一章所言，少年高第的吴伟业，在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尤其是复社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鼓荡下，本是抱着挽大厦于将倾的雄心踏入仕途的，但腐朽的朝廷不仅没有为他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而且在激烈的党争漩涡中，个人安危也难以预料，甚至稍微不慎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故归隐意识日渐增强。当他在“黄道周廷杖”案中再次侥幸“得免”后，终于“绝意仕进”，于崇祯十四年决然归隐故乡。可是其心灵并未因归隐而获得安宁，他并做不到完全忘情世外、放弃经世理想，甚至仍然抱着待时而出的希望。但未等他看到复出的机会，明王朝已在农民军与清军的内外交攻下迅速走向灭亡。如洛阳、襄阳、南阳等亲藩的相继失陷，洪承畴、孙传庭的大败，短短三年的时间内，大半国土沦丧，军事力量丧失殆尽。目睹这些触目惊心的时事，其内心的悲愤感伤可想而知，故再做不到纯粹客观理智，以写于明亡前夕的《洛

---

1 叶君远《吴梅村的一首重要佚诗》，见《文献》2001 年 03 期，第 170-176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八，第 667 页。
3 陈子龙《陈子龙诗集》卷十三《遇桐城方密之于湖上，归复相访，赠之以诗》其二，第 41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7 月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阳行》为标志，其“诗史”的抒情成分明显增多。此诗以福王一生命运的巨大变化为线索，从“叔父如王有几人”之威福莫当，写到“帝子魂归南浦云，玉妃泪洒东平树”的悲惨结局，流露了诗人对人生祸福无常的沉重慨叹与对王朝衰亡的深沉感伤：贵宠擅天下、有重军护卫的福王，一朝遭乱，尚且性命不保，其他人的命运又会如何？曾是皇室荣华富贵之象征的福藩藩邸，转眼间一片荒凉：“邹枚客馆伤狐兔，燕赵歌楼散烟雾”；“北风吹雨故宫寒，重见新王受诏还。唯有千寻旧松括，照人落落松高山。”写崇祯帝“流涕黄封手自裁”的哀悼，不止是写他对这位叔父的缅怀，更是写他对自身及王朝命运的悲伤，凄凉的意绪弥漫在字里行间。吴伟业后来为在此役中死难的吕维祺所作《神道碑铭》即感叹云：“呜呼!吾观洛阳之亡，公之死，于王室菀枯之际，恫乎其有余痛焉。”[1]李雯《寄赠吴骏公太史假满还朝》诗云：“高节微吟神骨惊，此曲乃是《洛阳行》。会稽李官三叹息，嵩高明月延松声。”[2]即指出了此诗感染人心的情感力量。另外，写于归隐期间的《汴梁》二首、《黄州朱白石以武康令殁于官……》等诗也透露了这一变化倾向。个人命运总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在这样的衰世中，不仅建功立业成为奢望，安定的归隐生活亦难以保障：且勿论底层的民众，从王侯将相到普通士大夫，死于战乱者已不计其数，其中便包括挚友宋玫等许多朋辈，谁又能保证战火不会烧到其家乡太仓？一旦朝廷不保，自己又将何去何从？难料的人生，难料的世事，使他深刻感受到了末世的悲凉。因此，诗人尽管本着客观、真实的原则，但记录这些明显标志国运衰亡的时事时，不能不引发感伤的情怀与悲凉的心绪，故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抒情的端倪。

总之，此时期是吴伟业诗史观初步形成的阶段，尽管总体上并未突破宋代诗史说以“诗”存“史”的规定，但其自觉的创作动机、对待历史的眼光与意识是前人难以企及的。

二、记史与传情并重的创作倾向

自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至顺治十年仕清之前，是吴伟业诗史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由客观记史转向记史与传情并重，突破了宋代诗史说的藩篱。

这一转变是随着吴伟业心态的改变而实现的。首先，在这段惊心动魄的亡国历史中，吴伟业不再是一个局外人，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成为亲身体验，自此作为士大夫所享受的一切殊遇都一去不再。所以当他在诗歌中叙述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时，家国之痛、身世之感自然奔泄笔端，往往长歌恸哭，百感交集。如《避乱六首》以组诗的

[1] 《吴梅村全集》卷四十一《太傅兵部尚书吕忠节公神道碑铭》，第 870 页。
[2] 李雯《蓼斋集》卷十七，第 360 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111。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形式纪诗人的避乱经历，从战乱未起之前写到避难异地之后：“长日频云乱，临时信孰传。愁看小儿女，仓卒恐纷然。缓急知难定，身轻始易全。预将襁褓寄，忍使道途捐。天意添漂泊，孤舟雨不前。途长从妾怨，风急喜儿眠……多累心长苦，遭时转自怜。干戈犹未作，已自出门难。”（其二）战乱的消息频频传来，看着幼小的儿女，诗人愁肠百转，战乱不定今天还是明天，怎忍心在仓卒中将尚在襁褓的女儿弃捐？于是趁干戈未起，先将其送往异地避难。但上天似乎有意增添诗人的颠连漂泊，急风、骤雨、途长、妾怨!值得庆幸的是，小小的女儿在这凄风苦雨的避难途中安静地睡着了。通过“愁看”、“忍使”等感情色彩极强的叙述语言，融入了诗人凄苦、悲凉、辛酸、无奈的内心情感，读来催人泪下。故组诗在叙述完避乱经历后，以对战争的悲愤控诉作结：“我生亦何为，遭时涉忧患。昔也游九州，今来五湖畔。麻鞋习奔走，沦落成愚贱。”（其五）借他人命运变迁为线索来写这段惨痛的历史时，个人浓郁的家国身世之感同样寄寓其中，如《吴门遇刘雪舫》从刘雪舫易代前身为皇亲国戚的荣崇，写到今日羌裘裹膝、贫贱依人的悲惨。诗歌开始尚以诗中人物的口吻讲述他的身世、经历，但随着事实的叙述，情感的激流奔泄而出，不由自主地插入自己的感受：“当时听其语，剪烛忘深更……忆昔李与郭，流落今谁存？”最后“已矣勿复言，涕下沾衣襟”的悲叹，已分不清是刘雪舫还是诗人自己所发。同样国破家亡的历史，同样昔荣今辱的命运，使诗人的情感与诗中人物的情感合而为一，在历史的变迁中洄漩：回想昔日之繁华，更觉眼前之悲凉；目睹眼前之悲凉，更觉昔日之美好。诗笔带情韵而行，既是叙事又是抒情，兴亡情寓于兴亡史中。故国之思、兴亡之感成为此时期诗史最突出的主题。

其次，立言不朽的创作动机，是其自觉以“诗史”抒情的又一原因。如前所述，在当时看来，吴伟业作为明朝士大夫，不仅位高荣崇，且受崇祯帝知遇之恩，主辱臣死乃天经地义之事。可是对个体生命的留恋，却促使他选择了最后一条退路——“遗民”，在保全个体生命与现世生活的前提下，拒绝与清廷合作。但作为自幼饱受正统教育的儒家士子，忠孝观念已内化为其自觉的人格追求，当他在历史的反思中反观自我，以理想的伦理人格审视自己时，不能不为自己的“草间偷活”感到些许惭愧与无奈：“惨淡随时辈，艰难愧老成。”(《感旧》)“君亲有愧吾还在，生死无端事总非。”(《追悼》)“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赠愿云师》)尤其当他将自己与陈子龙等故人“流炳天壤”的英风毅魄对比时，惭愧之余又增添了几许惆怅：他们尽管以生命为代价，却已然赢得了声名之不朽，故“可以弗憾”，[1]而自己既无不世之功勋，又无殉难之壮烈，身后声名又会如何？所以已然失去立功、立德机会的吴伟业，将不朽的希望全部寄托于“立言”，自云：“自顾平生无可表见，将以其余年肆力于文章。”[2]此时

[1]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八《彭燕又偶存草序》，第671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六《彭燕又五十寿序》，第766页。由前后文所写陈子龙为“垂金石之名”而中夜“刻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期大量的“诗史”创作，既是其爱国精神的体现，又是自我不朽的手段，在保存故国历史的同时，还不断剖白个人忠贞不渝的心迹，不仅在诗歌中反复吟咏黍离麦秀之感，还有意表白自己遗民之志的坚贞。在记录史实的同时，将由此而来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遗民之志等个人情感融入其中，诗人忠贞的爱国形象就会随同故国历史一起保存下来。他曾在《题龚司李虞山画册》中说：“夫虞山隳山也，峰峦涧壑，枫柟松桧之奇，载诸图经，而巫臣、太公、虞仲、言偃为先圣前贤之遗迹，其次则昭明之于文，张颠之于书，黄公望之于画，文采风流，虽奕世载德可想见。况乎拂水之下，东皋之旁，其台榭陂池、车马宾客之盛，吾与公所亲见者，今已不可复作，惟文章风节之岿然者，长与此山垂天壤而同敝。嗟呼，士君子服官行政，可不兴怀于后世之名哉!”[1]在他看来，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无论其社会地位在当时如何煊赫，“台榭陂池、车马宾客之盛”都会随着朝代的迁改而荡然无存，声名也随之淹没无闻，只有文章风节岿然者，才能与名山一同长垂天壤。所以他致力于“诗史”创作，并在其中融入个人心志、情感，也欲以“文章风节”垂名后世。恰如赵翼所言：“事本易传，则诗亦易传。梅村一眼觑定，遂用全力结撰此数十篇，为不朽计。”[2]

再次，反思亡国原因的创作动机，也是导致此时期诗史记史与传情并重的重要原因。痛定思痛，反思明亡原因自然成为吴伟业诗史的重要创作动机之一。心系故国、亲遭国破家亡之痛的吴伟业，在历史反思中，对故国不可挽回的灭亡命运自然痛心疾首，对导致国家沦亡的腐朽势力自然充满愤恨。如顺治十年南京之行所写的一组律诗：《登上方桥有感》、《钟山》、《台城》、《国学》、《观象台》、《鸡鸣寺》、《功臣庙》、《玄武湖》、《秣陵口号》，以及长篇五古《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吊古伤今，感慨兴亡，故国情怀与历史反思融合在一起：

车马垂杨十字街，河桥灯火旧秦淮。放衙非复通侯第，废圃谁知博士斋。易饼市傍王殿瓦，换鱼江上孝陵柴。无端射取原头鹿，收得长生苑内牌。(《秣陵口号》)

松柏曾垂讲院阴，后湖烟雨记登临。桓荣空有穷经志，伏挺徒曾感遇心。四库图书劳访问，六堂弦管听销沉。白头博士重来到，极目萧条泪满襟。(《国学》)

形胜当年百战收，子孙容易失神州。金川事去家还在，玉树歌残恨怎休。徐邓功勋谁甲第？方黄骸骨总荒丘。可怜一片秦淮月，曾照降幡出石头。(《台城》)

韵赋诗”之事以及对彭宾诗文的评价来看，此处所谓“文章”指诗文创作。

[1]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六，第 645 页。

[2] 《瓯北诗话》卷九《吴梅村诗》，第 13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抒发了强烈的沧桑之感、亡国之痛，触笔所及皆是令人感伤的易世景象：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孝陵、风景秀丽的国子学、“形胜当年百战收”的台城……，如今一片萧条。在抒发故国之悲的同时，又对明朝的灭亡原因进行反思，如“子孙容易失神州”、“玉树歌残恨怎休”、“曾照降幡出石头”，谴责南明君臣的荒淫昏庸，断送了明朝中兴的希望。《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同样在今昔对比中抒发着“万事今尽非，东逝如长江”的无限伤怀，感伤之余转向对历史变迁原因的探寻，首先是对满清残酷、野蛮罪行的鞭笞：“钟陵十万松，大者参天长。……不知何代物，同日遭斧创。前此千百年，岂独无兴亡？况自百姓伐，孰者非耕桑？群生与草木，长养皆吾皇。人理已澌灭，讲舍宜其荒……大军从北来，百姓闻惊煌。下令将入城，传箭需民房。里正持府帖，佥在御赐廊。插旗大道边，驱遣谁能当。但求骨肉完，其敢携筐箱。扶持杂幼稚，失散呼爷娘。……下路初定来，官吏踰贪狼。按籍缚富人，坐索千金装。以此为才智，岂曰惟私囊。今日解马草，明日修官塘。诛求却到骨，皮肉俱生疮。”从群生到草木、从百姓到富人，无不被残酷摧残，比“贪狼”还要残忍。他认为前此千百年间，历史也曾多次经历兴亡，但只有满清这样的异族才会如此残酷野蛮。的确，历史上关于取代宋朝的蒙古元人之残暴就有许多骇人听闻的记载。所以在吴伟业看来，满清代明不仅仅是江山易主的朝代更迭，更是仁义之道的丧失，即所谓“人理已澌灭”。他对明清易代历史的理性思考，与顾炎武等人对“亡天下”的认识一样，共同体现了明清之际重夷夏之辩的强烈民族观念；在批判满清的同时，又进一步反思明朝灭亡的内部原因：“江南昔未乱，闾左称阜康。马阮作相公，行事偏猖狂。高镇争扬州，左兵来武昌。积渐成乱离，记忆应难详。”阉党专政、胡作非为，镇将跋扈、自相残杀，明朝二百多年的基业终于一朝断送。在激烈的批判中，传达着个人的悲愤、痛恨之情。对内部原因的反思，五律组诗《读史杂感十六首》的揭示最为详尽，其揭露弘光君臣的荒淫误国云：“莫定三分计，先求五等封。国中惟指马，阃外尽从龙。朝事归诸将，军输仰大农。淮南数州地，幕府但歌钟”（其二）；“北寺谗成狱，西园贿拜官。上书休讨贼，进爵在迎銮。”（其三）；“三军朝坐甲，十客夜传觞。”（其七）在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情况下，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仍然争权夺利，纳贿营私，排击善类，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四镇武夫则骄横跋扈，恣意行乐，一旦遇敌便“委甲甬东逃”（其十）；弘光帝的昏庸荒淫更是骇人听闻：“闻築新宫就，君王拥丽华。尚言虚内主，广欲选良家。使者螭头舫，才人豹尾车。可怜青塚月，已照白门花。”（其五）死到临头，还在忙着建宫室、选美女，可怜选中的美女未及册立，南都已破，悉被清军掳去；“王气矜天堑，边书弃御床。”（其七）史可法以十余疏告急，弘光却忙于看戏而不暇观览。明王朝的半壁江山，就在这样一班君臣的醉生梦死中被葬送，纵有一二史可法、左懋第这样的爱国志士亦回天无力！在辛辣的嘲讽与沉痛的哀悼中，诗人按抑不住的悲愤、哀激之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情溢于言表。又如《鸳湖曲》、《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等，均在叙述明清之际历史变迁过程的同时，对变迁原因进行反思，抒写对明朝衰亡的痛心、对故国的怀念、对满清的愤恨或对卖国者与亡国君臣的不满，记史与传情并重。

第四，与此情、史并重的观念一致，对“史”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前一阶段，“史”主要指某一件历史事实；此时期则主要指某一段历史的变迁过程，大部分作品均从亡国前的繁华写到亡国后的寂寞，“皆可备一代诗史”。[1]譬如同以战争为背景，《临江参军》写杨廷麟，始于战前之参军，终于战后之上疏、被谪，所述之事止于钜鹿之战的前后经过；而《圆圆曲》则从亡国前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田府相遇，一直写到吴三桂降清封侯后的“专征箫鼓向秦川”(顺治八年之进军陕西)，无论时空跨度，还是历史内容，均大大增加。这一变化是纪史之需，亦是抒情之需，是情、史融合的结果。个人的黍离之悲、身世之感、人生之叹……均缘历史的兴亡变迁而来；历史的变迁过程，同样凝聚着无限个人的家国身世之感。吴伟业诗史历史内容之丰富，兴亡情感之集中，在整个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确是罕有其匹的。譬如《后东皋草堂歌》从诗人崇祯五年拜访瞿式耜时所见到的东皋草堂写起，[2]以“君家东皋枕山麓，百顷流泉浸花竹。石田书画数百卷，酷嗜平生手藏录。”简洁地概括了当时盛况之后，笔锋一转，到了崇祯十年之被捕、放归，空间由草堂到朝廷、重又回到草堂：“隐囊麈尾寄萧斋，鸿鹄高飞鹰隼猜。白社青山旧居在，黄门北寺修捕车。有诏怜君放君去，重到故乡栖隐处。”朝政之失、党争之烈均见于此。但接下来笔锋又一转：“此时钩党虽纵横，终是君王折槛臣。放逐纵缘当事意，江湖还赖主人恩。”尽管仕途不幸，但在“主人”(即崇祯帝)的恩泽里，尚可安隐江湖，优游于风光秀丽的东皋草堂，可是“一朝龙去”，瞿式耜辞别故乡、追随永历帝抗清：“万里烽烟归未得”。当顺治五年，诗人再次来到东皋草堂，在清军将吏的搜刮下，这座昔日的名园已今非昔比：“……石础虽留不记亭，槿篱还在半无门。欹桥已断眠僵柳，醉壁谁扶倚瘦藤。尚有荒祠丛废棘，丰碑草没犹堪识。”目睹断垣流水的残破景象，回想十几年前初过东皋，在黄花烂熳的秋日游圆赏画的盛景，不能不令人黯然神伤：“十年旧事总成悲，再赋闲愁不堪读”！东皋草堂以自身的盛衰见证了时代之兴亡：明末之党争，国家之颠覆，残明之抗争，清军之浩劫，十几年的历史浓缩于一诗。如此长的历史过程与丰富的内容，势必要求诗史具备较大的容纳量与自由度。故体制之宏伟，成为吴伟业诗史的一大特色。[3]或组诗，如《读史杂感十六首》、《杂感二十一首》，每组合起来看，都是一部明清之际的历史；或长篇排律，如《思

---

1 尤侗《艮斋杂说》卷五，第 99 页，中华书局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2 吴伟业将前后《东皋草堂歌》抄录于董其昌画卷之上，诗后题跋云：“余以壬申九月游虞山，稼翁招饮东皋草堂，极欢而罢。” 故吴伟业初游东皋应在崇祯五年(壬申)。见叶君远《吴梅村的一首重要佚诗》，《文献》2001 年 03 期，第 170-176 页。

3 历来论者以长篇歌行定义“梅村体”，强调的即此特征。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陵长公主挽诗》以上千字的篇幅，叙述了长平公主短暂的一生；而更多的则是长篇古体，由于古体诗不受篇幅、格律的限制，与近体诗相比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譬如《萧史青门曲》用长达 92 句 644 字的篇幅，叙述了三代(万历、泰昌、崇祯)四位公主(荣昌、宁德、乐安、长平)的命运变化。另外如《永和宫词》、《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均以巨大的篇幅描绘了一幅幅长长的历史画卷。如此集中地写长篇诗史，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是罕有其匹的。

当然，此时期仍有一部分以客观纪“史”为主、寓批判时政之旨的作品，但其抒情倾向亦明显增强。对故国的缅怀与对新朝的不满其实是吴伟业遗民情感的两个侧面：越是热爱故国就越是仇恨新朝，越是不满现实就越是怀念故国，故记录与批判清朝苛政也是吴伟业此时期“诗史”创作的主题之一。如“可仿杜陵之《三吏》、《三别》”的《芦州行》、《捉船行》、《马草行》，[1]记录清初苛政下民不聊生的惨象。但吴伟业此时之心态毕竟已与亡国前大不相同，作为先朝遗臣，他与普通百姓一样，同受逼迫与征勒：“我家海畔老田荒，亦长芦根岂赐庄？州县逢迎多妄报，排年赔累是重粮。”[2]尽管努力以客观叙事为宗旨，但由个人遭遇所引发的悲愤之情却已无法按抑，黄传祖评《马草行》云：“萦情题外，按抑不吐，久不能耐，遂尔转侧逗露而出。”[3]似已认识到这一点。这种现象恰好说明，随着吴伟业人格心态的变化，其诗史观由客观纪实向并重抒情的转变已成必然。总之，情、史并重是吴伟业此时期“诗史”创作的主导思想倾向，决定了“梅村体”在题材、体制、语言、风格等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特征。当然，就创作倾向而言，在吴伟业之前，杜甫诗史也同样具备强烈真挚的情感特征。但杜诗所写之情，如其忠君爱国的真挚情感、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等，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博大的儒者情怀。而吴伟业除了观念上的自觉之外，还承认个人的一己情感，尤其是承认个体现实行为背后的“史外”之“心”，故“梅村体”所写之情已经突破了儒家诗教“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藩篱，这正是“梅村体”之抒情与杜甫诗史之抒情的最大区别所在。

三、以“心”传“史”的晚年“心史”观

顺治十年仕清后，是吴伟业诗史观发展演变的第三个阶段。由情、史并重转向以“心”传“史”，彻底实现了“诗史”向诗歌抒情特质的回归。

确如历来论者所言，宣泄内心愧悔痛苦是吴伟业“心史”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

---

1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五上《芦州行》评语，苏州扫叶山房藏版，乾隆刻本。
2 《吴梅村集》卷三《芦州行》，第 84 页。
3 见《吴梅村全集》，第 88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仕清，给吴伟业带来的痛苦比亡国还要大，他自此成了身仕二姓的“两截人”，丧失了士大夫立身之本的“名节”。文学创作成为其宣泄内心痛苦的唯一手段，奏响了一曲如泣如诉的心灵悲歌：从被征入京前的悲恨自叹：“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自叹》）到赴京途中的自惭自悔：“昔人一饭犹思报，廿载恩深感二毛。”（《过淮阴有感二首》其一）“ 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过淮阴有感》其二）；再到仕清京师期间的触事伤怀：“万事愁何益，浮名悔已迟。”（《病中别孚令弟十首》其六）“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樽。”（《怀古兼吊侯朝宗》）……直到临终前的灵魂拷问：“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临终诗四首》之一）刻骨铭心的忏悔反复回响，确实是一部心灵的血泪史，向来读者无不为之动容：沈德潜《书吴梅村诗后》：“蓬莱宫里旧先卿，自别青山悔远行。拟作祢阳离别赋，江南愁杀廋兰成。”[1]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吴梅村》：“就使吴儿心木石，也应一读一缠绵。”[2]杨际昌《国朝诗话》：“…… ‘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尤一字一泪也。”[3]……精神信仰被迫屈从于生命存在所造成的心灵悲剧，使诗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剖白心迹、开脱“失节”罪责以获得读者的同情谅解是其“心史”的深层创作动机。吴伟业主张诗史“传心”固然是情感宣泄的需要，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判定其“心史”均是内心情感的真实记录。“除了没心没肺的暴君，谁都不想在历史，尤其是自己的诗文中留下不光彩的形象。”[4]深明“文如其人”理论的吴伟业，尤其如此。所以他自觉以诗歌表白心迹，告诉他人，尤其是后世读者其行为之无辜与“本心”之忠贞，籍此挽回可怕的“贰臣”形象，实现立言不朽的愿望。如《寄房师周芮公先生四首》序言称其诗“抒平生于慷慨，写尽日之羁愁”，希望同样经历丧乱的周廷鑨，能够“识此襟情”。言外之意即其仕清有难言的苦衷，希望对方能够体察，不要误解。恰如第一章所言，强调失节的外在原因，不仅是为了减轻个人心灵负罪感以获得心理平衡，亦有进行自我开脱辩解的讳过之意。强调环境之险恶、忠孝之冲突、时命之不谐等客观因素，无疑有掩饰本人贪生怕死这一根本原因，从而在诗文中留下一个较为光彩的形象，以获得读者谅解与同情的创作意图。这一创作动机持久而又强烈，直到临终前夕，在病中尚恐“无人识吾前事”，故作《与子暟疏》述一生之大略，“明吾为天下大苦人”，并以“诗人”定位自己的一生。

---

1 转引自靳荣藩《吴诗集览》：《谈薮》卷之上，苏州扫叶山房藏版乾隆刻本。
2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二十七，第 68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第 1 版
3 《国朝诗话》卷一，第 1659 页，《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4 蒋寅《文如其人？——诗歌作者和文本的相关性问题》，见《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第 191 页，中华书局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看透了吴伟业这一创作意图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其诗歌中那些痛不欲生的心灵忏悔，我们就会明白，一方面固然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人们的同情与谅解而进行的灵魂自赎，具有一定的表演性。吴伟业作为诗人是非常聪明的，在失节的事实已是有目共睹、无法掩饰的情况下，越是痛自谴责、忏悔，就越能赢得同情与谅解，因为人们内心都有渴望真诚、同情受害者的一面，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会有类似的情感体验。王曾祥《书梅村集后二则》曾云："……所作诗文，颇多哀怨。感禾黍于秋风，述沧桑于世变。羁縻煎迫，重有所拂。然而失贞之妇，擗标故夫；二心之仆，号咷旧主。徒增戮笑，谁为信之！嗟呼，孤忠日月，已情层楼；故国衣冠，空怀死友。鲁连蹈海之辞，介子焚山之语，视其生平，何相戾也。"[1]尽管言过其实，却揭示了吴伟业"文不如其人"的一面，即为了挽回"贰臣"形象，诗人美化了诗歌的抒情主人公，这一点恰是历来治吴伟业诗歌者往往忽略的一面。此亦为"心史"，只不过是被修饰过的心史，是让别人理解的心史，这又充分表现出其在君臣大义与夷夏之防的观念制约下所遭受的心灵折磨。

在众多"贰臣"中，吴伟业独能赢得当时及后世多数人的同情，正是其"心史"的贡献：

> 梅村出处之际固不无可议；然其顾惜身名，自惭自悔，究是本心不昧。以视夫身仕兴朝，弹冠相庆者，固不同；比之自讳失节，反讬于遗民故老者，更不可同年语矣。如赴召北行、过淮安云："我是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遣闷》云……[2]
>
> 至其诗集中，如吊侯朝宗、寄房师周芮公诸作，凄酸激楚，自悔偷生，隐痛沈悲，殆难言喻。盖甲申而后，堂上健存，柴车屡征，忍耻一出，自与虞山、合肥贪恋富贵者，心事略有不同。后人追考生平，慕其才、悲其遇可也。[3]
>
> 梅村故国之思，时时流露。遣闷云："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不意而今至于此。"又病中词曰："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奴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读者每哀其志。若虞山不著一词矣。此二人同异之辨。[4]

后人正是按照其"心史"所表白的心迹来理解他的。吴伟业与钱谦益的对比尤其引人

---

1 王曾祥《静便斋集》卷八《书梅村集后二则》，第879－880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272。
2 赵翼《瓯北诗话》卷九《吴梅村诗》，第136页，文中所谓"反讬于遗民故老者"指钱谦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版。
3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三《吴梅村有难言之隐》页270-271，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1版。
4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一，第13页，中华书局1975年11月第1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深思，二人行迹大致相似，得到的评价却迥别天壤，就连将吴伟业列入“贰臣”行列的乾隆帝，也情不自禁地为其缠绵哀怨所感动：“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批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1]这固然与清朝统治者对钱谦益的不满有关，更是因为其创作讳言失节。也就是说，吴伟业以诗传“心”的理论及创作努力是非常成功的。

当然，思想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心史”思想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彻底抛弃从前的诗史观念。此时期仍有大量诗史继续沿着此前创作倾向，以现实历史为线索，或者以“史”寓“情”，如《雁门尚书行》、《临淮老妓行》、《松山哀》、《王郎曲》、《银泉山》、《田家铁师歌》、《楚两生行》等脍炙人口的歌行名篇以及以重大史实为题材的《扬州四首》、《闻台州警四首》等近体组诗；或者直叙时事、寓批判时政之旨，如《打冰词》、《再观打冰词》、《直溪吏》、《临顿儿》等。但是，当时事一旦触及清廷造成的个人痛楚，便由记史转向“传心”。譬如《赠辽左故人八首》伤陈之遴之事，“哀痛之情，见之纸上”，[2]如：

路出河西望八城，保宫老母泪纵横。重围屡困孤身在，垂死翻悲绝塞行。尽室可怜逢将吏，生儿真悔作公卿。萧萧夜半玄菟月，鹤唳归来梦不成。(其七)

齐女门前万里台，伤心砧杵北风哀。一官误汝高门累，半子怜渠快胥才。失母况经关塞别，从夫只好梦魂来。摩挲老眼千行泪，望断寒云冻不开。(其八)

陈之遴是吴伟业的儿女亲家，也是其仕清的援引者，三年之内两度徙边，其遭遇无疑引起了吴伟业无尽的感慨：清廷对主动降清、位及相国的陈之遴尚且如此，对自己又能怎样？自己被迫出仕后之未被重用又何足挂齿!吴伟业对清廷强行征召的哀怨，缘于对个人道德、声名的顾惜；对陈之遴遭遇的哀痛，则是对清廷政策的彻底绝望，所以他借陈母之口，悲愤地呐喊“生儿真悔作公卿”!更何况，陈之被难，直接导致了女儿的悲惨命运，故尤其一字一泪。另外如涉及清初科场案的《吾谷行》、《赠陆生》、《悲歌赠吴季子》，涉及奏销案的《短歌》等诗，均情余于事，传达了诗人对清初酷政悲愤怨恨的心情。

总之，吴伟业“诗史”思想从存“史”到“传心”的过程，是逐步发现并肯定诗史抒情特质的过程，使中国古代诗史走出了明代诗学所批判的脱离诗歌本质的困境，为“诗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就思想发展的主导倾向讲，可以划分为如上三个

[1] 《四库全书》集部 251、别集类《御题<梅村集>》，第 1312 册。
[2] 袁枚录本评语，见《吴梅村全集》第 441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发展阶段，但各阶段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思想的发展演变不可能沿着单一的线索直线行进，各时期的思想观念往往并存、互见，恰如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第一阶段以纪实为主的创作倾向，在后两个时期中都可见到；第二阶段情、史并重的创作倾向也一直延续在后来的创作中。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三章　诗史观之体现：“梅村体”之创作实践

“梅村体”独特的艺术成就，引起了学界很大的兴趣。许多论著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它的创作特征，譬如伍福美先生的《吴梅村诗歌艺术新论》、裴世俊先生的《吴梅村诗歌创作探析》、徐江先生的《吴梅村研究》等等，对其题材、体式、叙事技巧、语言形式等方面的特征作了深入的辨析。本章试图探讨的是这些创作特征形成的原因，认为“诗史”观是指导其创作的理论基础，而“梅村体”的种种特征反过来也显示了吴伟业“诗史”观的丰富内涵。

第一节 “梅村体”创作风貌的发展演变

以往论著普遍将“梅村体”限定为七言歌行这一种诗体，或限定为直接反映史实的叙事作品，而将晚年“传心”的作品排除在外，这样一来，所谓“梅村体”的诗歌总数尚不足百首，其中大部分又都是同一时期所作，所以现有论著很少单独涉及“梅村体”创作风貌的发展演变。[1]本文在重新认识“梅村体”的基础上，认为其创作风貌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记事到抒情的发展过程，可以以明朝灭亡与吴伟业仕清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侧重记事的阶段、叙事与抒情并重的阶段、侧重抒情的阶段；认为诗史观由客观记史到记史与传情并重，再到“史外传心之史”的发展演变，恰是促成这一发展过程的根本原因。

一、明亡之前：客观记事

明亡之前，记录时事的“梅村体”作品以长篇歌行为最多，它们大都以客观记事为主而夹叙夹议，鲜明地体现了客观记“史”的宗旨。如《殿上行》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客观叙述黄道周直言进谏的场面以及被贬谪的前后经过，随着事件的进展偶尔插入个人的评价：“公卿由来畏庭议，上殿叩头辄心悸”是说朝臣的贪生怕死；“况今慷慨复遑惜，不尔何以乘朝车？”是说黄道周的赤胆忠心。最后以“吾闻”领起议论，发表自己对臣子进谏与帝王纳谏的看法，并发出“呜呼”的感慨，表明自己的褒

[1] 目前唯有叶君远先生《论“梅村体”的形成与发展》(《社会科学辑刊》2005 年第 1 期）一文论述了“梅村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叶先生以长篇歌行叙事诗为“梅村体”，将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崇祯十五年前为“萌芽期”；崇祯十五年至顺治二年为“确立期”；顺治二年以后为“兴盛期”。由于笔者对“梅村体”的理解有所不同，故分期亦有所不同。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贬态度与政治立场，以起到讽谕现实、批判时政的作用。除去爱憎分明的正义感与忧国忧时的传统儒者情怀以外，其中并无多少个人情感的渗入。又如《临江参军》、《读杨参军悲钜鹿诗》、《东皋草堂歌》、《高丽行》、《悲滕城》、《襄阳乐》均采用了这样的创作模式，结构比较简单，叙事手法比较单一，不像后来作品那样运用多种叙事技巧使时空腾挪变化、情节波澜起伏；句式以散句为主，间或杂以偶句，转韵较为随意；辞采虽高华典雅，但比不上后来作品的绮丽婉艳，用典也不像后来作品那样频繁密集；风致格调自然也与后来作品的缠绵悱恻有所不同，相对较为质实雅健。此时期直接以时事为题材的近体诗非常少，但也能反映出同样的创作特征，如《墙子路》："匈奴动地渔阳鼓，都护酣歌幕府钟。一夜蓟门风雪里，军前樽酒卖卢龙。"写崇祯十一年清军进攻墙子岭之事，不动声色地描述鼙鼓动地的危难形势，明军将领沉酣于欢歌乐舞以致墙子岭要塞失守的场面。[1]当然，通过客观对比，也流露了诗人对明军将领的不满与愤慨。又如《汴梁二首》，前两句描绘水灾之惨状，后两句直接抒发感慨："此地信陵曾养士，只今谁解救王孙？"（其一）"梁园遗迹销沉尽，谁与君王避吹台？"（其二）表现的同样是比较宽泛的道义情怀与政治美刺态度。这说明此时期吴伟业个人的诗史观尚不典型，主要还是对宋代"诗史"说的继承。当然，除直接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外，有些赠人、怀人等并非以纪"史"为宗旨的作品也往往涉及时事，如《送黄子羽之任四首》、《送姚永言都谏谪官》、《送黄石斋谪官》、《怀杨机部军前》、《再怀杨机部》、《赠范司马质公偕钱职方大鹤》等，一些与时事有关的人（事）往往会引发其记"史"意识，又说明吴伟业以诗记"史"的动机自觉而且强烈，这也是"梅村体"作品能够以"时事之大者"入诗，具有比此前诗史更高的史学价值的原因所在。

与此同时，吴伟业还创作了大量并不涉及时事的抒情诗（主要是艳情诗）。正因如此，关于其早期诗歌，目前学界还存在以"才华艳发"、"清丽芊眠"而缺乏社会现实内容的抒情诗为主，还是以上述反映时事的"诗史"为主的争论。[2]事实上，在明亡前这两类诗歌是很难分别主次的，不仅因为二者数量相当，更因为两种创作倾向分头并行、互不交融。吴伟业与大部分明末文士，尤其是其周围师友如张溥、吴继善、陈子龙、宋征璧兄弟等吴中文人一样，一面怀抱经世济民的壮志，积极参与政治，提倡实学，呼吁文学关心干预现实；一面又倚红偎翠，优游文酒，在浅斟低唱中写着秾艳靡曼的艳诗艳词。追求秾丽婉艳成为一时文坛风尚，如学术上"尊经复古"的张溥，诗

---

[1] 据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五十二《杨嗣昌传》记载："大清兵入墙子岭、青口山，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方醉，不能军，败死。"诗歌前两句即反映此事。（第 6513 页，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 版，）

[2] 叶君远《论吴梅村的早期诗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 年第 1 期）批驳了清人如四库馆臣、朱庭珍《筱园诗话》等早期吴诗为"艳体"的观点，认为早期的梅村诗已具备了"激楚苍凉"的特征。而王于飞《吴伟业早期艳体诗略论》（《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则对此提出了质疑，结合同时期的词作，重申早期诗为"艳体"之说。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学却推崇六朝；性情耿介的陈子龙，明亡前亦多“浮艳”之作；[1]宋征璧早岁“多芳泽绮艳之词”；[2]龚芝麓“阑入闲情艳绝多”[3]……恰如钱谦益所云：“近世学者，摛词掞藻，春华满眼。”[4]少年巍科、春风得意的吴伟业，自然也是这一风气的追逐者，创作了大量秾丽婉艳的抒情诗，与当时风雨飘摇的社会现实几乎毫不相干。如《画兰曲》、《赠妓郎圆》、《子夜歌十三首》、《子夜歌六首》、《新翻子夜歌四首》、《戏赠十首》、《偶成二首》等，吟咏艳情，张扬个体欲望，被誉为“文采风流，照映一时”。[5]这些抒情诗的存在恰好说明，他此时尚未能将记事与抒情两种创作倾向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诗史观还处在继承传统的阶段。

二、易代至仕清之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

明清易代后，“梅村体”创作风貌由客观记事转变为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诗风随之由清丽、雅健转向凄丽婉艳。而记“史”与传情并重之“诗史”观的形成是促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

（一）记“史”与传情并重：叙事与抒情兼长的“梅村体”歌行

许多论者已经指出，“梅村体”广泛吸取了唐诗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初唐歌行的格律藻采与元、白“长庆体”通篇叙事的体制，并借鉴戏曲、史传等叙事文学的叙事技巧，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完善，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特征，如音节和谐、凄丽婉艳的语言，纵横捭阖的叙事艺术，哀感顽艳、激楚苍凉的诗歌风格等等，共同构成了一种叙事与抒情兼长的整体风貌。笔者认为这些创作特征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满足记“史”与传情的需要，从而体现出其情、史并重的诗史观。

其一，音节和谐、凄丽婉艳之语言风貌的形成，[6]源于情、史并重的“诗史”创作宗旨。

作为对前朝抱有深厚情感，并亲历亲睹了国家败亡具体过程的吴伟业，在诗史创

---

1 陈田《明诗纪事》第 281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第 1 版。

2 《陈子龙文集》:《陈忠裕公全集》卷八《宋尚木诗稿序》，第 418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1 版。

3 茹纶常《国朝诸名家逸事杂诗》，转引自郭绍虞等《万首论诗绝句》，第 58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4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十八《题费所中山中咏古诗》，第 1573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5 尤侗《艮斋杂说》卷五，第 99 页，中华书局 1992 年第 1 版。

6 关于“梅村体”和谐流畅、凄丽婉艳的语言特征，在清代已被许多论者指出。目前学界对此一特征的分析更加全面深入，如裴世俊《吴梅村诗歌创作探析》（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 版）“融合初唐四杰歌行体式”部分、伍福美《吴梅村诗歌艺术新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第五章《梅村诗歌的艺术风格》、程相占《论“梅村体”的用典》（山东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1 期）等论著、论文，对“梅村体”语言的声律、音韵、词藻、用典等特征作了全面深入的论述，笔者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些特征体现出的诗歌观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作中再做不到以旁观者的态度客观记录史实，他更要叙写历史变迁中个体的内心感受，抒发家国身世之痛与兴亡之感，所以在记录故国历史时，往往要写到其繁华、美好的一面，以便通过亡国前的乐景来反衬亡国后的哀情。因此，为了更好地铺叙故国历史上那些富丽堂皇、奢侈繁华的生活场景或粉腻脂香的歌舞场面，“梅村体”在延续早期抒情诗“摛词掞藻”语言习惯的基础上，进一步向语言骈俪华美的初唐歌行学习，往往在以散句交待事件发展脉络的过程中杂用大量偶句律句以铺写场景、渲染气氛，形成了绮丽婉艳、骈散相间、音节和谐的语言风貌，在叙事的同时，又适合情感的咏叹。如《永和宫词》述田贵妃之多才多艺：“上林花鸟写生绡，禁本钟王点素豪。杨柳风微春试马，梧桐露冷暮吹箫。” 以对仗工整的句式、清丽婉转的语言将宫廷生活点画得花明雪艳。述田贵妃之得宠：“贵妃明慧独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皓齿不呈微索问，蛾眉欲蹙又温存。”旖旎而不狎媟，比白居易《长恨歌》“芙蓉帐暖”及“洗凝脂”、“娇无力”等语更胜一筹。但将这些美好的场景与后来“苔没长门”的悲惨结局联系在一起，便通过对比传达了诗人对美好生命难逃悲惨命运的哀伤叹惋之情，从而使华丽的语言蒙上了一层凄凉的色彩，华艳变为了凄艳。再加上和谐的音节、流畅的声调，就使诗歌产生了如歌如泣的强烈抒情效果。恰如袁枚所评：“新声古调，寓事含情，具子安之高韵。”[1]又如《鸳湖曲》，以优美的笔触、顶针蝉联的句法铺写鸳湖深春时节的美丽风光：“桃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接下来以绚丽浓艳的色彩、错彩镂金的语言铺陈吴昌时湖边宴客的盛况：“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轻靴窄袖娇装束，脆管繁弦竞追逐。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鹦鸽》。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娇艳的歌女，欢快的音乐，热闹的场面，与春暖花开的明艳景色互相辉映，其中从“画鼓队催桃叶伎”至“雪面参军舞《鹦鸽》”是对仗工稳的律句；但美丽的春光、繁华的场景之后，却是出人意料的悲惨结局，同样在对比中透露出对末世中人生变幻盛衰难料的感慨，“其辞甚艳，其旨甚哀”，[2]艳辞其实是表现哀旨的手段。《洛阳行》、《圆圆曲》、《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后东皋草堂歌》等长篇歌行，均骈散相间，辞艳情哀。影响所及，许多无“歌”、“行”、“词”、“曲”等歌辞性题目的古体诗亦趋向歌行化，如《项黄中家观万岁通天法帖》、《赠吴锦雯兼示同社诸子》、《送杜公弢武归浦口》、《吴门遇刘雪舫》等均通篇用叙述语气，杂以俪偶，回环往复，一唱三叹，亦均为典型之歌行体。总之，这种凄丽婉艳、和谐流畅的诗歌语言，不仅更适合叙述那些与歌舞繁华场面紧密相关的特定历史内容，而且更适合传达缠绵哀怨的情感，

1 袁枚录本《永和宫词》评语，《吴梅村全集》第 55 页。
2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五上《鸳湖曲》引陆云士评语，苏州扫叶山房藏版乾隆刻本。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情、史并重之诗史观的典型体现。

“梅村体”语言的华丽典雅还与频繁地使事用典有关。这一点前人已多有论述，如赵翼：“梅村熟于两汉、三国及晋书、南北史，故所用皆典雅。”[1]其用典之频繁、广泛以及熟练程度远远超过了四杰，以致被王国维讥讽为“非隶事不可”。[2]“梅村体”有些作品的确有用典过繁、翻致腻滞的缺点，甚至亦有“与题不称，而强为牵合者”、“用事错误者”，[3]吴伟业亦自谓“镂金错彩，未到古人自然高妙之极地。”[4]这一作法固然与其追求文雅的审美理想有关，也不能排除炫耀学识博洽的心理动机，但根本上还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纪“史”与抒情的需要。因为此时期“梅村体”所叙史实往往是刚刚过去的、关系明清兴亡的大事，所要表达的感情又往往包含对故国、旧君的哀悼与对新朝的不满，在清初文网严密的特定环境中，诗人不能质言、不敢昌言却又不忍不言，只好通过典故曲譬暗喻，将事情说得若隐若现、扑朔迷离，委婉曲折地传达内心感受，恰如乔亿所云“情性有难以直抒者，非假事陈词则不可。”[5]若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点就更为明显。“梅村体”用典大多数都灵活贴切，既能暗喻时事，又能恰切地传达诗人情感，已经化为诗歌的内在血脉。如《圆圆曲》用“鼎湖”的典故写崇祯帝之死：“鼎湖当日弃人间”，典出《史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须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6]不直言其自缢，而说他象黄帝一样抛弃人间，不仅是为“尊者讳”的问题，也是为了表达丰富的内心情感：有哀痛，有尊崇，有祝愿。《萧史青门曲》用秦穆公女弄玉“登仙”之传说写长平公主之死，亦出于同样的动机；借薛涛、西施、绿珠、绛树指代陈圆圆，不仅是以她们的身份、美貌比喻陈圆圆，而且是以她们共同的悲惨命运暗示陈圆圆的前景。将其纳入历史上这一“红颜薄命”的序列中加以观照，看似偶然的个体命运便具有了历史的普遍性，不管你曾经受到怎样的荣宠，美好的生命总是难逃多舛的命运，体现了诗人对个体命运不由自主的感慨与思考。《永和宫词》用张丽华、赵飞燕、杨玉环等宠极一时、又结局悲惨的后妃写田贵妃；《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用张丽华、孔贵嫔、潘贵妃写弘光帝所选的美女，亦有同样效果。用吴王夫差的典故写吴三桂：“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乌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以吴王夫差的荒淫逸乐、穷奢极侈比喻吴三桂的富贵骄奢，以夫差的败亡暗示吴三桂的前景。“馆娃”即馆娃阁，是吴王夫差为西施营造的宫殿，任昉《述

---

1 赵翼《瓯北诗话》卷九，第 13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第 1 版。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第 1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
3 赵翼《瓯北诗话》卷九，第 134、13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第 1 版。
4 杜浚《变雅堂遗集》：《变雅堂文集》卷八《祭少詹吴公》，第 85 页，《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1394。
5 乔亿《剑溪说诗》卷下，第 1099 页，《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6 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 1394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第 2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异记》载：“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宫妓数千人，上别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造千石酒钟。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龙舟，舟中盛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嬉。吴王于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铜沟、玉槛宫、之楹槛，皆珠玉饰之。”[1] “香径”即采香径，《姑苏志》：“采香径在香山旁，吴王种香于香山，使美人泛舟于溪以采之。”“屧廊”即响屧廊，《姑苏志》：“响屧廊在灵岩山，相传吴王建廊而虚其下，令西施与宫人步屧，绕之则响，故名。”[2]可谓极人间之奢华，但就在他醉生梦死之时，吴国很快便被越王勾践所灭。夫差以一代霸王的显赫尚且不免一朝败亡、万事成空的命运，昔日的采香径早已覆满尘土，只有不管人间世事变幻的乌鸦乱啼，响屧廊早已人去楼空，长满绿苔。今日之吴三桂，虽然“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在人们普遍沉浸于改朝换代的无边愁苦之时他却沉湎于“珠歌翠舞”，又岂能避免败亡的命运！所以要另外唱一首“吴宫曲”，预示其前景，歌曲的内容是“汉水东南日夜流”。“吴宫曲”即吴王夫差时的歌曲，任昉《述异记》载夫差时乐府云：“梧宫秋，吴王愁。”[3]预示夫差之败亡，梧宫即吴王别馆，梧楸成林，故名。“汉水东南日夜流”则化用李白《江上吟》：“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之意，[4]言功名富贵之难以持久，含蓄地传达了诗人对吴三桂的不满与讥讽。在此，诗歌凭借丰富的典故，不仅隐晦地叙述了难以直言的史实、曲折地传达了难以直抒的情感，而且将眼前偶然的个人命运与事件纳入了历史的长河，使诗人对具体人物命运的感叹与对明清易代兴亡难料的感慨上升为一种人生与历史的反思，很好地实现了记“史”与抒情的双重兼顾。与“梅村体”相比，初唐体与元白体之用典则大为逊色，因为其题材决定了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如白居易《长恨歌》用事只“小玉”、“双城”四字，因为他写作《长恨歌》的元和元年已与安史之乱相隔五六十年，皇帝也已换了四五个，所以可以无所顾忌地直言“汉皇重色思倾国”、“婉转蛾眉马前死”，明清之际的史实与个人的身份、情感倾向却决定了吴伟业不能如此。因此，“梅村体”之用典已不仅仅是一种获得典雅华丽之形式美的修辞手法，也是记“史”与抒情的一种特殊手段。

其二，灵活的转韵手法是叙述纷繁多变之历史过程的有效手段。

关于转韵手法，王士祯云：“此法起于陈、隋，初唐四杰辈沿之，盛唐王右丞、高常侍、李东川尚然，李、杜始大变其格。”[5]沈德潜亦云：“四语一转，蝉联而下，特初

---

1 任昉《述异记》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 353、小说家类，1047 册。
2 王鏊《姑苏志》卷三十三《古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 251、地理类，493 册。
3 任昉《述异记》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 353、小说家类，1047 册。
4 《李太白全集》卷七，第 374 页，中华书局 1977 年第 1 版。
5 郎廷槐编《师友诗传录》，第 136 页，《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3 年 9 月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唐人一法，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也。”[1]初唐体及元白体歌行的转韵比较随意。出于叙述纷繁多变的历史过程的需要，“梅村体”创造性地运用了这种自由换韵的手法，将音韵的转换与诗歌结构、内容的变化紧密结合，每一转韵，叙事内容便跟着变化，已成为一种独特的叙事手段。如《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首先追叙明亡前卞玉京所见中山女的美貌聪慧：“中山有女娇无双，明眸皓齿垂明珰。曾因内宴值歌舞，坐中瞥见涂鸦黄。问年十五尚未嫁，知音识曲弹清商。归来女伴洗红妆，枉将绝技矜平康，如此才足当侯王。”第一、二、四、六、七、八、九句押韵，且同为平声韵，婉转悠扬；接下来突然转韵，过渡到另一层意思：“万事仓皇在南渡，大家几日能枝梧。诏书忽下选蛾眉，细马轻车不知数。中山好女光徘徊，一时粉黛无人顾。艳色知为天下传，高门愁被旁人妒。尽道当前黄屋尊，谁知转盼红颜误。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一个平声韵后连用五个仄声韵，调促声哀，由对中山女高贵身份、美丽容颜的描述，切换到对其在南明灭亡后悲惨命运的叹惋，使叙事时空大幅度转换，内容别开生面，情感波澜起伏。又如《永和宫词》由对田妃一生的叙述，突然转韵到白头宫女对田妃早逝的感慨：“头白宫娥暗鬓蹙，庸知朝露非为福？宫草明年战血腥，当时莫向西陵哭。”想到明亡后的蔓草铜驼，田妃之早逝何尝不是一种幸福!诗歌内容突变，由此转入对明亡后悲惨景象的描述。《王郎曲》、《圆圆曲》、《萧史青门曲》等转韵也明显具有这样的特点。这种灵活的转韵手法，不仅使诗歌避免了一韵到底的呆板，而且使众多不同的历史画面在瞬间实现转接，是叙述纷繁多变之历史过程的有效手段，其多寡长短视叙事内容变化之需要而定，“行所不得不行，转所不得不转”，[2]是诗人匠心经营的结果。

其三，“梅村体”纵横捭阖的叙事艺术是反映纷繁复杂、时空跨度较大的历史过程与情感历程的需要。

此时期“梅村体”不仅超越了杜甫诗史及汉乐府叙事诗截取事件某一情节或片断、时间与空间某一单元的叙事手法，而且在整体上打破了其所师法的元、白叙事诗按时间顺序单线推进、情节单一的结构模式，形成了纵横捭阖的叙事艺术。[3]这一进展是在情、史并重的诗史观指导下完成的，是完整、真实地记录明清之际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与人们内心感受的需要。

---

1 沈德潜《说诗晬语》，第 20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第 1 版。

2 叶燮《原诗》，第 7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第 1 版。

3 “梅村体”的叙事艺术成就，在清代已备受关注，目前学界已有非常全面深入的论述，如裴世俊《吴梅村诗歌创作探析》（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 版）“继承元、白叙事之法”、“明代传奇的影响渗透”、“‘梅村体’的成就地位——以历史容量与叙事艺术为古代叙事诗开拓疆宇”部分，伍福美《吴梅村诗歌艺术新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第三章《梅村诗的叙事个性》，郭建球《论吴梅村叙事诗的艺术成就》（《中国文学研究》1997 年第 1 期）等论著、论文，论述角度、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对“梅村体”在叙事手法上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如叙事线索的交织、顺叙模式的打破、叙事视角的转换等特征都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笔者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种叙事艺术为什么会形成，认为其思想根源就是吴伟业情、史并重的诗史观。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一，充分反映繁杂多变的历史过程与自由抒写人物（包括自我）内心感受的创作目的，促使“梅村体”调整了承源于元、白的创作方式：发展了顺叙、倒叙、插叙等多种叙事手法，打破了时空限制；将传统叙事诗的单线模式演进为多线索交织并进，使故事情节复杂化，从而创造性地运用了长篇歌行容量大的特点，将纷繁的史实重新组合、联缀，错综交织成一幅完整、立体的艺术画卷，大大拓展了诗史的叙事容量。如《萧史青门曲》运用三条线索分叙长平、乐安、宁德三位公主的命运，时合时分、交织并进，通过顺叙、倒叙、插叙等叙事手法将明朝万历年间到清初这段漫长时间里的一系列纷繁史实巧妙地联缀、组合在这三条线索上，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绘了一幅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历史画卷。首先从一个反映世运衰亡的眼前画面叙起，用四句话概述了长平驸马周显望月伤怀的场景与昔日公主、外戚府第萧条、败落的荒凉景象。为了表现更宽广的历史内容，诗歌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接下来写眼前长平公主或宁德公主的不幸命运，而是通过倒叙手法转入了对历史往事的回忆：先追叙光宗少女乐安公主驸马巩永固的才学风度与乐安出嫁的盛大历史场面，引出诗歌的第一条线索。然后叙事时间继续逆向流动，使历史时空进一步拉大，追溯到此前光宗的另一个女儿宁德公主出嫁时的豪华盛况，引出了诗歌的又一条线索，也是主要线索。用华丽的辞藻、排比对仗的句式对此奢华场面作了详细铺叙：“百两车来填紫陌，千金榼送出雕房。红窗小院调鹦鹉，翠馆繁箏叫凤凰。白首傅玑阿母饰，绿鞴大袖骑奴装。”接下来两线合一，用比拟、蝉联的句法合写乐安与宁德共同的尊贵骄奢的生活画面：“灼灼妖桃共秾李，两家姊妹骄纨绮。九子鸾雏斗玉钗，钗工百万恣求取。屋里熏炉滃若云，门前钿毂流如水。”至此又附带写出年辈更老的神宗女荣昌公主，历史时空上溯到了万历年间。然后转而将三位公主合在一起写：“六宫都讲家人理，四节频加戚里恩。同谢面旨龙德殿，共乘油壁月华门。”历史往事可谓繁华至极，但诗歌至此突然以一句“万事荣华有消歇”的哀婉浩叹停止了叙事时间的逆向流动，而转入对悲惨结局的叙述。刚刚还是繁华似锦，突然间便荣华消歇，使历史盛衰与人物前后命运、心境形成了巨大落差，这样就将诗人对故国衰亡的无限沉痛，对明朝公主不幸命运的无限同情惋惜，以及对历史盛衰难料的无限感慨传达了出来：先是乐安病殁的悲凉场面，然后通过“忧及四方宵旰甚，自家兄妹话艰辛”两句暗示出农民战争的风起云涌与明朝国运的极度衰落，接着便是明室覆亡，帝、后殉国，改朝换代后宁德公主“卖珠易米”谋生的悲惨境遇。叙事至此，笔势已由历史回到现实，但诗人再次运用倒叙手法，通过宁德公主的回忆引出了诗歌的又一条线索——长平公主命运的始末，又荡开一个新的历史画面。四位公主的结局都交待完毕后，诗歌似乎写到了尽头，可是又依靠转韵手法突然插叙宁德一梦：“昨夜西窗仍梦见，乐安小妹重欢宴。先后传呼唤卷帘，贵妃笑折樱桃倦。”使故事情节波澜陡翻、语断意连，盛衰悬殊的历史画面交融叠现，又一次形成了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触目惊心的对比。将昔日富贵荣华付诸宁德一梦，不仅是为了渲染宁德公主的凄苦心境，也是为了表现诗人“万事都非”的怅惘。最后终于回到现实，写长平墓地的荒凉与驸马周显：“只看天上琼楼夜，乌鹊年年它自飞”的伤怀，与开头望月的场景遥相呼应。总之，诗歌交叉运用了顺叙、倒叙、插叙等叙事手法，及单写、合写、附写等叙事手段，使时空大幅度跳跃，情节曲折多变，结构纵横开阖，避免了元、白叙事诗所谓“寸步不移”的平铺直叙，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反映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与人物内心感受的创作目的。又如《永和宫词》同样是为了表现更为广阔、复杂的历史内容，在明写、实写田贵妃命运变化的同时，又暗中铺设了一条辅线，即明末农民战争的发展，在主线的发展过程中时露一鳞半爪。通过“君王宵旰无欢思”、“已报河南失数州”、“宫草明年战血腥”这样寥寥数句隐约地暗示出农民战争节节胜利、迅猛发展，最终推翻明王朝的广阔历史背景。另外，诗歌还运用插叙手法将笔触由宫内延伸到宫外，插入了田妃父豪横非法与田妃少子夭亡二事，以展示明末社会的败亡景象，进一步拓展诗歌的历史内容：国家命运摇摇欲坠，戚臣如田宏遇之流却仗势明抢豪夺、骄奢无度；军饷匮乏，戚臣们竟利用田妃少子之病装神弄鬼，拒不助饷。因此，诗歌通过田妃的命运变化，映照出了明王朝“繁华——衰败——灭亡”的悲剧历史。总之，多条叙事线索与多种叙事手法的运用，满足了反映纷繁复杂、时空跨度较大的历史内容与情感内容的需要，成功地拓展了诗史的叙事容量。大开大合与时空交错的结构变化，既有利于涵盖巨大的历史内容，又有利于抒发沉郁激烈的复杂情感。

第二，为了真实地再现纷繁的史实与复杂的内心感受，与以往叙事诗及其本人前一时期作品相比，“梅村体”的叙事角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诗人视角与诗中人物视角往往暗中转换、交互重叠。元、白叙事诗虽然也有视角的转换，如《连昌宫词》中的“老翁”视角，《琵琶行》中的“商人妇”视角，但视角之间的转换不仅有明确的提示，如《连昌宫词》：“宫边老人为予泣”、“耳闻眼见为君说”，《琵琶行》：“自言本是京城女”，而且诗人的经历与诗中人物相差甚远，因此，读者一眼便可看出哪些内容是诗人站在人物的角度所述。而此时期“梅村体”叙事视角间的转换往往依靠转韵手法在暗中完成，诗人视角与人物视角合而为一，很难作截然划分。如《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首先以诗人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卞玉京悲凉的琴声，追叙二人的相识与卞玉京的身世：“玉京与我南中遇，家近大功坊底路。小院青楼大道边，对门却是中山住。”仍是诗人视角，但接下来“中山有女娇无双，清眸皓齿垂明珰”实际上已暗换为卞玉京的视角，除了诗歌韵脚随之转换外没有任何明显的标志，读完下面“曾因内宴值歌舞，坐中瞥见涂鸦黄……如此才足当侯王”才让人恍然大悟，中山女的形象是由卞玉京眼中看到的。接下来弘光帝所选诸妃以及卞玉京本人在南明灭亡时的悲惨遭遇与哀怨心境，虽然形式上的表述者是卞玉京，但除去诗歌最后“坐客闻言起叹嗟”的标志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之外，很难分清是诗人还是卞玉京的所见、所闻、所感，因为诗人本身也是这段历史过程耳闻目睹的见证者，有着与卞玉京完全相同的时代背景与大致相似的命运经历及家国身世之感。又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以及仕清后所写的《临淮老妓行》、《雁门尚书行》、《松山哀》、《楚两生行》等诗中叙事视角的转换均有这样的特点。（二）往往摹拟诗中人物口吻叙事，暗中转换叙事语气。如《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以卞玉京的口吻叙述众多美丽女子在南明覆亡过程中的悲惨命运时，又摹拟祁、阮诸妃口吻发出对不幸命运的悲怨感叹："当时错怨韩禽虎……玉儿甘为东昏死!"既是描摹祁、阮诸妃当时的心理活动以及卞玉京对此事件的感受，更是传达诗人对明清易代所导致的个人不幸命运的哀怨与同情。又如《吴门遇刘雪舫》以刘雪舫口吻叙述明朝衰亡过程，其中所抒家国身世之痛形式上是刘雪舫的感受，实质也是诗人的感受。再如《阆州行》有歌者口吻、"同年翁"口吻、"同年翁"之妇口吻、传言之"客"口吻，沓杂淋漓、曲折入妙，恰如靳荣藩所云："此诗只于暗中换却语气……至前阆州山水起，后用阆州城江结，将许多人语气收入烟云缥缈之中。如画家山水人物，有攒簇团结处，而必于上面、侧面空留余地，或以微烟淡墨，拂之更觉通纸生动，杳然无尽，别有天地，非人间也。"[1]《萧史青门曲》、《琵琶行》、《南生鲁六真图歌》以及后来的《临淮老妓行》、《楚两生行》等，均运用了这种借人物口吻叙事的手法。（三）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作品明显增多。诗人不再只是局外的客观叙述者，而是通过扮演诗中的一个角色而置身于事件之内，以事件经历者或见证人的身份叙述自己的见闻感叹，不仅增强了所述内容的真实感，而且便于诗人主观情感的直接抒发。如《琵琶行》、《鸳湖曲》、《毛子晋斋中读吴匏庵手钞谢翱西台恸哭记》、《吴门遇刘雪舫》、《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等，此时期大部分长篇歌行均采取了第一人称叙事角度，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有些诗即使前面用第三人称，后来为了抒情的痛快，也往往换用第一人称，如《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在用第三人称叙述完事件发展过程后，转用第一人称："我来山馆见雕盆，蟋蟀秋声增叹息。呜呼!漆城荡荡空无人，哀蛩切切啼王孙。贫士征夫尽流涕，惜哉不遇飞将军。"诗人以角色身份直接站出来抒发亡国之痛、兴亡之慨。又如《东莱行》、《后东皋草堂歌》、《项黄中家观万岁通天法帖》、《堇山儿》等，均以第三人称叙事，转用第一人称抒情，从而体现出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鲜明特征。

吴伟业之所以采取此种叙事角度，是因为这样更有利于真实地再现多角度观察下的历史事实与诗人及人物的复杂内心感受。由于诗中人物本身即历史的直接见证者或实际承担者，所以通过叙事人称、叙事视角、叙事口吻的转换，不仅可以自由叙述从不同角度观察下的历史，拓展诗歌的叙事容量，增强所述内容的真实可靠性，使诗中

1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一下《阆州行》评语，苏州扫叶山房藏版乾隆刻本。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可感，更重要的是，叙事角度的转换还是“梅村体”的独特抒情手法——角色扮演的抒情方式。因为吴伟业“诗史”不仅要记录当时人的内心感受，还要抒写个人对历史与人生的主观感受，而运用第一人称叙事，诗人本身作为诗中的人物角色而存在，那么角色情感就是诗人情感的直接抒发；而通过诗人视角与人物视角、诗人口吻与人物口吻的暗中转换，则可以使诗人情感对象化为诗中人物的情感：从表面看，抒情者是诗中其他人物，所写感受是他人的心理感受，但从深层看，诗中人物往往与作者有着大致相似的命运经历与情感历程，其实是诗人的角色扮演，其情感实质即诗人的感受与认识。这种通过扮演角色抒情的方式恰是“梅村体”与一般抒情诗最大的区别，因为一般抒情诗中的抒情者只能是作者本人。[1]当然，角色扮演手法汉乐府诗已采用，但诗人与角色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是诗人代角色立言而非以角色代言，诗人情感与人物情感并不一致。如《艳歌何尝行》既以丈夫身份与口吻抒写别离之情：“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又以妻子身份与口吻抒写别离之情：“念与君别离，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2]“妻子”与“丈夫”所抒之情显然非作者本人的情感。吴伟业吸取这种角色扮演的手法，并通过将角色安排成与个人时代背景、身世经历大致相似的真实人物，以及上述转换叙事角度的手法，消弭了诗人与角色之间的情感距离，使“梅村体”所抒人物情感与个人情感合而为一，大大增强了诗史的抒情功能，实现了抒写个人情感与记录当时人内心感受的创作目的。所以，“梅村体”叙事角度的这些新特征，是在情、史并重的诗史观推动下形成的。

第三，在情、史并重的诗史观支配下，“梅村体”歌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题材范围、人物形象系列与“以人系事”的表现范型。[3]综观“梅村体”歌行的取材范围，主要包括三类：（一）明清之际的重大政治、战争事件。如前一时期的《殿上行》、《东皋草堂歌》、《悲滕城》、《襄阳乐》、《高丽行》、《临江参军》、《读杨参军悲钜鹿诗》，仕清后写的《雁门尚书行》、《松山哀》等。（二）与明清盛衰史紧密相关的个体命运悲剧。从所写人物的身份特征来看，这类题材又可分为两小类：（1）宫廷、艺人悲剧。这一类人情感纤细脆弱，最接近权力中心，历史变动在他们身上引起的影响最大，表

---

[1] 代言体诗歌除外。代言体诗歌由于是代他人所写，所以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只能是形式上的“作者”而非现实中的诗人，譬如诗歌史上大量男性诗人站在女性角度所写的抒情诗，抒情主人公是作者所代之人而非作者本人。

[2] 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三十九卷，第576－577页，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

[3] 关于“梅村体”诗史的题材，徐江《吴梅村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六章《吴梅村“诗史”之什论略》分为三类：“直接叙写重大事件的”、“描写明朝贵戚的荣衰遭遇来感叹沧桑陵谷之变的”、“描写战乱中人民疾苦以再现那个动荡时代的社会生活”，魏中林《诗史思维与梅村体史诗》（《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分为四类：“战争悲剧”、“政治悲剧”、“宫廷悲剧”、“艺人平民悲剧”，分类标准虽略有不同，但都总结出了“梅村体”诗史的主要题材。本文分析其题材特征的目的是为了透视它所反映出来的诗史观念，认为在所有这些题材类型中，能够体现其独特诗史观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关于“梅村体”诗史“以人系事”的表现方式，伍福美《吴梅村诗歌艺术新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叶君远《吴伟业评传》（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等论著中都有相关论述，本文侧重考察的是这种表现范式所体现的诗史观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现最明显。如前一时期的《洛阳行》，此时期的《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勾章井》、《吴门遇刘雪舫》、《琵琶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圆圆曲》、《阆州行》、《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以及写宫廷事物之遭际的《宫扇》、《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项黄中家观万岁通天法帖》，仕清后写的《银泉山》、《田家铁师歌》、《楚两生行》、《王郎曲》、《临淮老妓行》、《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2）作为诗人故交旧友的文人士大夫悲剧。这一类人往往是政权的直接参与者，其命运变化是政治变动、朝代更迭的必然结果。如此时期的《东莱行》、《鸳湖曲》、《后东皋草堂歌》、《汲古阁歌》、《哭志衍》，仕清后的《白燕吟》、《吾谷行》、《悲歌赠吴季子》、《咏拙政园山茶花》、《短歌》、《赠陆生》、《矾青湖》；作为社会的上层（或依附于上层），这两类人物均与吴伟业本人有着大致相似的身世经历或情感经历，他们的悲剧命运均能引起吴伟业强烈的共鸣。（三）清初苛政下的悲惨社会生活。如此时期的《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堇山儿》，仕清后的《织妇词》、《直溪吏》、《临顿儿》、《木棉吟》、《海户曲》、《打冰词》、《再观打冰词》，以及直接讥刺清初统治者之残忍骄奢的《雪中遇猎》、《茸城行》。其中第三类题材的作品，虽然在叙事技巧、表现方式、思想深度等方面有超越此前叙事诗之处，但就题材范围来讲，显然非“梅村体”所特有，杜甫已有“三吏”、“三别”这样的一系列名篇，中唐元、白等人的新乐府亦属这一题材范围，因此，“梅村体”此类作品只是这一传统题材中成就较高的一部分。而艺术成就最高、在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此时期大量创作的第二类题材的作品。因为这类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其情、史并重的诗史观：形成了关系“时事之大者”与兴亡盛衰之感的特有题材范围；采取了“以人系事”的表现方式，即将个人置于明清之际的历史背景中，以个人的悲惨命运作为牵引历史与情感发展的主线，叙事与抒情兼长。并在特有的题材范围内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藩王、公主、贵妃、戚畹等以宫廷为中心的人物系列；卞玉京、陈圆圆、冬儿、白彧如、王紫稼、柳敬亭、苏昆生等歌伎、艺人系列；吴昌时、陈之遴、瞿式耜、单狷庵、吴兆骞等文人士大夫系列，并且与元、白歌行对人物事迹有所虚构不同，“梅村体”所写都是真实人物的真实事迹，由诗人通过巧妙构思，重新剪裁、选择、联缀、组合成完整的故事情节，既为人物立传、补史之阙，又以小见大，通过典型人物悲剧命运反映普遍历史真实。如《鸳湖曲》以吴昌时的命运变化为主线，反映历史变迁、抒写当事人内心感受，寄寓自我对历史与人生的感悟与叹惋。先写其在家乡的欢乐生活，继写其在京师的富贵煊赫，然后写其突然被杀的悲惨结局。吴昌时命运这种出人意料的迅疾变化，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他是否“赃私巨万”、是否“通内”，而只不过是明末党争的牺牲品。因为他所依附的首辅周延儒，崇祯十四年再度入相后，为报答复社人士的帮助，“悉反体仁辈弊政”，结果得罪了厂卫，被免职而归。但其政敌仍不放过他：“既去，给事中郝晰疏请除奸，以指延儒。帝不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听。山东佥事雷演祚纠范志完，亦及延儒。已而御史蒋拱宸劾吴昌时赃私巨万，大抵牵连延儒，而中言昌时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机密，重贿入手，辄预揣温旨告人。给事中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怒甚，御中左门，亲鞫昌时，折其胫，无所承，怒不解。拱宸面讦其通内，帝察之有迹，乃下狱论死，始有意诛延儒。”[1]杀吴昌时不过是借以杀周延儒、推翻其政治措施的一个手段，所以吴伟业在诗中感叹曰：“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以嵇康喻吴，以荐举嵇康的山涛喻周，吴之被杀，正说明周之失势。所以通过吴昌时的命运变化，既反映了明末党争的残酷，政治的黑暗，又抒发了对个人命运不由自主的悲哀感叹。出于抒情的需要，诗歌不仅通过今昔盛衰的反复对比来表现兴亡盛衰的感慨，诗人还往往直接站出来抒发内心感受，如在叙述吴昌时的家居生活后感叹曰：“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叙述吴昌时悲惨结局前感叹曰：“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叙述今日南湖的萧条后感叹道：“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季石伦，衔杯且效陶彭泽。”诗歌结尾更以“君不见”的强烈感叹句发出了对历史与人生的深沉感喟：“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个人在动乱的时世中，不过是“白浪掀天”的江湖里一叶危殆的小舟，苦心经营功名事业的世人，远不如自由自在的“钓叟”更有智慧。又如《阊洲行》、《后东皋草堂歌》等，均以个人命运为主题，将历史变迁与兴亡之情、家国之痛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宫廷、妓女、艺人等与故国昔日繁华场面紧密相联的人物命运，成为此时期最为突出的题材。因为这些人物最接近政权中心(妓女、艺人往往依附权贵)，是往昔繁华的直接见证者，并且情感纤细脆弱，历史的变动、朝代的更迭在他们身上引起的震动最大，表现最明显，其命运变化最能反映世运变迁，也最能传达强烈的亡国之痛、兴亡之情，所以最适合表现其情、史并重的诗史观。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吴门遇刘雪舫》、《琵琶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向来被视为“梅村体”代表作的长篇歌行，或咏皇妃、公主、皇亲，或咏艺人、歌伎……，均以明朝灭亡为转折点，两段历史、两种命运形成鲜明对比，以乐景写哀情，哀感倍增：极写亡国前的繁华逸乐，意在反衬亡国后的凄惨哀伤。诗人“易代之感，与夫身世之悲，盖有不能质言、不敢昌言者，乃籍儿女情踪，曲譬而善道之。”[2]国破家亡的巨大悲痛，就在鲜明对比中一泄千里。《宫扇》、《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项黄中家观万岁通天法帖》等诗，则以明亡后流落民间、不知几易其主的皇家之物为主线，睹物忆往，同样逗露出一段兴亡史、满怀兴亡情。美好人（物）的悲惨结局甚至毁灭，根源乃在动荡的时世所造成的时代悲剧，通过个体命运又表现了普遍的历史真实。所以正是以情、史并重的诗史观为基础，“梅

[1]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八《周延儒传》，第 7930 页，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 版。
[2] 俞平伯《古槐书屋读本＜萧史青门曲＞》，《学术集林》卷九，第 14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村体”才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题材范围、人物形象系列与“以人系事”的表现范型，为“诗史”开拓了新的疆域。

总之，是记“史”与传情并重的诗史观，促使“梅村体”长篇歌行在继承《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等诗叙事体制的基础上，又广泛借鉴史传、传奇等叙事文学的叙事技巧，熔铸初唐歌行富丽的藻采、和谐的韵律，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题材范围、语言特色、表现方式及情致风调：

> 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1]
>
> 七古用元、白叙事之体，拟王、骆用事之法，调既流转，语复绮丽，千古高唱矣。[2]
>
> 梅村歌行以初唐格调，发杜、韩之沉郁，写元、白之缠绵，合众美而成一家。[3]

叙事委曲详尽而又辞丽情深、风华绝代，既担负了记“史”功能，又避免了明人长期以来所反对的“诗史”脱离抒情的弊端。当然，吴伟业对长篇歌行的重视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也与明代复古派长期以来对乐府诗的提倡密切相关。关于前七子及之前李东阳等茶陵派诗人乐府诗的创作情况，黄卓越先生《前七子乐府诗制作与明中期的民间化运动》一文已作了深入分析，并且指出“乐府诗的创作在后七子处显示为有增无减”。[4]正如黄先生所讲的那样，前后七子对这一诗体的提倡，其实是他们对民间化运动的积极反应，所以他们也非常重视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但由于复古思想的局限，他们同时又特别强调对章法技巧尤其是格调文风的模仿，所以明人的乐府诗有相当大数量都是刻板的模拟之作。反映时事与风格模拟这两种创作倾向之间的矛盾在吴伟业这里彻底消解，“梅村体”以反映时事与个体内心感受为宗旨，自然形成了独特的风貌。

“梅村体”歌行创作的巨大成功，使之赢得了时人的好评与仿效，如云间王广心“诗秀气成采，长篇如《大梁行送林平子》，韵致仿佛梅村。”吴园茨“歌行如《青山下望黄将军墓道》，淋漓顿挫，疊疊逼梅村”；陈维崧“歌行佳者似梅村”；[5]章静宜“歌

---

[1]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三，集部二十六、别集类二十六《梅村集四十卷》，第 2341 页，中华书局 1997 年第 1 版。

[2] 袁枚录本评语，《吴梅村全集》第 39 页。

[3] 汪学金《娄东诗派》卷十二，第 181 页，《四库未收书辑刊》9 辑 30 册。

[4] 黄卓越《前七子乐府诗制作与明中期的民间化运动》，中国文研究 2003 年秋之卷。

[5] 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一第 1680 页、卷二第 1710 页、1725 页，《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 1983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行清丽激楚，颇近梅村集门径”；[1]吴兆骞“《萧史青门》成绝调，又传一曲《浚稽山》。”[2]尤其是其同里弟子，以吴伟业为领袖，相互切磋唱酬，形成了与云间、虞山鼎足而三的娄东派：“甲乙以来，以诗鸣江左者，莫盛于娄东。其体大率以三唐为宗，而旁及于国朝高（启）、杨（基）、何（景明）、李（梦阳）诸作。其人则吴梅村先生为之帜志，相与唱酬者，周子俶诸子及太原昆季也。百里之间金春玉应，泓泓乎，洋洋乎，洵风雅之都会哉。”[3] 如王抃：“下笔千言，珠玑错落。五言长篇，有类白太傅；……七古绮丽流美，往往欲入初唐。”[4]黄与坚：“独七言古，数与梅村讲论，尝以古人长篇断章取义，于操纵开阖处得其遗法。”[5]影响所及，诗歌批评领域亦逐渐改变了长期以来一味贬抑初唐及元、白歌行的观念，如陈维崧：“七言必首垂拱四子”；[6]毛先舒《诗辩坻》：“七言歌行……唐代卢、骆组壮，沈、宋轩华，高、岑豪激而近质，李、杜纡佚而好变，元、白迤俪而详尽，温、李朦胧而绮密。陈其格律，校其高下，各有专诣，不容斑杂。”[7]贺贻孙《诗筏》：“长庆长篇，如白乐天《长恨歌》、《琵琶行》，元微之《连昌宫词》诸作，才调风致，自是才人之冠。”[8]极力主张复古的云间派成员宋尚木也说：“七言，初盛唐虽各一体，然极七言之变则元、白、温、李皆在所不废，元白体至卑，乃《琵琶行》、《连昌宫词》、《长恨歌》未尝不可读。”[9] 更重要的是，诗歌的记事功能及叙事诗的审美特征也开始被诗论家们所发现，如宋尚木《诗话偶录》：“读《焦仲卿》、《木兰诗》，如看彻一本传奇，使人不敢作传奇”，“《仲卿诗》叙事老朴，延之《秋胡诗》叙事闲雅。”[10]贺贻孙《诗筏》亦将古代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孤儿行》、《木兰诗》、《悲愤诗》[11]与戏剧比较，对其人物形象、戏剧性情节大为赞赏：“叙事诗长篇动人啼笑处，全在点缀生活，如一本杂居，插科打诨，全在净丑。”[12]明清之际诗学观念的这一转变，“梅村体”歌行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梅村体”正是此一诗学观念的体现，反过来又加速了此一观念的展开与深化。

（二）记“史”与传情并重的近体诗：吴伟业“诗史”观的新体现

此时期，以时事为题材的近体诗明显增多。字数固定、格律严谨的近体诗，向来

---

1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二，集部三十五、别集类存目九《吾好遗稿一卷》，第 2546 页，中华书局 1997 年第 1 版。
2 翁心存《论诗绝句十八首》，转引自郭绍虞等《万首论诗绝句》，第 87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3 陆元辅《陆菊隐先生文集》卷六《王怿民诗序》，民国间抄本。
4 《归庄集》卷三《王异公诗序》，第 19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4 月第 1 版。
5 黄与坚《愿学斋文集》卷八《论学三说》，清抄本。
6 陈维崧《陈迦陵集》卷四《与宋尚木论诗书》，《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281。
7 毛先舒《诗辩坻》卷三，第 46 页，《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8 贺贻孙《诗筏》，第 139 页，《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9 宋尚木《抱真堂诗稿·诗话偶录》，顺治九年自刻本。
10 宋尚木《抱真堂诗稿·诗话偶录》，顺治九年自刻本。
11 大多数学者认为《木兰诗》出于唐代文人之手，蔡琰《悲愤诗》亦后人伪托。
12 贺贻孙《诗筏》，第 139 页，《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以写景抒情为主，以营造言简情深、意在言外的含蓄意境为长，吴伟业却兼以叙事，事、景、情水乳交融，亦自韵味悠远。赵翼就曾敏锐地指出，以律诗叙事是吴伟业“独擅长处”。[1]如其在弘光朝任职期间所作七律《有感》：

已闻羽檄移青海，是处山川困白登。征北功惟修坞壁，防秋策在打河冰。风沙刁斗三千丈，雨雪荆榛十四陵。回首神州漫流涕，酹杯江水话中兴。

首联借用李白《关山月》：“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的诗意与汉高祖“白登之围”的典故叙述弘光朝在清军威逼下的危急形势：战火继续南移，大半江山已沦丧于清军；中四联转回头叙述弘光朝的苟安政策：征讨清军的全部功绩就是修筑防御功事上，防敌策略只是打碎河冰，试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敌人过江，而闲放着“三千帐”大军，祖陵却无人守护而任其荒废，更不用谈收复失地了。在这看似不动声色地叙述中，通过将紧急的战况、沦丧的故国与朝廷的苟安作对比，又使诗人强烈的不满与讽刺之情跃然纸上。尾联直接抒写对故国沦亡的哀痛与对南明“中兴”的失望，十四字中寓无限感慨。全诗情事交融，余韵悠然。

吴伟业近体诗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于其独特的“诗史”观。情、史并重之诗史观的形成与诗史意识的进一步加强，促使记事与抒情这两种原本并行不悖的创作倾向在此同样融合在了一起，既发挥近体诗擅长抒情的特点，又兼以叙事凝炼的追求，使之承担起记“史”的功能，从而形成了融情于事的独特体貌。除上述《有感》外，又如《与友人谈遗事》前半铺陈崇祯帝阅城的盛况：“曾侍骊山清道尘，六师讲武小平津。云旄大纛星辰动，天策中权虎豹陈。”首句用杜甫《九日》：“酒澜却忆十年事，肠断骊山清路尘”诗典，借唐玄宗驾幸骊山华清宫事指崇祯帝阅城事。据《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十年八月，车驾阅城，铠甲旌旗甚盛，群臣悉鸾带策马从。六军望见乘舆，皆呼万岁。”[2]时吴伟业正任翰林院编修、实录纂修官，自然也在侍从之列，有《圣驾阅城恭遇口占》一诗可以为证，所以诗云“曾侍”，乃实录。后半转入抒情：“一自羽书飞紫塞，长教钲鼓恨黄巾。孤臣流涕青门外，徒使田横客笑人。”对明朝灭亡的无限痛惜，对清军与农民军的无限愤恨，以及个人未能为崇祯帝殉节的内心愧疚，都因故国往事勾起。在记录史实的同时，传达出无尽的亡国之痛、身世之悲。《白门遇北来友人》、《乱后过湖上山水尽矣赋一绝》、《登数峰阁礼浙中死事六君子》、《感事》、《鸳湖感旧》等等，均以情、史并重的诗史观为基础，或因情以记事，或缘事以抒情，

1 赵翼《瓯北诗话》卷九，第 13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第 1 版。
2 张廷玉《明史》，第 2182 页，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记事与抒情互相交融，意境深远，情韵无尽。

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近体诗不可能像长篇歌行那样将纷繁复杂的史实统摄于一诗，但吴伟业创造性地运用组诗形式，同样成功地叙述了复杂的历史过程。如《读史杂感十六首》叙述从弘光朝建立到南明各政权相继灭亡的历史，“数首可合为一首，一首中又自具开阖变化之妙。”[1]对纷繁复杂的史实，“或专叙，或错叙，或复说，或带说”，[2]错综交织、或详或略，真实完整地记录了那段亡国历史过程。其一叙述史可法整顿军队、开府扬州，为建国之初的弘光朝带来了“吴越黄星见，园陵紫气浮”的“中兴”希望，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以下笔锋一转，开始叙述朝政的糜烂：其二、三、四从不同角度分别描述文武群臣专权跋扈、卖官鬻爵、排斥善类、苟且偷安的累累丑行，同时映带出弘光帝的宠信佞幸、是非不辨。其五专叙弘光帝的荒淫好色、醉生梦死，与《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中“诏书忽下选蛾眉”至“青冢凄凉竟如此”一段异曲同工。其六、七将这批亡国君臣合在一起来写，清朝的进攻日迫一日，而弘光朝下至三军群臣，上至皇帝阁老，均沉醉于歌舞宴乐、“狗马”、“俳优”，对边事置之不理，不要说击退清军、收复失地了，国家存亡的命运都完全交付给了长江“天堑”，南明半壁江山终于被葬送。其八接下来便叙述弘光朝的覆亡：“偏师过采石，突骑满新林。”写清军越过弘光君臣矜以为“天堑”的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已设牵羊礼，难为刑马心”，上句用微子投降武王的典故写群臣不等南京失陷便已准备投降，下句写弘光帝逃至黄得功军中事，据《明史》所载，清军刚一过江，弘光帝即慌忙逃出南京，至黄得功军中：“得功方收兵屯芜湖，福王潜入其营。得功惊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3]“难为刑马心”即指此事，意思是说黄得功等将领即使有抗击清军的决心，也很难有所作为了。“孤军摧韦粲，百战死王琳”连用韦粲、王琳两个典故写黄得功孤军作战，终于战死疆场，弘光朝支撑不到两年，便匆匆宣告结束。因黄得功最为史可法所信任，所以叙事至此，又附带叙及史可法曾驻守、前此已陷落的扬州：“极目芜城远，沧江暮雨深”，诗歌想像黄得功死时极目扬州，而史可法前此已死，沧江暮雨中的扬州城已成芜城，留给人无尽的沧桑悲凉。故靳荣藩评此首云：“梅村诗史之目，真无愧矣，而诗境亦烟波无尽。”[4]接下来三首叙述弘光朝覆亡后的悲惨景象，可以说是弘光亡国史的余波：其九描述到处兵火的战乱景象，寇贼强盗皆趁机聚众据地，横行一方。其十叙述原来弘光朝“守江诸将帅”的不战而逃。其十一写朱大典守金华、城破合家殉难的悲壮事迹。前十一首可以看作组诗的第一个段落，完整地叙述了弘光朝从建立到灭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

1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十一上，七律总评，苏州扫叶山房藏版乾隆刻本

2 黄传祖评语，《吴梅村全集》第 97 页。

3 《明史》卷二百六十八《黄得功传》，第 6902 页，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 版。

4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八五律总评，苏州扫叶山房藏版乾隆刻本。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十二首以下是第二个段落，叙述唐王朱聿建隆武政权（其十二）、鲁王朱以海监国政权（其十三）、桂王朱由榔永历政权（其十四、十五、十六）的覆亡历史。半壁江山被弘光朝一旦葬送，其后纵有黄道周、何腾胶、姜曰广、金声桓这样的爱国志士也已回天无力，更何况各政权间还自相残杀！十六首合在一起即一部南明亡国史。名为“读史”，实“妙合今情”，有对误国君臣的辛辣嘲讽，也有对江山沦丧、英雄战殁的沉痛哀悼，“彼黍离离，不足并其哀激。”[1]又如顺治十年南京之行所写组诗《登上方桥有感》至《秣陵口号》九首，与长篇五古《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异曲同工，皆吊古伤今，感慨兴亡，故国情怀与历史反思融合在一起。仕清途中所写《扬州四首》：“南都情事，该括无遗”，[2]“四首首尾合之分之俱成章法”。[3]《杂感二十一首》、《听朱乐隆歌六首》、《癸巳春日禊饮社集虎邱即事四首》等均以明清之际的重大时事为题材，融情于事，纪事与抒情相结合，圆满实践并深化了情、史并重的诗史观。

此时期，除直接以记史为目的、以重大时事为题材的作品之外，其他题材的诗作亦往往涉及时事、涉及人们在历史变迁中的感受与认识，流露出强烈的“诗史”意识。如大量赠答类诗作，往往用组诗形式，叙述对方在历史变迁中的身世与情感经历，家国兴亡之痛与个体身世之感融为一体。如《赠寇白门六首》以明清易代为历史背景，通过对一代名妓寇白门之身世浮沉与“沦落之感”的叙咏，寄寓了诗人自己的故国哀思，“借客形主，百倍惋怅。”[4]《阆园诗十首》、《岁暮送穆大苑先往桐庐四首》、《座主李太虚师从燕都间道北归，寻以南昌兵变避乱广陵，赋呈八首》、《赠王子彦五十四首》等等，均通过对友朋身世、情感经历的铺叙吟咏，反映了明清易代的历史变迁，借以寄寓个人的亡国之痛与身世之感，恰如袁枚所云：“梅村赠答诗铺叙皆长，另有一种矜警哀动处。”[5]又如此时期的部分艳情诗，也一改前一时期的风流自赏、“无一忧危之词”，将爱情的咏叹与家国身世的感伤融为一体，缠绵而哀怨。如《琴河感旧四首》将诗人与卞玉京的爱情放在明清易代的历史背景中，不仅是对被扼杀之爱情的哀挽，更是对动乱时代人生不由自主的感慨，诗人在序言中描述自己这种抑郁难舒的情怀曰：“予本恨人，伤心往事。江头燕子，旧垒都非；山上蘼芜，故人安在？久绝铅华之梦，况当摇落之辰，相遇则惟看杨柳，我亦何堪；为别已屡见樱桃，君还未嫁。听琵琶而不响，隔团扇以犹怜，能无杜秋之感、江州之泣也！”随着社会的动荡、朝代的更迭，“青山憔悴”，“红粉飘零”，深深相爱的人不得不分袂，那恩重情深的爱情恍惚是“前生”的往事。爱情悲剧的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故钱谦益

---

1 黄传祖评语，见《吴梅村全集》第 97 页。
2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十二下，七律《杨州四首》引陆云士评语，苏州扫叶山房藏版乾隆刻本。
3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十二下，七律《杨州四首》评语，苏州扫叶山房藏版乾隆刻本。
4 黄传祖评语，《吴梅村全集》第 211 页。
5 袁枚录本《赠王子彦五十四首》评语，《吴梅村全集》第 143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评云：“声律妍秀，风怀恻怆，于歌禾赋麦之时，为题柳看花之句。”[1]哀艳而沉痛。这些现象表明，诗史观念已化作潜意识，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在各种创作目的、各类题材的作品中。

总之，吴伟业反映时事诸近体诗，虽然与长篇歌行相比，事件已被高度提炼和简化，但同样叙事与抒情相结合，鲜明地体现了记“史”与抒情并重的诗史观：或带着悲凉的感情叙史，或通过叙史传达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皆“指事类情，无愧诗史。”[2]沈德潜云：“梅村咏前朝事，沧桑悲感，俱近盛唐。”[3]尤侗云：“七言古、律诸体，流连光景，哀乐缠绵，使人一唱三叹。”[4]林昌彝云：“近代七言律诗最为沉雄者，首推吴梅村，盖能以西昆面子运老杜骨头者，自义山、遗山而后，殆无其匹。”[5]均指出其近体诗在“诗史”意识观照下形成的婉艳而沉郁的风格特征，与长篇歌行一样，辞丽情深、调哀声谐，确乎是“在妩媚的外表下寄寓着深沉的哀痛”，[6]共同体现了“梅村体”独特的艺术风貌。在此，将纪事与抒情完美和谐地结合起来，使诗史的观念进一步得以深化，不仅解决了明人长期争论的纪事与抒情、凝炼含蓄与铺叙细腻的种种矛盾，而且也使诗史在文体上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此一观念进一步延伸，在诗歌创作中就是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以“一时之性情”抒写“万古之性情”；[7]反映在戏剧创作中则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结构模式。

三、仕清之后：情余于事

仕清后，吴伟业诗歌创作总体上由原来的纪事与抒情相结合转向了侧重抒情，往往情余于事。其重要征象之一就是叙事与抒情兼长的长篇歌行（包括歌行化的长篇古体诗）越来越少，而以抒情为主的近体诗却大量增加。据《梅村家藏稿》，后集诗歌总数约是前集的两倍，而古体诗总数却比前集还少十几首。“心史”观的形成是导致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因为根据吴伟业“心史”观，此时期诗歌表现的重点是自我内心世界而不再是风云激荡的外在历史，时事的描绘已退居为抒情的背景，其经过始末并不需要直接出现在诗中，所以宜于叙事的长篇歌行在这里失去了用武之地。当然，思想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创作习惯也不可能一朝改变，因为长篇歌行毕竟一直

---

1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绛云余烬诗·读吴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序》，第 116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2 严荣《吴翌凤＜吴梅村先生诗集笺注＞弁言》，见吴翌凤《吴梅村先生诗集笺注》，嘉庆十九年沧浪吟榭刻本。

3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一，第 19 页，中华书局 1975 年 11 月第 1 版。

4 《尤西堂全集》:《西堂杂俎三集》卷三《梅村词序》，第 316 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129。

5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十六，第 37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

6 黄天骥《吴梅村的诗风与人品》,《文学评论》1985 年第 2 期。

7 黄宗羲《马雪航诗序》:“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夫吴歈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 《南雷文约》卷四，第 483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205。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以来都是吴伟业实践其诗史观得心应手的诗歌样式，其成功在当时已获普遍认可，并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因此，此时期他仍然沿着原来情、史并重的诗史观与创作习惯，继续创作了一部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歌行名篇，如《楚两生行》、《王郎曲》、《临淮老妓行》、《雁门尚书行》、《田家铁师歌》、《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等。旨在客观记“史”的歌行作品也未绝迹，如新题乐府《织妇词》、《木棉吟》、《海户曲》、《打冰词》、《直溪吏》、《临顿儿》等，但由于“心史”观的影响，长篇歌行创作更多的时候已不再自觉以“诗史”为动机，如《九峰草堂歌》、《通玄老人龙腹竹歌》、《观王石谷山水图歌》、《京江送远图歌》、《画中九友歌》、《题苏门高士图赠孙征君钟元》、《题刘半阮凌烟阁图》、《题江右非非子访逍遥子图》、《高凉司马行·赠孙孝若》、《退谷歌·赠同年孙公北海》、《赠文园公》、《秋日锡山谒家伯成明府临别酬赠》、《送沈绎堂太史之官大梁》、《鲁谦庵使君以云间山人陆天乙所画虞山图索歌得二十七韵》、《荡子失意行赠李云田》等等，或咏物，或题画，或写人，并不刻意以反映“世运升降、时政得失”为宗旨。也就是说，随着诗史观的转变，宜于叙事的长篇歌行已不再适合表现“心史”的情感内容，这种已经运用娴熟的诗体便被尝试用来写作一般题材的诗歌，而以抒情见长的近体诗则成为吴伟业实践“心史”观所选择的主要诗歌体式，这一点从以下征引的例子中也可看出。

确如历来论者所言，展示痛苦、拷问灵魂是吴伟业此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在其晚年的创作生涯中反复回响。但这种自责忏悔的痛苦情感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有修饰表演的成分，两种倾向互为依托，紧密纠缠在一起，体现了“心史”独具一格的抒情功能。以往论者往往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其中屡屡被后世论者用来说明其晚年忏悔心态的《过淮阴有感》二首与《临终诗》四首最为典型。其应征赴京途中路过淮阴，受淮阴地区的历史传说感发而作的《过淮阴有感》二首云：

落木淮南雁影高，孤城残日乱蓬蒿。天边故旧愁闻笛，市上儿童笑带刀。世事真成《反招隐》，吾徒何处续《离骚》。昔人一饭犹思报，廿载恩深感二毛。

登高怅望八公山，琪树丹崖未可攀。莫想《阴符》遇黄石，好将《鸿宝》驻朱颜。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联系与淮阴地区有关的典故与历史传说，抒写自己违心仕清的痛苦与愧对故国旧君的深刻自责与忏悔。先是用向秀闻笛的典故，抒发怀念故友的悽恻情怀，用韩信年轻时志向不为人知、被人侮辱的典故，暗喻被人误解的内心痛苦，表明自己变节并非“本心”，而是有难言的苦衷。所以接下来才会感叹：“世事真成《反招隐》，吾徒何处续《离骚》。”意思是说，在外力胁迫下，自己不得已忍辱违心出仕，世事真得如《反招隐》诗所说“小隐隐于陵薮，大隐隐于朝市”那样了，又于何处续写“《离骚》”以抒发忠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君爱国的心迹呢！将仕清解释为迫不得已的“大隐”，进一步表明自己身虽仕清而“心”实与那些壮烈殉难的故人一样不忘故国。在做了这样的表白解释之后，又对自己的忘恩负义之举痛加鞭笞：“昔人一饭犹思报，廿载恩深感二毛。”昔人韩信对漂母一饭之恩犹思报答，而自己如今头发已斑白，对先皇 20 年的深恩不仅无由报答，还做出了背叛之举！接着在下一首诗里甚至痛不欲生地诅咒自己“浮生所欠止一死”，发出“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这样悔恨交加地哀号，对自我灵魂的拷问可谓撕心裂肺、鲜血淋漓，的确如程穆衡所云：“君子读其二诗者，宜乎涕泪盈襟，哀思郁乱矣。”[1]让人看到的是一颗原本贞洁、美好的心灵在外界势力的摧残戕害下痛苦地滴血。痛苦与忏悔固然是吴伟业被迫“失节”后的真实心理感受，但是到如此痛不欲生、自恨不死的程度，则系经过了夸张修饰，具有一定的表演成分，联系其现实行为来看，这一点便暴露无遗。如第一章所述，吴伟业的确是不愿仕清的，也为此做过挣扎与努力，但并没有付出个人生命的勇气，他的辞荐书、辞荐诗都写得软弱可怜，只是恳求对方成全自己，丝毫没有以死抗争的意思。即使在写下这两首刻骨忏悔、自恨不死的《过淮阴有感》之后，他还怀着“白衣宣至白衣还”的希望写了《将至京师寄当事诸老四首》，乞求当政者网开一面放其归乡，仍然语气软弱，措辞委婉，表现出不愿仕清又怕清庭治罪的微妙心境。所以，此际如果真是如诗中所说痛苦、忏悔到感觉生不如死的程度，他完全可以就此归乡，以死抗争。然而，现实中他并不采取这种极有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行动，相反却正在向清朝京师行进，早已决定屈节。事实就是吴伟业根本做不到以生命捍卫气节，根本没有顾炎武、傅山等遗民那种面对征召“非死则逃”的勇气。当然，我们并不是苛责诗人未能坚守名节，只是想说明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更看重的是生命。在选择了生命之后，又会为丧失名节而痛苦愧悔，自然也是真实的心理感受，但不可能达到如此痛不欲生的程度，否则就无法解释他的言行不一。因此，诗中所写这种痛心疾首的忏悔,并非其内心情感的完全真实的记录，一半是真，一半却是经过夸张修饰后表演给别人看的，目的是让别人看到他的痛苦与忏悔，从而理解其“本心”的贞洁与无辜，给予谅解与同情，这恰是“心史”的深层创作动机。当然，由于诗歌是有感于淮阴地区的历史传说而写，这些传说中的人事恰恰又与诗人眼下境遇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在对比抒情时往往容易夸大差别的感受，所以这种夸张与诗歌所写题材也有一定关系。

正是从这种复杂的创作动机出发，从被征召之时起，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止，他反复不断地在诗歌中展示痛苦、拷问灵魂：

[1] 程穆衡《吴梅村诗集笺注》卷六，第 36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惭余亦与山公札，抱病推迁累养生。(《淮上赠嵇叔子》)

过尽九折艰，咫尺俄失坠……早贵生道心，中年负名义。蹉跎甘皓首，此则予所愧。(《送何省斋》)

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樽。(《怀古兼吊侯朝宗》)

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遣闷六首》之三)

乱离兄弟恨，辜负十年盟。(《喜愿云师从庐山归》)

过尽碧云处，我心惭隐沦。(《夜发破山寺别鹤如上人》)

……

反复不停地表白惭愧与后悔，却并不打算为此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没有断然拒绝或断然辞职之举，也没有像钱谦益晚年那样的反清复明之举，而是仍然继续“草间偷活”、“忍死偷生”。所以这种绵绵不断的自责与忏悔，有真实流露内心情感的一面，也有自我表演的一面。与此同时，他还反复倾吐希望归隐的心愿：“故园先业在，多难几时归。”(《送湘阴沈旭轮谪判深州四首》之四)“东庄租苟足，修葺好归家。”(《再寄三弟二首》其二)“与君谋共隐，为报故园春。”(《送穆苑先南还四首》其一)“待余同拂衣，徐理归田计。”(《赠家侍御雪航》)……与不愿仕清的心理一致，希望归隐的确也是其真实心愿，但他并没有诗中所言这种拂衣而归的勇气，而是一直等到有了合理借口后才安全归乡。所以当有人责问他时，他辩解道：“忽接山中书，又责以宜退。卿言仍复佳，我命有所制。总未涉世深，止知乞身易。……人生厌束缚，摆落须才气。……老夫迫枯朽，抱膝端居睡。虽称茂陵病，终乏鸱夷智。逊子十辈才，焉能一官弃。”(《送何省斋》)剖露不能断然归隐的苦衷：自己不是不想退隐，而是没有足够的才智摆脱束缚，言外之意，即惮于政治高压而不得不违心仕清。故又云：“拂袖非长策，蹉跎为老亲。”(《送田鬲渊孝廉南归》)“岂不贪高卧？其如世路非。”(《送湘阴沈旭轮谪判深州四首》之四)。很明显，他最在乎的还是个人生命的安危。所以，这些反反复复的表白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表达忏悔、剖白心迹。直到临终前，他还写了《临终诗四首》，这是为其赢得后人谅解做出巨大贡献的又一组诗：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岂有才名比照邻，发狂恶疾总伤情。丈夫遭际须身受，留取轩渠付后生。

胸中恶气久漫漫，触事难平任结蟠。块垒怎消医怎识，惟将痛苦付汍澜。

奸党刊章谤告天，事成糜烂岂徒然。圣朝反坐无冤狱，纵死深恩荷保全。

首先对自己痛失名节、愧对君亲的“罪孽”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与鞭挞，对自己“忍死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偷生”的二十余年生命历程从总体上做了“总比鸿毛也不如”的彻底否定；然后在第二、第三首中剖露二十余年来的心灵痛苦、胸中块垒。诗歌语言褪尽藻饰，和着血泪奔泻而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反省自己的一生，我们不能不说这的确是其真情的流露。他的确觉得自己“忍死偷生”的行为本身有“受恩欠债”的“罪孽”，也确实为此痛苦不已，否则就不会在诗歌中反复表白、辩解，正因有真情才会写出如此感人肺腑的诗篇。但仔细寻味，其中仍然暗藏着比宣泄痛苦、记录真实心迹更深的用心。此际，吴伟业在留给儿子的遗书《与子暟疏》中详述自己“万事忧危”的“一生遭际”，自言写作用意云：“岁月日更，儿子又小，恐无人识吾前事者，故书其大略，明吾为天下大苦人。”[1]显然他并不真心认为自己的一生完全“比鸿毛也不如”，否则其“前事”还有什么价值值得“恐无人识”呢？也就是说，诗中所表现的情感并非完全属实，至少这种“总比鸿毛也不如”的忏悔与自责是经过修饰夸张的。那么他想让后人知道什么呢？即其不幸遭际背后的苦衷——“吾为天下大苦人”，而诗歌创作恰是他所选择的展示内心苦衷的主要手段，若“心”不被后人理解，那才真得是“总比鸿毛也不如”。所以诗歌所写“心史”，有真情的流露，也有修饰表演的成分，目的同样是希望后人谅解。这种微妙的创作动机，通过组诗的最后一首也可略窥一二。诗中对清朝“圣朝反坐无冤狱，纵死深恩荷保全。”的感激，与前面所写后悔仕清的情感显然是矛盾的，的确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为身后计，为子孙计。因为故国旧君之思的另一面就是对新朝新君的不满或仇恨，对仕清经历如此痛苦忏悔，至少会表明他对新朝是反感的。对诗祸、史祸，尤其是陆銮告讦（“奸党刊章谤告天”即指此事）心存余悸的吴伟业自然明白，一旦引起清庭的怀疑或不满，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才在这里掩饰自己对清朝的不满。这种矛盾心理至少说明，吴伟业写作此诗时是有所担心、有所顾忌的，心中清楚地想着身后事。尽管害怕遗害身后，但还是要将自己的忏悔、痛苦写出来，说明他对这种情感之表现非常重视，决不单单为了宣泄痛苦、记录内心感受，更是为了展示给后人看，向后人剖白自己的苦衷。同时也说明，这种情感是有所修饰或夸张的，否则，在极度痛苦的心境下，是不太可能想到什么后果的。当然，这种用心良苦的自我剖白，又充分体现了他在名节观念制约下所遭受的心灵折磨。吴伟业这部“心史”从总体上说是真实的，那就是他让后世看到了一位真实的“大苦人”，但“大苦人”的“苦衷”却是软弱之志与失节之痛所导致的心灵折磨，而之所以要将此种心灵折磨暴露给人，则是其强烈的求名之心所左右的，有为挽回“贰臣”形象而美化诗歌抒情主人公的一面。

在展示痛苦、拷问灵魂的同时，吴伟业此时期诗歌创作还不断为自己的失节行为

[1] 《吴梅村全集》卷第五十七《与子暟疏》，第 1133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作辩解，反复表白自己的“本志”，如顺治十年准备接受征召前后所作《自叹》：

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压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鼓枻有心逃甫里，推车何事出长干。旁人休笑陶弘景，神武当年早挂冠。

由于曾经的高官、盛名给他带来了被征召的命运，所以是“误尽平生”的累赘。他悲哀无奈地向读者倾诉：松竹犹能历风霜而不改，鱼鸟尚且希望在宽广的天地里自由生活，我又怎么愿意丧失名节、自投罗网去清朝做官呢！用陆龟蒙隐居甫里与陶弘景挂冠神武门的典故，进一步表明自己真心归隐、无意仕清的“本志”。诗歌通过“自叹”让人看到了诗人在外力压迫束缚下悲愤无奈的心灵。又如赠诗同时被征却“独得不至”的房师周廷鑨云：“但若盘桓便见收，诏书趋迫敢淹留。”（《寄房师周芮公先生四首》其三）赠诗由京师致仕的何采云：“纵抱凌宵姿，萧条斧斤畏。时命苟弗谐，贫贱安可冀。”（《送何省斋》）赠诗乙酉避乱时曾接待过自己的吴青房云：“天意不我从，世网将人驱。……一官受逼迫，万事堪唏嘘。”（《矾青湖》）赠诗因遭贬谪而有“故乡思”的吴雪航云：“群公方见推，雅志安得遂？”（《赠家侍御雪航》）……诗歌反复解释自己仕清的原因：清朝从“群公”到皇上的驱迫，忠孝不能两全的无奈，时命、天意的捉弄……如前面第一章所述，这些外在原因的确客观存在，但都不是决定性因素，行为的最终决定者只能是其本人。譬如其房师周廷鑨，同样官高名大，且与之同时被征，就能够冒着生命危险断然拒绝，吴伟业在《寄房师周芮公先生四首》诗序中也曾羡慕地说：“师以同征，独得不至。”而他本人却做不到，根本原因显然在于他没有为此牺牲生命的勇气。所以这些反反复复地解释与表白，固然是不得已心情的流露，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为获得后人谅解所作的自我开脱、自我辩解，甚或是对自己软弱人格的掩饰，同样体现了“心史”复杂的创作动机与多层次的抒情功能。

其实，这种微妙的自我表白，甚至修饰表演的创作现象，在明清之际另外一些文人那里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譬如主动降清的龚鼎孳，也时时在创作中流露故国之思、失身之悔，如《游子岁晏，冰雪载涂，盎粟行尽，饥驱无所，见杜子于皇乞食诗，恻然心伤，为赋反乞食诗用渊明原韵》其五：“贫贱岂不贵，恨吾离去之。失身志肥甘，温饱复我辞。”《湖彦远归武林，吴梅村纪伯紫各有诗赠别，漫步原韵二首》其二：“太息平生心，艰难顿成负。”[1]又如《和答黄美中寄怀》、《咏怀诗　闲居无事记咏写情用阮公原韵得四十六首》、《秋怀诗二十首　和李舒章韵》等等，尽管强烈程度远远无法与吴伟业相比，但向后人表白心迹的用意却十分明显。他在给吴伟业的信中就曾明确

[1] 文中所引龚鼎孳诗，均出自《龚芝麓先生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3卷，集部·清别集，书目文献出版社。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示：“空言一线，犹冀后世原心。”[1]又如钱谦益，不仅实际参预了东南遗民的反清复明运动，还自觉将这些活动写进诗里，《投笔集》的一百零八首诗歌即写此内容，其中有一百零四首是次杜甫《秋兴八首》之韵，明确以“诗史”自任：“孝子忠臣看异代，杜陵诗史汗青垂。”[2]他自然知道泄露这种“反叛”行为与意图会有什么危险，所以为了掩清人耳目，这类作品都写得非常曲折隐晦。虽然隐晦，但若肯仔细推敲，又足以让人看到潜藏在文字背后的抗清行动与志向，鲜明地体现了欲图“晚盖”的动机。即使勇于以生命捍卫名节的顾炎武，也未尝没有表演的动机。王冀民先生即曾提出质疑：“亭林缅怀唐、桂，为何终生未作西南之游？志存恢复，为何未见密谋抗清之实据？人皆谓亭林刚严方正，为何常与清朝官员往还？深恶降臣，为何仍交史庶常与程工部？鸿博既举，为何特恕潘、李且不废《广师》？至于责人坚守志节，而己则剪发易服；避用清朔，而仍用康熙年号，尤不可解。”其实，这种言行不一的矛盾并非“集夷清、惠和于一身”[3]所能解释得了的，我们并不怀疑亭林先生忠于故国的诚心，但为留给后人一个完美的遗民形象，其诗文同样有修饰表演的成分。

那么导致他们以诗文自饰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中国传统以气节区分君子与小人的论人标准，尤其是“夷夏之防”观念的影响。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严于君子、小人之辨。“君子”作为完善的伦理道德人格的化身，是千百年来文人志士不懈追求的理想人格，而作为它的对立面，“小人”则为人所不齿。在此论人标准中，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价值，被强调到远远超越了人的生命本身，孔子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4]朱熹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5]这种道德律令同时也是华夏民族认同的符号，自宋代以来“夷夏之防”的观念尤为严格。如前所述，吴伟业等饱受正统文化熏陶，尤其是明代名节教育影响的士大夫，同样具有强烈的伦理观念与严格的“夷夏之防”思想。按他们的道德观念，“君子”身遭易代，“死社稷”、“君亡与亡”应是天经地义的选择，其次也要坚守遗民志节、自外于新朝，更何况明清易代不同于寻常的改朝换代，而是意味着华夏文明沦丧的“以夷变夏”。因此，其时清议、士论对士人节操的要求尤为苛刻。不仅失节者遭人唾弃，即使不肯仕清的遗民，也往往动辄遭受非议，如傅山之拒征不可谓不坚决顽强，顾炎武犹谓“即青主中书一授，反觉多此一番辛苦。”[6]其时士论之严苛于此可见一斑。在如此严厉的论人标准面前，不仅吴伟业、钱谦益等为个体生命而牺牲道德信仰的失节者，会受到

---

1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八《梅村诗话》，第 1139 页。
2 《牧斋杂著》:《投笔集》卷上，第 4 页，《钱牧斋全集》本，《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3 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自序》，第 4 页，中华书局 1998 年第 1 版。
4 邢昺等《论语注疏》卷一五《卫灵公第一五》，第 2517 页，《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第 1 版。
5 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二十六《与陈师中书》，第 1127 页，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
6 《顾亭林诗文集》卷三《与苏易公》，第 207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 8 月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个人灵魂与社会舆论的双重谴责，从而为了自我心灵安慰、开脱失节罪责而以诗文自饰，即使顾炎武、黄宗羲等声名卓著的遗民，也往往难以自安，因为现实中他们也做不到完全践履如此苛刻的道德准则。顾炎武就曾多次流露对“清议”、“评论”的顾虑，如《与潘次耕札》关心地询问自己被荐举之事“得超然免于评论否？”《与原一公肃两甥》：“……若欲我一见当事，必谤议喧腾，稚珪之移文，不旬日而至于几案矣。”《与李子德》则劝勉被强行荐举的李天生：“鸿都待制，似不能辞，然陈情一表，迫切呼号，必不可已；即其不伸，亦足以明夙心而谢浮议，老夫惓惓者此也。”[1]由此可见其某些言行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为了塞“浮议”而博声名。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会有前述言行不一的矛盾，为何在晚年手订诗文时，将自己与贰臣曹溶、孙承泽往来的有关作品全部剔出了。[2]正是这种严厉的论人标准，导致了吴伟业等人肉体与灵魂的分裂，从而促成了这种自饰现象的产生。其次，传统知人论世观的影响。在传统知人论世批评中，“人”与“文”总是一致的，认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即所谓“文如其人”。那么反过来，是否有什么样的“文”就有什么样的“人”呢？熟悉知人论世观的人，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一点。正是“文如其人”与“人如其文”的交互影响，最终促成了这种自饰现象的产生。因为深知“文如其人”道理的文人们，谁都不想在历史上，尤其是自己的诗文中留下不光彩的形象，而是宁肯按照自己所希望成为的形象来塑造自己，那么后人从“文如其人”的角度知人论世时，所看到的“人”就是与其文一致的“人”了。但事实表明，许多情况下是“文不如其人”的，元遗山先生早已指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仍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3]这一点，吴伟业等人肯定更清楚。由此便引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作者现实形象与诗文中形象不一致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将“人”与“文”统一在一起，从而使之符合“人如其文”的批评原则呢？吴伟业给出的解决方法是将“人”的现实行为与“本心”（或称“本志”）区分开来，赋予“知人”以知“心”的内涵，主张“知人”要透过表面行为探寻作者的“本心”。也就是说，诗歌写的是作者表面行为背后的“本心”，这正是吴伟业“史外传心之史”命题的理论出发点。这样以来，“人”与“文”的关系问题便迎刃而解，并从理论上为这种自我修饰提供了合理依据。关于吴伟业这一批评观念，文章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这种以诗文自饰的创作现象说明，吴伟业并未继承晚明以“真”为美、追求表现自我真实的文学观。与这种自我修饰的创作观念截然不同，学界所说的晚明性灵文学

---

[1] 《顾亭林诗文集》第168、215、210页，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

[2] 顾炎武与曹溶、孙承泽的关系参见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顾炎武、曹溶论交始末”与“清初的遗民与贰臣——顾炎武、孙承泽、朱彝尊交游考”部分。

[3] 贺新辉辑注《元好问诗词集》卷十一《论诗三十首》其六，第453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1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思想，从徐渭、李贽到公安派，再到竟陵派，都以“真”作为衡量文学的首要标准，主张诗文真实地表现自我而反对文饰，甚至以“癖”、以“疵”为美。如代表公安派主要诗学主张的诗论名篇——袁宏道《叙小修诗》云：“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庇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1]因为“疵处”多为“本色独造语”，即作者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以疵为美，实际上便是以真为美，而这种美实际上便是以不完善为美。”[2]与吴伟业同时而深受晚明性灵文学思想影响的张岱亦尝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3]一个人有“癖”、有“疵”才见出其有深情、有真气。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观，他在诗文创作中毫不讳言自己的弱点或缺陷。如他的《自为墓志铭》总结自身各种各样的“癖错”：有“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的癖好；有“七不可解”；“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坦言自己在国亡后“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4]写得何等真实！在明清交替的背景中，始终坚守遗民志节，并且投身明史事业的张岱，满可以象顾炎武等人一样以气节高自标榜，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甚至坦然承认自己未能以死殉国是因为“忠臣邪怕痛”。[5]而如前所述，吴伟业为自己的失节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却极少说怕杀头这一根本原因。与张岱相比，其自我开脱、自我掩饰的意图更可谓一目了然。很明显，他不具备张岱这种表现自我之真实面目的创作精神，并未接受晚明以“真”为美的文学观，而是仍受传统“载道”观的制约。

当然，这并不是说吴伟业此时期所有抒写内心感受的诗歌创作都是夸张修饰后给人看的。从前面所举例子也可看出，这种现象往往是在某些特殊创作情境，如写给他人、与他人(或古人)相比较、排解舆论或道德压力等情境下才会有的。事实上，此时期许多自抒怀抱的诗歌都是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如在应征北上的途中，他一路触景伤情，留下了许多自抒内心感受的诗歌。如《旅泊书怀》：“已遇江南雪，须防济北冰。扁舟寒对酒，独客夜挑灯。流落书千卷，清羸米半升。征车何用急，惭愧是无能。”他感到应征的路途是如此艰难，在江南已遇大雪，眼下又要提防河水结冰。在这寒冷的冬夜里，独自一人在一叶孤独的扁舟中挑灯对酒，感伤身世。清廷的征召何必这么急呢，惭愧的是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摆脱这一遭遇。只有在伤心人眼中，景象才会如此冰冷、孤独。又如《新河夜泊》、《江楼别幼弟孚令》、《临清大雪》、《远路》、《清江闸》、《任丘》等诗，皆触景伤怀，真实地抒写了身世不能自主的内心悲伤。又如一些针对

[1] 钱伯诚《袁宏道集笺校》，第187－1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版。
[2]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第7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3] 夏咸淳《张岱诗文集》:《瑯環文集》卷四《五异人传》，第2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版。
[4]《张岱诗文集》:《瑯環文集》卷五《自为墓志铭》，第294－2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版。
[5]《张岱诗文集》:《瑯環文集》卷五《自题小像》，第3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客观时事而作的诗歌，也往往以抒写个人对时事的真实心理感受为主，同样情余于事。如为“丁酉科场案”而作的歌行名篇《悲歌赠吴季子》一改昔日歌行的缠绵悱恻，而是直抒胸臆，一韵到底，调急声促，回肠荡气。吴季子即吴兆骞，为江南名士，少负才名，吴伟业曾誉之为“江左三凤凰”之一，为“南闱”科场案所株累，顺治十五年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宁古塔。诗歌开篇便是呼天抢地的沉痛浩叹：

>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词赋翩翩众莫比，白璧青蝇见排抵。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绝塞千山断行李。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

悲愤之情喷发而出，“君独何为至于此”的诘问尤为尖锐、深刻，意味着吴兆骞的悲惨处境绝非其个人行为所应导致的后果，而是被蜚语牵连、蒙受了不白之冤：“白璧青蝇见排抵”，并且一旦陷入这一冤案就再无辩白和解脱的余地——“上书难自理”，矛头暗指着清朝打击、迫害汉族士人的血腥政策。接着以夸张的笔调、奇险的笔法描写诗人想象中宁古塔阴惨、恐怖的景象，渲染、烘托诗人与流人共同的悲苦心境。诗歌最后以愤激的呐喊作结：“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里，作为读书人的吴伟业却喊出了“生男聪明慎勿喜”、“受患只从读书始”的警句，实令人热耳酸心，不忍卒读！这绝不是为吴兆骞一个人的不幸而悲愤，也是其个人长期以来胸中积愤的倾泻，他本人的不幸同样是因为有了聪明才华，读书为官、浪得浮名，所以一直都在感叹“盛名为不详”（《秋胡行》）、“浮名悔已迟”（《病中别孚令弟》其六），而这样的不幸如今又在吴兆骞等大批文士身上重演，所以又是为清政府残酷镇压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的不幸而悲愤。又如同样为此次“科场案”所作的七古《赠陆生》、《吾谷行》、七绝《送友人出塞二首》，为“嘉定钱粮案”所写的五律《送王子惟夏以牵染北行四首》、七律《别维夏》，为“奏销案”所写的七古《短歌》，为“海宁之狱”所写《咏拙政园山茶花》、《赠辽左故人八首》、《寄怀陈直方四首》等，无不情余于事，真实地传达了个体对时事的心理感受。

总之，是情、史并重之“诗史”观向“心史”观的转变，促使“梅村体”表现重心由外在历史转向了心灵历史，由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转变为抒情以记录心史，并且在明清之际复杂的时代境遇与个人不幸遭际的激发下，发展了多层次的表现功能，进一步丰富、深化了“心史”观的内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二节　“诗史”观向戏曲的渗透

关于吴伟业戏曲创作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往往强调戏曲对“梅村体”的单向影响：一是题材上，“梅村体”诗歌多选择宫廷、妓女、艺人等戏曲常用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题材。二是创作手法上，“梅村体”诗歌借鉴了戏曲纵横捭阖的叙事技巧，并对二者在创作中呈现出的一致特征作了细致的比较分析。[1]但笔者认为二者创作风貌高度一致的根本原因是“诗史”观向戏曲的渗透，即传“心”、传“史”的相同创作宗旨。在以诗歌为中心的文学传统中，吴伟业与古代许多其他曲论家一样，特别强调戏曲与诗、词的同源同质，如《杂剧三集序》云：“汉、魏以降，四言变为五七言，其长者乃至百韵。五七言又变为诗余，其长者乃至三四阕。其言益长，其旨益畅。唐诗、宋词，可谓美且备矣，而文人犹未已也，诗余又变而为曲。……传奇、杂剧，体虽不同，要于纵发欲言而止。”[2]认为诗歌自汉、魏以来，由四言变为五七言，又由五七言变为“诗余”，由“诗余”又变为曲，其间只是篇幅越来越长，主旨表达越来越酣畅，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不仅仅是借此提高戏曲的地位，而且用于指导创作实践。其友尤侗曾这样描述其诗、词、曲创作的关系：“今读其七言古、律诸体，流连光景，哀乐缠绵，使人一唱三叹，有不堪为怀者。诸曲亦于兴亡盛衰之感，三致意焉。盖先生之遇为之也。词在季孟之间，虽所作无多，要皆合于国风好色、小雅怨诽之致。故予尝谓先生之诗可为词，词可为曲，然而诗之格不坠，词、曲之格不抗者，则下笔之妙，古人所不及也。”[3] 即指出了其诗、词、曲相通的一面：都以抒写兴亡盛衰为主题，皆合乎风雅之旨。此种特征，实质即其“诗史”观之呈现。关于梅村词作的“诗史”性质，前人已多有论述，[4]所以笔者不再赘论，而是主要探讨“诗史”观向戏曲的渗透。

吴伟业三部剧作均作于明亡至仕清这一时期内，[5]正是“梅村体”长篇诗史创作的

1　裴世俊《吴梅村诗歌创作探析》（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 版）“明代传奇的影响渗透”一节，叶君远《吴伟业评传》（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中关于梅村体“富于故事性戏剧性”特点的分析，都谈到了戏剧对“梅村体”的影响这一问题。

2　《吴梅村全集》卷六十，第 1211 页。

3　尤侗《尤西堂全集》：《西堂杂俎三集》卷三《梅村词序》，第 316 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129。

4　如孙豹人：“以史料为词料，是梅村长技。”曹顾庵：“少陵称‘诗史’，如祭酒可谓‘词史’矣。”靳荣藩评其小令《望江南》曰：“有明兴亡，俱在江南，固声名文物之地，财赋政事之区也。梅村追言其好，宜举远者大者，而十八首中止及嬉戏之具、市肆之盛、声色之娱，皆所谓足供儿女之戏者，何欤？盖南渡之时，上下嬉游，陈卧子谓其‘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梅村亲见其事，故直笔书之，以代长歌咏叹。十八首皆诗史也，可当《东京梦华录》一部，可抵《板桥杂记》三卷，或认作烟花账薄，恐没作者苦心矣。”（皆见《吴梅村全集》所录评语）

5　关于三剧作期，目前所见唯一可靠的材料是顺治十年李宜之所作的《秣陵春序》，其中曾提到：“别有杂剧几种”，据此可以确定三剧皆作于顺治十年以前；又三剧皆以抒发亡国之痛、故国之思与兴亡盛衰之感为主题，故必为明亡后所作。各剧具体创作时间目前尚难确考，叶君远《年谱》已将《秣陵春》下限提前为顺治八年，《通天台》下限提前为顺治六年；朱则杰《秣陵春作期新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2 期）、黄果泉《吴伟业传奇、杂剧撰年考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0 年第 6 期）等虽然将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但并未找到可靠的证据。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高潮期，在诗、词、曲同源同质的文体观念影响下，此时已深入潜意识层的“诗史”意识也渗透到了戏曲创作中，使之亦具有鲜明的传“心”、传“史”倾向，从题材的选择到情节的结构与安排均可看出这一点。

首先，从题材的选择来看，三剧均取材于历史，以历史上与明清易代相似的朝代更迭为背景，以此中人物的命运遭际与情感经历为主题。吴伟业曾在《北词广正谱序》中这样解释人们创作戏剧的原因：“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概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于是乎热腔骂世，冷板敲人，令阅者不自觉其喜怒悲欢之随所触而生，而亦于是乎歌呼笑骂之不自已。”[1]根据这一解释，他本人选择上述历史题材显然有两个目的：一是借古人之“歌呼笑骂”抒写郁积于胸中、“无所发抒”的“无聊不平之概”与“抑郁牢骚”，即亡国之痛、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悲；二是“热腔骂世，冷板敲人”，借历史折射现实，表现个人及当事人的感受与认识，并以此警醒、感发世人。如《秣陵春》传奇以南唐的灭亡为背景，写南唐学士徐铉之子徐适与南唐临淮将军黄济之女黄展娘，在后主李煜与其妃、黄济之妹黄保仪鬼魂撮合下的爱情故事，全剧重心是因“家国飘零，市朝迁改”而“栖迟不仕”的江南才子徐适的个人命运遭际。徐适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原为北宋末徐徽言从孙，在抗金斗争中殉国，事迹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七《徐徽言传》。吴伟业有意将他写成南唐学士徐铉之子，目的就是通过对南唐亡国的凭吊，寄托个人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又如《通天台》杂剧以南朝梁的灭亡为背景，写梁尚书左丞沈炯，在梁亡后羁留北方，凭吊汉武帝通天台遗迹，述己亡国之痛与沦落之悲，梦中被汉武帝召用，力辞出关。敷演《陈书·沈炯传》“以母老在东，恒思归国。……尝独行经汉武通天台，为表奏之，陈己思归之意。”[2]《临春阁》杂剧则取材于《隋书·谯国夫人传》与《陈书·张贵妃传》，通过冼夫人受知贵妃张丽华、发兵勤王等事写南朝陈的亡国史。三剧的历史背景均与吴伟业由明入清的时代背景十分相似，皆是南方小朝廷被北方国家灭亡。剧中人物的命运遭际亦与吴伟业本人及其同时人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我们不应该将剧中“历史”一一坐实为明清之际的史实，也不能将剧中人物一一坐实为明清之际的现实人物，如以《临春阁》之冼夫人为明末女将秦良玉，以陈后主为弘光帝，以冼夫人对文武将官的讽刺“毕竟妇人家难决雌雄，则愿你决雌雄的放出个男儿勇”为讽刺左良玉；以《通天台》之梁武帝比崇祯帝；以《通天台》之沈炯、《秣陵春》之徐适为吴伟业本人，但作家以历史折射现实的用意的确十分明显：剧中“历史”有着明清易代的影子，剧中人物有身历

[1] 《吴梅村全集》卷六十，第 1213 页。
[2] 姚思廉《陈书》卷十九《沈炯传》，第 254 页，中华书局 1972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鼎革者的影子，更有作者本人的影子，是作者从自身所处时代背景、个人身世与情感经历出发，对易代之际历史与个人生存状态的普遍思考，此即“诗史”观之呈现。吴伟业本人在《秣陵春序》中解释此剧创作动机云：“余端居无聊，中心烦懑，有所彷徨感慕，仿佛庶几而将遇之，而足将从之，若真有其事者，一唱三叹，于是乎作焉。是编也，果有讬而然耶？果无讬而然耶？即余亦不得而知也。”[1]认为若有人以其所写“幽婚冥媾”、“非形非影”为荒诞不经，则是“夏虫不可语冰”，即未理解其真正用意，明确点出了作品的寓讬之旨。他还在《杂剧三集序》中说：“余以为曲亦有道焉：世路悠悠，人生如梦，终身颠倒，何假何真？若其当场演剧，谓假似真，谓真实假，真假之间，禅家三昧，惟晓人可与言之。”[2]同样认为戏曲以反映现实为宗旨：故事本身虽是虚构，但其反映的世态、人情却是真实的，与诗、词、文等其他文体并无本质区别。

其次，从情节的结构与安排来看，也明显可以看出作者借历史折射现实，以古人古事传今事今情的创作动机。传奇《秣陵春》写徐、黄二人的爱情故事：南唐灭亡后，徐适与黄济在秣陵比邻而居。徐适藏有李后主赐予其父的玉杯，黄济藏有黄保仪所赐宝镜，由女儿黄展娘保管。在仙人耿先生的操纵下（受李后主、黄保仪鬼魂之托），徐适玉杯与展娘宝镜交换，二人各在镜、杯中看到对方身影，彼此爱悦。后在耿先生诱导下，徐适与展娘之魂在冥界后主宫中结成“仙婚”。婚后又被送回人间，在“仙机播弄”下，几经周折，徐适得中新朝状元，终与展娘结成“真婚”。故事明显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是现实中徐、黄二人奇特爱情的发生、发展过程；二是在冥界，耿先生操纵二人爱情发生、发展的过程。而前者完全受控于后者，致使故事过于荒诞离奇，头绪繁多，结构松散，徐适、展娘作为爱情主人公的形象也不够鲜明、丰满。全剧虽然以爱情故事为构架，但描述重心却不在二人相恋相悦的过程，而是通过徐适的个人遭际以及促使爱情产生、发展的外部因素，极力凸现鼎革变迁的历史背景，抒写徐适及其他先朝遗民的兴亡之感与身世之悲。譬如主人公徐适，作为爱情角色的形象虽然不够丰满，但作为亡国遗民的形象却十分鲜明。作者不惜花费大量笔墨让他直接抒发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如其出场引子［瑞鹊仙］：“燕子东风里。笑青青杨柳，欲眠还起。春光竟谁主？正空梁断影，落花无语。凭高漫倚，又是一番桃李。春去愁来矣，欲留春住，避愁何处？”第十一出《庙市》参拜李皇庙时所唱［中吕过曲·泣颜回］：“薛壁画南朝，泪尽湘川遗庙。江山余恨，长空黯淡芳草。临风悲悼，识兴亡断碣先臣表。过夷门梁孝台空，入西洛陆机年少。”第二十出《遇猎》中被独孤荣赶出洛阳城后所唱［仙吕过曲·二犯傍妆台］：“叹苍皇，一身流落向何方。世路情何薄，漂泊怨谁行。穷途马蹄须信步，被酒悲歌到北邙。恨添潘鬓，愁深庾肠，断鸿声里立斜阳。”等等，

[1]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二，第 728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六十，第 1212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感慨时事，悲悼故国，凭吊一身，反复抒发兴亡之感。剧中其他正面人物也多是先朝遗民，如黄济是南唐外戚，其命运更是与南唐紧密相联，鼎革后家道衰落、门庭萧索，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同样深刻，其出场引子［满庭芳］云："恩泽通侯，勳资名将，江东门第金、张。歌钟零落，花没旧昭阳。老去悲看故剑，记当年、笳吹横江。伤心处，夕阳乳燕，相对说兴亡。"回首往昔之显赫，伤悼今日之零落，一家人皆沉浸于"椒华旧望，往事如天上"（第三出［绕地游］）、"朱门洞敞，全不似旧时情况"（第三出［玉山供］）的家国与身世感伤中。又如曹善才是南唐仙音院服侍后主的琵琶乐工，他在剧中并无重要活动，其存在与否对剧情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作者却单独为他安排了两出戏：第六出《赏音》、第四十一出《仙祠》，内容就是抒发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代言的用意尤为显豁。其思念故国旧君的情感甚至比徐适更加纯粹、深沉，如其出场［西江月］一词云："忆昔华清供奉，琵琶弟子征歌。宫声不返羽声多，演《念家山》入破。　　又是江南好景，落花时节经过。相逢莫唱《定风波》，一曲《懊侬》谁和。"追忆亡国历史，不胜兴亡之叹。而整个第六出《赏音》即以曹善才弹唱亡国悲痛为主，［北骂玉郎带上小楼］：

小殿笙歌春日闲，无人处，整翠鬟。楼头吹彻玉笙寒，注沉檀。低低语影在秋千。柳丝长易攀，柳丝长易攀。玉钩手卷珠帘，又东风乍还，又东风乍还。闲思想朱颜凋换，禁不住泪珠无限。知犹在玉砌雕阑，知犹在玉砌雕阑，月明回首，春事阑珊。一重山，两重山，想故国依然。没乱煞许多愁，向春江怎挽。

又［前腔］：

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苦，枫叶丹。别时容易见时难，莫凭阑，遥望见，初雁飞还。听花边漏残，听花边漏残。梦中一饷贪欢，叹罗衾正寒，叹罗衾正寒。回想着嫔妃鱼贯，寂寞锁梧桐深院。现隔那无限江山，现隔那无限江山，叹落花流水，天上人间。菊花开，菊花残，双泪潸潸。几时得旧红妆花前再看。

隐括李后主词成歌，描述满目凄凉的亡国景象与触目伤心的故国情怀，曲文优美典雅，凄楚哀怨。整个第四十一出《仙祠》则写他在李皇庙中为徐适、李后主（仙）等人弹唱往事，伤今吊古，沉郁感慨。大篇幅地抒写伤悼故国之情，固然有助于渲染国败家亡的感伤气氛，然而将人物刻画成亡国遗民的形象，最终却使一个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变了味道，实际上是作者抒写个人心志以传"史"的需要。所以吴梅云："吴梅村所作曲，如《秣陵春》、《临春阁》、《通天台》，纯为故国之思，其词幽怨悲慷，令人不堪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卒读。余最爱《秣陵春》，为其故宫禾黍之悲，无顷刻忘也。”[1]吴伟业在全剧结尾自题一律：“词客哀吟石子冈，鹧鸪清怨月如霜。西宫旧事余残梦，南内新词总断肠。漫湿清衫陪白傅，好吹玉笛问宁王。重翻天宝梨园曲，减字偷声柳七郎。”写的就是自己填词时的内心感受：回首往事，肝肠寸断，即悲故国之覆亡，又叹自身之沦落。其《金人捧露盘·观演＜秣陵春＞》词云：“记当年曾供奉，旧《霓裳》。叹茂陵、遗事凄凉。酒旗戏鼓，买花簪帽一春狂。绿杨池馆，逢高会、身在他乡。　　喜新词，初填就，无限恨，断人肠。为知音、仔细思量。偷声减字，画堂高烛弄丝簧。夜深风月，催檀板、顾曲周郎。”亦直接点明本剧寄托家国与身世之感的宗旨，即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杂剧如《通天台》仅两折，写沈炯国破家亡、流落穷边，后来在梦中遇汉武帝的故事，明显缺少戏剧应有的情节冲突，作者借人物立言，自抒心志、自伤身世的用意尤为明显。如第一出《沈左丞醉哭通天台》写沈炯因“国覆荆、湘，身羁关、陇”而愁肠万斛、悲痛欲绝，自述亡国之痛与身世之悲，追问与思考梁朝灭亡的原因。如其上场词［忆秦娥］：“愁脉脉，江山满目伤心客。伤心客。长干梦断，灞桥闻笛。　　天涯梦断看衰白，秦川对酒青山湿。青山湿。冷猿悲雁，暮云萧瑟。”［赚煞尾］云：“则想那山绕故宫，寒潮向空城打，杜鹃血拣南枝直下。偏是俺立尽西风搔白发，只落得哭向天涯。伤心地付与啼鸦，谁向江头问荻花。难道我的眼呵，盼不到石头车驾，我的泪呵，洒不上修陵松槨，只是年年秋月听悲笳。”亡国之痛与身世之感融合在一起。他为梁朝的灭亡呼地问天，［天下乐］：“好教我把酒掀髯仰面嗟，你差也不差？怎的呀，做天公这等装聋哑。文书房停签押，帝王科没堪查，难道是尽意儿糊涂罢？”［一半儿］：“为甚的，姓萧骨肉没缘法，这丢儿有些亏心大。锦片样江山做一会儿耍。”通过将汉武帝与梁武帝作比较，苦苦思索朝代更迭、历史兴亡的根由：汉武好仙，梁武好佛，聪明才智没一件不是相同的，虽然最终“两代铜驼，都化做一抔黄土”，但梁武苦行修持，汉武雄心潇洒，汉武一生享用，梁武日诵《楞伽》，“这一个落得个收场结果，那一个为甚的破国亡家？”汉武“娶皇后，还落得个小舅子，做得大将军；祖公讬梦，撞着个妄男儿，恰好是头厅相”，梁武“以天下兵马委邵陵诸王，自家儿子见父亲饿得这样田地，还不肯出力”，所以“天下事那一样不是侥幸来的？”言外之意，国家兴亡固然“理数昭然”，但亦取决于人事。譬如梁朝的短命，无非因为朝廷无汉朝那样的将相，而武帝的儿子们眼看着武帝被困“偏不肯把兵来救搭，各自己称孤道寡”，自相残杀，将“锦片样江山做一会儿耍”，分明折射出明末腐朽的社会现实。正是江山鼎革的悲剧历史造成了沈炯个人的悲剧命运：“便是我沈初明半生沦落，只有这场遭际。王太

[1] 吴梅《顾曲麈谈》，第 11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慰教我草平贼表章，七官家虽号忌才，毕竟篇篇嗟赏。若遇汉武好文之主，不在邹、枚、庄、马下矣。今者天涯衰白，故国苍茫，才士轗轲，一朝至此。正是往时文彩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岂不可叹！”国破家亡的历史变迁，致使沈初明满腹才华无处施展，昔日风光一去不返，眼看着新朝新贵“田、窦豪华，卫、霍矜夸，僮仆槎枒，歌笑淫哇”，他却憔悴沦落，“不尴不尬”。这正是作者个人“畴昔文章倾万乘，道旁争欲识名姓。……憔悴而今困于此。”[1]之身世命运的写照，也是鼎革之际众多才士的共同写照。又如《临春阁》共四折，从关目的安排：“冼夫人锦缵通侯”、“张贵妃彩笔词头”、“青溪庙老僧说法”、“越王台女将边愁”就可看出，并无贯穿全剧的主线，也未形成集中的矛盾冲突，一出写一事，结构随意，情节散漫。主要通过张丽华与冼夫人君臣遇合的故事，反映陈朝的灭亡过程及灭亡的种种原因。如陈后主终日沉醉，不理政事；朝中臣宰不仅庸碌无为而且“左班挤轧右班，后手挨幫前手”；文官们对上钻官讨缺，对下诛求无厌，以致频频激变；军兵们畏难畏苦、畏敌如虎；隋军过江后，陈朝军队更是不战自溃，文武大臣最终还把亡国的责任推卸到女人头上。这固然是针对陈朝而写，但也明显折射出明末社会的种种弊端如朋党之争、政治腐败、君臣昏庸等等，其灭亡过程与南明弘光朝的覆亡极为相似。也正是因为陈朝的衰亡，冼夫人与张丽华纵然一武一文才艺绝伦，却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冼夫人为报张贵妃知遇之恩而入山修道，在解甲时叹道：“咳！我六州节度使，还家去做个老妪，岂不可叹！”而文采风流的张丽华则被冠以“女宠乱朝”的罪名含恨殒命。同样体现了作者借陈亡历史写明亡现实，总结亡国原因及易代之际个体生存状态的创作意图。总之，从这样的情节结构与安排不难看出，吴伟业的戏剧创作，真正用意并不在结撰故事本身，而是借历史折射现实、以古人古事传今事今情。而无论是抒写个人心志以传“史”，还是总结衰败原因以明“史”之兴衰根由，皆“诗史”观之呈现。

但从戏剧的角度而言，吴伟业剧作并非成功作品。他还没能将剧中故事与历史兴亡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为了表现个人情绪、反思历史兴亡，作品往往忽视故事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客观思想内涵，致使结构过于松散，有些情节甚至游离于故事之外，人物形象更接近作者自我形象而不够鲜明丰满，曲词、宾白都过于典雅，具有明显的诗化倾向而不大适合舞台演出，因此被后人称为“案头之曲”。而反过来，由于故事框架的限制，作品对历史兴亡的表现也受到很大影响。譬如同样是借男、女主角的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秣陵春》传奇与稍后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相比，无论是对历史过程的把握，对历史兴亡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戏剧结构的编织，前者都比不上后者。《桃花扇》的男、女主角本身就是南明兴亡的实际承担者。男主人公侯方域作为东林

[1] 《吴梅村全集》卷十《遣闷六首》其三，第 260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子弟、复社名士，亲身参加了反阉党的斗争和史可法幕府，以他的活动为线索就可以集中地反映南明王朝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而女主人公李香君作为秦淮名妓，以她的遭遇为线索又正好可以反映南明王朝的苟且偷安、腐化堕落。所以他们的悲欢离合始终与南明王朝的社会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爱情故事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南明王朝的兴亡过程。恰如第二十一出《媚座》总批所言："上本之末皆写草创争斗之况，下本之首皆写偷安宴游之情。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通过侯、李的爱情故事，有条不紊地展现了南明王朝从草创到灭亡的整个过程，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明朝覆亡的原因：国家危难当头，阮大铖、马士英等阉党余孽生活上苟且偷安、腐化堕落，政治上把持权位、排斥异己、自相残杀，而代表复社文人的侯方域则沉迷声色，几乎为阮大铖所收买，也不可能担当起挽救南明危亡的重任，所以作者最终以兴亡之恨否定了儿女之情，以侯、李二人在张道士的棒喝下双双入道作结。作品取材虽然基本上忠于史实，但也经过了作者的精心编织，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里说："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如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晴龙爪，总不离乎珠。"[1] 结构布局严谨周密：以男、女主人公的活动为贯穿始终的两条线索，以"桃花扇"为关合两线的枢纽，场次安排起伏转折、错落有致，情节设置前后照应，人物形象鲜明丰满，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圆满地结合在了一起。既是精致的美文，又是适合场上搬演的佳构。而吴伟业《秣陵春》中的男、女主角均非历史兴亡过程的实际承担者，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没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剧中，徐适、展娘只是先朝学士之子、外戚之女，虽因南唐灭亡而门庭败落、深怀故国之思，但他们本人与南唐兴亡并无直接联系。作者为了表现历史兴亡，虽然用荒诞手法为"南唐"虚设了一个幽冥世界，让李后主等人暗中替他们安排爱情婚姻，但由于爱情故事本身与现实中的南唐兴亡过程无关，况且作者本意不在表现南唐兴亡，而是借以反映明朝兴亡，所以作品不可能像《桃花扇》那样成功地展现一代兴亡的历史过程。对腐朽社会现实的揭露、对兴亡原因的探讨，也不可能像《桃花扇》那样全面、深入。而为了表现历史兴亡而不时插入的一些情节，譬如上述关于曹善才的两出戏《赏音》、《仙祠》，又如《恨嘲》、《狱傲》、《县聋》等揭露丑恶社会现实的情节，又影响了对爱情故事本身的编织。在整个爱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均非推动剧情发展的决定因素，故事的发生、发展完全依靠"仙机播弄"，仅李后主、耿仙人等为二人安排爱情婚姻的情节就占了全剧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致使情节过于荒诞离奇，头绪纷繁，结构松散，从戏剧的角度而言，并不成功。

总之，由于"诗史"观的渗透，吴伟业戏曲也同"梅村体"诗歌一样，承担着传

[1] 《桃花扇》卷首《桃花扇凡例》，第 1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心”、传“史”的功能。其实，借历史故事抒写兴亡之叹、身世之感也是清初许多文人戏曲创作的一个共同特征，如尤侗、丁耀亢、黄周星、嵇永仁等人的剧作，也往往寄寓兴亡之感。但吴伟业剧作在“诗史”观及个人心态的支配下，兴亡之感的表达尤为突出集中，故引起了当时广大文人的共鸣，在文人圈中影响颇大、流传较广。如其《西堂乐府序》记载，晋江黄景昉看了他的作品后曾赠诗曰：“征书郑重眠餐损，法曲凄凉涕泪横。”[1]有感于其浓郁的兴亡之叹与身世之伤，对其被迫仕清表示同情理解。其《诰赠奉议大夫秘书院侍读徐君坦斋墓志铭》记载，徐乾学之父徐坦斋曾“偃息吾吴氏之南园，索余所作传奇，令儿童歌之以为乐。”[2]《秣陵春》当时还曾被搬上舞台，冒襄的家庭乐班就曾上演过。冒氏《同人集》卷十有《演秣陵春倡和诗·步和徐漱雪先生观小优演吴梅村祭酒秣陵春十断句原韵》，当时很多文人都参与了唱和。钱谦益亦有诗云：“《牡丹亭》苦唱情多，其奈新声水调何？谁解梅村愁绝处？《秣陵春》是隔江歌。”[3]从戏剧的角度来讲，吴伟业剧作尽管并不算成功，但仍然对清代文人剧的创作产生了不小影响。如《临春阁》、《通天台》杂剧以个人抒怀遣兴为主，结构随意灵活，情节淡化的特点，也成为后来清代杂剧的一个突出特征，[4]而《秣陵春》以男女之情写兴亡之感的结构模式，则被洪昇、孔尚任等人继承，为《长生殿》、《桃花扇》等传奇剧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1] 《吴梅村全集》卷六十，第 1213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四十五，第 946 页。
[3] 《牧斋有学集》卷十一《读豫章仙音谱题八绝句呈太虚宗伯并雪堂梅公古严计百诸君子》之三，第 523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4] 参考《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第五章第三节《清代的杂剧》，第 127－131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四章　诗史观所涉及的文学思想内涵

“诗史”观虽然不是吴伟业文学思想的全部，但它却是吴伟业文学思想的核心，吴伟业对文学诸多方面的看法恰是其“诗史”观之不同侧面的体现或延伸。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吴伟业文学思想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关于吴伟业对文学诸多方面的看法如文学创作有何作用、应表现哪些内容，影响文学创作的因素是什么，如何才能创作出好文学，好文学有何衡量标准等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它们与“诗史”观的关系也未论及。本章从文学的目的、创作的要素及方法、文学批评三个层面展开，探讨“诗史”观所涉及的文学思想内涵。

第一节　经世与不朽并重的文学目的

在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吴伟业同样重视文学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社会作用与时代意义，强调诗文经世致用的目的。如其《严修人宜雅堂集序》论严氏诗文曰：“非特用著述自娱已也，盱衡乎政事得失，民生利病，以发为文章，盖不离乎数卷之书，而临民出政，道在是矣。……庶几遗经绝学，赖斯人以不堕；故既论次修人之文折衷于古人，尤举其为学之方，明体达用，可裨于当世者告焉。”[1]认为诗文创作的目的不应仅止于自娱，还应反映政事得失、民生利病，总结“临民出政”之道，即明体达用、有裨于当世。又如《和州守杨仲延诗序》：“余故序仲延之集，始终告之以为治，而归其说于中和，以无失乎教化斯民之意。呜呼！此即吾说诗之大旨也。”[2]强调诗歌创作应以为政施治、教化斯民为旨归。另外如《抚轮集序》、《观始诗集序》、《何季穆文集序》等等，均视经世致用为文学创作的目的。

正是从经世致用的文学目的论出发，吴伟业与其他复社文人一样，对科举制度下空疏剽窃、日趋僵化的时文提出了严厉批判。[3]如《毛卓人诗序》：

> 昔者先王以诗教天下，自祭祀、聘饗、乡饮、大射，无不用诗为登歌，故以立之学宫，肄习子弟。汉遂置博士等官，而唐因之设科取士，虽先王温柔敦厚之旨渐以散亡，于其教亦可谓之盛矣。由宋以后，始改为制举之文章，本意在黜浮

[1]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九，第 688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九，第 685 页。
[3] 叶君远《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浅论吴梅村的诗文观》（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1 版）第一部分“对时文的批判”关于吴伟业对时文的看法已作过一些分析，本文将吴氏关于时文的观点放在其文学目的论的层面上来考察，认为他对时文的批判，实际上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文学功能观。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华、尚经术，后人乃沿习苟且，躐取世资，自守其固陋空疏，尽诎诸儒百家之言于弗讲……近代以文取士，文有奇有平，其言总无当于用。……嗟呼！自举世相率为制举义，而诗道湮灭无闻。[1]

从其妨碍“诗道”的角度指出，在汉代以前的往古盛世，先王以诗歌教化天下，故风俗醇朴。唐代以诗取士，虽然由于科目的束缚，传统的温柔敦厚之旨逐渐散亡，但文人士子毕竟皆习诗歌，并且诗歌有正有变，故自先王以来的诗道尚未完全崩坏。而自宋代始，废诗歌而改以制艺取士，本意是“黜浮华、尚经术”，但在从宋到明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早已丧失了它的本意：为了应合主司之求，士皆沿习苟且、白首一经，“自守其固陋空疏，尽诎诸儒百家之言于弗讲”，故科举制艺成了躐取功名的手段而“无当于用”。并且自举世相率为时文，诗歌便极少有人问津了，诗道因之而湮灭无闻。又如《两郡名文序》：“自熙宁定科举之法，以墨义帖括取士，行之数百年，至今日而其重固已极矣。虽然，昔也优游纵弛听之，举世之风习而醇驳各半；今也束缚之，整齐之，可谓密矣，而纰戾牴牾，乃间出于法制之外……揣摩迎合之心盛，而轇轕之见生也。”[2]从文风与世风的关系角度指出，科举制度下空疏剽窃的文风导致了虚浮无耻的士风。针对时文的这种种弊端，吴伟业从经世致用的目的出发大力提倡诗歌与古文创作。其《古文汇钞序》解释“古文”得名之由来曰：“古文之名何昉乎？盖后之君子论其世，思以起其衰，不得已而强名之者也。……自魏、晋、六朝工于四六骈偶，唐、宋巨儒始为黜俗崇雅之学，将力挽斯世之颓靡而轨之于正，古文之名乃大行，盖以自名其文之学于古耳，其于古人之曰经曰史者，未敢遽以文名之。南宋后，经生习科举之业，三百年来以帖括为时文，人皆趋今而去古，间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时文或离或合，离者病于空疏，合者病于剽窃，彼其所谓古文，与时文对待而言者也。”[3]“古文”之名是唐、宋诸儒为纠正六朝之浮华、挽救文风之颓靡而提出的，用以标明其文章学习的是古代之经、史。而自南宋以后，由于空疏剽窃的时文盛行，“古文”就成了与“时文”相对待而言的一个名称，其目的主要是弘扬古代经、史之学的经世精神。又如其《德藻稿序》云：“吾之致力于应举，一二年耳，至今山陬穷邑，知吾名字，尚以制科之时文。为诗古文词二十年矣，而闾巷之小生以气排之，而诋吾空言为无用。盖天下之士，止知制义之可贵，而不思古学之当复，其为日也久矣。”[4]感叹于人们对制科时文的热情，对诗歌古文的冷漠。自己致力于应举不过一二年，连山陬穷邑之人都因其制艺而

---

[1]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七，第 662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四，第 741 页。
[3]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二，第 716 页。
[4]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四《德藻稿序》，第 746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知其名，而从事诗歌古文创作已 20 年，却仍不被世俗理解，被闾巷小生诋为“空言无用”。由于时文乃入仕之资，所以世俗以为有“用”，然非吴伟业诗歌古文所追求的经世致用之“用”也。吴伟业早、中期之以诗歌保存历史与民族文化、反思历史盛衰规律与亡国教训、反映民生疾苦及批判时政的思想，亦即以诗存“史”的“诗史”观，恰是这种经世致用文学观的典型体现。

但经世致用并非吴伟业赋予文学创作的唯一目的，他是经世致用与垂名不朽并重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在吴伟业自我生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他曾对尤侗讲：“若文，则吾岂敢？于诗或庶几焉。”[1]以诗人自命。在临终前写给遗民友人冒襄的信中自称：“平生以文章友朋为性命。”[2]视文学为生命形式之一种。所以他在强调文学经世致用功能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其自我不朽的功能，关注其能否留传的命运。如《彭燕又偶存草序》：

> 古来诗人，处极盛之世，应制雍容，从军慷慨，登临赠答，文酒流连，此纵志极意者所为诗也；其次即仕宦偃蹇，坎壈无聊，发为微吟，讽切当世，知之者以为怜，不知者亦无以为罪；彼皆有诗之乐而无其累者也，岂吾与燕又所遇之时哉？虽然，当其势位方隆，声名籍甚，或传写于通国，或藏庋于名山，累牍连章，盈囊溢几，可谓盛矣；曾几何时，而荡为云烟，散为灰烬，名篇迥句，尚有知者，卷帙磨灭，十不一传：然后知诗之存者以其时，诗之所以存者，其道固有在也。今燕又之诗虽出于亡失之余，而其言皆发乎性情，系乎风俗，使后人读其诗，论其世，深有得于比兴之旨，虽以之百世可也，而偶存乎？[3]

认为文学的留传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外部社会要有足够的宽容与稳定；二是文学本身要有“比兴之旨”。倘若生逢盛世，“纵志极意者”可通过诗歌导扬盛美、抒发心志；“仕宦偃蹇”者也可通过诗歌讽喻现实、宣泄心中不平，无文字之祸，无兵火之灾，只要诗歌本身具有留传价值，自然会传之后世。但若生不逢时，则或者“零落于兵火”、“以散佚不及存”，或者“以避忌不敢存”。当然，若能象彭燕又诗歌这样“出于亡失之余”，又具备“比兴之旨”，自然会存之百世。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比，感叹明清易代之际文学留传之难。所谓“比兴之旨”即上文所谓“发乎性情，系乎风俗”：既要表现个人性情品德，又要反映时风世俗，这样的诗歌才有留传不朽之价值。在这里，经世致用的功能恰巧又是垂名不朽的一个条件。又如《程崑仑文集序》：“自古富贵而名

---

[1] 《尤西堂全集》：《西堂杂俎三集》卷三《梅村词序》，第 316 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129。
[2]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九《与冒辟疆书》“辛亥中秋绝笔”，第 1178 页。
[3]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八，第 670－671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多澌灭，唯博闻绩学之士，垂论著以示来祀，虽残膏剩腹，与江山同其永久，而又复奚憾焉。”[1]认为若能通过论著的留传而垂名不朽，人生也就没什么遗憾了。类似的立言不朽观，吴伟业在诗文中曾多次提到。这种经世与不朽并重的文学功能论，反映在“诗史”观中，便是情、史并重。

不过，吴伟业所谓不朽不仅是一般的传名，更重要的在于“传心”。吴伟业临终前曾遗命儿子：“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用心良苦，后世读吾诗而能知吾心，则吾不死矣。吾死毋以厚敛。吾性爱山水，葬吾于灵岩、邓尉之间，碣曰‘诗人吴梅村之墓’足矣。”[2]强调自己的诗歌创作“用心良苦”，如果后人读其诗而能理解其“心”，他就能随着诗歌的留传而不朽。并以“诗人”定位自己的一生，把不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后世之“知吾心”上。很明显，他之所以强调“知吾心”是因为他非常清楚，身仕两朝的事实已使他丧失了以道德品行传名不朽的资格，并且在后世留下的极可能是“贰臣”的千古骂名。他只有让后世读者理解其“本心”的贞洁与无辜，才有可能获得他们的同情与谅解，挽回耻辱的“贰臣”形象。所以自决定失节之时起，他便把心血倾注在“传心”上，用心良苦地在诗歌中剖白“本心”，为自己开脱辩解，甚至自我修饰。而此恰是其以“心”传“史”的“心史”观之体现。不仅如此，其“传心”以不朽的良苦用心在《梅村家藏稿》的体例编排上也有所反映。与明代诗文集之通常按体分卷有所不同，《家藏稿》效仿国初刘基将元季、明初作品分别结集的方式，以仕清为界限分为前后两集。这一作法显然受到了钱谦益的启发。钱氏《列朝诗集》曾就刘基作品之分集大做文章，录其元季所作《覆瓿集》于《甲前集》元遗民之作中，而录其入明朝佐命以后所作《犁眉集》于《甲集》，冠诸明朝之首。从而将刘基分为二人，一以为元之遗民，一以为明之功臣。并在《甲集》之《刘诚意基》小传中，对刘基之以元遗民而仕于明多所辩护：“余考公事略，合观《覆瓿》、《黎眉》二集，窃窥其所为歌诗，悲惋衰飒，先后异致。其深衷讬寄，有非国史家状所能表其微者。每蘸然伤之。近读永新刘定之《呆斋集》……呆斋之论，其所以责备文成者，亦已苛矣。……诵犁眉之诗，而推见其心事，安知不以永新为后世之子云乎！”[3]许多论者已指出，牧斋之为青田辩实质亦是自辩。对于钱氏之论吴伟业当非常熟悉，计东之言可为佐证：“……刘文成公集分《覆瓿》、《犁眉》，其意亦然，大概见于虞山钱宗伯之论，老师所熟知也。”[4]故他分仕清前后之作品为两集，目的亦与牧斋相同，即让后世读者论世而知其遗民之

---

[1]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九，第 684 页。

[2] 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转述吴曔语，陈氏此表是因吴曔之请而作，此语乃吴曔当面为陈氏所言，其真实性无可怀疑。见《吴梅村全集》附录一，第 1409 页。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第 7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 年第 1 版。

[4] 计东《改亭文集》卷十《上吴梅村祭酒书二》，第 658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228。由于吴伟业生前已行世的四十卷本《梅村集》还是按体分卷，计东此信正是因此而建议他效仿刘基分集之法，其观点与钱谦益之论刘基相同，且引钱氏之论来说明。计东此信作于康熙九年二月，而次年年底吴伟业已去逝，《梅村家藏稿》之体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心”。

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是对外部社会的重视，垂名不朽的价值取向则是对作家自我的重视。吴伟业两者并重的文学观，无疑直接导源于其既重视个体生命，又追求经世理想的人生价值观，同时与时代思潮的影响亦密切相关，而“诗史”观即其典型体现。当然，吴伟业也不排除文学有自娱或宣泄的功能，如戏曲之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诗文之难免悲歌侘傺、哀怨怒诽，但他并不赞成以此为最终目的，而是自觉追求经世致用与自我不朽。

第二节　作者与时世并重的创作论

与经世与不朽并重的文学目的论一致，吴伟业视作者与时世为文学创作的两大决定因素：既要本于作者，又要系于时世。

一、作者必备三要素：才、性情、学识[1]

吴伟业在康熙九年为龚鼎孳诗集所作序言中，详细阐述了一个诗人必须具备的要素：

> 夫诗人之为道，不徒以其才也。有性情焉，有学识焉，其浅深正变之故，不于斯三者考之，不足以言诗之大也。今以吾龚先生选词之缛丽，使事之精切，遣调之隽逸，取意之超诣，其诗之工固矣。俊鹘之举也，扶摇一击；骐骥之奔也，决骤千里。先生之潜搜冥索，出政事鞅掌之余；高咏长吟，在宾客填咽之际。尝为余张乐置饮，授简各赋一章，歌舞恢笑，方杂踏于前，而先生涉笔已得数纸；坐者未散，传诵者早遍于远近矣。此先生之才也。身为三公，而修布衣之节；交尽王侯，而好山泽之游。故人老宿，殷勤赠答，北门之窭贫，行道之饥渴，未尝不彷徨而慰劳也；后生英隽，弘奖风流，《考盘》之寤歌，彤管之悦怿，未尝不流连而奖许也。自《伐木》之道衰，而黾勉有无、匍匐急难者，吾不得而见之矣。先生倾囊橐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其恻怛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而下读

例是否是在采纳其建议后才定，已难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受钱氏之影响当无可置疑。

[1] 徐江《吴梅村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第九章第二节《梅村文学理论论略》第一点“论诗主才思、性情与学识并重”对此问题也作了简要分析，指出吴伟业这一观点是对复古派末流与性灵派末流的“纠偏救弊”，但对“才”、“性情”、“学识”的具体内涵未作解释。叶君远《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浅论吴梅村的诗文观》（第 60 页，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1 版）第四部分“‘才、性情、学识’与‘做诗之要’”对此问题也作过一些分析，并对“才”、“性情”、“学识”的内涵作了解释：“其所谓‘才’，是指灵感来得快。”“其所谓‘性情’，指的是真挚而充沛的感情。”“其所谓‘学识’，指的是通过刻苦努力而获得的对诗歌史和时世人情的把握与了解。”并且认为 “其中的‘才’与‘性情’，比较接近公安派的‘性灵’；而‘学识’则包含了七子强调学习古人古法的某些思想。”笔者对吴伟业“才”、“性情”、“学识”具体内涵的理解与叶先生有所不同。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之应为感动，而况于身受者乎？此先生之性情也。板荡极而楚骚乃兴，正始存而大雅复作。以先生时世论之：由其前则忾我寤叹，忧谗慝，痛沦胥也；由其后则式燕以敖，诵万年、洽四国也。举申旦不寐之衷，兴夙夜在公之道，上求之于古昔，内审之于平生，于是运会之升降，人事之变迁，物侯之暄凉，世途之得失，尽取之以融释其心神而磨淬其术业。故其为诗也，有感时诧傺之响，而不改于和平；有铺扬鸿藻之辞，而无心于靡丽。故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士君子所以益坚者，其砥砺必有道矣。此先生之学识也。[1]

提出诗人必备三大要素：才、性情、学识，并结合龚芝麓其人作了具体阐发。此三要素中的任何一项，在文论史上都曾被频繁提到，但每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不同的个人那里都有不同的内涵。有的论者认为吴伟业“才”、“性情”的内涵与公安派的“性灵”相近，“学识”则与七子派学习古人古法的思想接近，其实是一种误解。其所谓“才”，不仅是指诗人先天的才情、气质或曰灵感，象龚芝麓才思之敏捷、才气之富赡如“俊鹘之举，扶摇一击；骐骥之奔，决骤千里。”还包括诗人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的写作技能与运思技巧，如龚芝麓之“潜搜冥索”，在“选词”、“使事”、“遣调”、“取意”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才华，性灵派多强调前者，以致失于俚浅率易；而复古派多强调后者，以致陷于机械模拟，吴伟业则将两者合在一起，认为一个诗人既要有良好的先天才情又要有良好的后天才华，才真正称得上“才”。又如其《许尧文诗小引》论许氏之“才”曰：“尧文之才，开敏乐易，于读书能采掇其菁华，而出之以杼轴，故其诗深妍秀美，声病稳贴，虽豪门名家莫或过之。”[2]“开敏乐易”乃先天之才思、气质，而通过读书“采掇其菁华”而“出之以杼轴”则是后天之学习积累，同样是先天才思与后天才华同时强调。所以吴伟业并不赞成作者只依赖先天才情而忽略后天积累，如谈迁《北游录》记其论诗之语曰：“人虽有才，决不可恃，且迟速难强。”[3]此处所言之“才”即先天之才，认为诗人决不可仅仅凭恃先天才性，在创作过程中有无灵感、才思快慢都不是可以勉强得来的。

其所谓“性情”，也不同于性灵派之“性灵”主要指个人的情趣爱好，而是指超越于个人好恶之上的人格境界，含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如龚芝麓之“身为三公，而修布衣之节；交尽王侯，而好山泽之游”、“黾勉有无、匍匐急难”、“倾囊橐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富贵不骄，好善乐施，急人患难，笃于友朋，是典型的仁义人格。又如《徐季重诗序》言徐氏之为人云：“夫儒者处世，不簪绂而贵，非岩穴而高，修身服

[1]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八，第 664－665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一，第 709 页。
[3] 谈迁《北游录·纪邮上》，第 81 页，中华书局 1960 年 4 月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物，弹琴以咏先王，其声若出金石，虽有家门贵宠，蝉联辉赫，而能退然其中……终其身无不自得，当世景其高行，有铜鞮伯华之风，若季重者，殆其人乎！”[1]居林下而怀道抱德，不以富贵或贫贱而改其操守，于进退得丧之际“无入而不自得”，有先贤铜鞮伯华之风，同样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一个诗人只有具备这样的“性情”，诗歌才能不悖于“和平”。否则，若不具备此种道德境界而只求适乎一己之情，那么其为诗便会“矜长任气”，不能达“和平”之境，所谓“适乎情者不免累于境”。[2]吴伟业还进一步强调这种道德人格的真诚性，只有“恻怛真挚”，发为诗歌才能产生感人至深的效果，使“百世而下”读后而为之感动。正是从道德境界着眼，他还反对作者的门户之见，如《与宋尚木论诗书》：“虽然，当今作者固不乏人，而独于论诗一道，攻讦门户，排诋异同，坏人心而乱风俗。”[3]要求作者“不矜同，不尚异，各言其志之所存。”[4]所以他在《致孚社诸子书》中提出的“论文取友之道”有“持品节”、“化意见”两条，“持品节”即坚持气节操守：“遭患处变，风霜不改”；“化意见”即排除门户之见、“尽化同异”，特别强调文人的品德修养。[5]吴伟业的诗学弟子黄与坚在《广诗说》中云：“古云诗以道性情，性情与才情不同。如杜牧之、李义山、韩致尧诸诗，以侧辞艳体相高，此才情也，……此古人论诗必以性诗。诗必才根乎性，而后以情贯之，庶矣乎！”[6]对“性情”与“才情”作了明确区分，直接将“性情”之“性”解释为道德之“性”，要求作者才情必须根于道德之“性”，亦可为吴伟业“性情”观之佐证。

其所谓“学识”，并非指学习古人获得的诗法技巧，而是指通过学习获得的切实有用之学问见识，其价值在学以致用。如龚芝麓：“举申旦不寐之衷，兴夙夜在公之道，上求之于古昔，内审之于平生，于是运会之升降，人事之变迁，物侯之暄凉，世途之得失，尽取之以融释其心神而磨淬其术业。”学于古昔，参验于平生，而后在世运升降、人事变迁的社会现实中实践、磨砺其所学，即立身行世、经世济民的学问与见识。惟其具备此种“学识”，发为诗歌才会如楚骚之“有感时诡傺之响，而不改于和平”，如大雅之“有铺扬鸿藻之辞，而无心于靡丽。”又如《严修人宜雅堂序》：“余反复于其论著，如恨豪猾吏之盘互膠结，贤有司辄反为所中，而威令格于不行；又以农人困苦而商民富贵，推汉武之重本抑末，均输盐铁，摧豪强，赡国用，而田赋不加于民。此二者皆救时笃论，修从从十年之中，讲求是非，参验其治否，然则举而措之，达于从政，岂不裕哉！”[7]则反过来通过文学创作看作者，同样强调了作者经世救时的学识。总之，

---

1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第 703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田鬘渊梦归草堂诗序》，第 659 页。
3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二，第 1089 页。
4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太仓十子诗序》，第 694 页。
5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四，第 1087、1088 页。
6 黄与坚《愿学斋文集》卷八《愿学斋论学三说·广诗说》，清抄本。
7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九《严修人宜雅堂集序》，第 689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吴伟业这里，每个概念均被时代语境赋予了新内涵，而不是将七子派与公安、竟陵的理论简单拼合在一起，既无七子派拘泥古法之弊端，又无公安派排斥技巧、规则、道德、学问等一切外在因素的缺陷。

吴伟业将三者并举，认为缺少任何一项都“不足以言诗之大”。如《珠林风雅序》：“昔人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然非才与学兼到，不足言诗。供奉才胜而博学，少陵学胜而富才，储、岑、王、孟多擅双绝。”[1]强调只有才、学兼到，才能创作出如“三唐大家”那样的好诗。若恃先天之“才”而轻世傲物，忽视对既成“诗法”的学习与遵守、道德品行的修养与学识的积累，则尤为不可取，如《程翼苍诗序》：“正德中黄冈王稚钦、绥德马仲房为同年，同馆选，后先同谪补外。稚钦以通脱竟废，仲房终跻尊显。此二君者皆诗人也，稚钦颖悟绝伦，所为诗纵恣诙谲，脱去绳束，以慢悔当世；仲房诗整练有法，步伍秩然，虽才不及稚钦，而用意过之。今其集具在，读其书，论其世，以考其人之得失，不亦可乎！此吾有重于翼苍也。士君子患其行之不高，学之不赡，而不患名位之不达。入而为相如、枚皋，出而为贾生、董相，一而已矣，何必长杨载笔，太液从游，而后可以傲当时、称作者哉？”[2]此处王稚钦“颖悟绝伦”之“才”指的是先天才情，其为诗“纵恣诙谲，脱去绳束”，任由个体情感的宣泄，也与性灵派之创作相似。而吴伟业对这种有“才”而无“法”的“诡傺怨诽之音”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他看重的是程翼苍那种“和平温厚，归于尔雅”的诗风。对王稚钦以诗歌“慢侮当世”的作法显然也是不赞赏的，认为这是其道德、学识不够高造成的，因为按照儒家道德观，“士君子患其行之不高，学之不赡，而不患名位之不达”。对程氏诗歌“整练有法，步伍秩然”的赞赏，则透露了他对诗法的重视。当然，这是为朝廷学官（程翼苍时为苏州府教授）之诗集所作序，难免有鼓吹道德与正统诗教的一面。事实上，吴伟业对那些有违“中和”的“诡傺怨诽之音”并非一概否定，因为他认为除作者外，客观时世也是影响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因素，二者在创作中的位置与关系，下文即将具体论述。吴伟业本人的创作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此三项要素，“梅村体”诗史“论事之当”，取题多关系时事之大者，对历史盛衰原因教训的揭示与总结等等，均是作者“史识”的体现；爱憎分明的褒贬态度，忠君爱国、坚持遗民身份的内心愿望与道德操守则是其“性情”的表现；而其风神韵致之秀冶轶伦，藻采之华美，使事用典之频繁精当，以及在韵律、结构、叙事手法等技巧上的“用意”，既是自身才情的流露，也是学习前人（尤其是唐诗）所得才华的运用，是其“才”的表现。钱谦益曾赞梅村诗“可学而不可能”而又“非可以不学而能”，“可学”者即其诗歌之声律、体裁、

[1] 此文为佚文，见叶君远《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吴伟业佚文辑考》，第 228 页，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1 版。

[2]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八，第 669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学识：“有声焉，宫商可叶也。有律焉，声病可案也。有体焉，正变可稽也。有材焉，良楛可攻也。……天地之物象，阴符之生杀，古今之文心名理，陶冶笼挫，归乎一气，而咸资以为诗。”这些都是可以靠后天学习而能的，是“人事”。“不可能”者则是其诗歌秀冶轶伦的风神韵致，变幻莫测的笔势，流动无端的性情：“其调之铿然，金春而石戛也；气之能然，剑花而星芒也；光之耿然，春浮花而霞侵月也；情之盎然，草碧色而水绿波也。……文繁势变，事近景遥，或移形于跬步，或缩地于千里。泗水秋风，则往歌而来哭；寒灯拥髻，则生死而死生。” 这些是靠后天学习所学不来的，它源于诗人的灵心慧性，是“天工”。[1]这样的描述可以说是符合“梅村体”实际的，而能够做到“人事”与“天工”的完美结合，正说明作者于此三要素兼备。

强调作者的道德境界与学以致用的真才实学，也是明清之际文论的一个突出特征，实质即实学思潮在文学领域的延伸。在以实学相砥砺、以名节相标榜的风气影响下，明清之际大多数文人都非常重视作者的人品修养、真才实学，要求文学表现真性情，贯彻真学问。如黄宗羲提倡“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的“万古之性情”，[2]钱谦益以“灵心”、“学问”与“世运”为作诗的必备要素，他们所说的“性情”、“灵心”，具体内涵也与时代精神、现实内容相结合，具有明确的道德内容，“与同样提倡性情的晚明批评家主张摅写个人本色的性灵和欲念以及后来袁枚等人意在表现人的各种情感都有明显的区别。”[3]所以吴伟业关于作者的论述，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二、作者与客观世界在文学创作中的位置及关系：“本乎性情，因乎事物”

吴伟业的观点是在批评总结明代最主要的文学流派：七子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文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这几种不同的文学传统，其态度是有明显区别的。[4]《与宋尚木论诗书》：

> 夫诗之尊李、杜，文之尚韩、欧，此犹山之有泰、华，水之有江、河，无不仰止而取益焉，所不待言者也。使泰山之农人，得拳石而宝之，笑终南、太乙为

[1] 《牧斋有学集》卷十七《梅村先生诗集序》，第 756－757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2] 黄宗羲《南雷文约》卷四《马雪航诗序》，第 483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205。

[3] 见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第 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

[4] 关于吴伟业对明代诸诗文流派的理论认识，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第三章《明清之际文人的诗文批评》、徐江《吴梅村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第九章第二节《梅村文学理论论略》第三点“评论晚明及当时诗风”、叶君远《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浅论吴梅村的诗文观》（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1 版）第二部分“‘取其中焉而已’”都作过勾勒与分析，指出吴伟业对复古派与性灵派的态度是各取所长而摒其所短，即“取其中”。笔者认为吴伟业对明代诸派的批评，除了表明他力图纠偏救弊、无门户之见外，还表达了个人的诗学主张，本文即着重探讨这一问题。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培塿；河滨之渔父捧勺水而饮之，目洞庭、震泽为泛觞：则庸人皆得揶揄之矣。今之学者何以异于是？彼其于李、杜之高深雄浑者未尝望其崖略，而剽举一二近似，以号于人曰：“我盛唐，我王、李。”则何以服竟陵诸子之心哉？竟陵之所主者，不过高、岑数家耳，立论最偏，取材甚狭。其自为之诗，既不足追其所见，后之人复踵事曾陋，取侏儒木强者，附而著之竟陵？……吾只患今之学盛唐者，粗疏鲁莽，不能标古人之赤帜，特排突竟陵以为名高，以彼虚骄之气，浮游之响，不二十年嗒然其消歇，必反为竟陵之所乘。如此则纷纠杂揉，后生小子耳目荧乱，不复考古人之源流，正始元声，将坠于地，噫嘻，不大可虑哉！虽然，此二说者，今之大人先生有尽举而废之者矣，其废之者是也，其所以救之者则非也。古乐之失传也，撞万石之钟，悬灵鼍之鼓，莫知其节奏，繁筝哀笛，靡靡之响，又不足以听也，乃为田夫婺妇，操作而歌吴歌，则审音者将赏之乎？且人有见千金之璧，识其瑕类，必不以易束帛者，以束帛非其伦也。今夫鸿儒伟人，名章巨什，为世所流传者，其价非特千金之璧也。苟且有瑕类，与众见之足矣，折而毁之，抵而弃之。必欲使之磨灭；而游夫之口号，画客之题词，香奁、白社之遗句，反以僻陋故存，且从而为之说曰：‘此天真烂熳，非犹夫剽窃摹拟者之所为。’夫剽窃摹拟者固非矣，而此天真烂熳者，插齿牙，摇唇吻，斗捷为工，取快目前焉尔，原其心未尝以之夸当时而垂后世，乃后之人过从而推高之。相如之词赋，子云之笔札，以覆酒瓿，而淳于髡、郭舍人诙谐调笑之辞，欲驾而出乎其上，有是理哉？[1]

从此段论述可得以下几点：

（一）对竟陵派的理论及实践予以彻底否定，批评其“立论最偏，取材甚狭”，并认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自为之诗”尚“不足追其所见”，其末流更是“踵事曾陋”。对公安派虽然作了具体分析，但总体上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对其率性由情、信心冲口的诗学宗尚强烈不满，认为他们的作品不过是“游夫之口号，画客之题词，香奁白社之遗句”，其俚俗浅易犹如“田夫婺妇，操作而歌吴歌”、倡优（淳于髡、郭舍人）“诙谐调笑之辞”；认为他们的创作不过是任个性，逞才思，取一时之快心：“插齿牙，摇唇吻，斗捷为工，取快目前焉尔”，原其本心未必想“以之夸当时而垂后世”，因此不必“过从而推高之”。以经世与不朽为文学目的的吴伟业，自然不会认同公安派以自适为目的的诗学主张及其俚浅率易的诗风。这与“梅村体”诗史工整的形式、严密的结构、典雅华丽的风貌所体现的诗学观念是一致的。

（二）对七子派的诗学宗尚与唐宋派的散文宗尚总体上予以肯定，认为“诗之尊

[1]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二，第1089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李、杜，文之尚韩、欧”的合理性是“不待言”的，分别代表了他对诗歌与散文的认识。就诗歌领域而言，他认为复古派领袖人物的创作是成功的，其“名章巨什，为世所流传者，其价非特千金之璧也。”所以他对钱谦益（“大人先生”）推崇公安派而否定七子派的诗学主张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钱氏无异于以“束帛”易“千金之璧”，因为两者高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对钱氏折毁、抵弃王世贞等人“名章巨什”的作法强烈不满。他还曾在《太仓十子诗序》中对钱谦益关于王世贞的“晚年定论”说予以尖锐批判：“晚近诗家，好推一二人以为职志，靡天下以从之，而不深惟源流之得失。有识慨然思拯其弊，乃訾敖排击，尽以加往昔之作者，而竖儒小生，一言偶合，得躐而跻于其上，则又何以称焉？即以瑯琊王公之集观之，其盛年用意之作，环词雄响，即芟抹之殆尽，而晚岁颓然自放之言，顾表而出之，以为有合于道，诎申颠倒，取快异闻，斯可以谓之笃论乎？”[1]认为虽然复古派末流有“不深惟源流之得失”而盲目模仿剽窃之弊，但将末流之失“尽加以往昔之作者”则是矫枉过正。批评钱氏之“晚年定论”说是“诎申颠倒、取快异闻”，认为王世贞“环词雄响”的“盛年用意之作”，才是其艺术成就的真正代表。这是吴伟业绍述七子的一段重要言论，研究吴伟业诗学思想或明末清初复古思潮者大都会引用，却很少注意他在这篇文章中是将王世贞放在元末以来的吴中文学传统中加以论述的。[2]那么吴、钱二人究竟孰是孰非？王世贞晚年诗风确实发生了某些变化：早年专学盛唐，追求雅正雄浑之美，多实大声宏之作；晚岁则取径有所放宽，甚至旁及宋诗，屡和东坡诗韵，也欣赏“风行水上”的自然淡泊之美，平淡质直的作品相对增多。这种变化尽管对早期的复古思想有所修正，但并非如钱谦益所言，是因为晚年“蘧然梦觉”[3]而彻底抛弃了从前的复古主张。此处仅举王世贞晚年对待宋诗的态度一端，即可说明其文学思想的前后连续性。如其《宋诗选序》云：“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然而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此语于格之外者也。今夫取食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比之，奚啻食色重！夫医师不以参苓而捐溲勃，大官不以八珍而捐胡禄障泥，为能善用之也。虽然，以彼为我则可，以我为彼则不可。子正非求为伸宋者也，将善用宋者也。”[4]承认有些个性、情感是不应被古典的“格调”所牢笼的，故宋诗自有其价值，但同时又强调吸收其长处为我所用则可，改弦易辙则不可，即欲“用宋”，而非“伸宋”。又如其《苏长公外纪序》，虽然于东坡才情赞不绝口，但同时又认为苏诗足可“为吾用”而不能“为吾式”。[5]很明显，他并

[1]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第 694 页。
[2]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吴伟业推崇王世贞有很多原因，并不仅仅因为赞赏其诗学观念，如上文所述，王世贞领袖文坛的盛况对吴伟业就有极大的吸引力。另外，从私人关系来讲，吴伟业对他也会有天然的好感，其弟子、“太仓十子”中的王昊、王曜升即世贞弟世懋之曾孙。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第 43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 年第 1 版。
[4]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一，第 2240－2241 页，（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0 年。
[5]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二《苏长公外纪序》，第 2269 页，（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0 年。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未彻底改变尊唐抑宋、推崇格调的复古观念。但他之尊唐、崇格是为了学习唐诗的高华典雅之美，而非一格一调，所以在“格调”之外他又汉魏、唐、宋兼取，主张吸收众长以“为吾用”，故仍具有文采风流之内涵，而不像李梦阳、李攀龙诸人那样归于单一格调之模拟。恰如陈田所云：“弇州天才雄放，虽宗李、何成派，自有铁足迅发，不受羁勒之气。”[1]正因如此，他才会在《艺苑卮言》中已对李攀龙的机械模拟之弊提出批评：“于鳞自弃官以前，七言律极高华，然其大意，恐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守其俊语，故三首而外，不耐雷同。”“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2]总之，王世贞与此前徐祯卿、皇甫汸等饱受吴中文学传统浸染陶冶的文人一样，虽亦倡言复古，但并未归于一格一调之模拟，而是仍然保留了吴中文学张扬个性、高华雅丽的一贯精神，是南北文学融合的桥梁。正是职此之故，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才会批评徐祯卿“守而未化”、蹊径犹存。[3]王世贞晚年思想与诗风的某些变化，也正是重个性、尚才情之倾向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钱谦益“晚年定论”说看重的是王世贞文学思想前后不同的一面。他抹杀其“盛年用意之作”而过分强调晚年某些“颓然自放”的作品，实质上是为了宣扬本人的性灵文学观；吴伟业看重的却是王世贞文学思想前后相承的一面，将其纳入吴中文学传统，说明他看到了其“盛年用意之作”与吴中文学重个性、尚文雅的精神相通的一面。换言之，在吴伟业看来，重视法式格调并不妨碍个性、才情的表现，反映了他继承王世贞等融合南北文学、兼顾才情与“格调”的思想倾向。四库馆臣云：“知末流之失可矣；以末流之失而尽废世贞之集，则非通论也。”[4]与吴伟业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钱钟书先生也认为吴伟业“议论极公”：“弇州《续稿》中篇什，有意无韵，木强率直，实不如前稿之声情并茂；盖变未至道，况而愈下者也。”[5] 吴伟业在《龚芝麓诗序》中也明确指出钱氏之《列朝诗集》“推扬幽隐为太过，而矫时救俗，以致排诋三四巨公，即其中未必自许为定论也，诚有见于后人之驳难必起，而吾以议论与之上下。”[6]说他排击复古派的观点是矫枉过正。这说明吴伟业诗学思想与七子派，尤其是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有一脉相通之处，如其《宋子建诗序》赞扬子建之子楚鸿云：“年十五六，其为诗则已含咀汉、魏，规摹盛唐。”[7]与七子派论诗宗旨明显一致。他在评价他人诗歌，尤其是云间派诗人诗歌时有不少类似的言论，推崇复古派诗学正是他与云间派相同之处。他本人的创作实践也的确取径七子而上溯三唐，“梅村体”学习唐诗所取得的成就在上一章中已作过论述。但

---

1 陈田《明诗纪事》己籤卷一，第 188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第 1 版。
2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第 1065、1066 页，《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 版。
3 《空同先生集》卷五十一《徐迪功集序》，第 1459 页，（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 1976 年。
4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集部二十五、别集类二十五《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七卷》，第 2325 页，中华书局 1997 年第 1 版。
5 钱钟书《谈艺录》一《诗分唐宋》，第 4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1 版。
6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八，第 666 页。
7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八，第 667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就散文而言，吴、钱二人的看法却是一致的，都推崇唐宋派。与七子派论文专主秦汉的观点不同，吴伟业更倾向于唐顺之、归有光、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的散文主张，如《致孚社诸子书》:“至古文辞，则规先秦者失之摸拟；学六朝者失之轻靡；震川、毗陵抚衰起敝，崇尚八家；而鹿门分条晰委，开示后学。若集众长而掩前哲，其在虞山乎!”对七子派规模先秦、泥古不化的作法表示不满，而认为唐宋派崇尚唐宋八大家，有振衰起敝、开示后学之功，并对继其后的钱谦益古文创作给予了很高评价。

（三）批评复古派尤其是其末流者固持宗尚、袭貌遗情的拟古弊端。吴伟业虽然从总体上肯定了七子派以盛唐为宗，标举古韵高格、宏声雄响的诗学主张，但对其末流死守町畦、字规句模的拟古风气却有清醒的认识:“彼其于李、杜之高深雄浑者未尝望其崖略，而剽举一二近似，以号于人曰:‘我盛唐，我王、李。’则何以服竟陵诸子之心哉？”认为求“李、杜之高深雄浑”于字句，就如同“泰山之农人得拳石而宝之”、“河滨之渔父捧勺水而饮之”，只是学得一点皮毛。批评“今之学盛唐者，粗疏卤莽，不能标古人之赤帜，特排突竟陵以为名高，以虚骄之气，浮游之响，不二十年嗒然其消歇,必反为竟陵之所乘。”矛头暗指云间派及其影响下的西泠派诸人偏重模拟的弊端，认为他们并没有学到盛唐诗根底于现实的真正创作精神。又如其《送杜大于皇从娄东往武林兼简曹司农秋岳范佥事正》诗云:“近来此地擅时誉，粉饰开元与天宝。我把耒锄倦唱酬，耻画蛾眉斗工巧。”[1]同样针对云间派的形式模拟。这正是吴伟业与同样继承七子诗学主张的云间派的分歧之所在。

既然吴伟业对当时几家诗歌流派都有所批评,那么诗歌究竟应该如何创作呢?《与宋尚木论诗书》接下来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 然则为诗之道何如？曰：取其中焉而已。《閟宫》之章,《清庙》之作，被之管弦，施诸韶箾者，固不得与《兔罝》之野人、《采蘩》之妇女同日而论，孔子删诗，辄并举而存之。夫《诗》者本乎性情，因乎事物，政教流俗之迁改，山川云物之变幻，交乎吾之前，而吾自出其胸怀与之吞吐，其出没变化，固不可一端而求也，又何取乎訾人专己、喋喋而咕咕哉！

所谓“取其中”,即各取所长而摒其所短。既然公安派末流之失在于过分强调自身才思、情感以致信心冲口、脱去绳束，而七子派末流之失则在于过分强调诗歌法则以致粗疏卤莽、剽窃摹拟，实际上都存在脱离现实的弊端，那么最好的创作就应该是各取其长而避其短，并以孔子删诗“《閟宫》之章,《清庙》之作”与《兔罝》野人、《采蘩》妇

[1] 《吴梅村全集》卷十，第 256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女之歌并存为例来说明之。吴伟业在这里看似暗换了论述角度，前面讲“为诗之道”即创作理论，所举例子则讲“取诗”之道即存诗标准，而事实上他正是以孔子的存诗标准来说明自己的创作主张。因为在他看来，孔子两类诗歌并存的目的是观风俗盛衰、察王者之迹，恰如《且朴斋诗稿序》所云：“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太史陈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入贡天子，不必其为朝廷邦国之史也。”[1]“野夫游女之诗”与“士大夫之诗”、“朝廷邦国之史”一样具有反映“世运升降，时政得失”的功能。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公安派的作品虽然“僻陋”却也有反映其时之世俗人心的价值。所以理想的创作态度便是抛开门户之见，自觉实践反映“世运升降，时政得失”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他紧接着便提出了“本乎性情，因乎事物”的创作主张。

所谓“本乎性情，因乎事物，政教流俗之迁改，山川云物之变幻，交乎吾之前，而吾自出其胸怀与之吞吐，其出没变化，固不可一端而求。”论述的是作者与客观世界在文学创作中的位置与关系问题。认为诗歌创作既要本于作者的性情，又要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政教流俗之迁改”是说社会的变迁，“山川云物之变幻”则是说自然的变化，它们与作者的关系是“吾自出胸怀与之吞吐，其出没变化，不可一端而求。”即作者性情必须与客观事物交汇融合，随其出没变化而生发不同的情怀，然后发为诗歌才是好的诗歌，而不能只求之于其中一端。不同的自然景物会引发不同的思想情感，早已是文论史的共识，从陆机的“物感”说到王夫之的“情景相生”论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吴伟业将“政教流俗”与“山川云物”并举，并着眼于其“迁改”、“变幻”的动态过程，实际上是针对明清易代的史实而言的，强调的是时世变迁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当然，这一影响能够产生的根本前提是作者忧世悯时、仕民爱物的“性情”。又如《三吴游览志序》：“古今一时一事，一草一木，遇其人则传，不遇其人则湮灭无闻者多矣。然其间哀乐之趣不同，要以性情触之，发为歌啸，著为文章，各自孤行一意，而兴会机境，因之以传，如阮步兵途穷之哭，谢康乐凿山之游，谢太傅泓海之舟，韩吏部华山之恸皆是也。”[2]“一时一事”即社会人事，而“一草一木”即自然景物，作者性情与之相碰撞，发为歌啸，著为诗文，不同景物便因之而有了哀乐不同的旨趣。其所举“阮步兵途穷之哭，谢康乐凿山之游，谢太傅泓海之舟，韩吏部华山之恸”，事实上强调的同样是阮藉等人忧时伤乱的性情与客观时世对创作的影响。诗文书画之道相通，其《王石谷赠行诗序》亦将作者性情与客观世界视为书画创作的两大

[1] 《吴梅村全集》卷六十，第 1205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六十，第 1207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决定因素：“书画之道，本乎性、适乎情，通乎天地万物。”[1] 所以前引《龚芝麓诗序》谓“板荡极而楚骚乃兴，正始存而大雅复作”，认为是沧桑板荡的时世，激发了具有忠君爱国性情的诗人“忧谗慝、痛沦胥”的忧国忧时情怀，一腔忠爱、孤愤发为诗歌，此即楚骚之创作过程。也就是说，有如此性情、如此时世，二者交汇融合才会生发如此思想情感，创作出如此诗歌。这也是“梅村体”反映明清鼎革变迁史实、抒幽愤寄哀思的理论根据：正是本于忧国忧时的性情，痛感于明清鼎革造成的“政教流俗之迁改”（如薙发、易衣冠、更礼节）与“山川云物之变幻”（如“故宫非、江山换”），发为诗词“秋月春花，满眼皆泪”。[2]通过这样的创作自然可以知其人、论其世，与其不朽与经世并重的文学目的、知人论世的批评观念又是一致的。所以，在这方面，吴伟业既不同于强调主体性灵的公安派，也不同于讲究情景交融的盛唐复古派。公安派以自我之快适为创作目的，视主体性灵为创作的决定因素，袁宏道等人虽然爱好山水，也在创作中描绘山川景物，但他们并非着眼于客观景物对主体情感的激发，而是把山水主体化，借以抒写性灵、求得个体的享受与愉悦，所以他们的创作与其时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是脱节的；而盛唐复古派之讲究情景交融，则是为了营造含蓄蕴藉的诗美境界，防止情感表现的直露浅白，其着眼点同样不在客观世界对创作的影响。吴伟业的情景观，显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了自身的内涵，与其“诗史”观紧密结合在一起。

总之，吴伟业“取其中”的涵义就是：要学习古人，但不能死守古人字句，而是首先学习其反映现实的创作精神；要表现作者个体情感，但情感不能脱离时世，即表现其所谓“性情”而非公安派所谓“性灵”。质言之，即作者与客观世界在创作中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不可“一端而求”。所以，吴伟业对七子“复古”思想的超越，并不仅仅表现在其取径较宽，如由七子的专主“盛唐”扩大到开元、大历，更重要的是他对作者“性情”与社会现实的重视，这正是其“诗史”观的内核，是“梅村体”能够成为一代“诗史”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三、情、法完美结合的文学表现观：“毋使才而碍法，毋袭貌而遗情”

与“取其中”的思想一致，吴伟业在《致孚社诸子书》所讲“论文取友之道”的“考文艺”一条中，提出了“毋使才而碍法，毋袭貌而遗情”的诗文表现观。[3]所谓“毋使才而碍法，毋袭貌而遗情”，就是要以工整、圆美的形式表现真实的性情，既不能像

[1]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五，第 758 页。
[2] 陈廷焯《词坛丛话》，第 3729 页，《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1 版。
[3]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四《致孚社诸子书》，第 1087－1088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七子派那样将文学的形式（法）强调到“物之自则”的高度而忽视自我性情，又不能像公安派那样任个性、逞才思而不顾形式。当然，七子派的理论动机未尝不是想将“情”与“法”完美结合，但由于过分强调“格古调逸”的“法”，以致忽略了“情”，颠倒了诗歌创作的目的与手段。而吴伟业对“法”的重视是建立在“本乎性情”的基础上的，而非以古人为准则，其目的是使情感之表现更符合诗歌审美特征，因为在他看来，并非所有的情感都可以直接入诗。如《董苍水诗序》论董氏之诗云：“其才与地既足以自拔，而又使之优闲不仕，蕴其骯脏牢落之气，一发之于诗，故讲求益密，而寄托益深，其篇什将为当世所推，不独雄云间也。”[1]诗歌根柢于作者的“骯脏牢落之气”，但又不象公安派那样任由其宣泄，而是“讲求益密”、“寄托益深”。所谓“讲求益密”即对诗歌之韵律、声调、语言、结构等写作技巧的讲求，而通过这样的审美处理，其“骯脏牢落”的情感就会“寄托益深”，即更有深度，更符合含蓄蕴籍的审美特征，而不致怨怼怒诽。又如《傅石漪诗序》：“其为诗也，于体制风格既讲求渐渍之有素，又能标举蕴藉，剪刻深至，以自探性情之所独得。”[2]对体制、风格的讲求，并不妨碍性情的表现，而是使之蕴藉、深至，即所谓“自探性情之所独得”。

吴伟业情、法完美结合的文学表现观，无疑体现出追求文雅的审美理想，这与其自我不朽的文学目的是一致的。诗歌要有长久的生命力而留传后世，并非只是真实地表达情感、反映现实就可以了，美的艺术形式也是必不可少的，进入诗歌的情感与现实还必须经过审美的过滤。“梅村体”诗史可以说是这一表现观的绝好注脚。另外，吴伟业还结合个人的创作经验总结了一些具体的做诗、作文之法，并向弟子们传授过，在陆元辅、黄与坚、谈迁等人的文章中有一些片段记载，叶君远先生《浅论吴梅村的诗文观》一文有相关论述，[3]兹不赘论。

第三节 “知人论世”批评观的新内涵

吴伟业的批评观亦与上述经世与不朽并重的文学目的论、作者与时世并重的文学创作论一致，以知人论世为核心，并进一步开拓与深化了这一传统批评观的内涵。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其内涵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4]然而发展到明代，在反驳“诗史”说的同时，知人论世批评也受到冷淡。但知人论世批评毕竟有其合理的内核：作家是社会的人，作品是社会的精神产物。一

[1]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第 697 页。
[2]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八，第 678 页。
[3] 见叶君远《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第 60－62 页，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1 版。
[4] 可以参见刘明今《方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三编第一章《知人论世》的相关论述。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旦将文学与社会现实隔绝，其“情思”就易流于空虚，明代复古派的失败便是有力的证明，性灵派流于俚浅率易的根本原因也在此。有鉴于此，明代中后期，随着明王朝的日趋没落，实学思潮日益高涨，“诗史”思想重新抬头，知人论世批评随之浮出水面，至明末清初，随着经世致用文学思潮的盛行，“诗史”创作空前繁荣，文学、作者与社会的关系重又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的焦点。吴伟业知人论世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并与其“诗史”观相结合形成了自身的内涵：

首先，吴伟业强调“知人”与“论世”相结合，以“性情”、“为学”补充传统知人论世观。如《宋尚木抱真堂诗序》论宋征璧诗云：

> ……君子之于诗也，知其人，论其世，固已；参之以性情，考其为学，而后论诗之道乃全。夫尚木之称诗四十年矣，初与大宗伯宛平王公同起，继为同里大樽诸子所推重。宛平之言曰：尚木以膏粱少年，匹马入京师，从有司之举。时椓人窃国柄，君贳酒悲歌燕市中，肮脏扼塞，一发之于诗。大樽之言曰：尚木早岁好为芳华绮丽之辞，一变而感慨激楚，再变而和平深婉，归之于忠爱。……合两君子之言，可以论尚木之人与其世矣。

王崇简论其诗重“知人”，强调个性情感的宣泄；陈子龙论其诗重“论世”，突出了社会政治变化的影响，若按传统知人论世观，合二人之言则“可以论尚木之人与其世矣”，但他认为还必须“参之以性情，考其为学，而后论诗之道乃全”。所谓“性情”，已如前所述，主要指道德人格境界，如尚木“不欲标榜”、“用大体，独拥护老成”的“温柔敦厚之风”。所谓“为学”即前述之“学识”，主要指学以致用的实学。也就是说，知人论世除了要了解作者的天赋秉性及所处社会现实外，还要了解其道德学识在现实尤其是世事变迁中的践履情况，即将“人”与“世”相结合。强调作者的道德境界与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实质即实学思潮在文学领域的反映，是明清之际文论的一个典型特征。如钱谦益提倡诗歌“正纲常、抚世运”的政教功能；[1]陈子龙强调“诗者，非仅以适己，将以施诸远也。《诗三百篇》，虽愁喜之言不一，而大约必极于治乱盛衰之际。”[2]魏禧强调为文“躬行可践”、“见诸行事而有功”；[3]王夫之重视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他提倡比兴手法，也意在发扬《诗经》、《楚辞》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一批评观念延伸到“诗史”观中，即体现为存“史”与抒情并重。易代之际，文人往往以保存故国历史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以诗存“史”是经世致用的重要手段之

---

1 《牧斋有学集》卷十九《十峰诗序》，第 831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2 《陈子龙文集》:《陈忠裕公全集》卷八《白云草自序》，第 446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1 版。
3 《魏叔子文集》外编卷六《答施愚山侍读书》，第 289 页，中华书局 2003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如黄宗羲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唯此是赖。[1]吴伟业正是以“诗史”自任的。纪“史”即要求诗歌反映其“世”，而国破家亡的史实又总是引发其兴亡之感、身世之悲以及未能践履道德理想的良心谴责。所以，“世”与“人”的结合，在明清易代的特定背景下，必然体现为记“史”与抒情的结合，作者之“为学”、“性情”亦于此见焉。这是“梅村体”诗史的一大特征，也是吴伟业“诗史”观对明清之际“诗史”观的一大贡献，突破了自宋代以来以客观记“史”为主要内涵的传统观念，使“诗史”走出了远离诗歌抒情本质的困境。如第二章所述，此种情、史并重的“诗史”观，在明清之际已获得较为普遍之认可。吴伟业正是以大批情、史并重的优秀诗史享誉当时及后世，如《圆圆曲》、《萧史青门曲》、《永和宫词》、《琵琶行》等，均颇脍炙人口，以致“后来摹拟成派”，[2]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吴伟业强调时运对“人”与“诗”的制约作用，突破了明代诗学脱离社会现实的局面。与传统“论世”观侧重探讨社会政治教化或个人世俗生活不同，吴伟业侧重探寻历史的走向，即“时命”。对明清易代的社会现实及历史的反思，使他认识到了“时命”对个人命运的决定作用：“时命苟弗谐，贫贱安可冀？”(《送何省斋》)“时命苟不佑，千载无完人。”(《咏史十二首》其二)“丈夫失时命，无以辞碌碌。”(《毛子晋斋中读吴匏庵手抄宋谢翱西台恸哭记》)生逢乱世，安守贫贱亦成奢望，坚守道德信仰、气节操守或建功立业又谈何容易！即使历史上那些叱咤一世的风云人物，如“霸越平吴”的范蠡，一旦时运变迁，也只能落得“却嗟爱子犹难免”的结局；[3]一代帝王秦始皇：“阿房阁道，钜丽之极观也”，但只“咸阳三月”便“劫灰具烬”，[4]所谓功名事业，在历史的变迁中总归虚有。这不仅仅是看透人生后的豁达，也是对个人未能坚守道德信仰的安慰与开脱。

时运制约着“人”的命运，又通过“人”制约着文学的整体风貌。如第一章所言，吴伟业尽管也在理论上呼吁反映盛世之时代精神的“正始元音”，但又清楚地认识到“文章兴废关时代”。[5]如本章第一节已引用过的《彭燕又偶存草序》指出，“应制雍容，从军慷慨，登临赠答，文酒流连”乃盛世诗人之所为，处于乱世的诗人则难免“悲歌侘傺”。因此，其《观始诗集序》对魏裔介“若夫淫哇之响，侧艳之辞，哀怒怨诽之作，不入于大雅，皆吾集所弗载”的作法表示疑义：“抑诗者，缘情体物，引伸触类，以极其所至者也。若子之论，其汰之无乃太甚乎？”[6]由于身际衰世的不幸命运，使诗人内心郁积着巨大的悲伤、幽愤，故往往发为不平之鸣。但他认为这类“哀怨怒诽”之作

---

1 黄宗羲《南雷文约》卷四《万履安先生诗序》，第 469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205。
2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第 207 页，中国书店 1988 年第 1 版。
3 《吴梅村全集》卷五《谒范少伯祠》，第 146 页。
4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二《秣陵春序》，第 727 页。
5 《吴梅村全集》卷六《癸巳春日禊饮社集虎丘即事四首》其三，第 175 页。
6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七，第 660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并不违背“中和”的审美境界，如《赠琴者王生序》曰：“今聆王生之操，不言哀而哀，得毋张急调下，非中和之响乎？是不然，夫人心有烦冤菀结者，骤闻幽眇之音，愀怆之调，一弹再歌，涕泪横集，则仰首出气，足以释然于胸怀矣。”[1]认为王生之琴虽“张急调下”，但“心有烦冤菀结不能自达者”可因之“导情宣郁”，使心境复归和平，从此角度看又可谓不违“中和”。诗、乐一理，将以情感宣泄为目的的作品纳入“中和”的审美范畴，是为了提高其地位，实质上已突破了传统的儒家诗教。时人如黄宗羲释“温柔敦厚”、孙枝蔚释“哀怨”等，[2]亦是同一思路。总之，是由盛到衰的时运，决定了明清之际文学感慨苍凉的整体风貌。重视时运也是明清之际知人论世观的又一典型特征，如陈子龙《佩月堂诗稿序》：“和平者，志也。其不能无正变者，时也。”[3]钱谦益《顾伊人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声，乱世之不能不怨怒而哀思也，犹治世之不能安以乐也。”[4]朱鹤龄《寒山集序》：“声音之理，通乎世运，感乎性情。……诸君子生濡首之时，值焚巢之遇，则触物而含凄，怀清而激响，怨而怒，哀而伤，固其宜也。”[5]等，皆强调时运对文学创作风貌的制约。反映“世运升降”恰是吴伟业“诗史”观的核心内涵，“梅村体”诗史融兴亡之感与个人身世之悲于一体，诗风激楚苍凉，可泣可歌，正是受到了时运的影响。

第三，吴伟业认为“知人”应透过表面现象探寻作者“本志”，赋予“知人”以知“心”的内涵。如《宋辕生诗序》论杨维桢、袁凯云：

> ……古来诗人，自负其才，往往纵情于倡乐，放意于山水，淋漓僚倒，汗漫而不收，此其中必有大不得已，愤懑勃郁，决焉自放，以至于此也。廉夫为淮张所蹙迫，流离世故，晚节以白衣宣召，仅得归全。海叟从御史放还，数为诇卒所逻察，佯狂病废，得免于难。至今读其诗，有漂泊颠连之感，有沉忧噍杀之音，君子论其世，未尝不悲其志焉。[6]

结合二人在元明之际的艰危处境，认为在其“纵情倡乐”、“淋漓潦倒”的表面行为下，实际上掩藏着“大不得已”的内心情感，即心怀故国，坚守名节，却被新朝强迫出仕的“愤懑勃郁”，其诗中的“漂泊颠连”之感、“沉忧噍杀”之音即此内心情感的流露。

---

[1]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五，第754页。

[2] 黄宗羲《万贞一诗序》：“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结；激扬以抵和平，方可谓之温柔敦厚。”（《黄梨洲文集》第362页）孙枝蔚《吴宾贤陋轩集序》：“其怨也，非于人有所不平之谓也，其哀也，亦不过自鸣其所遇之穷，而且以为诗不出于诚意则不足传也……宾贤之哀怨乃其诗之诚而亦其人之高与！”（《溉堂集·文集》卷一，第10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

[3] 《陈子龙文集》：《陈忠裕公全集》卷七，第38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1版。

[4] 《牧斋杂著》：《有学集文钞补遗》，第442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版。

[5] 《愚庵小集》卷八，第4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

[6]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九，第686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又如《余澹生海月集序》论谢灵运：“康乐祖父为晋室功臣，通侯贵重，刘宋易姓，心念故国，愤愤不得意，以自放乎山泽之游，其本志如此。”[1]同样结合刘宋易姓的特定时世与其世为“晋室功臣”的身世，认为“自发其无聊之气”的诗歌，实际上流露了其“心念故国，愤愤不得意”的“本志”，“傲世轻物，纵诞诡越”的放荡行为不过是表面现象。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人”的外在表现与其内心真实思想情感往往并不一致，要真正理解作家与作品，就必须结合具体处境探寻其“本志”。

吴伟业赋予“知人”以知“心”的内涵，是源于自身感受而做出的适应明清之际文学创作实际的理论发展。如前所述，历经明清易代并被迫失节仕清的吴伟业，深刻体会到了乱世中“人”之行为的不由自主，如其本人之仕清即为了保全生命而不得不牺牲道德信仰，实非本心。始终坚守遗民身份的魏禧尚且感叹“卖文以为耕耘”的不得已之情，[2]如吴伟业这样身仕两朝的文人更可想而知。所以，在明清之际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作者现实行为与内心情感脱节的现象较为普遍，“本志”往往或隐或显地流露在创作中，需要读者设身处地地辨别体会。钱谦益论刘基：“百世而下，必有论世而知公之心者。”[3]与吴伟业便是同一思路。自此，论世而知“心”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角度，后世对吴伟业等人“略其迹而原其心”的批评，皆从此角度而来。这一批评观，甚至对今天的文学思想研究也不无启发，我们同样需要注意结合作者在阐述某种理论、写作某一诗(文)时的具体处境如时间、地点、对象、目的等等，来探寻其真实的思想情感，而不能只看表面所说，叙述者与作者有时并不一致。

此一批评观延伸到“诗史”观中，便是吴伟业“史外传心之史”的著名命题。由于知“心”必须结合作者之时世，故在明清易代这一特定的时世中，可以知“心”的诗歌，必然也反映了此时兴亡盛衰的历史。《且朴斋诗稿序》正是从知“心”的角度入手，结合明清易代的时事，揭示了徐懋曙（映薇）诗歌“不堪凄恻”的内心情感，而此“凄恻”之情恰缘此衰亡“气运”而发，故其诗在传“心”的同时，也反映了兴亡盛衰的历史过程。吴伟业正是由此提出了其“史外传心之史”的著名命题。

当然，吴伟业由知“心”到以“心”传“史”的理论，是与其自觉以诗文表白心迹，以期自赎甚至挽救名节之污的创作动机密不可分的。他自谓其诗“用心良苦”，希望“后世读吾诗而能知吾心”，明确表明其诗是不同于现实行为的“传心”之作，希望后世亦从知“心”的角度读其诗，目的就是弥补挽救业已残损的人格形象，藉以不朽。自觉在诗中抒写愧悔、自责而又迫不得已的内心情感，从而表明“本心”的无辜、行

---

[1] 《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一，第 708 页。

[2] 《魏叔子文集》外编卷六《答施愚山侍读书》：“禧频年客外，卖文以为耕耘，求取猝应之文，动多违心，主人利于流布，辄登板。扪心自忖，其不逮已之所言，盖十而八九矣”。第 289－290 页，中华书局 2003 年 6 月版。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第 13-1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为的无奈，固然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但亦是为获得谅解与同情而进行的精神自赎。并且，他是将这类传“心”之诗当作“诗史”来写的，由此更可见其传“心”于后世的自觉动机。正因有了这样的自觉动机，其“心史”才会有选择地、集中地抒写这些有利于其个人形象又能打动读者心灵的情感，收到了感人至深的效果，使“梅村体”诗史受到一代代文人喜爱，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陈维崧、吴兆骞、陈文述、章静宜、樊曾祥、王闿运……直至现代的老舍、郁达夫等，龚自珍甚至“明知其非文章之极，而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1]由此可见“诗史”因写“心”带来的生命力。自此，在人们的文学观念中，“诗史”不再仅仅是“纪时事”的有韵之“史”，或合乎儒家诗教的讽谕美刺、忧国忧民一类内容，抒写感于时事的个体情感成为突出主题。

第四，在“心史”观的支配下，吴伟业突破传统知人论世观“文如其人”的思维模式，即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认识到了“文不如其人”的一面，反过来强调“人如其文”。传统知人论世观虽也有因文以观世、明志的内涵，但基于从“世”、“人”到“文”的单向线性思维模式，以“世”、“人”与“文”的一致为前提。如前所述，吴伟业却认为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文”比“人”的实际行为更能真实地传达“本心”，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人”、“世”与“文”并非完全一致。这一思想是与其“心史”观结合在一起的：自觉以诗传“心”，目的即希望读者根据其诗而非现实行为来论其“人”，做出“人如其文”的评价，故其本人首先将此批评方式付诸实践，尤其针对那些与他一样迫于“时命”而名节有污的人。如《梅村诗话》之论龚鼎孳：

> 庚寅秋，于临清舟中报余书曰：“……运移癸、甲，大栋渐倾，妄以狂愚，奋身刀俎，甫离狱户，顿见沧桑，续命蛟宫，偷延视息，堕坑落堑，为世惭人。……顾万事瓦裂，空言一线，犹冀后世原心……近年以来，蓬转江湖，仲宣登临，襟情难忍；嗣宗怀抱，歌哭无端。未极斐然，不无驱染。”此书至，余发之于相知，读者无不以为徐、庾复出也……可为三叹！

龚鼎孳以文表白“堕坑落堑，为世惭人”实非本心，故欲借“空言一线”以“冀后世原心”。吴伟业据此认为他乃徐陵、庾信复出，人虽仕新朝，心实系故国。与此思路一致，他还往往指出“文不如其人”的事实，如《戴沧州定园诗序》指出戴沧州诗中的“忧危侘傺之意”，与其现实中“享盛名、履高位”、“宾朋之赏会，景物之流连”的表现并不一致，吴伟业认为诗中之情才是其本心之情。[2]

---

[1] 《龚自珍全集》第九辑《三别好诗·序》，第 46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2] 《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七，第 658-659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明清之际，许多如吴伟业般既已在事实上身仕二姓，又不甘心留“贰臣”骂名于历史的文人如龚鼎孳、钱谦益等，均借诗文来表白本心之忠贞，希望读者因其文而论其人，故“人如其文”的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但这种批评观及其指导下的创作，在真正的气节之士看来却无疑造成了一批言行不一的“假遗民”。有鉴于此，他们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如顾炎武指出：“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其次则王维。灵运身为元勋之后，袭封国公。宋氏革命，不能与徐广、陶潜为林泉之侣。既为宋臣，又与庐陵王义真款密。至元嘉之际，累迁侍中。自以名流，应参时政，文帝惟以文义接之，以致觖望。又上书劝伐河北，至屡婴罪劾，兴兵拒捕。乃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及其临刑，又作诗曰：‘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终尽。’若谓欲效忠于晋者，何先后之矛盾乎！史臣书之以逆，不为苛矣。”与吴伟业对谢灵运的看法恰好相反，并由此进一步指出：“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1]认为那些不能坚守气节而身仕二姓的人，在诗文中表现黍离之感的目的是欲博忠直之名，其情感是假的。又如朱鹤龄《书元裕之集后》：“人臣身仕两姓，犹女子再醮，当从后夫节制。于先夫之事悯默不言可也。有妇于此，亦既奉盘匜、侍巾栉于他人之室矣，后悔其非所也，肆加之以诟詈，而喋喋于先夫之淑且美焉，则国人之贱之也滋甚。……乃今之再醮者，吾异焉。讪辞诋语曾不少避，且日号于众曰：安得与吾先夫子同穴乎！或又并先后夫之姓氏合为一人，或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诳国人者，斯又蔡文姬、李易安之所不屑，非徒悖也，其愚亦甚矣哉！”[2]其本意在骂钱谦益，指责其诗文抒写故国之思意在诳人，几近恶毒的人身攻击。归庄则明确主张“苟其人无足取，诗不必多存。”[3] 这些批判其实恰好从反面证明了“人如其文”观念在当时的盛行。这一观念固然与美化作者形象的动机密不可分，但其所“表暴”之情亦非尽“伪”。章炳麟曾言：“以人情思宗国言，降臣陈名夏至大学士，犹拊顶言不当去发”，故不仅吴伟业之诗“深隐”、“近诚”，钱谦益亦“不尽诡伪”。[4]所以，“人如其文”思想在明清之际产生有其现实土壤，为知人论世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总之，吴伟业的知人论世观，既有明清之际知人论世批评强调道义、学识、时运等的共同特征，又与其以“心史”为“诗史”的诗学观念相结合，形成了独特内涵，是对传统知人论世批评观的开拓与深化，体现了明清之际“诗史”观的新进展。这些

---

1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九“文辞欺人”条，第1458、14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版。
2 《愚庵小集》卷十三《书元裕之集后》，第646－6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
3 《归庄集》卷三《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序》，第2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
4 见徐复《訄书详注·别录第六十一》，第902-9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理论观念的提出，是由于明清之际独特的历史机遇所提供的。其实，在前此的历史发展中，也未必不存在这些问题，如“文如其人”与“文不如其人”的命题，在元好问那里就已经被明确提出，但并未成为广泛流行的理论，因为在一般的历史环境中，文人们没有遭逢生死抉择的人生难题，许多问题均被历史所遮蔽。而在明清朝代更替之际，这些问题由于严酷的现实被推到了历史的前方，于是就有了这些理论观念的提出、强调与深化，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诗学观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结　语

一

吴伟业诗史观典型地体现了明清之际诗史观的新进展。

明清之际，诗史思想空前盛行，而吴伟业走在了这股潮流的最前面。他在继承传统“诗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自身的新内涵。主张诗史不仅应该记录客观时事，还应记录历史变迁过程中个体的内心感受，进而又赋予了它“史外传心之史”的深层内涵，彻底解决了明代诗学给诗史提出的难题。关于诗歌的纪实性与抒情性、记录政治史还是抒写心灵史，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承认“心史”，自然就肯定了诗歌的抒情性，从而将纪实与抒情两种传统在“诗史”观中融合在了一起，彻底解决了这对被明代诗学认为是不能调和的矛盾，为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而由此引发的“文如其人”与“文不如其人”的命题，则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观念。吴伟业的“心史”在某些情境下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表演性，但总体来看大致又是文如其人的。也就是说，“文如其人”与“文不如其人”的命题，都是在某种限度内成立的。如果我们找出“文不如其人”的原因，就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文人心灵的复杂性，从而更好地理解古代文人。

明清之际的许多其他文人，其实也各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诗史”的抒情功能。如钱谦益在《胡致果诗序》中云：“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1]认为杜甫之前的一些诗歌，如曹植《赠白马王彪》、阮籍《咏怀》等，抒写了诗人对时事的“感叹悲愤”，反映了历史的“兴亡升降”，虽无“史”之名却有“史”之实。指出宋末谢翱、汪元量等人“如穷冬沍寒，风高气栗，悲噫怒号，万赖杂作”的诗歌可以“续史”。实际上也是将诗人在历史兴亡中的内心感受如“感叹悲愤”、“悲噫怒号”的情感看作了“史”应记录的内容。又如张煌言《奇零草自序》，将自己寄托“哀世之意”的诗歌比作杜甫诗史、郑思肖《心史》，并指出这些“志可哀”、“情诚可念”的诗歌，可代“年谱”。[2]“年谱”即“史”，实质上就是认为这些抒情诗可以代“史”。再如黄宗羲《万履安诗序》，同样注意到了亡国人物之诗史“血心流注”、“凄楚蕴结”的抒情特征，认

[1] 《牧斋有学集》卷十八，第800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版。
[2] 张煌言《张苍水集》第二编《奇零草自序》，第5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为“苦心”、“痛哭”等亡国感受与“闽、广之兴废”、“黄东发之野死”等具体史实同样是“史”。[1]但是，他们没能彻底摆脱传统“诗史”观的束缚，提到“诗史”时强调的主要还是诗歌的记史功能。如钱谦益《胡致果诗序》虽然承认“诗史”可以抒情，但接下来又云：“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篇啮翰，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2]最终落脚点仍然是存人、存事，即“续史”，在社会动乱、正史阙如的情况下承担“史”的职责。他编集《列朝诗集》的目的就是借诗存人、存事，即存有明一代之历史。也正是职此之故，《钱注杜诗》虽然旨在阐发杜诗之微旨，甚至借题发挥以抒发个人隐衷、发遑个人心曲，但仍然主要采用以史证诗的手法；其自视为“诗史”的《投笔集》之诗歌，虽然也旨在表白个人对故国的忠贞，但与吴伟业的直接“传心”有所不同，他更重视反映自己反清复明的行为事迹。又如黄宗羲《万履安诗序》虽然肯定亡国人物之内心感受是“诗史”应有的内容，但其最终目的却是强调诗史“补史之阙”的史料价值。[3]再如杜浚《程子穆傅放歌序》：“世称子美为诗史，非谓其诗之可□为史，而谓其诗可正史之伪。”[4]因为改朝换代后，新朝在修旧朝之史时，由于避忌往往歪曲史实，所以他主张以诗“正史之伪”。屈大均《二史草堂记》：“少陵何为以诗为史也？予曰：今夫诗者，史之正者也，史则诗之变者也。《诗》之未亡，一代之史在《诗》；《诗》既亡，而一代之史在《春秋》。孔子作《春秋》，所以继《诗》。少陵之诗，则思以羽翼《春秋》而反史之本者也。故曰‘以诗为史’。”[5]认为“诗史”应羽翼正史，具备“史之本”。总之，无论是“续史”，还是“补史之阙”、“正史之伪”、“反史之本”，主要强调的都还是诗歌之“史”的价值，而非吴伟业所谓的“史外之心”。所以，吴伟业在肯定诗史抒情功能的道路上，走在了同时人的最前面。

当然，在明清之际也有对诗史持否定态度者。如王夫之《姜斋诗话》：“夫诗之不可以为史，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6]从“辨体”的角度出发，认为“诗”与“史”两种不同的文体不能相互混淆，就像口与目不能相互替代一样。所以他对杜甫诗歌也颇多贬抑之辞，对其某些诗歌的议论、铺陈以及浅白直露极为不满，与明代杨慎对“诗史”的批评基本一致。但他并非反对诗歌反映时事，如评李白《登高山而望远海》一诗云：“后人称杜陵为诗史，乃不知此九十一字中有一部开元天宝本纪在内。”[7]认为李白这首抒情诗反映了一代历史，其实就是说，诗歌记“史”不能脱离抒情特征，史实

---

1 黄宗羲《南雷文约》卷四《万履安先生诗序》，第 469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205。
2 《牧斋有学集》卷十八，第 800 页，《钱牧斋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3 《南雷文约》卷四《万履安先生诗序》，第 469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205。
4 杜浚《变雅堂遗集》：《变雅堂文集》卷一《程子穆倩放歌序》，第 15 页上，句中“□”表示缺字，《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1394。
5 屈大均全集》：《翁山文钞》卷一《二史草堂记》，第 32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
6 王夫之《姜斋诗话》，第 6 页，《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3 年 9 月第 1 版。
7 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第 21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应该通过景语或情语暗示，而不是直接说出来。又如其评古诗“上山采蘼芜”云：“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着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1]同样强调诗歌之记事不能脱离抒情，“事”只能作为情感的依托，即所谓“即事生情”，这与吴伟业“史外传心之史”的内在思路其实是一致的。又如傅山，虽然推重杜诗，但对“诗史”说却持批判态度：“‘史’之一字，掩却杜先生，遂用记事之法读其诗。老夫不知‘史’，仍以诗读其诗。世出世间，无所不有。”[2]实际上也是强调“诗”与“史”在创作手法以及审美特征上的区别，而并非否定杜诗反映时事的功能。所以，他们的观点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吴伟业“心史”观的价值与意义。

二

吴伟业诗史观正因其独特的价值，更因其指导下杰出的创作实践——“梅村体”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伟业诗歌在清代备受人们关注与喜爱，并且被公认为“诗史”。通过众多有关吴诗的评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吴伟业诗史对清代诗史观的重大影响，如：

> （梅村诗）感怆时事，俯仰身世，缠绵凄惋，情余于文。……梅村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3]
>
> 国变后诸作，缠绵悱恻，凄丽苍凉，可泣可歌，哀感顽艳。以身际沧桑陵谷之变，其题多纪时事，关系兴亡，成就先生千秋之业，亦不幸之大幸也。[4]
>
> 世称杜少陵为诗史，学杜者不须袭其貌，正须识此意耳。吴梅村歌行，大抵发于感怆，可歌可泣。七古最有名于世，大半以《瑟琶》《长恨》之体裁，兼温、李之词藻风韵，故述词比事，浓艳哀婉，沁入肝脾。……体则元、白，可为史则已如杜也。[5]
>
> 王荆公以少陵诗为沉着痛快。或问义山，曰：彼亦自有沉着痛快处。余服膺梅村诗，谓可追配少陵者此也，惊心动魄，殊移我情。[6]
>
> ……

---

1 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第 145－146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2 《霜红龛集》卷四十《杂记五》，第 726 页，《续修四库全书》集 1395。
3 赵翼《瓯北诗话》卷九，第 130－13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第 1 版。
4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第 2355 页，《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5 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一，第 1666 页，《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6 靳荣藩《吴诗集览》:《谈薮拾遗》引张如哉语，苏州扫叶山房藏版乾隆刻本。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他们的诗史观显然已不再是单纯强调诗歌“史”的价值，而是重在强调诗歌抒写诗人对时事之感受的功能。所谓“缠绵凄惋，情余于文”、“ 缠绵悱恻，凄丽苍凉，可泣可歌，哀感顽艳”、“浓艳哀婉，沁入肝脾”、“惊心动魄，殊移我情”，描述的就是吴伟业诗史的感人效果与抒情特征。当然，这种诗史观念并非仅仅体现在有关吴诗的评价中，而是清代诗学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如王士祯评杜甫诗史云：“独是工部之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1]认为杜诗之所以被尊为“诗史”，是因其以忠君爱国之情为本而“感时纪事”。实质即认为“诗史”应该表现诗人对时事的内心感受，而非纯粹客观地记录时事。朱庭珍《筱园诗话》亦云：“少陵诗伤时感事诸篇，其时势人地，一一切合，得失分明，怀抱亦露，故有‘诗史’之目，不止作忧乱愤激之词也。”[2]同样以“伤时感事”为“诗史”的主要内涵。

由此可见，以抒写个人对时事的内心感受为诗史的主要内涵，在清代已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诗学观念。而吴伟业诗史观及其指导下的“梅村体”诗史，在此观念的形成与普遍化过程中，无疑有开创之功与巨大影响。

1 郎廷槐编《师友诗传录》，第 145 页，《清诗话》本。
2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第 2354 页，《清诗话续编》本。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主要参考文献

十三经注疏	阮元校刻	上海古籍 1997 年第 1 版
明儒学案	黄宗羲	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1 版
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	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 版
泾皋藏稿	顾宪成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顾端文公遗书	顾宪成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14
问辨牍	管志道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87
高子遗书	高攀龙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汉书	班固	中华书局 1962 年第 1 版
后汉书	范晔	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1 版
史记	司马迁	中华书局 1982 年第 1 版
隋书	魏征	中华书局 1973 年第 1 版
陈书	姚思廉	中华书局 1972 年第 1 版
宋史	脱脱	中华书局 1977 年第 1 版
明史	张廷玉等	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 版
明史纪事本末	谷应泰	中华书局 1977 年第 1 版
清史稿	赵尔巽等	中华书局 1977 年第 1 版
东林书院志	高廷珍等编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24
社事始末	杜登春	吴江沈氏世楷堂道光刻本
复社纪略	陆世仪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复社姓氏传略	吴山嘉	中国书店 1990 年第 1 版
日知录集释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	上海古籍 1985 年第 1 版
枣林杂俎	谈迁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113
北游录	谈迁	中华书局 1960 年第 1 版
国榷	谈迁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58 年第 1 版
幸存录	夏允彝	上海书店 1982 年第 1 版
绥寇纪略	吴伟业	上海古籍 1992 年第 1 版
四友斋丛说	何良俊	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菽园杂记	陆容	中华书局 1935 年第 1 版
丹午笔记	顾公燮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五石脂	陈去病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郎潜纪闻	陈康祺	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1 版
茇楚斋随笔	刘声木	中华书局 1998 年第 1 版
东林本末	吴应箕	上海书店 1982 年第 1 版
东林始末	蒋平阶	上海书店 1982 年第 1 版
烈皇小识	文秉	上海书店 1982 年第 1 版
研堂见闻杂记	佚名	上海书店 1982 年第 1 版
姑苏志	王鏊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述异记	任昉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太仓州志	张采	崇祯刻本
镇洋县志	金鸿修，李鳞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缩微制品

梅村家藏稿	吴伟业	宣统三年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
梅村集	吴伟业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梅村诗集笺注	吴伟业著，吴翌凤笺注	嘉庆十九年沧浪吟榭刻本
吴诗集览	吴伟业著，靳荣藩笺注	苏洲扫叶山房藏版乾隆刻本
吴梅村诗集笺注	吴伟业著，程穆衡笺注	上海古籍 1983 年第 1 版
吴梅村全集	吴伟业著，李学颖点校	上海古籍 1990 年第 1 版
梅村词	吴伟业著，李少雍点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1 版
硕园诗稿	王昊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9 辑 16 册
巢松集	王抃	四库未收书揖刊第 8 辑第 22 册
芦中集	王摅	四库未收书揖刊第 8 辑第 22 册
端峰诗选	毛师柱	四库未收书揖刊第 8 辑第 22 册
白溆先生文集	沈受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238
西斋集	吴暻	清康熙刻本
清诗别裁集	沈德潜	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1 版
陈子龙诗集	陈子龙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陈子龙文集	陈子龙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娄东诗派	汪学金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9 辑第 30 册
陆菊隐先生文集	陆元辅	民国间抄本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愿学斋文集	黄与坚	清抄本
曝书亭集	朱彝尊	四部丛刊初编集 278－280
魏叔子文集	魏禧	中华书局 2003 年第 1 版
南雷文约	黄宗羲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205
南雷文定	黄宗羲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205
霜红龛集	傅山	续修四库全书集 1395
施愚山集	朱鹤龄著，何庆善点校	黄山书社 1982 年第 1 版
顾亭林诗文集	顾炎武	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1 版
顾亭林诗笺释	顾炎武著，王冀民笺	中华书局 1998 年第 1 版
屈大均全集	屈大均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
七录斋集	张溥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82
七录斋诗文合集	张溥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1387
变雅堂遗集	杜浚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1394
偶存草	彭宾	清初刻本
林屋文稿诗稿	宋征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215
抱真堂诗稿	宋征璧	顺治九年自刻本
蓼斋集	李雯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111
改亭文集、诗集	计东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228
钱牧斋全集	钱谦益	上海古籍 2003 年第 1 版
列朝诗集小传	钱谦益	上海古籍 1959 年第 1 版
龚芝麓先生集	龚鼎孳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13 卷
壮悔堂文集	侯方域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51
陈迦陵集	陈维崧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281
尤西堂全集	尤侗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129
艮斋杂说	尤侗	中华书局 1992 年第 1 版
归庄集	归庄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钱遵王诗集笺校	钱曾著，谢正光笺校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0
张苍水集	张煌言	上海古籍 1985 年第 1 版
瞿式耜集	瞿式耜	上海古籍 1981 年第 1 版
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	周亮工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36
王文肃公全集	王锡爵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136
钱忠介公集	钱肃乐	丛书集成续编集 149
桃花扇	孔尚任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	上海古籍 1999 年第 1 版
文征明集	文征明著，周道振辑校	上每古籍 1987 年第 1 版
匏翁家藏集	吴宽	四部丛刊初编集 255－256
李东阳集	李东阳、周寅宾点校	岳麓书社 1984 年第 1 版
空同先生集	李梦阳	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 1976
大复集	何景明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廷相集	王廷相著，王孝鱼点校	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1 版
由拳集	屠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180
大泌山房集	李维桢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150
澹园集	焦竑	中华书局 1999 年第 1 版
弇州山人续稿	王世贞	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0
诗薮	胡应麟	上海古籍 1958 年第 1 版
袁宏道集笺校	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	上海古籍 1981 年第 1 版
张岱诗文集	张岱著，夏咸淳点校	上海古籍 1991 年第 1 版
谭元春集	谭元春	上海古籍 1998 年第 1 版
郑思肖集	郑思肖	上海古籍 1991 年第 1 版
文天祥全集	文天祥	中国书店 1985 年第 1 版
增订湖山类稿	汪元量著，孔凡礼辑校	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1 版
霁山文集	林景熙	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1 版
蛟峰先生文集	方逢辰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88
朱熹集	朱熹著，郭齐、君波点校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
越缦堂读书简端记	李慈铭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1 版
顾曲麈谈	吴梅	上海古籍 2000 年第 1 版
尩书详注	章炳麟著，徐复注	上海古籍 2000 年第 1 版
射鹰楼诗话	林昌彝	上海古籍 1988 年第 1 版
随园诗话	袁枚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第 1 版
瓯北诗话	赵翼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第 1 版
国朝诗话	杨际昌	《清诗话续编》本
筱园诗话	朱庭珍	《清诗话续编》本
剑溪说诗	乔亿	《清诗话续编》本
诗辩坻	毛先舒	《清诗话续编》本
诗筏	贺贻孙	《清诗话续编》本
姜斋诗话	王夫之	《清诗话》本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师友诗传录	郎廷槐编	《清诗话》本
麓堂诗话	李东阳	《历代诗话续编》本
艺苑卮言	王世贞	《历代诗话续编》本
本事诗	孟棨	《历代诗话续编》本
升庵诗话	杨慎	《历代诗话续编》本
太仓十子诗选	太仓十子著，吴伟业选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384
古诗评选	王夫之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年第 1 版
唐诗评选	王夫之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年第 1 版
明诗评选	王夫之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年第 1 版
明诗平论	朱隗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169
明诗纪事	陈田	上海古籍 1993 年第 1 版
清诗纪事初编	邓之诚	上海古籍 1985 年第 1 版
晚晴簃诗汇	徐世昌	中国书店出版社 1988 年第 1 版

银鱼集	黄裳	三联书店 1985 年第 1 版
清诗纪事	钱仲联	江苏古籍出版 1987 年第 1 版
梦苕盦专著二种	钱仲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第 1 版
明末清初的学风	谢国桢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谢国桢	中华书局 1982 年第 1 版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左东岭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明代心学与诗学	左东岭	学苑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	谢正光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	何宗美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明代诗学	陈文新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清代诗学	李世英、陈水云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清代诗学研究	张健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清诗史	严迪昌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清代文学研究	段启明、汪龙麟	北京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赵园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方法论	刘明今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	傅璇琮、蒋寅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1 版
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	蒋寅	中华书局 2003 年第 1 版
井中奇书考	陈福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 [日]冈田武彦 上海古籍 2000 年第 1 版
吴梅村年谱 冯其庸、叶君远 江办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第 1 版
吴伟业与娄东诗传 叶君远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 叶君远 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1 版
吴梅村诗歌创作探析 裴世俊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 版
吴伟业评传 叶君远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吴梅村研究 徐江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
吴梅村诗歌艺术新论 伍福美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
Two Journeys to the Nor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etic Journals of Wen T'ien-hsiang and Wu Mei-ts'un Tung Yuan-fang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2000
增订吴梅村研究 王建生 (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0
吴梅村钩沉 施祖毓 (香港)天马图书有陷限公司 2003
吴伟业与中国古代叙事诗 程相占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
吴梅村生平创作考论 王于飞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
吴伟业诗歌研究 何锐钰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
吴伟业戏曲研究 孙利平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

试论吴伟业叙事诗的艺术特色 陈抱成 郑州大学学报 1981 年第 1 期
论吴伟业史诗的思想特征 罗东升、何天杰 华南师大学报 1983 年第 2 期
吴梅村的诗风与人品 黄天骥 文学评论 1985 年第 2 期
论吴梅村诗歌的艺术特色 叶君远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9 年 3 期
简论吴梅村诗歌的悲剧特色 裴世俊 山东师大学报 1996 年第 5 期
论吴梅村的早期诗歌 叶君远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7 年 1 期
诗史思维与梅村体史诗 魏中林、贺国强 文学遗产 2003 年第 3 期
吴梅村诗学理论刍论 徐江 中国文化研究 2002 年 02 期
试论吴伟业的文学思想及其渊源 林启柱 重庆师院学报 1996 年第 3 期
吴伟业的诗史思想 程相占 苏州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4 期
徘徊于灵与肉之际的悲歌 魏中林 苏州大学学报 1990 年第 1 期
吴伟业传奇、杂剧撰年考辨 黄果泉 河南师大学报 2000 年第 6 期
吴梅村的一首重要佚诗 叶君远 文献 2001 年第 3 期
二十世纪吴伟业诗研究述评 汪龙麟 社会科学战线 2000 年第 4 期
论“梅村体”的用典 程相占 山东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1 期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梅村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林启柱　渝州大学学报 1999 年第 2 期
七言歌行的演变与“梅村体”　王于飞　苏州大学学报 2002 年第 3 期
弘治、嘉靖年间吴中士风的一个侧面　罗宗强　中国文化研究 2002 年冬之卷
崇祯末《心史》刊刻经过及序跋者考　陈福康　学术月刊 1998 年第 12 期
论“梅村体”　叶君远　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 2002 年 02 期
吴伟业行实考二则　王于飞　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 2004 年 03 期
“梅村体”辨　曾垂超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2002 年 04 期
论“梅村体”　徐江　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 2002 年 02 期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致　谢

在论文完成之际，我要衷心地感谢辛勤培养我的导师左东岭先生。从选题、写作到修改，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导师大量的心血和汗水。由于知识积累与理论素养的欠缺，论文写作过程中，尤其是在研究思路的转变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导师为我反反复复地讲解，反复复地纠正，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劳动。每次看到导师因我不能开悟时的焦虑，尤其是看到先生修改过的文稿时，我在感激之余，总不免深深的愧疚。先生的道德人品与严谨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也为我以后的做人与治学树立了榜样。我自知，论文目前的水平，离先生的要求还很远。在以后的岁月里，惟有加倍努力，才有希望不辜负先生的教诲与期冀。

我在此深切感谢黄卓越、赵敏俐、吴相洲、邓小军、鲁洪生诸位先生，在论文的修改过程中，他们给了我许多指导。黄先生为我主持开题报告与预答辩，就论文的一些观点给出了补充与深化的宝贵建议，并给予我鼓励。赵先生就论文题目与整体内容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并为我指出论文中的硬伤。吴先生大到篇章结构、论述重心，小到句、字、论文格式，都给了我许多详细的指导。邓先生对文献资料的补充，对进一步研究方向的指点，鲁先生对概念严格辨析的意见，都使我获益良多。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我在此还要感谢我读硕士期间的老师杜贵晨先生、张稔穰先生、王承丹先生，他们带我走上学术的道路，并且一直给予我热情的关怀与鼓励。

感谢丁功谊、刘尊举、郭艳华、莫真宝、卫崇周、林春虹、李琳等同门，感谢好友颜丽博士、杨梅博士，他们在很多方面给了我真诚的帮助，诚挚的手足情谊让我感动。

最后，我还要感谢同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爱人李健，在精神上、生活上默默地给予我支持与呵护，这段携手奋斗、艰辛但充实的日子，令我永远难以忘怀。

所有这些，都是鼓舞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张金环

2006 年 5 月 15 日于首都师大学生公寓 4－112 室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